

SRBA SHOI
ZABULYORIE
KESARE GAIAX

【乌】米尔切夫·弗拉基米尔 著
吴世红 译 著

十八世纪 扎波罗热哥萨克概览

Нариси з історії запорозького козацтва
XVIII століття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安徽省芜湖市北京东路111号）

内容简介

本书以乌克兰扎波罗热国立大学历史系主任米尔切夫教授所著《十八世纪扎波罗热哥萨克概览》为蓝本扩充而成。其中既重构了1709年之后扎波罗热哥萨克处于克里米亚汗国庇护之下的这段历史，也描写了1734年之后扎波罗热盖达马克群体建立自主塞契并在那里生存生活的情况。同时，本书还追溯了塞契哥萨克效力土耳其及奥地利等帝国的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梳理了帝俄政府与塞契关系以及黑海哥萨克军建立等诸多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本书可为从事相关区域国别研究工作者提供史料性参考。

STUDA NIEMI ZADOLFORE GESAKE GAILAN

十八世纪 扎波罗热哥萨克概览

Нариси з історії запорозького козацтва
XVIII століття

[乌] 米尔切夫·弗拉基米尔◎著
吴世红◎译 著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芜湖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八世纪扎波罗热哥萨克概览/(乌克兰)B.米尔切夫著;吴世红译著.—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9

ISBN 978-7-5676-6160-8

I. ①十… II. ①B… ②吴… III. ①哥萨克人—民族历史—研究—俄罗斯—18世纪 IV. ①K512.8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2023)第 078880 号

十八世纪扎波罗热哥萨克概览

[乌]米尔切夫·弗拉基米尔◎著

吴世红◎译著

责任编辑:吴 琼

责任校对:晋雅雯

装帧设计:王晴晴 姚 远

责任印制:桑国磊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北京中路2号安徽师范大学赭山校区 邮政编码:241000

网 址: <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 0553-3883578 5910327 5910310 (传真)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23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23年9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880 mm × 1230 mm 1/32

印 张: 9 插页: 4

字 数: 20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676-6160-8

定 价: 35.00元

凡发现图书有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553-5910315)



图一：扎波罗热哥萨克回函土耳其苏丹



图二：十七世纪中期哥萨克神甫



图三：传说中的哥萨克马迈



图四:赫梅尔尼茨基之科尔逊之战(1648年)



图五:科什阿塔曼康斯坦丁·戈尔季延科与瑞典国王卡尔十二世及盖特曼马泽帕(1709年)



图六：塞契阿塔曼招兵



图七：波德波利纳亚河畔船厂



图八:扎波罗热哥萨克炮兵之要塞围攻战



图九:阿塔曼奥利菲尔·戈洛布殒歿



图十：哥萨克头领伊万·哈吉单挑波军大将



图十一：老伙计，搭把手！



图十二：解救受伤兄弟



图十三: 培训未来哥萨克



图十四: 哥萨克井边戏村姑



图十五: 圣诞节意外归客



图十六: 扎波罗热盖达马克酒店寻欢

致读者

亲爱的中国读者,您手中这本书旨在介绍乌克兰历史上的光辉一页——哥萨克人历史。十五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给后人记忆中留下了整整一个“哥萨克”时代。乌克兰境内的哥萨克大地上,扎波罗热及其都城——塞契——尤为后世所传颂。

十八世纪扎波罗热哥萨克史一直是乌克兰国内史学界的关注焦点。这些研究在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期间奠定了坚实的史学基础,代表着整个学术流派和个别历史学者多年来的学术活动成就。A. 斯卡利科夫斯基、H. 科斯托马洛夫、B. 安东诺维奇、M. 格鲁舍夫斯基、Д.И. 亚沃尔尼茨基、H. 波伦斯卡娅-瓦西莲科、B. 戈洛布茨基、E. 阿帕诺维奇、A. 什维季科、Ю. 米茨克以及诸多其他扎波罗热史学研究者经年累月,笔耕不辍,不断丰富着乌克兰史学研究宝库。

乌克兰独立后的三十年里,得益于国内自由化的政治生活和哥萨克史地区研究中心的发展,此类研究活跃起来,扎波罗热、敖德萨、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等城市纷纷建立起一批实力雄厚的哥萨克研究中心。此外,加拿大和俄罗斯的一些史学家也研究起该问题来。仅从十八世纪九十年代至十九世纪初,已出



版学术研究成果的就有C. 安德烈耶娃^①、A. 巴钦斯基^②、E. 巴钦斯卡娅^③、A. 博伊科^④、B. 格里博夫斯基^⑤、Л. 马连科(罗辛娜)^⑥、C. 莫古丽奥娃(卡尤克)^⑦、A. 奥利依内克^⑧、И. 沙波什尼科夫^⑨、Д. 谢尼亚^⑩、P. 施阳^⑪等学者。

① C.C. 安德烈耶娃:论克里米亚汗国马泽帕移民与扎波罗热哥萨克联系(1738年—1758年)//科学笔记:青年学者与研究生作品集,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格鲁舍夫斯基古文献学与史科学研究所,基辅,2006,第12卷,第77-91页。

② A.Д. 巴钦斯基:多瑙河右岸塞契(1775—1828),历史文献概要,敖德萨,1994。

③ O.A. 巴钦斯卡娅:十八世纪君士坦丁堡沿多瑙河地区殖民政策研究//中东欧乌克兰(自古代至十八世纪末期),学术作品集,第3辑,基辅:乌克兰国家社会科学院乌克兰史研究所,2003,第243-252页。

④ A.B. 博伊科:十八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扎波罗热窝冬村研究,扎波罗热:“出版者”广告出版公司,1995。

⑤ B.B. 格里博夫斯基:大边界背景下的扎波罗热人和诺盖人//哥萨克遗产,乌克兰国家社会科学院乌克兰历史研究所哥萨克科学研究所尼科波尔分所研究丛刊,第1辑,尼科波尔-扎波罗热:覃登出版公司,2005,第95页、131页。

⑥ Л. 马连科:亚速夫哥萨克军(1828—1866),扎波罗热,2000。

⑦ C.M. 莫古丽奥娃:多瑙河右岸哥萨克的初期行动:论扎波罗热哥萨克转入土耳其帝国起因//扎波罗热国立大学南乌克兰历史学术研究实验室笔记,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南乌克兰研究,第2辑,扎波罗热:覃登出版公司,1996,第108-115页。

⑧ A. 奥利依内克:扎波罗热塞契覆灭原因探索//乌克兰历史杂志,1992,第2期,第38-45页。

⑨ И. 沙波什尼科夫:布格-德涅斯特罗夫塞契(1775—1780)//哈吉别-敖德萨与乌克兰哥萨克(1415—1797),敖德萨:“ОКФА”出版社,1999,第47-110页,(《永不枯竭的记忆文献》系列,第三卷)

⑩ Д.В. 谢尼亚:十七世纪最后二十五年至十八世纪初的克里米亚汗国与哥萨克:国际政治背景下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以顿河哥萨克和扎波罗热哥萨克为例)//哈兹亚克联盟(1658—2008)三百五十年纪念//杰列兹·亨钦斯科依-亨奈尔等主编,华沙:“DiG”出版社,2008,第531-550页。

⑪ P. 施阳:十八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南乌克兰哥萨克研究,扎波罗热:覃登出版公司,1998。

然而我们发现,与这些成果相伴而存的是某些个别问题因无人问津而导致扎波罗热哥萨克史学研究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衡。究其因,主要在于史学研究者对一些基本文献史料缺乏掌握。

本书作者——乌克兰扎波罗热国立大学历史系主任B. 米尔切夫教授在最近二十多年里进行了多次学术调研,到访过俄罗斯、波兰、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等国,盘桓于莫斯科、圣彼得堡、克拉斯诺达尔、华沙、克拉科夫、扎格勒布、贝尔格莱德、诺维-萨德以及番切沃等各大城市的档案馆和图书馆,了解了有关十八世纪扎波罗热哥萨克历史文献的补充资料。笔者以其挖掘到的基础性资料为主干,完成了哥萨克特定历史的重构。

本书所构建的内容在编年史与地域空间方面有着自己的特色,它们囊括了整个十八世纪从巴尔干到高加索的广袤地域。其中,既有对前三分之一世纪扎波罗热哥萨克处于克里米亚汗国庇护之下的生存情况描写,也有对1734年之后扎波罗热盖达马克群体建立自主塞契的活动概述,还有对塞契士兵效力土耳其及奥地利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片段的重现。同时,本书也不乏对沙俄政府剿灭塞契以及建立黑海哥萨克军等诸多历史事件的起因进行分析。本书涉及的某些内容笔者在其他研究中已有





部分涉猎^①。

本书突出特点和根本不同之处在于,笔者几乎完全凭借其亲手采集到的第一手文献史料的实义化信息潜力,重构了十八世纪扎波罗热哥萨克史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画卷,直观表明了存在着新的、能够阐释扎波罗热史上不为人知和存有争议的事件的广泛可能性。

本书能够用中文在芜湖出版乃缘于一场幸运之遇。首先,这得益于以尼古拉·弗罗洛夫教授为首的乌克兰扎波罗热国立大学校领导同以顾家山教授为首的安徽师范大学校领导大力推动的两校间国际合作及其合作成果——扎波罗热国立大学孔子课堂(2018),它是本书走进中国读者视野的桥梁;其次,得益于对扎波罗热哥萨克人历史具有浓厚兴趣的时任孔子课堂首任中方院长吴世红先生,是他对本书的写作给予了推动与协作。

2019年下半年,笔者以安徽师范大学教育部国别与区域研究中心——“伏尔加-第聂伯两江流域研究中心”外籍特聘专家

^① B. 米尔切夫:(a)“反塞契”探索:哥萨克自由区之外的扎波罗热塞契(1740—1760)//科学笔记:青年学者与研究生作品集,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格鲁舍夫斯基古文献学与史料学研究所,基辅,2005,第10卷,第231—250页;(b)克里米亚汗国治下的第聂伯河下游扎波罗热哥萨克军//乌克兰哥萨克史:概论,两卷版,集体编辑:B.A. 斯莫里(主编)等,基辅:“莫吉拉学院”出版社,2006,第1卷,第587—603页;(c)1775年第聂伯河下游扎波罗热哥萨克军自由区吞并始末:方案、计划及实施//南方档案//学术作品集,历史科学,第21辑,赫尔松:赫尔松大学出版社,2006,第47—53页;(d)1785—1790年代奥地利帝国军事边境区的扎波罗热哥萨克(研究与资料),扎波罗热:覃登出版公司,2007;(e)塞契覆灭后头十年土耳其境内的扎波罗热哥萨克分支//哥萨克遗产,阿尔马纳赫社会研究所,第4辑,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波罗基出版社,2008,第92—101页。

身份来安徽师范大学进行为期六个月讲学,良好的环境使得本书得以完成最后构思。截至2022年初的近三年时光里,得益于中乌两国间富有成果的合作,本书完成了主要内容的写作。同时,扎波罗热国立大学历史系也完成了对中国公派攻读硕士学位留学生吴文迪同学的培养工作。其间,该同学不仅参与了本书部分内容的资料收集工作,还参与了部分内容的写作协助工作。

本书使用了很多精美的人物插图和反映哥萨克重大历史活动场景的画作。除特别说明外,这些作品均出自扎波罗热著名画家、历史学家米罗斯拉夫·多布良斯基先生之手。这些绘画作品现今珍藏于史学专家瓦列里·科济列夫私人画廊。作为这些作品的作者和收藏者,多布良斯基和科泽列夫热情将其奉献出来,以便中国读者能更加充分直观地感受到扎波罗热哥萨克塞契的日常生活和战斗气息。

本书创作集体对现任安徽师范大学校领导、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领导和出版社工作人员以及安徽省出版界有关领导表示诚挚感谢,正是得益于他们的大力支持,本书方有可能以中文形式呈现于读者面前。愿本书的出版有助于中国读者更好地了解扎波罗热哥萨克乃至整个乌克兰历史,促进中乌友谊发展和文化交流,推动世界和平。



前 言

扎波罗热哥萨克——对于我国大多数读者而言,这是一个陌生的文化名词,除了列宾名画《扎波罗热哥萨克回函土耳其苏丹》能提供一些信息之外,大家就很难再从其他途径获取关于它更多专门的信息了。本书《十八世纪扎波罗热哥萨克概览》或许有助于大家了解一些这方面的情况。

本书原本由乌克兰扎波罗热国立大学历史系教授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米尔切夫先生所著。米教授是扎波罗热哥萨克问题研究专家。近二十多年来,他到访过俄罗斯、波兰、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等国,追寻了哥萨克当年的踪迹,收集到关于其活动历史的第一手史料,以此为基础,完成了扎波罗热哥萨克自“1709塞契覆灭事件”至“1792年移师库班”这段特定历史阶段的重构工作。因此,此书涉及的地域空间和历史空间跨度非常大,几乎囊括了现今东南欧大部分国家所在地区,如俄罗斯、乌克兰、波兰、罗马尼亚、摩尔多瓦、克罗地亚等,涉及俄罗斯帝国、波兰-立陶宛王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克里米亚汗国、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等历史上诸多国家。

也正因如此,翻译此书对译者来说是一个巨大挑战。好在译者一直与米教授保持着沟通,及时向他请教原著中涉及的历史问题,现学现卖。但即便这样,读者也一定能够看出,本书中



有不少文字的处理不够专业,水平如此,实属无奈。

本书所涉及的人名和地名等专名和术语的翻译遵照一条原则:依据国内哥萨克研究者普遍接受的译法来翻译,而没有严格按人名和地名翻译标准处理。这其中包括一些重要专有名称,如乌克兰著名学者“М.С. Грушевський”,本书没有译作“М.С. 赫鲁舍夫斯基”而代之以国内习惯译名“М.С. 格鲁舍夫斯基”。又如,乌克兰的“Запоріжжя”市,本书也是按国内习惯称之为“扎波罗热”,而非“扎波利热”。最为突出的是本书关键名称“Січ”一词译名。按理,它应当译为接近乌克兰语发音的“西奇”。如,乌克兰著名的航空发动机公司“Мотор Січ”,其名称中的“Січ”一词便是借用了历史上扎波罗热哥萨克大本营“Січ”之名,国内一般称该公司为“马达西奇”。但本书遵循了国内哥萨克研究者习惯接受的名称,将“Січ”处理为“塞契”。

在翻译原著的过程中,经与米教授商量,译者对各章的原标题做了一点调整,使得它们均以三字至五字的关键词打头,这样使标题更加醒目,方便读者快速把握该章节主题内容。

细心的读者还会发现,本书中提及的人名没有统一格式。比如,有些人物有全名(姓、名和父称),而有些人物却只有姓氏或名字,还有些人物的名字或父称只有缩写形式,这或许是原著作者所使用的史料原本就是如此。本书史料丰富,且不少都是出自同一份史料文献,作者一律使用脚注方式来体现,译者尊重这一做法。

作为文化历史现象的哥萨克在我国也有不少学者在研究,希望本书能给大家提供一点参考。这不仅是译者心愿,也是原著作者心愿。

目 录

第一章	哥萨克序:十八世纪前扎波罗热哥萨克 主要发展历程	001
第二章	入籍汗国:效力于克里米亚汗王的扎波罗热 哥萨克	023
第三章	最后的塞契:新塞契/波德波利纳亚塞契/ 波克罗夫塞契(1734年—1775年)	063
第四章	帕兰卡:新塞契时期下游扎波罗热军行政区 (1734年—1775年扎波罗热边界)	092
第五章	体制改革:新塞契时期沙俄帝国体系里的 扎波罗热军(1734年—1755年)	104
第六章	盖达马克:十八世纪扎波罗热哥萨克人的 一次社会运动	115
第七章	哥萨克宝藏:扎波罗热哥萨克生活中的 藏宝与探宝活动	164
第八章	哥萨克改制:沙俄政府对下游扎波罗热哥萨克军 及其他哥萨克部队的体制改造	183



第九章	布特卡雷:塞契覆灭后的土耳其扎波罗热哥萨克 (1775年—1791年)	213
第十章	马耳提兹:效力于哈布斯堡王朝的扎波罗热 哥萨克(1785年—1790年)	238
第十一章	黑海哥萨克:沙俄帝国前扎波罗热哥萨克 新军事组织(1783年—1801年)	263
结 语		273
后 记		277

第一章 哥萨克序：十八世纪前扎波罗热哥萨克 主要发展历程

倘若中国读者被问及对乌克兰以及哥萨克过往历史知道多少,估计大多数人会想起杰出画家列宾的世界名画《扎波罗热哥萨克回函土耳其苏丹》^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列宾塑造的艺术形象十分真实地传达了距离画家着手创作此画两百多年前哥萨克塞契(哥萨克的核心要塞)的生活场景。

1878年,列宾听闻流传着一封哥萨克写给他们对手的诙谐有趣的信函,于是他便开始构思此画。据说,那是哥萨克写给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四世的回信,后者来函劝说哥萨克顺从他并承认他的统治(1676年)。回信内容妙语连珠,趣味横生(尽管有些话闻之不雅),真实展现出哥萨克人的性格。这使得该信在很多年内一直在乌克兰大地上以手抄本形式广为流传^②。

然而现实化创作构思并非一件易事:从1878年至1893年,列宾差不多在这幅画作上花费了十五年的时光!在创作准备阶段,他十分用心地收集有关哥萨克群体的材料——衣着样式、兵器实物等,亲身前往扎波罗热哥萨克从前生活过的地方考察,广

① 参见本书彩页。此画现珍藏于乌克兰哈尔科夫美术馆。

② Д.И. 亚沃尔尼茨基:《扎波罗热哥萨克历史》,利沃夫:世界出版社,1991,第2卷,第333页。



泛阅读一切涉及扎波罗热哥萨克的文献记录,还不忘参阅哥萨克主题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尼古拉·果戈里的中篇小说《塔拉斯·布尔巴》。得益于这些努力,他创作的哥萨克形象跃然于画布之上,仿佛下一刻这些人就会走动起来并开始趣言妙语……

请仔细观察一下这些人物!瞧,一群哥萨克围在他们的头领——科什阿塔曼伊万·希尔科身边,正座上是一位无名军书记官。整个画面传递出因对苏丹给予豪迈回答而激发起的一股欢快激动氛围:有人试图还要添加一些尖锐措辞,而另一些人则对别人想出来的俏皮话忍俊不禁。不仅如此,勇士们爽朗的笑声如海浪奔涌,透露出自己不败的信念。这些哥萨克军人神情冷峻,同时又豪放不羁,透着一股常年征战的杀伐之气;哥萨克服饰上斑斑点点——或是名贵饰物,或是破损织物;长枪短矛,高擎于哥萨克手中蓄势待发。这一切向我们展现出生活在十七世纪那些崇尚自由的扎波罗热哥萨克人的性格^①。

哥萨克人与乌克兰,哥萨克人与乌克兰人民……这些概念自古以来密不可分,这并非偶然。就本质而言,须知哥萨克人历史折射出的是被称为乌克兰及其人民的“哥萨克人岁月”的整个过往时代。

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的乌克兰人生活,无论我们今天谈起它的哪一个方面,哥萨克人都在其中留下了自己的痕迹。这种痕迹表现为:经济方面开发了黑海北部沿岸草原地带的广袤大地,建立起以雇佣、非强迫劳动为基础的新型经济方式;政治

^① 小百科全书:乌克兰哥萨克人,基辅:扎波罗热出版社,2002,第162-163页。

领域里,哥萨克人开创了国家建设过程新阶段,赋予其民主共和国性质。更为重要的是,哥萨克人在乌克兰人民精神发展过程中的贡献——全面扶持学校教育,支持当时作为乌克兰民族前哨和保护乌克兰免受波兰同化影响的东正教教会和修道院活动。哥萨克人对于乌克兰人民的解放运动和社会斗争之意义怎么评价都不为过。实质上,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哥萨克人成为唯一一支同自己好战邻居进行斗争的社会力量。其斗争的意义在于保障乌克兰人民有权生存,有权从事经济和精神发展活动。

与此同时,如果对哥萨克人的一些负面内容缄默不语,那也是不公平的。他们身上一直存在着匪性气息、无政府思想,这些要素不时地充斥在哥萨克社会的底层和高层人员之间,整体上破坏性地影响着乌克兰稳定,与当时的政治制度发生冲突。

“哥萨克”和“哥萨克人”这两个词汇是对那些过着半军事生活方式的一群人的概括性称呼。这些人分别居住在乌克兰境内以及边境交界地区——顿河、库班河、捷列克河、伏尔加河和雅伊克河,甚至西伯利亚等地区。“哥萨克”一词首次见诸书面资料是在《蒙古初史》(1240年)中,意指孤独,既无乡情羁绊,又无家室牵挂之人。而在另外一份中世纪时期的资料——《波罗维茨语言词典》(1303年)里,该词被解释为“看门人”(保安)。尽管存在不同释义,但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是,“哥萨克”一词由蒙古语和突厥语进入斯拉夫语的过程中,在乌克兰民众那里获得了新的内涵,指称那些个性自由、独立于官府、敢于保护自己人民以及东正教信仰之人。





首批确切提及乌克兰本国哥萨克的文献出现在十五世纪最后十年。那时,哥萨克队伍的活动中心是克里米亚汗国同立陶宛公国和波兰王国两国交界的缓冲区。后两国于1569年合并成一个统一国家——波兰-立陶宛王国(有时简称“波立王国”)。当时,这一缓冲区处于这几国政府监管之外,实际上也无定居人口。该地区的各种机遇吸引人们前来,人们在这片所谓的“大荒原”无人区定居下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他们震惊于该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在这片沃土之上生活却使得他们时刻面临着死亡——鞑靼汗国几乎每年都会扫荡该地,给这一地区经济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有时还会剥夺人们的自由和生命^①。

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具有综合特点,其中不乏经济、政治、军事战略和社会等诸多要素。忽视这些要素中的任何一个,或相反,夸大其中任何一个都会使再现乌克兰哥萨克群体出现和发展的历史环境这一工作变得扭曲和走样。解释哥萨克人出现的原因,面对他们必须保卫草原边界免受游牧民族(鞑靼人和诺盖人)入侵的严峻现实,显然不宜将重点仅放在对其早期生产经营活动(打猎和捕鱼、酿蜂蜜和食盐开采)的分析方面,或者将注意力集中于探讨农民从封建主手中逃亡之意义乃社会斗争之形式之一云云,这将会偏废其他要素^②。

但有一点可以完全有把握确定,即南部草原地区在十五世纪成了各阶层不同群体的大聚集之地——这些人往往有着不同

① Я.П. 达什科维奇:《大国背景下的乌克兰//古代与中世纪乌克兰(历史考古集)》,卡门涅茨-波多利斯基,2000,第288-297页。

② B. A. 斯姆利:《历史整体背景下的乌克兰哥萨克现象//乌克兰史学杂志》,1991,第5期,第69页。

的利益诉求,有着远非一致的行为和举止动机以及初始冲动。正是这些因素促使他们离开久居之地,前往危机四伏同时又充满自由气息的草原地带。

无数支在这片土地上从事经济开发和与鞑靼人进行一贯斗争的哥萨克队伍,为了自身安全被迫在各栖息地建立起防御工事。于是,扎波罗热哥萨克塞契便应运而生。

人们认为,“扎波罗热塞契”这一名称的本原是一个术语,从词源上来看,该术语等同于“鹿寨”一词(即出于防御目的,将一些树木砍倒,设置成为路障且四周用栅栏围起来的营地)。最早关于哥萨克在第聂伯河大石滩下游渔猎场的“斯坦村(镇)”“木造边防堡垒”和“小城”的资料出现在1520年代。比如,其中一个“小城”是一个小要塞,由德米特里·维什涅维茨基公爵(他的哥萨克浑名叫拜达)于1556年至1557年期间在小霍尔季察岛建造(现今扎波罗热市辖区内)。书面文献提及木造防御工事“鹿寨”是自十六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的。这些堡垒现在被视为“原始塞契”(即后来塞契的前身),只是后来才形成一个“大”扎波罗热塞契^①。

哥萨克都城历经数次迁址,并且历史上曾出现过好几个塞契要塞:托马科夫卡塞契、巴扎夫鲁克塞契、尼基京诺塞契、切尔托姆雷克(老)塞契、阿廖什基塞契、卡门卡塞契和波德波利纳亚(新)塞契。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哥萨克都城位于“大卢戈”——沿第聂伯河下游两岸地区及众多小岛屿。那里森林覆盖,水草

^① M. C. 格鲁舍夫斯基:乌克兰-罗斯历史,第VII卷,基辅,1995,第376-378页。





丛生,河流与水道纵横交错,沼泽与湖泊星罗棋布^①。

扎波罗热塞契在其发展早期阶段曾是哥萨克主要,而且好像也是唯一一处在其所开发土地上聚集和居住的据点。他们人数不多,行动协同,一年内全员聚集数次,共同商量所有大事。及至十六世纪末期,扎波罗热哥萨克队伍壮大之后,他们不仅将草原边境地区土地置于自己监管之下,还积极在所谓的“乡”(波兰-立陶宛管理下的人口稠密乡村)推广哥萨克制度,这时便出现了社会结构现代化的必要性。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自然的步骤就是所有来自第聂伯河大石滩下游的哥萨克同乡自觉组织起来,建立一支哥萨克部队,这就是“扎波罗热哥萨克军”(而作为修饰语“下游”一词要到后来才出现)。部队成了被称为“库林”的同乡联合会。这些男性同乡因向往哥萨克生活而投奔库林,而每个库林则以这些成员家乡城镇或乡村的名字来命名,诸如,波尔塔瓦库林、乌曼库林、卡涅夫库林等(共计三十八个)^②。

塞契是扎波罗热哥萨克的行政管理中心所在地,哥萨克自由区最高管理机构集中在此处办公。扎波罗热哥萨克群体制定出一套独特的内部社会制度,吸取了以前社群的传统。由于其民主主义特色,这种制度在当时封建关系广泛统治的背景下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异类。的确,一套简单却行之有效的政权立法(全体大会——“拉达会议”)和执法(扎波罗热军科什)部门系统正是建立在民主传统的基础之上。塞契里有科什阿塔曼官邸,他与其他军事指挥官一道,共同行使扎波罗热哥萨克全境最高

^① 小百科全书:乌克兰哥萨克人,基辅-扎波罗热,2002,第164页。

^② Д. И. 亚沃尔尼茨基:扎波罗热哥萨克史,基辅,1990,第1卷,第140页、146页、150页。

军事、司法和行政权。

共和制形式的管理以及哥萨克人广泛参与解决几乎所有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这使得扎波罗热塞契变成一个牢固的政治组织。内部社群民主以及社群成员在哥萨克古习俗面前人人平等的传统确保了塞契成员的高度生存能力^①。

不能说乌克兰的哥萨克人,首先是扎波罗热(第聂伯河和南布格河两条河流中那些横锁江面,妨碍航行的巨石——“大石滩”以下的地区)大地上哥萨克人,他们的形成机制与顿河或伏尔加河哥萨克人形成机制存在什么原则性差异。

在顿河或伏尔加河地区,差不多在同样的历史时段里(十五世纪至十六世纪)出现一些社会群体并积极发挥着其功能作用。这些群体在其成员的内部制度、经济形式、军事活动等方面同扎波罗热哥萨克群体有着很多共同特征。不过,这些社会组织后来各自走上了不同的演化之路^②。即便谈起与顿河哥萨克人——这个同乌克兰哥萨克人最为相近的群体——的不同之处,后者也只是在成功发展出拥有乌克兰民族三分之二领土的国家形式后,其自身组织进化成更为高级的形式而已^③。

塞契里驻扎着一支卫戍部队,规模不太大,七八千人,他们要确保时刻击退来犯之敌。每当需要召集更大规模部队时,塞

① C.列皮亚夫科:乌克兰哥萨克人世界观基础的形成(十七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期“哥萨克面包”概念)//中东欧地区的乌克兰:十五世纪至十八世纪历史研究,基辅,2000,第156页。

② B.布列胡年科: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中期乌克兰哥萨克人与顿河地区之关系,基辅-扎波罗热,1998,第46-52页。

③ A.П.普隆施坦恩:顿河哥萨克居民点的出现及哥萨克阶层形成史//本国历史新发现,莫斯科,1968,第161-162页。





契便将那些居住在窝冬村和渔场打工的哥萨克以及“乡”里那些已婚哥萨克都征召过来。扎波罗热哥萨克的战力很快便被其邻国政府所看中。首次尝试掌控这支哥萨克部队并使其为己服役的是1524年的波兰-立陶宛王国。那时,波兰国王西吉斯蒙德一世公爵让手下官员负责组建一支哥萨克部队,实行有偿服役。他认为,建立一支受控于自己的哥萨克组织有助于实现对他们监管,并且在和平时期遏制住他们对鞑靼人的攻击,否则必定会导致波兰与克里米亚汗国和土耳其两国关系恶化,引发战端。不过,这种打算却注定难以如愿,这不仅是因为波兰国库钱粮不足,还因为哥萨克不愿入彀,受制于他人规则与纪律约束。



小霍尔季察岛哥萨克抵御土耳其人
之战(1557年)

尝试征召扎波罗热哥萨克为自己服役的还有莫斯科沙皇。十六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前文提到的德米特里·维什涅维茨基(拜达)公爵在小霍尔季察岛建立要塞时曾一度听命于沙皇伊万四世。但那次沙皇招安未能成功,因为公爵的堡垒被由黑海进入第聂伯河的土耳其和鞑靼人部队联合行动的几艘大桡战船捣毁。

“扎波罗热哥萨克军”隶属波兰-立陶宛王国的正式“成立”日期或可以认定为1572年6月2日。那天,根据国王西吉斯蒙德二世·奥古斯都旨意,皇家盖特曼耶日·亚兹洛维茨基被授权“雇

佣扎波罗热三百名哥萨克当差服役”。此事很快便顺利完成,所有被雇哥萨克均被列入所谓的“名册”,即哥萨克士兵登记簿。这些哥萨克均可获取国王粮饷(钱、食物和服装),享受免税特权,拥有土地,可从事酿酒及其他营生。此外,“在册”哥萨克不受地方当局司法管辖,仅听从他们自己选出来并经国王确认的盖特曼领导^①。

小城特拉赫杰米洛夫(现今第聂伯河右岸,基辅州与切尔卡什州交界处)连同其修道院一道被划拨给这支皇家哥萨克部队作为大本营,以便设立兵器库,建立医院。这个地方的选择并非随意为之的——不远处就是卡涅夫要塞,里面驻扎着一支强大的波兰卫戍部队,这样一来便不难对哥萨克部队管控。在册哥萨克从国王那里获得“扎波罗热军”封号,这支军队拥有自己的军旗、战鼓和其他军队标志。

1578年,在新一任国王斯杰番·巴托利亚执政期间,名册人数增至五百名,次年,又增至六百人。1590年,波兰-立陶宛下议院(贵族院)通过决议,将在册哥萨克人数增至一千人。

自那时起,我们便可见到“在册”哥萨克这个名称了,而与之相对的则是处于半合法地位的“非在册”哥萨克。在册哥萨克除防卫国境外,还要看住自家“兄弟”(那些非在册哥萨克),防止他们擅自对邻国发动征战活动。在册哥萨克多半开始在沿第聂伯河中游那些开发相对较好的地区居住,但为保留历史记忆,他们在自己部队的称呼中还沿用了“扎波罗热”这一最初居住地名称

^① O.M. 阿帕诺维奇:十八世纪上半叶乌克兰武装力量,基辅:科学思想出版社,1969,第16页、20页。





修饰语。而那些最终留在第聂伯河下游沿岸地区,即在第聂伯河“大石滩”以下地区的非在册哥萨克,他们为区别于弟兄部队,便在自己名称中加入“下游”一词,意指他们居住在第聂伯河下游,特别是指居住在扎波罗热地区。“第聂伯河下游扎波罗热哥萨克军”(简称“下游扎波罗热军”)经常被同义性地称作“扎波罗热塞契”,或干脆按其行政中心所在地名称“塞契”来称谓。整个十七世纪哥萨克军一直保持着在册与非在册之分。在反击鞑靼-土耳其军队侵犯时,扎波罗热军(盖特曼指挥的在册哥萨克)往往与下游扎波罗热军协同作战。哥萨克人的两个分支部队犹如一个整体,保护着乌克兰东正教居民免遭波兰贵族压迫。但与此同时,塞契人却对乌克兰哥萨克盖特曼尝试将这些居民置于自己管控之下的做法眼红,开始起义反抗他们。这两支“扎波罗热军”分属不同行政管理的划分一直持续到十八世纪下半期,直至沙俄政府于1764年取消“扎波罗热军”(盖特曼区),随后又于1775年消灭下游扎波罗热军(塞契)为止^①。

为对抗鞑靼人掠夺性进攻而建立的塞契在反土耳其侵略的泛欧斗争中发挥着出色作用。1580年至1620年期间,与扎波罗热军经常保持外交联系的就有波兰、梵蒂冈、奥地利哈布斯堡帝国、特兰西瓦尼亚公国、瑞典、莫斯科以及同时期欧洲其他国家^②。得益于此,塞契不仅保卫着乌克兰免遭鞑靼人侵略,还在泛基督教联盟中成为哥萨克多次进攻克里米亚汗国和奥斯曼土

^① C. 科古特:俄罗斯中央集权与乌克兰自治,废除盖特曼区(1760—1783),基辅,1996,第8页、48—50页、124—126页。

^② C. 列皮亚夫科:国际关系中的乌克兰哥萨克人(1561—1591),切尔尼戈夫,1999,第27页、45页。

耳其帝国的基地。扎波罗热哥萨克部队参与的一些独立军事行动不仅决定着某次战斗的胜负命运,还决定着国家的生死存亡,比如,1621年与土耳其人的“霍京”之战(源于乌克兰西部的霍京城之名,其郊区当时是该次战斗主战场)。

十六世纪末期,波兰-立陶宛王国加强了民族宗教压迫,扎波罗热地区便成了乌克兰民族解放斗争的风暴中心^①。由于下游扎波罗热军地处于偏远,并处于自治状态,波兰国家对其影响甚微,这使得那些对波兰贵族制度心怀不满的人士纷纷投奔该塞契,并将它变成了一个可以聚集力量,反对外国奴役者武装起义的基地。扎波罗热塞契赋予了哥萨克人以顽强精神,将其改变成乌克兰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一支主要力量。在克里斯托弗·科辛斯基(1591年至1593年)、塞维林纳·纳里瓦依科(1594年)、马尔科·日迈伊洛(1625年)、塔拉斯·特里亚西罗(1630年)、伊万·苏立马(1635年)、巴维尔·布特(1637年)、雅科夫·奥斯特里亚宁和德米特里·古尼亚(1638年)等领导的这些起义中,起主要作用的正是扎波罗热哥萨克^②。

不同时期的扎波罗热塞契从未囿于其“共和国”自身,相反,与其稳定的政治边界不同,塞契始终致力于将其国家主权扩张至乌克兰其他地区。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政治上替代波兰-立陶宛王国的国家组织行为最为突出地表现在彻底激化社会、宗教和种族矛盾之后的武装斗争时期,它在哥萨克阶层催生了新思想。前文提及的十七世纪初期的几次哥萨克大起义表明,哥

^① C. 列皮亚夫科:《十六世纪乌克兰哥萨克战争》,切尔尼戈夫,1996,第28-44页。

^② 小百科全书:《乌克兰哥萨克人》,基辅-扎波罗热,2002,第385-395页。





萨克内部已出现一股新潮流,其关注的内容是在从波兰贵族手中解放的土地上实行“哥萨克制度”^①。

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哥萨克不断揭竿而起,反抗波兰政府。及至这一时期,哥萨克人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中已成为最具威望的一类人。当时的社会现实是,作为一个阶层,哥萨克人较之于其他社会阶层可以更快经历自身的出现、形成和发展阶段,这有其自身原因。实际上,从最初开始,哥萨克人就是由一群走出中世纪后期狭隘封建制度囚笼的人构成的(尽管是以“骑士”身份在中世纪社会分层范围内发展的)^②。

哥萨克战士同哥萨克农民并存,因而其战斗因素自然也就融入农耕要素中并对其进行着补充。哥萨克农民是自由生产者,自己的家产(窝冬村)是按照农场经营的方式进行管理的,因而,这些人是新型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先行者^③。

哥萨克人是在经常更新和快速变化着的广阔社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是确保扎波罗热(乃至整个乌克兰)哥萨克人得以快速成长与顺利演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乌克兰大地上成千上万的各类东正教民众都接受过扎波罗热哥萨克人的学校洗礼,其中有小贵族和市民,当然,首先是农民。由于不断的迁徙,他们接触到的城乡居民不仅有乌克兰国内的,还有邻国的,这样的生

① C.列皮亚夫科:乌克兰哥萨克人世界观基础的形成(十七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期“哥萨克面包”概念)//中东欧地区的乌克兰:十五世纪至十八世纪历史研究,基辅,2000,第154页。

② Ф.卡尔季宁:中世纪骑士阶层探源,莫斯科,1987,第300-305页。

③ 哥萨克土地所有制资料(1494—1668)//编年史作者涅斯托尔之历史社会读物,基辅,1894,第8本,第3部分,第14页。

活方式改变了这些曾经是农民的人的传统观念,使他们形成了一种全新的世界观。那些曾经在哥萨克环境中待过的人,最后离开时就已不再是先前普通的小贵族或者逃亡农民了,而是一位拥有丰富人生经历的全新层次的人。他的这种人生经历在很多方面已然与中世纪的社会教条和标准格格不入了^①。

下游扎波罗热军前后存在数十年,这期间,它的突出特点是政治活动色彩的广泛性。事实上,乌克兰大地上的每一个生活领域都被科什关注过。它给教会斯拉夫兄弟会和教育机构提供过物质帮助,向东正教会和修道院的文化启蒙事业划拨过资金。

自十七世纪初起,下游扎波罗热军逐渐开始放弃局部性政治活动,转而集中关注一些根本性问题的解决。这其中,哥萨克人初步同东正教结成联盟。在1569年的布列斯特教会联盟(不少东正教高级神职人员接受天主教教会领导)之后,乌克兰东正教会便遭受到波兰-立陶宛王国在国家制度层面上的排挤与迫害。1620年,扎波罗热哥萨克积极参与了具有泛乌克兰性质的政治活动——恢复东正教等级制度(耶路撒冷牧首费奥凡给一名都主教和五名主教举行了按手仪式)。这种直接参与行为还具有更为长远的效果,它客观上起到(直接或间接)保存乌克兰族群诸如独特的语言、文化以及习俗等特征的作用。

乌克兰大地上的建国实践运动以及下游扎波罗热军对其发展的贡献并没有止步于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上半叶这段期限。建国运动具有更为深刻和长期的性质。在扎波罗热塞契及

^① B. 谢尔巴克:乌克兰哥萨克人——社会地位形成(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下半叶),基辅,2000,第110-116页。





其权力机构(正如乌克兰其他地方一样)演变的道路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发生在十七世纪中叶的一些事件。其中主要事件

是波格丹·赫梅尔尼茨基领导的乌克兰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他们反抗波兰贵族和天主教会推行的民族与社



1648年7月赫梅尔尼茨基大军马赫诺夫卡城下之战

会压迫(1648年至1676年)。关于该历史事件,我们现在还经常见到诸如“乌克兰民族革命”或者“哥萨克革命”等这样一些表述。

乌克兰自身立国实践运动发展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648年1月至1657年8月——赫梅尔尼茨基领导的起义、战斗以及重新建立哥萨克国家——“盖特曼区”的斗争高潮期。

第二阶段:1657年9月至1663年6月——盖特曼去世后的内战和盖特曼区分裂成右岸地区和左岸地区(相对于第聂伯河而言)两部分。

第三阶段:1663年6月至1676年9月——持续的争取哥萨克

国家重新合并的努力以及最终的失败^①。

“大革命”第一阶段，扎波罗热塞契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因为1648年1月25日，正是在这天开启了乌克兰民族的解放斗争运动。当时，赫梅尔尼茨基率领一支约五千名在册哥萨克与扎波罗热哥萨克向驻扎在第聂伯河塞契附近巴扎夫卢克岛上的波兰卫戍部队发起进攻，并一举将其歼灭。

大起义开局顺利，随后从扎波罗热地区蔓延至乌克兰全境。扎波罗热哥萨克成为义军主力、新政治精英骨干，而下游扎波罗热军则在摧毁波兰统治和建立乌克兰国家机关、军队以及行政-区域体系方面起到了主导作用。

1648年到1654年这段时期，即便是按多事的民族解放战争的标准来衡量，它也是一段特别紧张的时期。其中一个对日后乌克兰历史发展具有奠基性意义的事件应该是1654年1月盖特曼赫梅尔尼茨基同莫斯科签订协议。

为寻找盟友，指望与其一道战胜依旧强大的波兰-立陶宛王国，从起义开始的第一天起，赫梅尔尼茨基就被指派同克里米亚汗国、摩尔多瓦公国、特兰西瓦尼亚公国，甚至是瑞典等国联络，商讨建立军事同盟和政治联盟之事。可惜的是，这些国家，要不就像鞑靼人一样非常不可靠，要不就是距离过于遥远。面对这种情况，也就不奇怪盖特曼很快便有了与沙皇俄国结盟的念头。盖特曼做出这种选择的依据是，沙俄民众与乌克兰人在宗教信仰、语言乃至文化方面十分相近。而与此同时，其政治体制与哥

^① Ф. 西辛：赫梅尔尼茨基起义及其在现代乌克兰民族形成中的作用//乌克兰历史杂志，1995，第4期，第71-72页。





萨克人所习惯的民主管理形式却是相去甚远,然而战争时期,这个要素就显得无关紧要(但后来历史发展表明,盖特曼此举乃是枉费一番苦心)^①。

自1651年开始,盖特曼数次致函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彼得一世之父),请求接受他率全体“扎波罗热军”入籍俄国,但后者出于担心卷入与波兰战争的顾虑,久拖不决,直至1653年10月1日才最终拿定主张,决定给予乌克兰庇护,保护它免受波兰-立陶宛侵犯。随后双方协调了立场,盖特曼与沙皇在所谓的“拉达会议”上签订了协议。这次会议于1654年1月8日在佩列亚斯拉夫城(现今基辅州境内)召开^②,由赫梅尔尼茨基召集。根据所签条约之条款,乌克兰在保留自身充分自治地位和获取莫斯科沙皇对抗波兰-立陶宛的军事与政治帮助前提下,承认莫斯科沙皇对其的保护关系。实际上,佩列亚斯拉夫条约是一种附庸关系形式。在这种形势下,强大俄国同意为较弱小哥萨克提供保护,不干涉其内部事务。为此,作为较弱小的哥萨克有义务向沙皇纳税,提供军事协助等。这里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即下游扎波罗热军(塞契)领导人在此时此刻却自行退出了拉达会议,没有参与条约以及条约附件的签署仪式^③。

在对1648年至1676年事件进行总体评价之际,我们需要指

① T. Г. 泰洛娃-雅科夫列娃:大合并——佩列亚斯拉夫拉达大会之后的俄罗斯与乌克兰(1654-1658),基辅:“克里奥”有限公司出版社,2017,第10-42页。

② 乌克兰并入俄罗斯,(三卷本),文献与资料,莫斯科,1953,第1卷,第123页。

③ B. 布列胡年科:莫斯科扩张与1654年佩列亚斯拉夫会议,基辅:科学书籍出版社,2005,第188页。

出,战争的确带来了无数牺牲和破坏,但从外来统治者手中获得解放却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在解放战争期间形成了民族国家思想,它成了乌克兰历代后人为独立而斗争的历史见证者;战争成为民族意识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培养了新一代捍卫民族利益的政治精英,以致惊愕不已的欧洲看到,一个具有民主共和国管理形式,具有鲜明民族特征的立法和执法政府机构的新型国家是如何在它眼前一步步建立起来的。国家所有管理机构在连年不断的战争背景下,在敌对势力不断加大对乌克兰威胁的过程中,历经数年艰辛,获得发展,哥萨克共和国经住了考验^①。

民族解放战争之后,乌克兰大地上波兰大地主占据大量土地的现象被消灭,劳役制被废除,有一半以上人口宣称自己是哥萨克。一种新的非封建的经济形式不仅在扎波罗热地区,还在乌克兰左岸地区和斯洛博达地区开始占主导地位。一段时间之后,就连在乌克兰右岸地区,该经济形式也占据了主导地位^②。哥萨克人成为拥有特权,代表着扎波罗热军(盖特曼区)和下游扎波罗热军(塞契)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的一个阶层。

然而,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哥萨克人的悲剧在于,在十七世纪下半叶至十八世纪初期这样一个新的历史现实中,它开始逐渐丧失自身社会政治潜能。十七世纪中期的历史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下游扎波罗热军的政治地位。应该说,自从盖特曼区出

^① Ф. 西辛:赫梅尔尼茨基起义及其在现代乌克兰民族形成中的作用//乌克兰历史杂志,1995,第4期,第73页。

^② B. 巴尔文斯基: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乌克兰左岸农民研究,哈尔科夫,1909,第228页。





现之后,塞契在乌克兰的政治领导力便明显跌落。如果考虑到年轻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心转移到盖特曼区这一事实的话,那么这点也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在盖特曼区的几处中心城市里——奇吉林、巴图林、格鲁霍夫——正逐步建立政治机构,发展着国家体制,忙碌着与外国政府进行各种外交谈判^①。因此,下游扎波罗热军首脑机关科什试图继续在乌克兰政治事务中起主导作用的努力自然会遭遇到乌克兰盖特曼们的抵制。赫梅尔尼茨基是这样对待科什的,他的继任者们也是这样做的。故而,想要对下游扎波罗热军科什在十七世纪下半叶乌克兰历史事件中所采取的政策对错进行简单明确的评价是难以做到的。一方面,扎波罗热地区是乌克兰反抗克里米亚汗国斗争的前哨,是一个引力和避难中心,所有不满当时社会政治制度的人们都奔它而来。另一方面,科什有些时候推行与乌克兰盖特曼的国家方针相左的政策,与他们发生冲突,他们的行为对新生乌克兰国家而言是致命的。塞契在乌克兰国家体制框架内的生存时间不长,没能允许部分军官和群体摆脱自治主义的思维定式,没能养成国家主义的思维习惯,这导致扎波罗热哥萨克参加了马尔京·普什卡利反对盖特曼伊万·维果夫斯基的国家叛乱(1658年),而当右岸地区盖特曼彼得·多罗申科与土耳其政府结为具有战略意义的联盟(1669年)时,他们也没有给予积极支持^②。

科什阿塔曼们只习惯于相信自己手中的枪杆子,他们很难

^① B. B. 帕纳申科:盖特曼区社会精英(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下半叶),基辅,1995,第81-82页。

^② B. A. 斯莫里、B. C. 斯捷潘科夫: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乌克兰国家思想——形成、演化及现实化问题,基辅,1997,第312-315页。

理解外交游戏和周围环境中各种细枝末节之处的微妙,而这些微妙细节恰恰决定了某位盖特曼政治立场的改变与否。他们在战场上能击败敌人,但在同莫斯科、土耳其和克里米亚汗国的外交人员进行和平谈判时却容易迷失方向。顺便说一句,尽管扎波罗热哥萨克一度减少了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但它却依然是十七世纪后半期至十八世纪初期乌克兰大地上军事、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一股起着积极作用的因素。

下游扎波罗热军在削弱土耳其-鞑靼人侵略战争中贡献特别巨大。在莫斯科沙皇国家与土耳其之间分别于1672年至1681年、1686年至1699年进行的两场战争中,扎波罗热哥萨克威名大震。1695年至1696年,扎波罗热哥萨克部队与盖特曼哥萨克团以及俄国军队协同作战。得益于他们勇猛战斗,联军一鼓作气,接连攻克了黑海北部沿岸地区和亚速海地区的多处土耳其要塞——伊斯兰-克尔门、克兹-克尔门(现今赫尔松州的别利斯拉夫市和卡霍夫卡两城近郊)和亚速夫城(现今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同名城市)^①。

遗憾的是,扎波罗热哥萨克衷心服务于俄国沙皇彼得一世,但却没能充分享受到由此应得到的利益。1700年签订的和约不仅没能保住哥萨克新打下的要塞拥有权,俄土还讨论了两国在黑海北部沿岸地区建立防线体系问题。如此一来,扎波罗热哥萨克前往黑海沿岸进行采盐和渔猎活动就变得难以企及了。面对这些情况,哥萨克心里对这位俄国沙皇自然没有好感。1700

^① Д. И. 亚沃尔尼茨基:扎波罗热哥萨克历史,第2卷,利沃夫:“世界”出版社,1991,第345-387页。





年,俄国为争夺波罗的海出海口而同瑞典发生战争,后来被称为“北方战争”。这场战争持续了二十多年(1700年至1721年),它更加激化了下游扎波罗热军同莫斯科的关系。当时,按照沙皇命令,数千名塞契军和盖特曼军士兵必须被派往遥远的波罗的海,他们在那里不仅要战斗,还要参与修建要塞,挖掘运河等事务。这些乌克兰哥萨克自认为是贵族,认为被分派这种工作是对他们“骑士尊严”的侮辱。俄政府强迫他们长期远离家乡,加之不习惯北方气候,导致他们各种疾病缠身等,引发了哥萨克们的不满和牢骚。但“扎波罗热军”盖特曼伊万·马泽帕,这位沙皇意志最为忠诚的执行者果断制止住包括下游扎波罗热军在内的下属们的愤怒情绪^①。

然而,1707年初却发生了一件让这位盖特曼及其身边人心理崩溃的事情。2月10日,沙皇彼得一世签署一纸命令,将基辅和其他属于哥萨克管辖的城市并入“别尔哥罗德团辖区”。实际上,沙皇这是考虑在盖特曼区基础上建立普通行省的计划。此外,沙皇还承诺将乌克兰右岸地区土地转让给在同瑞典人战争中支持自己的盟友波兰人。哥萨克对莫斯科这些决定极为不满,这不仅挑起了盖特曼及其身边人的对立情绪,还导致他们产生另谋解决出路的想法,因为这实实在在地触及了哥萨克政权的存亡问题。于是,通过中间人斡旋,哥萨克暗中开始了与瑞典国王卡尔十二世谈判。后者答应,一旦战争获胜,将义无反顾,坚决维护“扎波罗热军”自治制度。1708年10月末,盖特曼马泽

^① 扎波罗热哥萨克军边界与1705年俄土勘界委员会活动//编辑:B. 米尔切夫,扎波罗热:“马达西奇”出版社,2004,第6-8页、14页。

帕违背对彼得一世曾经的誓言，率领部分高级军官和少量部队（两千名哥萨克）投奔了瑞典一方，以期加速莫斯科军队败亡，保全扎波罗热哥萨克军的哥萨克国家完整性和独立性^①。

以科什阿塔曼康斯坦丁·戈尔季延科为首的下游扎波罗热军一开始并不支持盖特曼的军事政治行动以及他同瑞典国王卡尔十二世的结盟行为。这里有着诸多原因：直到叛变前夕，马泽帕在限制塞契哥萨克自由方面一贯是沙皇意志的忠诚执行者。多年来，他一直试图彻底摧毁扎波罗热哥萨克独特的民主制度，禁止塞契进行领导人选举，与扎波罗热军官私下多有交恶。因此，直到1709年冬季（这里指1708年年末至1709年年初这段时间——译者），下游扎波罗热哥萨克对是继续效忠俄国沙皇还是投奔瑞典国王这一问题的最终决定始终不作表态。1709年2月，形势发生了变化。当时，瑞典军队在马泽帕及其战友支持下开始向乌克兰腹地推进，逼近波尔塔瓦要塞。所有迹象表明卡尔十二世将占据优势，情势已到了必须做出抉择的时刻！于是历史便出现了我们现在所了解的那种情形。促使塞契背叛彼得一世的主要原因在于彼得无视扎波罗热人世代相传的自由传统，欲彻底征服他们，使哥萨克服务于自己的利益。因此，1709年4月发生了下游扎波罗热军转投马泽帕和卡尔事件。这是一起不善于预测未来战争胜利者的“盲目”抉择。这一错误抉择决定了扎波罗热“老”塞契生死命运，导致塞契被沙皇军队和那些依然

^① Т.Г. 泰洛娃-雅科夫列娃：伊万·马泽帕与俄罗斯帝国：“叛国者”史，莫斯科：中央印刷出版社，2011，第315页、320-325页、337-356页。





忠于沙皇的盖特曼哥萨克军联手摧毁^①。1709年7月8日,波尔塔瓦战役打响,瑞典军队与哥萨克联军战败^②。而扎波罗热哥萨克人历史(乃至整个乌克兰哥萨克人历史)中的一页就这样从根本上被翻过。从此,扎波罗热哥萨克军踏上通往其生存终点的新的曲折之路——从一个塞契被捣毁(1709年)到另一个塞契被剿灭(1775年)的辛酸苦旅^③。

① T.Г.泰洛娃-雅科夫列娃:伊万·马泽帕与俄罗斯帝国:“叛国者”史,莫斯科:中央印刷出版社,2011,第315页、320-325页、337-356页。

② 小百科全书:乌克兰哥萨克人,基辅-扎波罗热,2002,第403页。

③ A.斯卡利科夫斯基:新塞契或最后一个扎波罗热科什史研究,敖德萨,1885,第8-12页。

第二章 入籍汗国：效力于克里米亚汗王的 扎波罗热哥萨克

十八世纪初是下游扎波罗热军史上最为艰难的时期，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原因是当时东南欧三个主要国家，即波兰（波兰-立陶宛王国）、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和俄国之间的力量均衡被打破。俄国实力增强，导致其与另外两个邻国之间以及同本国边境地区居民之间的关系性质发生变化。十八世纪头十年一个特点是，沙俄政府与南部边境草原地区的扎波罗热哥萨克以及顿河哥萨克这两个最大的哥萨克群体之间的关系紧张。当时，彼得一世针对哥萨克边区推行统一整编政策，内容为：一、吸引哥萨克参与他们传统草原边疆之外的军事行动；二、限制乌克兰及俄罗斯内陆地区新人员加入下游扎波罗热军和顿河哥萨克军；三、在草原边界建立据点链，以此作为有效手段来整合这两大军事团体，强化对他们的监控。

作为对彼得一世中央集权政策的回应，1707年至1709年间，顿河与扎波罗热两地哥萨克举行了反政府活动。活动失败后，全体下游扎波罗热军与部分顿河哥萨克军转入克里米亚汗国境内。

1709年2月末，扎波罗热塞契的科什阿塔曼——康斯坦丁·



戈尔季延科投奔了瑞典国王卡尔十二世及其盟友——哥萨克首领盖特曼伊万·马泽帕,自此,战事便转入乌克兰境内。1709年,下游扎波罗热军事行动受挫,这不仅是由于吃了一系列败仗,还在于彼得一世的军队完全攻占了扎波罗热全境(即扎波罗热哥萨克自由区)。1709年5月14日,俄军在盖特曼伊万·斯科罗帕茨基——这位沙皇亲信指挥的哥萨克部队帮助下摧毁了位于切尔托姆雷克河畔的扎波罗热塞契要塞,部分塞契士兵逃脱围剿,躲入克里米亚汗国境内。同年6月27日,那些曾在康斯坦丁·戈尔季延科带领下作为盖特曼马泽帕部队参加波尔塔瓦战役的扎波罗热哥萨克士兵也退入克里米亚汗国境内^①。

如果有人认为克里米亚汗国高层和土耳其黑海北岸地区军事要塞的指挥官们会真诚欢迎这些不请自来的入境者的话,那是言过其实。这些前不久还在与土耳其和克里米亚汗国为敌的扎波罗热人,他们未经准许就大批涌入奥斯曼帝国境内,这不仅使他们彼此之间处境危险,还可能会出现相互挑衅的情形,恶化土耳其与俄国关系,从而将柏塔政府(奥斯曼帝国政府——译者)拖入与后者不适时宜的战争之中。因此,尽管这些扎波罗热人“多次派人求见克里米亚汗王,恳求接受他们入籍,派遣军队支援……,但汗王并没有满足他们的……这一请求,而是上报土耳其苏丹王裁决”,苏丹则明令禁止汗王接受这些扎波罗热人的入籍要求,“以便不提供军事帮助,不引起纷争,也不为纷争提供

^① T.丘赫利布:1700年至1721年北方战争条件下扎波罗热塞契的科什阿塔曼——康斯坦丁·戈尔季延科拒绝莫斯科庇护之盘算//黑海往事,乌克兰国家科学院乌克兰历史研究所哥萨克史科研所乌克兰南方哥萨克史分所笔记,第3卷(6)科学著作,第4辑,敖德萨,2008,第18-24页。

任何借口”^①。由此可见,关于下游扎波罗热军于1709年入籍克里米亚汗国的提法乃不实之说,而且在哥萨克军领导人看来,栖身汗国本身就是一个权宜之计。

1710年4月5日,大哥萨克会议(拉达会议)在本德雷城(现今摩尔多瓦境内——译者)召开。到会的有盖特曼菲利普·奥尔利克、下游扎波罗热军科什阿塔曼康斯坦丁·戈尔季延科和那些来自在阿廖什基地区重建塞契军营的扎波罗热哥萨克军代表^②,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土耳其、瑞典和克里米亚汗国等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由菲利普·奥尔利克起草且在后世文献中以《宪法》之名为人熟知的一份协议,其中有一条,认可瑞典国王对下游扎波罗热军的最高统治(“庇护”)权。《宪法》规定,从今往后,克里米亚汗王仅仅是下游扎波罗热军同盟者,而非其宗主,并且也不拥有扎波罗热地区土地^③。这份协议于1710年秋季在土耳其与俄国开战前夕签订,协议签署方为乌克兰、瑞典和土耳其-克里米亚汗国。该协议其实就是一份不折不扣的军事同盟书。

俄国政府只是在1713年签订《阿德里安堡和约》之后才完全承认下游扎波罗热军脱离自己统治入籍克里米亚吉列王朝这个事实^④,但克里米亚汗王却不急于给这些扎波罗热哥萨克分配地盘。同年,戈尔季延科给负责掌管波兰-立陶宛王国与奥斯曼帝国勘界事务的波兰籍专员斯坦尼斯拉夫·霍缅托夫斯基写信说,

① 俄罗斯帝国法律大全,第四卷,圣彼得堡,1830,第455页。

② 现今乌克兰赫尔松州阿廖什基市地区。

③ O. B. 沃夫克:菲利普·奥尔利克《宪法》——真本及其历史探源//乌克兰档案,2010,第3—4辑(总269辑),第158—159页。

④ 俄罗斯帝国法律大全,第五卷,圣彼得堡,1830,第37页。





“汗王,我们这位仁慈的君王允诺我们以栖息之地”^①。次年春,盖特曼菲利普·奥尔利克同土耳其政府签订附加协议,最终明确了下游扎波罗热军的新地位:下游扎波罗热军从此以后将隶属奥斯曼帝国和吉列王朝双重管辖。就此事,克里米亚汗王卡普兰-吉列于1714年5月专门致函卡门涅茨-波多尔斯基要塞司令卡里诺夫斯基,称“哥萨克并非没有统治者,他们可是有两位主人”,即汗王和苏丹^②。

盖特曼菲利普·奥尔利克是整个“扎波罗热哥萨克军”(包括下游扎波罗热军在内的盖特曼国家)首领,但自从1714年去了瑞典之后便对土耳其政府和克里米亚汗国在制定扎波罗热哥萨克管理政策方面失去了影响力。从此,他对独立于俄国沙皇管辖之外的乌克兰哥萨克的领导权已名存实亡,而最后一次作为“扎波罗热哥萨克军”首领被柏塔政府提及则是在1734年。当时,柏塔政府在羁绊扎波罗热人的游戏中试图拿他的名望当作最后的“王牌”来使用^③。

扎波罗热哥萨克的直接统治者是克里米亚汗王,而汗王须就本国重大内政与外交政策与柏塔政府协商。关于这一点,奥地利驻伊斯坦布尔大使幺冈·冯·塔尔曼亲眼见过。他说,“鞑靼汗王来到伊斯坦布尔,并数次就当前局势与苏丹商谈。同样,他

① “华沙皇家档案基金会”:古代法令文书总档案(土耳其部),卷宗79,案卷57,第11页。

② “华沙皇家档案基金会”:古代法令文书总档案(土耳其部),卷宗64,案卷17,第3页。

③ Д. И. 亚沃尔尼茨基:乌克兰哥萨克史(三卷本),第3卷,基辅,1993,第438页。

也要同大维齐尔以及其他大臣磋商”^①。虽然情况如此,但柏塔政府是承认克里米亚汗王为下游扎波罗热军宗主国国主身份的^②。由于那时克里米亚汗王频繁更换,这导致扎波罗热哥萨克有些不知所措,因为任何一次更换都意味着同新汗王的关系要“从零开始”。比如,在夏杰特-吉列替代卡普兰-吉列登上王位之际就发生过这种情形^③,因为每次更换汗王,哥萨克统领、全体哥萨克军官以及库林阿塔曼等一千人等均须向新王宣誓效忠^④。1730年9月,有位去过加兹克尔门城^⑤的买卖人回到俄国之后便向人描述自己的所见所闻。他说:“克里米亚汗王被押解到皇城(伊斯坦布尔),两礼拜后哥萨克统领从塞契向巴赫乞萨赖派遣了两名阿塔曼去拜见维齐尔,请求他明示该向谁宣誓效忠,由谁来管理他们。维齐尔回答说新王卡普兰-吉列很快就会从皇城派过来,并告诉他们要有所谓之事做好准备。他们又问是否准备好迎接新王?这位维齐尔回答说所有哥萨克人要做好准备,新王一到就准备出征。”^⑥

自汗王以下,克里米亚汗国对下游扎波罗热军拥有管理权

① B. E. 舒德:(奥地利外交官眼中)波尔塔瓦战役前后的土耳其//翻译、引言及注释,莫斯科出版社,1977,第79页。

② C. C. 安德烈耶夫:论克里米亚马泽帕分子(1738—1758)与扎波罗热哥萨克关系//科学笔记:青年学者与研究生论文集/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格鲁舍夫斯基古文献学与史料科学研究所,第12卷,基辅,2006,第77—91页。

③ Д. И. 亚沃尔尼茨基:乌克兰哥萨克史(三卷本),第3卷,基辅,1993,第394页。

④ Д. И. 亚沃尔尼茨基:扎波罗热哥萨克史文献(两卷本),弗拉基米尔:省政府印刷厂,1903,第1卷,第1070—1071页。

⑤ 位于现今乌克兰赫尔松州别利斯拉夫市区。

⑥ 俄罗斯国家军事历史档案馆,全宗20,目录1,案卷31,第65页背面。





的还有来自吉列家族的卡尔加、努拉丁和奥尔比(均为克里米亚汗国的爵位称号——译者)等这些王室贵胄。由于柏塔政府经常更换克里米亚汗王,因而那些头顶贵胄头衔的人也相应变动。除这些人员之外,参与扎波罗热哥萨克事务决策管理的还有克里米亚汗国首席大臣,即那些汗国政府委员会成员的穆扎和别伊(两者均为汗国的贵族称号——译者)^①。那些代表吉列王朝的诺盖穆扎(又称“巴什-穆扎”)和苏丹对个别哥萨克群体进行托管的故事至今还为人熟知^②。

下游扎波罗热军不仅驻扎在克里米亚汗国地盘上,在黑海西北沿岸属于奥斯曼卢乜利亚地区的奥恰科夫省附近也有分布。相应地,他们也要服从当地以本德雷和奥恰科夫两城的帕夏以及加兹克尔门要塞卫戍司令为代表的土耳其地方行政机构管理^③,不过,主要还是受本德雷帕夏管辖。这是因为十八世纪初,从多布卢扎州巴巴达格城迁移过来的奥恰科夫省长官邸就坐落在本德雷城。本德雷帕夏是土耳其帝国在该地区的主要代理人,因而奥恰科夫和加兹克尔门两地的卫戍司令(帕夏)均隶

①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 248,目录 113,卷宗 49,第 2 页及其背面。

② Д. И. 亚沃尔尼茨基:扎波罗热哥萨克史文献(两卷本),弗拉基米尔:省政府印刷厂,1903,第 2 卷,第 1100 页。

③ О. 谢列达:源自奥斯曼帝国文献的黑海西北沿岸地区居民点:年代及发展历史问题//黑海往事,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哥萨克历史研究所乌克兰南部哥萨克史分部笔记 36,科学作品,第 4 辑,敖德萨,2008,第 58 页;Д. И. 亚沃尔尼茨基:乌克兰哥萨克史(三卷本),第 3 卷,基辅,1993,第 385 页、392 页、410 页。

属其管辖^①。所有这些官员均无一例外地关注几件事：第一，确保扎波罗热人忠于奥斯曼帝国；第二，监控他们的对外关系；第三，规范他们的火药配给和武器发放。

在巴赫乞萨赖王朝统治之下，下游扎波罗热军的地域管理机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它将古老的哥萨克传统管理方式与从土耳其和克里米亚汗国借鉴而来的行政管理实践经验融于一体。对后者的借鉴主要表现在所谓“帕兰卡制”方面（帕兰卡，即四周用木栅栏围起来的居民点）^②。1714年至1734年间，汗国以及苏丹政府将帕兰卡制度推广到扎波罗热哥萨克各军事据点，那里有哥萨克驻防军和塞契行政机构代表。帕兰卡督军一方面在克里米亚（土耳其）政府面前代表其治下的民众利益，另一方面，又负责兵役，收缴赋税等事务。这一时期，扎波罗热哥萨克形成了几处帕兰卡中心，分别为布格河加尔德、斯塔雷科达克、麦洛瓦亚卡门卡等^③。

1711年至1712年的俄土条约宣称扎波罗热哥萨克有权使用先前属于他们的全部领土。据此，俄国与奥斯曼帝国便以奥列

① Д. И. 哈伊达尔勒：论十八世纪黑海西北沿岸的居民概况（历史）// 罗马大道，第6期，基什尼奥夫：人类学高级学校大学出版社，2008，第110页。

② 1734年扎波罗热军恢复沙俄国籍之后，帕兰卡制依然保留下来，并于十八世纪四十年代在下游扎波罗热军辖区全境推广开来。就更为广泛的意义而言，被称作“帕兰卡”的不仅是中心居民点，还有扎波罗热境内全部行政地域单位。帕兰卡的首脑是哥萨克军事拉达大会上推举出来的军事指挥官（督军），这些人自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起由扎波罗热塞契政府——科什任命。

③ В. 米尔切夫：克里米亚汗国治下下游扎波罗热军研究//乌克兰哥萨克史：概论（两卷本）//编辑：B. A. 斯莫里主编（责任编辑）等，基辅，2006，第一卷，第591页。





利河与萨马拉河两河中间地带为边界,延伸到北顿涅茨河。这样,第聂伯河左岸草原下游扎波罗热哥萨克自由区全部并入克里米亚汗国。然而,下游扎波罗热军入籍二十三年间,巴赫乞萨赖汗王居然没有颁布过一道法令来确认哥萨克对某片具体区域的拥有权。这种情况的出现同邻国波兰-立陶宛王国的阻挠有关。比如,1714年1月24日,波兰驻伊斯坦布尔大使斯坦尼斯拉夫·霍缅托夫斯基声称,依据《普鲁特和约》和《阿德里安堡和约》规定,他的国家认为柏塔政府有权按自己意愿将居民安顿在她们从沙俄那里夺得的土地上,但坚持要求土耳其不要将自己掌管的哪怕是一丁点土地提供给依附于他们的哥萨克人住居^①。

下游扎波罗热军土地问题无法解决,这在很大程度上还与沙俄政府和奥斯曼帝国各自对边境地区的管理方式差异有关。十七世纪下半叶,俄国形成了一个模式,即扎波罗热哥萨克为沙皇效力(为其守边,参与作战),作为交换,沙俄政府承认哥萨克有权支配其控制区域内的土地和自然资源,外加每年支付酬劳(钱款、弹药和食品等)和提供贸易、手工艺活动的优惠条件。而在克里米亚汗国,扎波罗热人是以与诺盖人同样的条件来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即每个游牧群体都分配有一定的土地供临时使用,但土地多少随时都可能会改变。这自然不能满足扎波罗热人的要求。正是这一做法吹响了下游扎波罗热军必然脱籍克里米亚汗国的号角,且最终于1734年发生。

起初,克里米亚汗国对扎波罗热人使用自然资源的限制并

^① “华沙皇家档案基金会”:古代法令文书总档案(土耳其部),卷宗79,案卷593,第19页。

不多：他们可以毫无障碍地在汗国境内从事渔猎和狩猎活动。与此同时，扎波罗热人对所猎获的东西几乎均需要使用食盐进行加工，但汗国境内的天然积盐带主要集中在克里米亚半岛北部的盐湖（萨西克湖等地）以及金布伦沙嘴（普罗格诺伊）。扎波罗热人被允许免费从湖中捞取食盐，且数量不限。但十八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汗国官员发现扎波罗热人向盖特曼区（乌克兰左岸地区）的商贩大量出售食盐，于是就给他们设定了额度，仅供扎波罗热人满足最低生活需要^①。

克里米亚汗国政府从一开始就无意用丰厚的酬劳来“恩宠”乌克兰哥萨克。以1709年为例，他们给予盖特曼马泽帕和阿塔曼戈尔季延科的给养少得可怜。仅食物方面而言，从8月17日至10月2日这段时间，盖特曼及其亲信的开销仅为一千三百三十六个阿克切（等于十一个塔列尔），而科什首领的开销少得更可怜，从8月17日至10月25日只有八百八十个阿切克（约合八个多一点塔列尔），军粮也仅以最低标准配给：面包、大麦米、肉、醋、葱、少量伏特加、战马饲料^②。而在马泽帕去世（1709年9月21日）后不久，土耳其人干脆就取消了哥萨克人的给养。相比较而言，瑞典国王卡尔十二世在这方面则表现得较为慷慨，他不仅承担了“马泽帕帮”中最高层人员的生活费用，还承担了全部“七

① B. 米尔切夫：《克里米亚汗国治下下游扎波罗热军//乌克兰哥萨克史：概论（两卷本）//编辑：B. A. 斯莫里主编（责任编辑）等，基辅，2006，第一卷，第587-603页。

② O. 谢列达：《十八世纪奥斯曼土耳其文献中的奥斯曼-乌克兰草原边界溯源》，敖德萨：奥斯特罗文印社，2015，第161-162页。





百哥萨克骑兵”的给养^①。下游扎波罗热军入籍克里米亚汗国的头五年里只得到一些微薄的薪水。这大概是汗王从柏塔政府那里得到的传统用于常规军需开支,即从所谓的“协缅薪水”(“协缅”是奥斯曼帝国雇佣军的统称)里抽取的一部分来支付给哥萨克的,而粮食月给则经常出问题,这主要是因为黑海北岸地区的粮食生产量不大^②。1714年,俄国与土耳其的关系基本稳定了下来,在之后差不多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两国处于军事中立状态。这种情况下,奥斯曼帝国以及克里米亚汗国政府看不到下游扎波罗热军在大规模军事行动方面有利用的可能性,于是便开始拒绝向他们提供给养。此后,扎波罗热人也只有靠参与克里米亚汗国对北高加索战争而得到一些奖赏作为给养。炸药与子弹也只是在出征前根据参战哥萨克人数按比例进行配发^③。

关于克里米亚汗国境内各哥萨克塞契建立的时间、先后顺序和地点等问题,乌克兰国内学界持续引发争议。争议焦点是扎波罗热哥萨克在克里米亚汗国境内建立的第一个塞契据点究竟在什么地方?是在第聂伯河左岸的阿廖什基还是在右岸卡门卡河河口附近?何时建立?

众所周知,阿廖什基塞契位于阿廖什基地界或卡尔达什诺(又称卡尔达什或卡尔达什-奥尔曼),是一个位于第聂伯河左岸、介于现今戈拉亚普利斯坦镇居民点和赫尔松州阿廖什基市

^①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手稿部,全宗905,目录2,案卷Q-344,第4页背面。

^② B. Д. 斯米尔诺夫:十八世纪奥斯曼柏塔政府治下的克里米亚汗国,圣彼得堡大学出版社,1887,第35页。

^③ 俄罗斯国家军事历史档案馆,全宗20,目录1,案卷31,第65页。

之间的地方,其北面是第聂伯河及其众多河湾、湖泊和河滩,南面是一片隆起的阿廖什基沙滩,上面长满了低矮的树木和灌木丛。测绘资料、历史文献以及考古研究等均显示,阿廖什基塞契要塞位于现今阿列廖基市西南边缘的拉孜纽克河注入孔卡河入口处,面积不足两公顷。要塞几乎呈正方形,四周挖有壕沟,垒砌着土围子,还围着木栅栏。作为综合防御设施的一部分,要塞四个拐角处还各建有一个棱堡。

根据当时经历这些事件的扎波罗热哥萨克亲口描述,阿廖什基(卡尔达什)哥萨克据点建于1709年,那时,切尔托姆雷克塞契刚刚被毁不久。第一批居民是一些没有参与过战事的哥萨克手艺人,还有一些则是成功逃脱沙俄军队围剿的塞契哥萨克^①,但也不排除阿廖什基塞契所在地之前就有扎波罗热手艺人在那里季节性居住。尽管阿廖什基的扎波罗热哥萨克数量极少,但1709年至1710年间人们却将其视为切尔托姆雷克塞契的延续。它距离克里米亚半岛也就是骑兵一天的脚程,故而汗国官员们对它的出现感到担忧。几个世纪积淀起来的敌意迫使鞑靼人对偶然出现的盟友疑心重重,更何况这些扎波罗热人当时还没有投靠克里米亚汗国。因此,1711年初春,克里米亚汗王杰弗列特·吉列二世曾一度想要“捣毁阿廖什基新建塞契,将这些扎波罗热人安置到被沙皇大军摧毁的旧址上去”^②。这个旧址指的便是切尔托姆雷克要塞。1711年初,克里米亚汗国军队与其盟友的联合军事行动进展顺利,这给哥萨克带来了一线希望。他们

① 俄罗斯国家海军档案馆,全宗233,目录1,案卷34,第88页。

② 俄罗斯国家海军档案馆,全宗233,目录1,案卷14,第170页。





不仅想尽快占领扎波罗热地区,还想占领整个乌克兰。如此一来,一个实实在在重回切尔托姆雷克的蓝图便出现在扎波罗热人眼前。

就在那一年春季,俄军实施了捣毁阿廖什基塞契计划。俄军与盖特曼哥萨克军联合部队以此为目标,在卡门江湾要塞A. 乌沙科夫上校指挥下于1711年5月展开行动。然而,克里米亚人与扎波罗热人频繁的侵扰,阻挠了联军前往阿廖什基实施既定的作战任务。为了对上级有所交代,部分俄军乘坐小筏子沿第聂伯河而下,纵火焚烧了右岸卡伊尔渡口的一处扎波罗热人的小居民点,将其作为摧毁“新塞契营地”战功上报了事^①。

尽管事态发展有些匪夷所思,但汗王欲将扎波罗热人迁居至第聂伯河右岸的计划确实是因为1711年夏沙俄军队在普鲁特河行动失利并导致领土丧失而受阻。这种形势下,汗王倒是乐于把塞契营地安置在克里米亚岛附近从而便于吉列王朝控制,有助于防止扎波罗热人回迁俄国。就这样,塞契要塞在阿廖什基便得以保留下来。

1711年秋,扎波罗热哥萨克军大部分士兵从比萨拉比亚返回。于是,阿廖什基居民点便显现出了塞契特有的氛围。因为自那时起,要塞已经聚集了近六千名单身哥萨克,尽管还有相当多的扎波罗热哥萨克依然滞留在布扎克和瓦拉几亚^②。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要塞外围开始大规模挖壕沟,堆土围子,而内部则

^① 俄罗斯国家古文献档案馆,全宗9,分宗2,目录14,第13本,第1002-1028页。

^② 十七世纪后半叶至十九世纪初俄罗斯帝国海军部档案卷宗概述,第1卷,圣彼得堡,1877,第632页。

开始兴建塞契办公楼房和库林营房。

至少,最早关于阿廖什基要塞建有库林分队的资料出现在1711年(没有明确具体月份)^①,那时,要塞内连教堂也已经建成。克里米亚汗国对宗教信仰有着很高的容忍度,这给了扎波罗热哥萨克、旧礼仪派哥萨克以及克里米亚半岛原基督教居民充分满足自身宗教需求的可能。现存的克里米亚汗国时期有关塞契的档案文件(其中包括科什阿塔曼伊万·马拉舍维奇本人的信函)明确显示,扎波罗热哥萨克驻扎阿廖什基要塞期间,圣母教堂充分发挥了其职能^②。

也正是在那个时期,位于卡尔达什河河口两岸滩涂地带出现了哥萨克军人村(即“窝冬村”)。正如1712年10月扎波罗热人卢基扬·瓦西里耶夫所说的那样,“眼下有许多小俄罗斯城镇的男人携妻带子逃往他们那个地方,这些人逢人就说去那里是为了逃避官府和财主的苛捐杂税”^③。

可见,上述涉及的1709年至1711年所有文献中所提到的“新塞契”指的就是阿廖什基塞契,而“老塞契”指的则是被彼得一世下令摧毁的切尔托姆雷克塞契,而绝非1711年的卡门卡塞契。文献关于卡门卡塞契的提法是错误的,一位不知名的塞契史料研究者在1734年5月29日(也就是塞契脱离克里米亚汗国两个月之后)的一份“致后来者”便笺上称,扎波罗热哥萨克入籍

①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手稿部,全宗905,目录2,案卷Q-347,第1页。

②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24,目录124/1,1720,第31卷,第1-3页。

③ 俄罗斯国家海军档案馆,全宗233,目录1,案卷34,第87页背面。





克里米亚汗国后的第一个定居点是阿廖什基,而非卡门卡^①。

阿廖什基哥萨克塞契营地前后存在了十九年,于1728年5月25日被亲俄国的伊万·马拉舍维奇和伊万·古萨克率领的哥萨克部队捣毁。扎波罗热哥萨克出现了两个对立派别,他们分别投靠了克里米亚汗王和俄罗斯沙皇,这导致形成两个并行的军事中心。部分愿意效忠沙皇而非吉列王朝的哥萨克在1727年末和1728年初离开克里米亚汗国回到了切尔托姆雷克,在旧塞契遗址上建起了科什营地。这部分哥萨克脱离汗国多半是因为他们卷入了吉列家族阿德尔和蒙戈里之间的王位争夺战而遭迫害,如此,切尔托姆雷克塞契得以恢复。为使自己合法化,这部分哥萨克领导尝试办理两件事:第一,获取象征下游扎波罗热军的标志;第二,摧毁阿廖什基塞契并将其中哥萨克以及周边居民迁移至切尔托姆雷克河。这两件事于1728年5月完成,切尔托姆雷克塞契维持了两年。1730年春,在获悉沙俄政府并不急于接受他们入籍请求之后,哥萨克再次将他们科什机关进行了迁移,这次他们迁至右岸的卡门卡河注入第聂伯河河口地区^②。

卡门卡塞契是扎波罗热塞契在克里米亚汗国境内的延续和最后一个塞契。它位于现今赫尔松州别利斯拉夫区的列斯布伯利康涅茨镇南边。选择这个地方作为塞契据点绝非偶然,位于现今赫尔松州别利斯拉夫区的列斯布伯利康涅茨镇(右岸)和戈尔诺斯塔耶夫卡区的卡伊雷镇(左岸)之间的第聂伯河水域自古

① 俄罗斯国家军事历史档案馆,全宗52,目录1,案卷1,第2部分,第39页。

② 俄罗斯国家军事历史档案馆,全宗52,目录1,案卷1,第2部分,第39页背面。

以来一直有渡口存在,而渡口收费就成了下游扎波罗热军在克里米亚汗国时期收入中一个最来钱的项目。扎波罗热人效力汗国,作为回报,他们从吉列王朝那里获得了在第聂伯河和南布格河渡口的收费权^①。卡伊尔渡口(即卡门卡渡口)是下游扎波罗热军掌管的五个渡口之一,每年有数以百计的盐粮贩子和商人的骡马车队由此往来克里米亚汗国,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自然成了扎波罗热哥萨克定居点的不二选择。

此处长年驻扎着哥萨克边防军,还有边关机构和杂货市场。然而,此地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塞契要塞在1730年之前并不存在。1730年,塞契哥萨克在入籍沙俄的幻想破灭之后便放弃了切尔托姆雷克,将科什营地迁移至此处哥萨克人居住区,并在原有居民区基础上增建了塞契要塞。卡门卡塞契要塞外围挖有壕沟,垒砌着土围子,内部的中心地带按习惯建有圣母帡幪教堂、塞契机构办公楼房和供三十八支库林分队使用的营房。如同以往塞契一样,卡门卡塞契要塞外围设有商业区和手工业居民区,其中有分工细化的基础设施,如作坊、商店、酒馆乃至大车店等^②。卡门卡塞契历经四年多,直到1734年3月31日下游扎波罗热军最终脱籍克里米亚汗国。

关于这一时期的科什阿塔曼领导层信息,由于扎波罗热哥萨克文献保存状况差,加之来自土耳其方面的文献引用稀少,使得现有文献资料存在局限性,据其难以全面研究当时下游扎波

① B. 米尔切夫:入籍吉列王朝的扎波罗热哥萨克概况//扎波罗热国立大学历史系学术作品集,扎波罗热,2009,第XXVI期,第173页。

② O. IO. 弗拉索夫:扎波罗热卡米扬斯卡西奇旅游景点项目——问题与前景//地方志,第2期(总79期),基辅,2012,第97-103页。





罗热军军政领导情况。这一时期,有关科什阿塔曼的人物年表大多数是依靠新塞契档案以及俄罗斯帝国军事和对外政策机构的资料来构建。然而,塞契要塞里,派别内斗不断,哥萨克军领导更换频繁,俄国边境要塞有关科什阿塔曼的消息也只是偶有记载,且这些记载材料又未能妥善保存。于是,研究者几乎没有机会来重构1709年至1734年期间扎波罗热阿塔曼领导层的真实图景,对这一时期我们所熟知的每位科什阿塔曼身上有可能发生的诸多鲜为人知的事大家也只是一种猜测。还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扎波罗热哥萨克中心有好几处,且每处又各自有自己的领导人。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掌握了一些确切资料,比如,涉及个别科什阿塔曼头领的诨号、名字和父称等信息,我们也拥有最基本的人物年表资料,虽然它们不无争议。我们依据这些资料列出下表^①,并对其进行了核实。根据这个表格,我们可以得知,下游扎波罗热军在克里米亚汗国时期有过哪些领导人。

下游扎波罗热军科什阿塔曼年鉴(1709—1734)

康斯坦丁·戈尔季延科	1709年
彼得·戈尔季延科	1710年初
阿基姆·勃古什	1710年
约瑟夫·基里连科	1710年
康斯坦丁·戈尔季延科	1710年12月—1713年
伊万·马拉舍维奇	1713年—1714年
瓦西里·约瑟福维奇	1714年8月—1715年2月

^① Ю. А. 米茨克:哥萨克故乡——十五世纪至十七世纪第聂伯彼得罗夫省历史概要,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1997,第110—112页。

伊万·马拉舍维奇	1716年7月—1720年6月
伊万·菲利波夫	1721年
瓦西里·基塔列夫斯基	1722年—1723年
瓦西里·古什	1725年
帕维尔·费奥多洛维奇	1725年6月—1727年
巴维尔·西多连科	1728年3月—6月
康斯坦丁·戈尔季延科	1728年6月
伊万·古萨克	1728年6月—7月
康斯坦丁·戈尔季延科	1728年7月
伊万·马拉舍维奇	1731年8月—1733年
雅科夫·图卡洛	1733年
伊万·毕里茨基	1733年8月—12月
伊万·马拉舍维奇	1734年1月起

下面,我们简单谈一下扎波罗热哥萨克入籍汗国后参与军事行动的大致情况。

波尔塔瓦战役失利后,卡尔十二世的军队士气低落,财政来源也急剧缩减。这种情形下,扎波罗热哥萨克对瑞典国王的效力也愈发变得徒具形式而已,相当一部分人仅将其视为一种雇佣关系,而当他们失去获得报酬的希望之后,这些人便开始离弃本德雷的瑞典军营。

早在1709年末,扎波罗热哥萨克就已开始大规模逃亡第聂伯河下游地区。他们对自己的军功没有被给予像样的回报而感到愤愤不平,这种愤怒继而便转化为行动——他们劫持瑞典军人并将其卖给土耳其人为奴。截至1710年初,被贩卖到土耳其





的瑞典军人多达四百人^①。当然,不能说卡尔十二世对扎波罗热人服役毫无奖赏。比如,1710年夏,由于给国王一行从本德雷到卡门涅茨-波多尔斯基一路担任护卫,每位扎波罗热哥萨克便得到了二十个塔列尔作为奖励,而承诺护送瑞典国王到波美拉尼亚边界的酬金则更高。但参与此类行动且有奖赏的也只是戈尔季延科的亲信及战友。也就是说,1709年下半年以及1710年,扎波罗热哥萨克的主要任务是给瑞典国王当护卫。

扎波罗热哥萨克真正参与大规模军事行动是在1711年的俄土战争期间。为帮助卡尔十二世及其乌克兰盟友一雪波尔塔瓦战败之耻,占领扎波罗热地区、盖特曼区和斯洛博达乌克兰,经土耳其政府允许,克里米亚汗国加入了对沙俄的战争。1710年11月9日,苏丹艾哈迈德三世对俄宣战,同年12月下旬征召克里米亚汗国骑兵,并将其部署在佩列科普(奥尔-卡帕)要塞。克里米亚骑兵总数近十万之众。1711年1月6日至12日,大军北上,部队大部分渡过第聂伯河右岸,直指基辅^②,余下约四万克里米亚军队沿第聂伯河左岸直扑斯洛博达乌克兰和盖特曼区南部各地。途中两千扎波罗热哥萨克骑兵以及数百步兵汇入,这支军队中有四十名瑞典人,这可能是负责咨询对俄军要塞组织进攻方面问题的军官。三周之后,这支混杂着哥萨克和瑞典人的部队渡河进入了萨马拉河右岸地区^③。

①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手稿部,全宗905,目录2,案卷Q-344,第4页背面。

② O. П. 萨宁:1710年至1711年俄土战争中的克里米亚汗国//莫斯科-克里米亚,历史政论丛刊,第2集,莫斯科,2001,第79页。

③ 俄罗斯国家海军档案馆,全宗233,目录1,案卷14,第3页及其背面。

这支克里米亚-扎波罗热联军袭击了扎波罗热沃尔内耶镇附近的诺沃谢尔基耶夫要塞(位于现今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州诺沃莫斯科区沃尔镇)。该镇居民主要由下游扎波罗热军中有妻室的扎波罗热哥萨克和税户(波兰-立陶宛王国居民)组成。1709年,这些人成功逃避俄国迫害,留在了原地。在这些人协助下,联合军于1711年2月11日攻克诺沃谢尔基耶夫。萨马拉河沿岸地区居民协助联军夺取俄军要塞之事远不是独例。1711年2月,科切列什卡军事居民点(现今乌克兰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州帕甫洛格腊特区科切列什卡镇)的居民也转而支持联军^①。联军从沃尔诺哥萨克中留下一支守卫部队,将其部署在诺沃谢尔基耶夫要塞,然后便向斯洛博达乌克兰进发,但遭到伊久姆防线俄军的顽强抵抗,被迫撤回。3月初,扎波罗热哥萨克对诺沃勃格洛基茨克要塞进行了一次进攻,同样无功而返。该要塞司令申盛向上级报告说,“诺沃勃格洛基茨克要塞由土方建成,经常加固,请不用担心——这种要塞不是扎波罗热人能攻占的”^②。这次战斗中,扎波罗热哥萨克成功焚烧了要塞外围的工事,但遭到要塞守军炮火猛烈打击,被迫撤离^③。3月5日,联军大部分放弃了萨马拉河地区,撤至莫洛奇纳亚河,准备在那里进行春季休整,喂养战马,夏季返回扎波罗热。诺沃谢尔基耶夫要塞守卫军得到五百名扎波罗热哥萨克增援。他们接到命令:死守要塞,直至主力部队返归。俄军从附近诺沃勃格洛基茨克要塞向他们发

① 俄罗斯国家海军档案馆,全宗233,目录1,案卷14,第23页。

② 俄罗斯国家海军档案馆,全宗233,目录1,案卷14,第23页。

③ 俄罗斯国家海军档案馆,全宗233,目录1,案卷14,第14页及其背面、15页。





动进攻,但聂斯图里和普利亚卡(弗里亚嘎)两位阿塔曼指挥的千人部队在两个要塞之间构筑起一块阵地^①,为诺沃谢尔基耶夫要塞提供火力掩护。



扎波罗热人与俄罗斯龙骑兵之战(1713年)

俄军统帅部由于丢失其中一个主要据点而担忧不已,于是他们加强了收复诺沃谢尔基耶夫要塞的行动。彼得一世计划于1711年4月初派遣一支由

布杜尔林少将带领的俄军和盖特曼士兵组成的约两万人的队伍攻打克里米亚,顺便在行军途中夺回诺沃谢尔基耶夫要塞。但扎波罗热哥萨克与克里米亚汗国联军主力对乌克兰右岸的征伐行动在很长一段时间将该部队阻滞在白采尔科维城和佩列亚斯拉夫周边一带。1711年3月,在这一带活动的恰好是由盖特曼奥尔利克及科什阿塔曼戈尔季延科指挥的哥萨克联军主力部队,于是那位忠于沙皇的盖特曼斯科洛帕茨基便下令,命哥萨克军事事务官布托维奇率一支哥萨克“雇用骑兵”和“雇用步兵”组成的分队向这支哥萨克队伍发动进攻。3月17日,布托维奇在利襄卡

^① 俄罗斯国家海军档案馆,全宗233,目录1,案卷14,第11页。

城附近失利,其本人被俘,联军约两万人随后乘胜向白采尔科维城进军。该城自1704年起便为彼得一世军队所掌控,其守军基本力量由安涅科夫队长所率步兵团以及当地哥萨克队伍构成,总数两千人^①。3月25日,奥尔利克与戈尔季延科率部向白采尔科维城发起猛攻,但由于守军的防御设施牢固,炮火猛烈,进攻受挫。次日,哥萨克联军分队成功夺取外围工事,却依然无法接近城堡。3月27日拂晓,城堡内守军凭借一个手榴弹连的兵力将进犯的扎波罗热人从外围工事击退,击毙了两百人,这依旧未能阻止戈尔季延科联军继续发动进攻。联军的进攻依旧遭到守军炮火、重火枪和手榴弹的猛烈回击。面对近千名士兵被击毙,数百人被俘的局面,戈尔季延科终于开始从白采尔科维向法斯托夫城方向撤退^②。

俄军将敌人从白采尔科维击退之后便将注意力集中到第聂伯河左岸地区,他们当下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解决扎波罗热人控制的诺沃谢尔基耶夫要塞。于是,安涅科夫队长所率的几支常规军部队同费奥德罗·什得洛夫斯基少将指挥的斯洛博达地区哥萨克团组成联合部队,担负起攻打该要塞的任务。4月11日,什得洛夫斯基主力渡过了奥列利河,逼近诺沃谢尔基耶夫要塞。他这支队伍有三千七百五十六名士兵,其中,一千两百六十七人分别来自阿赫德尔、哈尔科夫、苏梅和伊久姆等斯洛博达地区各

① O. П. 萨宁:1710年至1711年俄土战争中的克里米亚汗国//莫斯科-克里米亚,历史政论丛刊,第2集,莫斯科,2001,第83页。

② O. П. 萨宁:1710年至1711年俄土战争中的克里米亚汗国//莫斯科-克里米亚,历史政论丛刊,第2集,莫斯科,2001,第84-85页。





哥萨克团^①。负责该要塞防御的阿塔曼普利亚卡和聂斯图利指挥汗国士兵与哥萨克试图解除围困,但未成功,诺沃谢尔基耶夫要塞内守军主动突袭也未能奏效。次日,俄军和哥萨克部队从三面向该要塞发起猛攻,战斗进入白热化。战至下午四时,城内哥萨克投降,被俘的有七百名哥萨克(其中四十六人是塞契士兵)和三千两百二十名妇女及儿童。俄军仅缴获了一门大炮(显然,早在3月份大炮就已被扎波罗热人移出要塞)、一千三百零五支火绳枪、三面扎波罗热军旗和一面定音鼓^②。俄军以抽签形式将十分之一战俘处死,而那些侥幸存活的沃尔诺居民则被解往莫斯科,然后从那里发配到西伯利亚。遭受同样命运的还有科切列什卡居民点。4月13日,什得洛夫斯基派遣了一个由六百五十人组成的哥萨克小分队攻占了科切列什卡居民点并将其焚毁,有两百户哥萨克家庭和“波兰-立陶宛王国居民”被押送去了哈尔科夫^③。

取得胜利之后,大部分俄军撤往第聂伯河左岸的乌克兰地区。利用这一机会,戈尔季延科于4月恢复了在白采尔科维地区的军事行动。4月末,彼得·戈尔季延科(科什阿塔曼戈尔季延科的兄弟)率领一支扎波罗热哥萨克小分队企图夺取白采尔科维守卫团驻防的锡尼亚瓦城,结果被俄军预备队和白采尔科维哥萨克击溃,彼得·戈尔季延科重伤被俘,审讯过程中遭受严刑拷

① 俄罗斯国家海军档案馆,全宗233,目录1,案卷14,第20页及其背面、22页、25-26页及26页背面、背面。

② 俄罗斯国家海军档案馆,全宗233,目录1,案卷14,第22页背面、23页、61页背面、62页。

③ 俄罗斯国家海军档案馆,全宗233,目录1,案卷14,第23页、31页。

打致死^①。5月,阿塔曼戈尔季延科和克里米亚汗王杰弗列特-吉列二世对涅米洛夫城的用兵也双双失利,在沙俄军队增援下,当地哥萨克击退了扎波罗热人与克里米亚汗国七千联军对该城的进攻。同样遭到失败的还有聂斯图里和普利亚卡。5月27日,他们率部对托尔要塞发动进攻,尽管这支队伍人数不少(有两千哥萨克和四千克里米亚军),但最后却不得不退兵^②。同年夏季,扎波罗热哥萨克不甘失败,试图卷土重来,而在萨马拉河沿岸地区,依旧活动着阿塔曼聂斯图里和普利亚卡的部队,他们试图再次攻占俄军要塞。1711年6月和7月间,扎波罗热哥萨克与克里米亚汗国联军尽管抵达斯洛博达乌克兰中心地带,但已无法重复第一次的辉煌了,原因是缺少盖特曼区、斯洛博达乌克兰地区以及第聂伯河右岸地区等地绝大多数居民的支持。另外,受戈尔季延科友军的牵连也是一个原因。这些克里米亚鞑靼人和诺盖人,他们行军途中每到一处,便习惯性抓人、抢劫、杀人、焚烧教堂,这些恶行招致了民众反抗。

1711年7月11日签署的俄土《普鲁特和约》终结了乌克兰南部战事,及至同年盛夏来临之际,扎波罗热哥萨克的反俄军事活动几近偃旗息鼓。1712年4月5日,和约签批仪式在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意味着扎波罗热军针对俄军和忠于沙皇的盖特曼部队的行动不再合法。

奥斯曼和沙俄两大帝国签署和约后,下游扎波罗热军便被克里米亚汗王纳入其在西北高加索对抗诺盖人和切尔卡什人的

① 俄罗斯国家海军档案馆,全宗233,目录1,案卷74,第182页。

② 俄罗斯国家海军档案馆,全宗233,目录1,案卷14,第247-248页。





活动中去了。最早有关这方面的报道出现在1714年至1715年间。按现有文献,我们无法追踪下游扎波罗热军在此类战事中的出征频率。在一些年份,他们根本不在这一地区出现,而在另外一些年份,比如1728年至1729年间,下游扎波罗热军甚至在库班过冬。应克里米亚汗国要求,被征召参战的扎波罗热哥萨克人数因战事的规模大小而变化不定。1731年动员了三百九十一名哥萨克参战(按每个库林分队出十人规定,外加十一名队长)^①,1732年则有一千名扎波罗热哥萨克(这次按每七名哥萨克出一人参战规定)^②。尽管此类军事行动每次征召的哥萨克不多,充其量也就只占整个下游扎波罗热军的百分之十五,但总体上的人员损失相当明显,这是因为克里米亚汗国指挥官经常将扎波罗热人派往最危险的地方作战。比如,1731年出兵卡巴尔达,哥萨克有三百九十一人出征,生还者仅六十人^③。

除因隶属克里米亚汗国而必须履行军事义务之外,扎波罗热哥萨克还从事一些传统的军事雇佣活动。1733年2月,斯坦尼斯拉夫·列辛斯基和弗里德里赫希-奥古斯特开始争夺波兰王位,波兰一些权贵也卷入其中,他们通过雇佣扎波罗热哥萨克来努力加强自己的武装力量。是年夏,两百名哥萨克在列乌什科夫斯基库林阿塔曼瓦西里·瑟奇——这位未来的科什阿塔曼带领下以每人每月十个金币的酬价被波兰-立陶宛王国的一位军

①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248,目录113,案卷49,第2页。

②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248,目录113,案卷49,第20页及其背面。

③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248,目录113,案卷49,第2页背面。

官哈列茨基所雇佣^①。

总之，下游扎波罗热军军事行动最为活跃的时期出现在1711年俄土战争期间，这与它想要恢复扎波罗热全境掌控权的企图有关。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1709年至1734年期间下游扎波罗热哥萨克的政治立场问题。在他们投靠吉列王朝的四分之一世纪里，由于亲俄和反俄两个不同派别领导经常轮换掌权，下游扎波罗热军的政治立场也不停地发生着变化。这种亲俄和反俄的两面性一直为下游扎波罗热军内部政治生活所特有。

反俄派领导长期由戈尔季延科担任，该派反俄立场基于塞契哥萨克民众对彼得一世统一化政策的不满。1705年，俄国划定了其与奥斯曼帝国（克里米亚汗国）接壤的南部边界（包括扎波罗热地区在内），使得扎波罗热人丧失了自由出入第聂伯河下游从事捕鱼和开采食盐等活动机会，同时也使得他们前往克里米亚草原进行传统狩猎的行为和去土耳其城镇变得非法起来。顺便提一下，戈尔季延科的拥趸是那些住在塞契的未婚扎波罗热哥萨克，他们的基本职业恰恰是从事这两种活动。当然，反俄派的心理原因也不可忽视。他们内心仇视俄国人，认为这些俄国人心怀“强国梦想”，强行改变“自古以来”哥萨克的自由，并且在1709年至1711年间热衷于迫害哥萨克。

亲俄派的社会基本盘是那些位于大卢戈（即第聂伯河河滩）扎波罗热窝冬村的居民以及纳德波罗热村、奥列利河及萨马拉

^①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248，目录8，案卷473，第85页及其背面、86页。





河沿岸地区的常住居民,畜牧、硝石开采、养蜂以及少量的农耕等构成了这些人基本的经济活动。与盖特曼地区相邻的扎波罗



扎波罗热窝冬村

热北部地区居民比其他地区的民众更为迫切地期待与在1709年至1711年的战事中遭毁坏的乌克兰地区恢复联系,他们既想通过向俄控区迁移

人口,又想通过鼓动全部下游扎波罗热军回归俄国的方式来实现这种愿望。早在1710年,扎波罗热哥萨克中的某些人和某些组织就曾向俄军统帅部和盖特曼政权管理部门提出过请求,希望允许他们回归哥萨克团故地,在自己的家乡定居下来。有不少哥萨克士兵参与戈尔季延科反俄活动仅仅是因情势所迫,他们一则担心遭到塞契社群迫害,二则害怕遭俄国压迫,因为他们属于下游扎波罗热军是一个铁的事实。俄土关系稳定期间,塞契军营高层领导岗位经常由亲俄派担任。而一贯持亲俄立场的科什阿塔曼军官有伊万·马拉舍维奇、瓦西里·古什、伊万·古萨克。在担任阿塔曼职务期间,这些人曾与俄国高级官员以及盖特曼政权当局有过不下十次的谈判。例如1715年1月,1716年5月,1717年7月,1718年11月至1719年1月,1728年10月,1731年8月等,试图为下游扎波罗热军恢复名誉,使其回归俄国。

还有一点也不能不考虑,即下游扎波罗热军需要源源不断地从乌克兰地区得到兵源补充,因为它那时还没有像顿河哥萨克、捷列克哥萨克、格列宾哥萨克以及雅伊克哥萨克等那样成为一个封闭、在自我繁衍方面自足的社会群体。扎波罗热哥萨克依旧是一个十分独特的社会模式,其中融合了欧亚游牧民族、中世纪欧洲军事封建阶层以及骑士团等社会群体的古代男性联盟特征。下游扎波罗热军需要经常不断的“更新血液”,在依附克里米亚汗国时期,尽管其兵源补充遭到俄国政府围堵,但依旧得以平稳实施。当时,俄国出台的政策规定,所有盖特曼地区以及斯洛博达乌克兰地区居民,凡与扎波罗热地区有一丝联系者便会受到政府严厉惩罚,凡落入政府手中的扎波罗热人,轻则烙字发配西伯利亚,重则处死。塞契哥萨克组织成员数量无论是1709年,还是1734年都维持在七千至八千人这样一个范围。

造成下游扎波罗热军不满和接下来回迁俄国的更深层次原因根植于两个方面:其一,扎波罗热人在克里米亚汗国的社会地位不明确;其二,扎波罗热人对经济、内外政策方面的各种综合性不良因素很有意见(我们前文提及过塞契与吉列王朝在“土地问题”方面发生冲突的复杂局面)。1724年,诺盖人自库班地区迁往第聂伯河下游流域,这对扎波罗热人生存空间造成极大挤压,因为畜牧业是扎波罗热人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部分,而诺盖人的迁入造成了牧区缩小,其利益受损如切肤之痛,此举加速了塞契人回归俄国的决心。最为明显的是这些新诺盖人在黑海北部地区的出现不仅使扎波罗热人不满,克里米亚鞑靼人和早期进入这一地区的诺盖人也不满起来。于是,草原上出现一股流





言,说是克里米亚汗国接纳耶迪桑人入籍就是要用其来替换扎波罗热人。因这股流言,同年秋,克里米亚鞑靼人之间甚至出现了骚乱,他们担心,如果汗王允许熟知克里米亚汗国情况的扎波罗热人回归俄国,那么这些人会在以后的行动中对克里米亚人不利^①。

在蒙戈里-吉列(1724年至1730年)以及卡普兰-吉列(1730年至1736年)统治时期,克里米亚汗国内政出现了某种稳定化趋势。这首先表现在他们成功挫败了诺盖汗国试图利用吉列王族个别成员进行暴动的企图,积极发动对顽固坚持脱离巴赫乞萨赖政权的西北高加索阿迪格人征讨活动。扎波罗热人在这些征讨活动中元气大伤,常受“夹板气”。比如,1727年12月,吉列王朝的王储阿德尔-吉列据说是遵照汗王命令,征召了两千名居住在南布格河沿岸地区的扎波罗热人,然后带领这些哥萨克进驻布扎克。在那里,他试图鼓动当地诺盖人对抗汗王蒙戈里-吉列二世。暴动很快被平息,王储本人被俘,而大部分被胁迫参加叛乱的扎波罗热人则被卖到奥恰科夫给土耳其人当划船奴隶去了。

克里米亚汗王对草原上的打家劫舍行径采取严厉打击措施,无论是对扎波罗热哥萨克人,还是对克里米亚鞑靼人或诺盖人都毫不留情。由于接受克里米亚汗国统治,扎波罗热人便失去最为重要的传统营生之一,即猎取“哥萨克口粮”,简单说,也就是对自己的邻居实施“抢劫”。株连制,这个奥斯曼帝国和克里米亚汗国的有效管理手段在扎波罗热人中也推广开来。他们

^① 俄罗斯国家军事历史档案馆,全宗20,目录1,案卷16,第2页。

中每发生一次抢劫,整个军队就要承担责任,且首先是罪犯所在的那个库林要承担责任。如果抢夺了鞑靼人马群或羊群,又或者抢劫了商人商队,那么罚金有时会高达数千金币。汗国政府官员经常毫无根据地捏造事实,指控扎波罗热人抢夺财物,借此向他们罚取大量钱财。另外,有一个事实必须承认,即很多哥萨克参与这项历史悠久的“草原体育活动”(格鲁舍夫斯基对这种传统抢劫的称呼)。从南布格河无人区到亚速海一带有不少隐秘逃难所,有些扎波罗热塞洛马(一些靠打劫为生的普通哥萨克)和一些诺盖图武士就是从这些地方走上“人生大道”的。为杜绝这类现象发生,汗王们动用军队进行军事稽查,同时吸引草原哥萨克参与到这项行动中来,规定每个库林出一人^①。

值得注意的是,在投奔克里米亚汗国期间(四分之一世纪),扎波罗热人竟一直未能与克里米亚鞑靼人和诺盖人处好关系,未能建立起互信。个别场合下,扎波罗热人与克里米亚人相互恭敬,称兄道弟,信誓旦旦地互表忠诚,但这也只是例外,并非常态。这种“兄弟情谊”更多地是因为他们意识到相互之间有着对沙俄帝国的相同仇恨,而非发自对对方由衷的好感。这方面,1730年9月发生在加兹克尔门城的一则故事颇能说明问题。有两位扎波罗热贩子找到佩列沃洛奇——一位懂突厥语的乌克兰商人,请求他陪他们去一趟诺盖人那里购买食品,原因是他们不懂突厥语。诺盖人穆扎(克里米亚鞑靼人的称呼)相邀他们同进晚餐。席间,他有些好奇,这几位究竟是什么人?当他得知当翻译的乌克兰商人来自(俄国)盖特曼地区,而那两位是扎波罗热

^①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248,目录8,案卷473,第116页。





人,穆扎便“多次对乌克兰翻译说,你是我的敌人,转脸则对两位扎波罗热人说我们是兄弟,他们那些俄国佬是我们的敌人”^①。同样,部分扎波罗热人亲克里米亚的态度更多是出于对俄国统治的仇视,而并非出于对克里米亚汗国的热爱。

扎波罗热人与克里米亚人彼此相互猜忌,相互提防着谁会第一个在背后向对方下手。这种猜忌氛围在1731年至1733年达到极点。那几年,塞契大本营的亲俄氛围高涨,而克里米亚和诺盖草原居民对扎波罗热人的恐慌症也发展到了极致。引起这一恐慌心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那些年克里米亚汗国军队相当一部分兵力在北高加索忙于镇压切尔卡什人暴动以及忙于同波斯人的战争,而扎波罗热哥萨克军队只是有限地介入这些战事。因此,某些时候给人的感觉是,这些扎波罗热人似乎在克里米亚附近聚集了一支庞大军队。人们对塞契军队的恐惧如此强烈,以致由于这个缘故,1731年9月,原本在巴赫乞萨赖商讨好的有关克里米亚鞑靼人和诺盖人联合对盖特曼地区实施劫掠的计划也被迫取消。有一位别伊(近东和中东国家小封建领主或官员的尊号)这么说道:“每当我们去俄罗斯人的城镇打劫,我们得到的还不如扎波罗热人给我们造成的损失多,他们虽然住在我们克里米亚,归我们管辖,但是他们的心思还在俄罗斯那边,要是我们一旦离开,他们就会把克里米亚洗劫一空。”^②

鞑靼人与扎波罗热人的隔阂越闹越大,他们之间爆发武装冲突和相互屠杀的可能性也逐渐增大。这一点感受最深的不是

① 俄罗斯国家军事历史档案馆,全宗20,目录1,案卷31,第65页背面。

②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248,目录113,案卷49,第2页。

塞契军人，而是那些有家小的扎波罗热居民。这些人自十八世纪二十年代起就在大卢戈至土耳其和克里米亚汗国的戈兹列夫、卡法、巴赫乞萨赖、加兹克尔门以及奥恰科夫一线定居下来。1733年夏，由于感受到战争威胁，扎波罗热居民从克里米亚南部边界和山区大批出走。正如一位离开自己住所，携家带口投奔塞契的难民所言，“眼下，我们在克里米亚生活越来越艰难，一不小心，就会被抓去当俘虏”^①。

就这样，1720年至1730年期间，扎波罗热人中滋生着反克里米亚和土耳其情绪，这种情绪一直不断地沉淀着，并最终凝结成回归俄国的决心。早在出走克里米亚汗国的头几年，扎波罗热科什同俄国和盖特曼手下的官员密函往来中就探讨过这个问题。俄罗斯政府方面，自彼得一世离世之后，原先对下游扎波罗热军不可调和的态度变得不那么坚决了，俄政府也在等待适合时机，让他们回归。这种时机便是再发动一场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使自己摆脱早先承担的义务。

1733年夏，科什又一次找到了基辅总督幺冈-别伦加尔德·冯·韦斯巴赫将军，后者将此事呈报给了女皇安娜。于是，1733年8月31日，女皇签署法令，恢复下游扎波罗热军名誉，准其回归俄罗斯，按照拉达大会的决定，回归仪式定于次年春季。克里米亚汗国境内自夏季山区牧场到库班和布扎克一带的所有扎波罗热人都被暗中告知了这一决定。于是，所有想回归俄罗斯的扎波罗热人纷纷离开了克里米亚汗国。

^①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177，目录1，1733，案卷5，第10页背面。





下游扎波罗热军离开克里米亚汗国时到底有多少人,弄清楚它是件很复杂的事。目前所知的是,仅仅是1734年,塞契要塞就有七千一百一十五名哥萨克,而要弄清楚包括窝冬村居民和在波兰-立陶宛王国居住人员在内的全部扎波罗热人数量,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因为那年年末,他们中依然还有一部分人滞留在克里米亚汗国,而另一部分人,眼见俄土对峙,已经迁移到盖特曼哥萨克团控制区和斯洛博达乌克兰地区等一些较为安全的地方去了^①。大迁移并非自发,哥萨克迁往新驻地时,把塞契要塞所有能拿的东西都带走:要塞内的教堂和库林房舍部分被拆卸装车,教堂上的十字架和大钟以及其他一些大型物件被装上大船,等第聂伯河冰解河开便往上游搬运,剩下的物品用马车、牛车载运。1734年3月28日,哥萨克离开卡门卡塞契要塞。他们沿卡门卡河,经过三昼夜航行,于3月31日停泊于波德波利纳亚河港口,在那里建立了新塞契——最后一个扎波罗热哥萨克要塞(位于现今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州尼科波尔区波克罗夫村附近,已被卡霍夫卡水库淹没)。同年夏,下游扎波罗热军代表访问了帝俄都城圣彼得堡,受到了安娜女皇的接见,9月2日,冯·韦斯巴赫将军在白采尔科维接受扎波罗热哥萨克统领们的集体宣誓效忠。

如此一来,下游扎波罗热军近四分之一世纪听命于吉列王朝的历史便宣告结束,自此开启了“新塞契时代”。

下面,我们来谈一下“新塞契时期”(1734年至1775年)那些

^①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24,目录124/1,1734,案卷5,第1页及其背面。

留在克里米亚汗国的扎波罗热哥萨克情况。

正如当年在克里米亚汗国时期一样，扎波罗热哥萨克在回归罗曼诺夫王朝之后，其政治态度也没有统一过，亲俄与亲克里米亚两大阵营依旧保持着对立。

而一部分哥萨克依旧留在汗国境内各处，直到1775年被彻底剿灭。这些人中，不仅有塞契光棍，还有“看家者”或“宅翁”（即有家室的哥萨克）。克里米亚半岛山区和南部沿岸，气候适宜，地势平缓，吸引着不少扎波罗热哥萨克前来生活，相比供职于汗王的戎马生涯，他们更倾向于安稳生活。十八世纪二十年代，他们来到戈兹列夫、卡法和巴赫乞萨赖等城市周边定居。这些哥萨克尤其偏爱在希腊人（卢梅和塔茨克）的城镇开磨坊，建花园，种葡萄^①。1734年之后，不少哥萨克村民“遍布在克里米亚城镇，尤其是在王城巴赫乞萨赖，这些人相当多，有的还娶了希腊女人，于是就有了牵挂，更舍不得离开了”^②。

还有部分扎波罗热塞契哥萨克也没有回归。这群人的生活痕迹在1730年至1760年间的巴赫乞萨赖与其周边地区保留下来的文物中能寻找到。这群人的主体部分由扎波罗热哥萨克单身汉构成，可惜的是，他们在1735年至1739年俄土战争期间的生活史目前还没有被研究。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他们人数在战争结束后由于扎波罗热和盖特曼地区居民的涌入而大量增加^③。根据当时一

①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177，目录1，1733，案卷5，第10页背面。

②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23，目录1，1744，案卷2，第124页。

③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15，目录1，案卷61，第21-26页。





些帝俄秘密信息员的报告,1734年之后,有一群塞契哥萨克在庫班的涅克拉索夫哥萨克村庄定居下来。顺带一句,在归顺克里米亚汗国期间,扎波罗热哥萨克与这些涅克拉索夫哥萨克关系相当不错^①。不过,这群“库班人”显然人数不多。

新塞契时期的整个扎波罗热哥萨克史贯穿着一个主题,这便是哥萨克领导在保持自治条件下,不断尝试促使整个扎波罗热哥萨克群体的传统生活方式适应新环境,力图与俄国地方和高层管理当局达成各种妥协。扎波罗热哥萨克高层在下游扎波罗热军中尝试实施一些新规,说白了,就是想使该部队在俄罗斯帝国日益中央集权化的条件下能“生存”下来。但这些努力遭到了秉承传统生活方式的普通哥萨克群众的抵制。对这些扎波罗热的“塞洛马”来说,其偶像与榜样是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那些在刀尖上闯荡的哥萨克劫掠者,而绝非十八世纪健壮的窝冬村主人。对立和抗争情绪正是在这群塞契底层哥萨克中滋生、蔓延的,并最终导致1749年、1756年和1768年的武装暴乱。对新生活方式的反抗情绪在盖达马克活动中也有体现。他们在扎波罗热一些地方建立了几处自己的“小塞契”^②。新塞契时期,这些“小塞契”逐渐培植出一种“克里米亚传奇”崇拜——吉列王朝统治下的自由生活神话^③。

① 俄罗斯国家军事历史档案馆,全宗20,目录1,卷宗1165,第53页。

② A. O. 斯卡利科夫斯基:新塞契史或扎波罗热末代科什史[前言与述评,Г. К. 什维契柯],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1994,第420-421页。

③ O. O. 利亚宾宁-斯克里亚列夫斯基:十八世纪扎波罗热暴乱与科什领导层分析//Г. Л. 马林诺娃、И. В. 萨巴什尼科夫、А. А. 利亚宾宁-斯克里亚列夫斯基:生平资料,敖德萨-基辅,2000,第93页、141页、146页。

自《贝尔格莱德和约》(1739年)签署之后,俄国叛逃者纷纷自愿投奔克里米亚汗国扎波罗热哥萨克阵营。十八世纪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期间,扎波罗热哥萨克在巴赫乞萨赖建立的社群成了下游扎波罗热军叛逃者圣地。投奔这里的有塞契“愣头青”,还有扎波罗热丘马克(即盐粮贩子——译者)和哥萨克猎狐人(皮毛兽猎人),即所有认为克里米亚汗国生活能让他们实现更大人生目标的人。刚开始,为了挣钱糊口,部分人不得不给人帮工。这种情况最终影响到他们在当时的俄国、土耳其和克里米亚鞑官方文件中的身份称呼——“阿尔加特”(雇农)和“林季别尔”(短工)^①,然而这种称呼并不能反映当时扎波罗热移民的真实生活状况。1744年9月,尼基弗洛夫中尉受基辅总督委派来到巴赫乞萨赖。据他报道,大多数扎波罗热阿尔加特滞留克里米亚与其说是为谋生,不如说是为了逃避犯罪惩罚。这位尼基弗洛夫有些渲染式地写道,“这些被称作‘阿尔加特’的扎波罗热哥萨克们(……)是一群醉鬼,无论挣多少钱都要喝光”,“这些阿尔加特们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保护自己,不想因胡作非为而受惩罚,而其余人则因不守誓言,身犯诸罪而逃到克里米亚来”^②。

汗国当局明知这些人不会安分守己,滞留在自己领土上会带来不良后果,但依旧收留他们,处心积虑地谋划如何利用这些人来达成自己的目的。在汗王私人翻译加桑(一位改信伊斯兰教的前扎波罗热人)推动下,哥萨克安德烈·谢尔宾纳获得那些

^①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15,目录1,案卷61,第27页背面、67页背面。

^②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23,目录123/1,1744,案卷2,第6页背面、37页。





自1709年就在巴赫乞萨赖定居下来的马泽帕分子的支持,被选举为克里米亚扎波罗热人阿塔曼,而汗国政府的一个近期计划就是尽快将其队伍从克里米亚迁到布扎克,并在那里建立独立的科什营地——塞契^①。

沙俄政府外交机构使尽手段来阻挠这一计划实施。尼基弗洛夫援引《贝尔格莱德和约》关于相互引渡罪犯条款,要求引渡阿塔曼谢尔宾纳,因为他是俄国人,因犯罪一直被科什通缉。于是,安德烈·谢尔宾纳便成为国家关系中一枚可兑换硬币,很快便被移交给了俄国当局。1744年10月17日,他被“俄国”扎波罗热哥萨克押送到塞契^②。随后,在尼基弗洛夫的要求下,又有数十位扎波罗热哥萨克分三阶段被移交给俄国,但其中不少人逃脱并返回克里米亚。最终,有十四个塞契库林的二十九名哥萨克被引渡俄国^③。

关于克里米亚扎波罗热哥萨克“流亡者”中心问题,尽管俄国驻伊斯坦布尔两任大使A.涅普留耶夫和A.奥布列斯科夫先后于1746年至1747年和1753年向土耳其政府提过抗议,要求关闭,但这些中心照样继续存在。于是,为顺利达成关闭中心这一重大目标,俄罗斯外交机构采取反制措施,坚持要求在巴赫乞萨赖设立常驻领事机构,但遭到土耳其柏塔政府的坚决反对。俄国针对巴赫乞萨赖的扎波罗热哥萨克群体的这一反制措施并没

^①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23,目录123/1,1744,案卷2,第50页。

^②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23,目录123/1,1744,案卷2,第52页。

^③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23,目录123/1,1744,案卷2,第22页背面、46页背面、62页背面、63页、123-124页及124页背面。

有取得重大成果^①。

眼见俄国政府对扎波罗热哥萨克事务鞭长莫及，于是，自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汗国当局就开始积极吸引这些哥萨克参与各种军事行动。据记载，1754年9月，克里米亚汗王对切尔卡什人发动了一场战争，动用六千人军队，其中就有不少涅克拉索夫哥萨克和二百八十位“自由扎波罗热人”^②。当然，不清楚这些人是巴赫乞萨赖扎波罗热哥萨克抑或是库班哥萨克，也有可能是几支不同的“克里米亚”扎波罗热哥萨克队伍的混合。1755年，这些人试图引诱塞契哥萨克加入自己阵营。同年9月末，基辅副总督И. 科斯秋林得到情报称，身在克里米亚的“马泽帕派”移民Ф. 米洛维奇和Ф. 纳西莫夫斯基试图同塞契军人搞好关系。他们暗中托人给陪伴少校米罗诺夫前往克里米亚的两位扎波罗热人捎去信函，鼓动他们脱离俄国，不过米罗诺夫少校十分机警，挫败了这起图谋^③。

克里米亚哥萨克与扎波罗热塞契之间的信息交流或许有其他渠道，因为这种鼓动宣传最终还是达到了效果。例如，1755年9月19日，И. 科斯秋林给枢密院的密报称，有一百一十九名扎波罗热哥萨克越过边境，进入奥恰科夫州，在德涅斯特河“比萨拉比亚一侧”（即德涅斯特河右岸）建立营地，随后便派代表前往克

①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15，目录1，案卷61、第23页及其背面、26页背面、59页及其背面。

②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248，目录113，案卷1574，第599页。

③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248，目录113，案卷1579，第517-518页。





里米亚,请求接受他们入籍^①。我们猜测,这些人的逃离不排除有“克里米亚”扎波罗热人参与谋划。为印证这种猜测,我们援引俄国间谍机构雇佣帕夏身边文秘拉德凯维奇的一则密报。据他说,1755年8月,考塞尼城有一些“克里米亚”扎波罗热人,他们在布扎克土耳其陆军总司令部当差^②。这位线人还目睹了扎波罗热哥萨克在本德雷城附近组建库林分队,并且向克里米亚汗王派出使者等一些事情。稍后,波兰边境警官给本德雷帕夏专门去函谈论这些哥萨克人。他指责这些人从事抢劫活动,要求引渡他们接受惩罚。这位土耳其官员没有理会他的这一要求,而是将这些人编入当地其他扎波罗热人队伍中^③。1755年至1756年期间,这支数量可观的扎波罗热哥萨克队伍被安置在比萨拉比亚地区。于是,1756年10月3日,彼得堡收到消息,称在比萨拉比亚的奥尔基耶夫和基什涅夫有四百名扎波罗热哥萨克,同时还有其他叛逃分子^④。关于这四百名哥萨克之事也被另外一个俄罗斯间谍——摩尔多瓦神父达米安所证实。他在密报中说,这群人最初到达土耳其境内时情况并不好。土耳其人最初打算将他们送去服苦役,甚至干脆消灭掉,但考虑后改变了主

①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248,目录113,案卷1579,第488页及其背面。

②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248,目录113,案卷1579,第494-495页。根据这位谍报员从位于圣伊丽莎白城边境要塞得到的消息,这些似乎是塞契逃跑的哥萨克,他们“一百一十九人在鞑靼边境安营结寨,并派遣代表前往觐见汗王,请求收留庇护”。(乌克兰国家图书馆手稿研究所,全宗IX,储存单元132-214,第146页)

③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248,目录113,案卷1579,第526页及其背面。

④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248,目录113,案卷1579,第3页。

意,让他们服军役,“说是用那些来降的恶棍们或许能够招来全体塞契哥萨克,就如以前招来扎波罗热人一样”^①。

由此可见,巴赫乞萨赖政府对待扎波罗热哥萨克和乌克兰盖达马克的态度并非明了,但即便如此,汗国政府依然试图把这些人当作一股军事力量来加以利用。例如,根据1760年4月16日报道(那时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竭力拉拢克里米亚吉列汗王参与七年战争),“那位汗王还在招收(……)鞑靼军队,尤其是招收盖达马克”^②。

不同时期,这些居住在克里米亚和土耳其城市的扎波罗热人都有被提及,例如,有位住在阿克门城名叫瓦西里的(1754年)^③。由于边境的通透性,加之黑海沿岸人烟稀少,这使得扎波罗热哥萨克人可以随时随地在克里米亚汗国控制的大陆境内落脚。他们的到来对克里米亚汗国和奥斯曼居民来说不是什么好事。扎波罗热科什(打鱼场的临时居住点)甚至靠近了土耳其军事要塞附近。据1755年土耳其方面的一份报道称,“有几位奥恰科夫居民驾着两条小帆船装运木材,他们将小船停靠在哥萨克科什据点对面的布格河河口,但这些哥萨克却明目张胆地围攻他们,将他们洗劫一空,船帆也被夺去,人被放走时已是不着寸缕”^④。就此次抢劫之事,从圣伊丽莎白要塞前来奥恰科夫进行

①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248,目录113,案卷1579,第701页及其背面。

② 乌克兰基辅市国家历史档案馆,全宗229,目录1,案卷88,第7页。

③ 乌克兰国家图书馆手稿研究所,全宗IX,储存单元625-650,第15页背面。

④ 乌克兰国家图书馆手稿研究所,全宗IX,储存单元132-214,第92页背面。





谈判的彼尔姆骑兵团军官瓦西里·安吉宾和科姆帕涅伊斯基团瓦西里·舍尔斯鸠克阿塔曼连长在与奥恰科夫法官会面时试图否认指控。他们说：“或者，这事（指抢劫）不是扎波罗热人干的，而是其他什么人做的？要知道，盖达马克来自不同民族。”但那位法官坚信“此事就是扎波罗热人干的”^①。

往后有关“克里米亚汗国境内”扎波罗热人的报道极为零散。最后一份报道注明的时间为1758年，说是有一群居住在库班的扎波罗热哥萨克打算迁居到克里米亚半岛^②。再往后就是大段空白期，没有任何报道。至少，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和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前半期，俄国枢密院、陆军院机要处和外交院等部门的考察密件中没有这方面的任何信息。给人一种感觉，这群扎波罗热哥萨克移民失去了激发他们渴望生活，追求理想，促使他们积极行动起来的前进动力。显然，起着这种激发动力作用的是老一代哥萨克戈尔季延科、马泽帕和奥尔利克等人的战友们。随着这些人渐次离世（Φ·米洛维奇和Φ·纳西莫夫斯基均于1758年离世），这支扎波罗热哥萨克逐渐成了不折不扣的“雇工”——他们无所谓出卖自己的劳力还是武艺。当然，不排除余下其他一些哥萨克在1755年之后融入土耳其境内的扎波罗热人主体，即所谓的“布特卡雷”中去了。至少，在土耳其政府任命的“奥恰科夫”扎波罗热哥萨克军官中就有留利卡上校这样“并非本地先前的扎波罗热人”^③，仅这一点就暗示着这种可能性。

① 乌克兰国家图书馆手稿研究所，全宗IX，储存单元132-214，第84页及其背面。此处“不同民族”当理解为各国臣民。

② 俄罗斯国家军事历史档案馆，全宗20，目录1，卷宗1165，第53页。

③ 俄罗斯国家军事历史档案馆，全宗52，目录1，卷宗304，第II部分，第11页。

第三章 最后的塞契:新塞契/波德波利纳亚塞契/波 克罗夫塞契(1734年—1775年)

史料中,最后一个第聂伯河扎波罗热哥萨克塞契是以“新塞契”或“波德波利纳亚塞契”或“波克罗夫塞契”的名称出现的。这三个名称是其基本称谓的具体化附加别称,在下游扎波罗热军最后一个大本营存在期间,它们使用频率并不高,主要出自史学文献,并且也只是自十九世纪上半叶起才在史学家著作中出现。而“新塞契”这一名称则可以在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后半期的俄国官方文件中读到。那时,塞契大本营也确实是“新”的,即,它是由那些刚刚从克里米亚汗国回归的扎波罗热哥萨克所建。

此处扎波罗热塞契要塞位于第聂伯河右岸,坐落在波德波利纳亚河汇入第聂伯河河口处的红库特“景区”。该地是一处河水冲积而成的半岛,位于现今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州尼科波尔区波克罗夫村以东的第聂伯河水域。正是由于这一居民点的名称,1775年在此建成的新塞契时而被称为“波克罗夫塞契”,1955年因修建卡霍夫卡水库导致该处旧址被淹没于水下。

一方面,哥萨克选择这个地方作为新塞契落脚地是相当有讲究的:第聂伯河在该段水域宽阔,支流众多,水草丛生,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去处。半岛连接陆地的部分生长着阔叶林,形成了



一道天然屏障。因此,在河流、河滩以及沟壑防护下,这个据点非常安全。

另一方面,第聂伯河水文变化莫测,春汛时节尤其复杂,从而导致不少问题出现。如,哥萨克在波德波利纳亚河畔安顿下来又几年之后,确切一点说是在1740年,发了一场大水,河水冲垮了堤岸,毁坏了不少防御工事和住宅,给他们带来不少灾难。此外,此处地势低洼,这不仅给哥萨克生活用水造成了极大危害,同时还使得他们不得不与河滩蚊虫为伍,从而深受其害。这些侵害相叠加,使得塞契相当一部分居民的平均寿命受到影响。要知道,先前这些扎波罗热人在卡门卡塞契的居住环境可比此处要健康舒适得多。

还有一点应该指出来,扎波罗热新塞契位于水陆两路交叉路口,道路四通八达:由此往北,可通往第聂伯河在米舒林角和佩列沃洛奇两处渡口的小要塞以及萨马拉河畔小要塞(现今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州的一个区中心——诺沃莫斯科夫斯克市);往南,可达土耳其的加兹克尔门要塞和奥恰科夫要塞;往西,可至扎波罗热小城——布格河加尔德城和俄国圣伊丽莎白要塞(现今乌克兰一个州的中心——克罗皮夫尼茨基市)。此外,沿第聂伯河顺流而下,新塞契还可与黑海沿岸克里米亚汗国和土耳其的一些城堡有往来;更远一点,可通往整个东地中海各大贸易中心。

与其他塞契不同的是,扎波罗热新塞契在波德波利纳亚河畔建立的确切时间是明确的:1734年3月31日(旧历)。这正好是大部分下游扎波罗热军成员在科什阿塔曼伊万·马拉舍维奇

率领下，“经水路和草原大道”从卡门卡塞契来到新址一周之后的事。

扎波罗热哥萨克出走克里米亚汗国之后又重返“老家”（扎波罗热“新”塞契位于第聂伯河原先切尔托姆雷克“旧”塞契下游，两者相距仅六公里），原因是这些塞契人不愿与鞑靼人合伙攻打乌克兰右岸地区，因为他们不想帮助波兰国王斯坦尼斯拉夫·列欣斯基的盟友来对付俄国人。另外，克里米亚汗王卡普兰-吉列还要求扎波罗热哥萨克把塞契大本营迁回到1728年前的旧址阿廖什基城，就是说，让他们距离克里米亚汗国更近一些，这样方便掌控。所以，哥萨克为保障自身安全，免遭汗国政府图谋侵害，情愿搬到离俄国边界更近的地方。更何况，此举早在1733年11月他们就已经征得俄国政府同意，尤其是得到了女皇安娜·伊凡诺芙娜首肯。

由于扎波罗热新塞契建在边境地区（克里米亚汗国以及奥斯曼土耳其官员认为这是他们的领土），而科什（哥萨克军指挥部）又不想引起冲突，于是他们不得已放弃了在新要塞周围修建防御工事的想法，仅修建了营房——“库林”和临时教堂等几处建筑。这样一来，在头一年半的时间内（到1735年秋），新塞契四周既没有壕沟，也没有防御性围墙，只是在塞契内部机关科什所在地摆放拒马，斜埋尖木桩，以此作为有效手段，防止鞑靼-诺盖骑兵突然袭击。

1735年至1739年，随着俄土战争爆发，形势发生了变化。下游扎波罗热军积极参战，与俄国军队和乌克兰（盖特曼）军队并肩战斗，除了向加兹克尔门、奥恰科夫、佩列科普、阿拉巴特和其





他克里米亚汗国和土耳其的要塞发起进攻,他们还参加了第聂伯河以及黑海的水战。

鉴于塞契几乎毫无防御能力,且只有少量哥萨克队伍留守(大部分扎波罗热哥萨克都已出征),俄军总指挥布尔哈德-赫里斯托福尔·冯·米尼赫元帅于1736年春便从佩列沃洛奇要塞向塞契派遣了一支由上校冯·佩奇率领的四百人步兵队伍前来协防。在工程人员监督下,该扎波罗热中心定居点3月底便开始修建防御工事,于是,塞契地位的不明确性就此结束:人们明白,塞契大本营从此将永久安扎在波德波利纳亚河畔。

1736年春季到秋季期间,塞契的防御能力大为增强,以至1737年1月,一队鞑靼骑兵攻打完波尔塔瓦和米尔哥罗德两处哥萨克团所在地区之后,于返回克里米亚汗国途中对它发动袭击,结果非但没有成功,反而由于受到武器精确射击而损兵折将,被迫撤离^①。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城防设施建设一直进行着,直到1739年底。随后,由于要消除1740年那场大洪水所带来的毁灭性灾害(前文已有提及),城防建设于1740年至1741年又得以继续。

从建立到1775年末,波德波利纳亚塞契在整个这段生存期间曾数次陷入生存绝境。它不仅差点丧失本身存在的条件,还几乎失去作为下游扎波罗热军行政中心而拥有的地位。比如,1756年1月1日,塞契发生了一起毁灭性火灾,一批相当数量的库林兵营以及其他营地设施遭焚毁,于是哥萨克军委员会决定

^① X. Г. 曼施坦恩:1727年至1744年俄国历史、民政及军事笔记,莫斯科,1823,第102页。

将大本营从波德波利纳亚迁至尼基京角（现今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州的区中心尼科波尔市），那里各方面条件都不错——远离边境，气候宜人，且还有一个第聂伯河大渡口。

盖特曼基里尔·拉祖莫夫斯基支持科什行政机构关于尽快实施建设新塞契计划的游说。1750年末至1760年初，俄国工程师达尼尔·戈杰·伯克赛特、卡尔·冯·施托芬及其他人对波德波利纳亚塞契和尼基京角（尼基京诺）先后进行了考察，绘制了草图，并制定了建设方案，但终究没能付诸实施。原因是俄国陆军领导在决策过程中担心再建一个新塞契会引起奥斯曼帝国不满。须知，此时正在进行着所谓的“七年战争”，而未来土耳其人极有可能偏向普鲁士，加入对俄作战阵营。俄国政府最终于1764年废除了盖特曼制度，免除了基里尔·拉祖莫夫斯基对乌克兰左岸地区的管理权，这些举措使得扎波罗热哥萨克大本营——塞契迁往新址计划成为泡影。

1765年，新塞契再次面临生死存亡问题，并且这次已不再是讨论迁往新址可能性的问题，而是有关直接取消下游扎波罗热军及塞契大本营，并在其地址上建立第聂伯省行政中心之事。向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提交此方案的始作俑者是俄军少将卡尔·施托芬。此人经常去塞契，对扎波罗热哥萨克风俗特点了如指掌，于是他决定利用恰当时机，一举解决哥萨克“混乱不堪”的问题，并趁俄罗斯帝国在扎波罗热这块重新占领的地盘上设立行省之际谋取省长这份肥差（此方案，诚如我们所见，是这位奸





猾之徒为自己“量身定制”的作品)^①。

卡尔·施托芬将军的计划未被付诸实施,仅仅只是因为就1765年形势而言,该计划还未成熟。俄国政府尽管当时拒绝了对下游扎波罗热军采取断然措施,但依然通过不同层面收集其有关社会制度、经济和军事实力等方面的信息资料,以便随时用于消灭哥萨克自治区的军事行动。

值得一提的是,新塞契虽然已经进入同时期新阶段,但就建筑特色而言依旧停留在中世纪——这是受其边境地理位置影响所致。那时的乌克兰北部地区,即盖特曼区或曰斯洛博达区,所有城市都竭力在突破拥挤的要塞围墙向外发展,而塞契在其生存的四十年间则一直是在要塞内及其外部的防御城中发展。即便是这样,新塞契总面积也已达到三十五至四十公顷。

关于最后一座扎波罗热塞契大本营能否被称为城市,这个问题目前依然是历史城市学研究领域学者们所讨论的话题。根据发展规模,新塞契到十八世纪下半叶尽管已是扎波罗热地区最大一个居民点,但依据各项分类指标却依然不宜将其归为城市之列,而是所谓的“福堡”(即“桥头堡”),即边区(边境)防御牢固的大定居点。若条件好,它便有可能发展成为真正的城市中心,一旦条件不利,也有可能变成一个村庄,乃至萎缩、消失。

就现有的文件、图表、回忆录等资料来看,波德波利纳亚塞契由四部分组成:科什、以商贸和手工艺为主的加桑-巴什集市、城郊哥萨克自由村(这三个部分实际上是一个整体)以及驻扎着

^① B. 米尔切夫、Ю. 科尼亚兹科夫:卡尔·施托芬少将关于扎波罗热哥萨克体制改革的方案(1765年)//扎波罗热大学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乌克兰南部历史研究实验室笔记,扎波罗热:覃登出版公司,2003,第七辑,第48-52页。

俄罗斯卫戍部队的新塞契防御城。

就像其他塞契一样，新塞契的主干部分是科什，实际上它是一个防御很好的要塞，位于塞契西南部，坐落在波德波利纳亚河拐弯所形成的半岛型高坡上，三面环河。得益于这样的位置，面对来自南方（鞑靼人方向）的威胁，科什由河边泥泞的低地和河水防护着，每到春季冰雪消融的日子，这个方向的通道基本被河水淹没。

这样一来，1734年春，扎波罗热哥萨克选择在这个地点落脚就毫不奇怪了，因为此类地方本身就是一座天然堡垒，易守难攻，1737年的事件也证明了这点。那年冬季，鞑靼人拼死也没能冲过由拒马、木桩、“陷狼坑”和填满沙土的大箩筐构成的弧形路障。

塞契据点建设完工后（十八世纪四十年代初期），科什的防护工事便呈现出加长形椭圆外观，而非等圆。这些工事由壕沟和土围子组成（一般都是四至六米深/长，同样的宽度/厚度），土围子上垂直埋入一根根削尖的橡木桩、黑杨树桩、榆树桩以及周围林里能用得上的其他树木做成的木桩。

科什南北方向上各有一座正方形瞭望塔楼，它们同样也是由这些木料建造，两座塔楼四面留有枪眼。十八世纪五十年代末，每座塔楼里还各自架起了两尊发射散弹的小火炮。进出科什除了走大门外，还有几处隐秘的便门。

科什规模相对较小，长三百五十米，宽三百米。相应地，其面积大约十点五公顷^①。科什内，沿着土围墙建有一座教堂、三

^① B. 连琴科：《十八世纪扎波罗热塞契手稿提纲》//乌克兰考古年鉴，新系列，第8/9辑，基辅-纽约：玛·科茨出版社2004，第165页。





十八个带储藏室的库林营房、学校、科什办公处、兵器库、贵宾招待用房、科什阿塔曼住宅以及其他建筑。由此可见,在扎波罗热塞契大营,科什里的建筑密度相当高。

科什中心地带是一块空场地,那里经常举行哥萨克“拉达会议”(即议事会)。同时,这块空场所也被哥萨克用作独具特色的“大街”,地面上既不铺石头,也不铺木块。有人回忆说,每逢雨天,路面上便形成一个几乎有成人三百步长的大深水洼,而每当水洼形成,塞契里就会跑出醉醺醺的活宝们,他们争先恐后,毫无顾忌地飞身扑入其中,比赛着,看谁能冲滑得更远。

科什正大门入口的左边(自加桑-巴什集市方向)坐落着圣母帡幪教堂——哥萨克军教堂。据我们所知,这座教堂始建于俄土战争时期,也就是1737年或1738年,1742年完工。可以确定的是,这是一座五顶(有五个葱头圆顶)教堂,里面十字形摆放着两张长供桌,上面供奉着圣器。教堂是为报答圣母和基督教圣徒尼古拉帡幪之恩而建。墙壁是木质的,顶部和葱头圆顶部是用“白色”铁皮(即锡箔或银汞混合物)蒙着的。

教堂内部空间相当大,两张供桌,每个长三十五米。教堂顶部的中央主圆顶竖立着蒙有铁皮的十字架,十字架中心部位挂着一个太阳形饰物,其底部是一个半月,象征着基督教对伊斯兰教的胜利。

新塞契时期,教堂的供给和装饰费用就如同下游扎波罗热军存在的其他时期一样,由科什和全体哥萨克承担。由此便不奇怪,教堂的富裕程度以及内部富丽堂皇的装饰足以与那时东正教最富有的修道院所修建的教堂相媲美。

圣母帡幪教堂里也有一面巨大的圣障，分上下五层，中间有一道镀金的银质御门。这道圣障上装饰有珍贵的圣像、十字架，挂着绘有基督在棺槨中遗体像的方布、法衣。这些圣物均镶嵌着珍贵金属和宝石，分别来自伊斯坦布尔、耶路撒冷、阿索斯山、西奈山以及其他对东正教徒来说是圣地的地方，其中部分珍宝今天在尼科波尔市地方志博物馆里还能见到。

除了通常的宗教功能外，塞契圣母帡幪教堂还充当着军需库、档案馆和图书馆的角色。因为这里保存着哥萨克军各种标志，与各国国王和沙皇往来的函件，还有大量珍贵的宗教书籍。

塞契学校是在圣母帡幪教堂和科什名下开办的，在这里读书的是长期居住在塞契的男性儿童与小伙子，其中既有孤儿，也有被父母送来专门接受教育的孩子。学生总人数有二十至四十人。照扎波罗热古风，这些孩子中的大多数人将被编入“波波维奇库林”。这个库林的名称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波波维奇”意为神父之子，那时候有点文化的人总体上就是这样被人称呼的。

就像塞契社群里的其他成员一样，学生也被分成高年级（独具特色的“军



塞契学校





官”)和低年级(“年轻人”)。高年级学生中按照年龄大小选出学校阿塔曼,由他们在塞契代表学生这个小群体的利益。他们出面与成年哥萨克商量有关参与悼亡(亡者祈祷)的活动,组织圣诞节挨家去唱圣诞节祝歌,替人写信等诸如此类的事。凡参与这些活动,学生们会有额外奖励。

此外,塞契学校多年来一直为下游扎波罗热军管理机构输送文书、注解员(翻译人员)和行政办公人员,为教堂培养辅祭和经师(也就是那些大声朗读祷文的人)。

还有一个具有“人文”性质的机构——医院,也挂在塞契教堂名下。塞契的医疗事务由军法官和基辅城郊的梅日格罗斯基道院派来的修士司祭掌管,后者同时也兼任塞契学校里的文化课教师。医院负责医治伤残哥萨克,费用由军方支付。

而提供医疗服务的是理发师兼卫生员(外科医生),伤病员的护理工作由塞契学校的学生、神职人员以及所有自愿帮忙的哥萨克兄弟负责。只有在特别严重的情况下,人们才会去找由医疗署派到新塞契防御城医疗所的临时军医。

那些战死或因伤致死的哥萨克被记录在“英灵录”(追荐亡人名簿),此事由塞契教堂负责,而教堂的丧事服务费则从已故人员的遗产中划拨以及用军队缴获的战利品(战争期间)或者做生意赚来的利润(平时时期)来支付。

新塞契科什内另一个直属哥萨克军管理的财产是军需库。将它安置在塞契要塞内并非随意为之,因为它里面存放着备用的火药、铅弹、球形炮弹、引火线、燧石等。放置火药的仓库是军需库不可分割的部分,也是整个塞契要塞的禁地。因此,其中一

部分被科什行政部门用作监狱来关押犯人。这些披枷戴锁的犯人主要是一些在行窃或抢劫时被捉住的盖达马克（类似中国的“红胡子”）。他们一般是在科什审判前的案件调查之际被收押在此的，有些则是在被分别押往扎波罗热-波兰边境调查委员会法庭、扎波罗热-鞑靼边境调查委员会法庭、俄国的基辅省办公厅（自1764年起改名为新俄罗斯省）以及其他什么地方之前临时羁押在此处的。

塞契要塞里建筑最多的一类是“库林”。众所周知，塞契时期的库林数量同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期一样，依然是三十八个。就其功用而言，扎波罗热库林是营房，里面住着哥萨克士兵，这些士兵往往隶属于某个具体的哥萨克库林分队。

库林的建筑风格完全与最初的扎波罗热（乃至乌克兰南部草原的）传统保持着相互联系。房舍的墙基埋于地下一点三至一点八米深，使用的是长度通常为四至五米长的大木桩，这些木桩分成内桩和外桩两排，构成营房墙体骨架。内排桩上绑有几层横木杠加固，横木杠两侧用篱笆扎住，篱笆是用藤条和芦苇编织而成，然后再“糊上黏土”。内桩和外桩之间的空隙用黏土、马粪和奶牛粪以及长草混合起来填充，然后再夯实成一堵墙，墙面上再抹上一层黏土，用石灰刷白，这些工序完成之后，在内外两排木桩上架上双坡房顶木架，上面铺层芦苇草。有人认为新塞契库林营房（如同其他塞契一样）整体是木质的，这点在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的文件、备忘录和民族志等历史文献面前是经不起质疑的。

塞契库林营房构造中唯一的大型木质部件是横梁。我们从





现今尼科波尔、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扎波罗热以及其他城市博物馆中保存的实物展品身上能清楚看到这一点(这些地方曾经属于扎波罗热哥萨克控制区)。这些横梁的主要功能是向“外界”宣示和证明该库林的存在。正因如此,横梁上的雕刻图案十分丰富,当然,其中必定雕刻有该库林名称。

新塞契时的库林从内部看上去就是一个不带隔间的大棚子,总面积大约在十二乘二十平方米。棚子里有一只只大木箱或是长木铺板,沿四周墙根摆放着,晚上睡觉时哥萨克便拿它们当床铺使用。在靠自己床铺的墙上,士兵们钉满钉子和挂钩,把自己的刀剑等冷兵器和火器等一些私人用品挂在上头。

库林内有一处“红角”,一般是房子的东角落或南角落。那里供放着圣像、俄罗斯沙皇和皇后画像(沙皇和皇后的画像是必须摆放的,对此,各种文献都有记载)。“红角”里点着灯盏,旁边放着一只大木箱,里面存放着该库林分队的钱款(该库林分队在册哥萨克的薪水和收缴上来的公共伙食费)。这个地方通常是“库林大爷”(上了年纪且受人敬重的哥萨克)以及阿塔曼及其亲信们的休息地。

库林入口处的过道搭建了灶台,也叫夏灶,这是专门在天暖时节用来做饭的,冬季就在库林里用釉面砖炉子做饭和供暖。

新塞契时期,按“同乡”原则,用专门来自某地方的人员来补充某库林兵源的做法已有所改变。1750年,有位叫卢卡的修士(亚琴科-泽连斯基)在走访了塞契后不无风趣地写道:“我们来到塞契之后便被带到住处——明斯克库林,尽管我们一行人中

哪怕能找出一个白俄罗斯人来。”^①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塞契某具体库林与该库林成员的来源地同名，这种联系不仅出于纯粹的称名功能需要，而且往往也使得该库林带上明显的兵源来源地的精神和物质方面特征。明显的一个例子是，基斯利亚基夫库林哥萨克退伍后去的地方便是基斯利亚科夫卡城的主显圣容修道院^②。

跟乌克兰南部草原上的其他大多数小城堡一样，扎波罗热新塞契也有自己的郊区集市，该集市历史上以民间的“加桑-巴什”称呼而闻名。

或许有人会问，塞契郊区集市怎么会有这么个不同寻常的古怪名称？我们可做一下推测。据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的历史文献记载，我们得知有一个小要塞（或曰“前哨”）叫克尤丘克加桑-帕夏（土耳其语 Küçük Hasan-başa，即帕夏加桑的小要塞），它位于奥恰科夫要塞的西南面（现今的奥恰科夫海港附近）。该前哨的建立与奥斯曼帝国的卡普丹-巴什（最高海军元帅）加桑·切列比·恰达尔季个人有关。1626年至1627年期间，他围绕奥恰科夫要塞负责修建一批新防御工事。当时既修建了克尤丘克加桑-巴什前哨，也修建了毕尤尤克（大）加桑-巴什要塞，或简称加桑-巴什（后者位于现今奥恰科夫市南部的尼古拉耶夫州的一个区中心所在地）。

① Д. И. 亚沃尔尼茨基：1750年—1751年波尔塔瓦修道院修士亚琴科·泽连斯基两次到访扎波罗热塞契之游记，叶卡捷琳诺斯拉夫：H. A. 安德卢欣科出版社，1915，第39页。

② 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国家档案馆，全宗249，目录1，案卷117（第1卷），第131页。





在克尤丘克加桑-巴什前哨与奥恰科夫城之间有一个基督教贸易手工业居民区加桑-巴什(约有五百来户),居住的是瓦拉几亚人(罗马尼亚人)和希腊人,他们日子过得红火,完全是一派塞契郊区集市的景象。可以想见,那些扎波罗热人对奥恰科夫郊区很熟悉,于是他们便把该居民点的名称套用到另外一个与其类似的居民点上。

但也可以作另外一种推测——新塞契同时代人的一些亲身经历向我们讲述了不少细节。那时,哥萨克对塞契郊区集市商贩们涨价,不让他们“赊账”等事很痛恨,于是他们一气之下便将那些“无良”商贩的店面给捣毁,抢夺了所需物品。由于在征讨土耳其的奥恰科夫城过程中他们不止一次地使用同样手段来袭击那里的加桑-巴什,由此,该地名称也被耍笑般地挪用到自家的郊区集市身上。

但不管怎样,反正扎波罗热的郊区集市“加桑-巴什”不只是变成了波德波利纳亚塞契的“商贸心脏”,它还是整个黑海北岸地区最大的商贸中心之一。扎波罗热哥萨克大本营的日常生活中有一点表明了加桑-巴什的重要性,即它像科什一样,外围四周都建有类似要塞里常见的工事——一道道四到六米长和深的围墙和壕沟。为了额外建立一道边界,早在十八世纪三十年代,该集市中心就曾建起了两个棱堡(强化性土质工事)。自科什以及新塞契防御城方向到加桑-巴什集市一线,凡经过的防御墙都开设了一道正门和几处便门。但那些塞契哥萨克依然嫌其麻烦,他们抄直道抵达商业点——所过之处,遇到路障就清理,遇到排桩和围栏就打洞。他们的行为引来哥萨克指挥官和俄罗斯

军官们的纷纷谴责。

扎波罗热塞契的最后几年里,加桑-巴什集市面积差不多有三十公顷^①,里面有五百多栋建筑,比如,商铺、仓库、作坊、面包房、酒亭子、小酒馆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②。集市中,房舍杂乱无章,建筑五花八门——能用的都用上了:有木质的、石质的、土坯的,有枯树枝搭建的,还有用芦苇扎的。紧挨着店铺和作坊区的是一个哥萨克村,约二百来家住户,居民中大多数是扎波罗热哥萨克和“乡镇”(扎波罗热北部的乌克兰地区)来的人,这些人或多或少在塞契居住过一些日子。

十八世纪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间,在正对着北大门的塞契郊区集市加桑-巴什入口处的地方矗立着一个标志性建筑物——一根高大的柱子,它是用来处决死囚犯的,也被称为“塞契耻辱柱”。自该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科什当局应俄国政府要求,着手铲除盖达马克匪帮,这根柱子便换成了绞刑架。波尔塔瓦圣十字



塞契耻辱柱

① 公顷,面积单位,一公顷为一万平方米。

② B. 连琴科:《十八世纪扎波罗热塞契手稿提纲》//《乌克兰考古年鉴,新系列》,第8/9辑,基辅-纽约:玛·科茨出版社,2004,第166页。





修道院修士卢卡(亚琴科-泽连斯基)曾分别于1750年和1751年两次到过塞契。据他回忆说,这个绞架很少有空闲的时候。

也是在这里,科什通往集市的正大门旁边经常聚集着来自各地的乞丐,他们在这里等待着哥萨克施舍。那位卢卡修士说他到过不同地方,那些地方的残疾乞丐往往都很安分,满足于人们的施舍(当然,人们经常给得也很大方),不胡作非为。但这里却不同,乞丐们履行起“墓地看守人”职责:他们把刚处死的犯人从绞架上放下来,迫不及待地将死人身上的衣物扒下来,然后在大门东边找一处角落(有可能是“专门埋死囚的地方”)直接埋掉,没有任何葬礼^①。

穿过法场(绞刑架)之后,便可直达加桑-巴什集市了。这里不仅是居住和工作场所,也是贩卖各种口味的食品和饮料之地,即便是嘴刁的人也能在此找到自己喜爱的美味。此外,这里还有叫卖衣装鞋帽的,甚至冷兵器或火器以及其他一些物品也到处可见出售。

这里的居民也是各色人等。有面目狰狞的扎波罗热盖达马克,他们手里拎着从波兰或克里米亚抢来的东西(“分得的赃物”)。有俄国大兵,他们来这里是为了把辛苦挣来的一个卢布的薪水给花出去。也有吵吵嚷嚷的犹太人商贩,这些人分别来自乌克兰第聂伯河右岸的乌曼、布拉茨拉夫斯基、涅米罗夫斯基以及其他犹太人村社。还有诺盖人和鞑靼人,他们赶来马匹出售。更有在众多“渔场”和盐湖晒盐场谋生的哥萨克,他们赶来

^① Д. И. 亚沃尔尼茨基:1750年—1751年波尔塔瓦修道院修士亚琴科·泽连斯基两次到访扎波罗热塞契之游记,叶卡捷琳诺斯拉夫:H. A. 安德卢欣科出版社,1915,第41—43页。

是为了卖鱼和食盐。甚至还有远道而来的波兰-立陶宛王国哥萨克，他们给塞契运来黑麦。

离加桑-巴什集市不远处的波德波利纳亚河河湾是个港口——这实际上是扎波罗热通往黑海的“门户”。和平时期它是商业港口，但在1735年至1739年和1768年至1774年的两次俄土战争期间，这里部署了一支扎波罗热哥萨克独立舰队。它专门用来对付活动在第聂伯河、黑海以及多瑙河等水域里的土耳其军队。

新塞契不同时期船舰数量有所不同（从五艘到十艘不等）。应新塞契要塞司令要求，所有船只需在距码头（水中打桩，桩柱上铺上木板的那种停泊场）一公里外水面停留，进行为期二十天的隔离，以防各种流行性疾病传入，但所有入港船只均免税。

人们经由加桑-巴什集市把俄罗斯、盖特曼区和波兰的货物转运到土耳其和克里米亚或者相反。往来不同方向上运输的货物各有特色。比如，波兰产或俄国产布匹相当一部分要经扎波罗热运往土耳其和克里米亚，他们在第聂伯河区域停留也只是为了供应塞契内部物资需求。但这样一来，来自盖特曼区、俄罗斯和波兰的面包真正能运到土耳其和克里米亚的数量很少，几乎在扎波罗热就会被抢购一空。

而克里米亚运来的有萨菲扬（一种皮革）、麦利卢什卡（一种薄羊羔皮），有时还有草驴和白骆驼、当地的红酒。更为主要的是盐，这对扎波罗热渔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商品。从扎波罗热运往克里米亚的主要是皮草、鱼、鱼子酱、铁器、绳索等。

“土耳其”商贩（其实他们大多数人是希腊东正教徒）经过塞





契转运稀有的叙利亚冷兵器——它们产自大马士革和阿勒坡（那里盛产举世闻名的大马士革钢），也有来自阿索斯山修道院（希腊北部）和圣地（巴勒斯坦）的宗教仪式用品，还有棉织和丝绸布料，威尼斯玻璃，各种口味的红酒，美味的干果——无花果、枣子、葡萄干、核桃，糖以及咖啡。

第聂伯河与布格河之间地带是俄罗斯帝国通往黑海沿岸出口的保障。自1774年该地区并入俄罗斯以及1775年塞契本身被剿灭之后，以商业闻名的加桑-巴什集市便在一两年内迅速衰败，郊区居民点也人去楼空，成了一座鬼城。

波德波利纳亚塞契接下来的一个建筑部分便是新塞契防御城。这是一个小型土质棱堡防御要塞，它沿波德波利纳亚河而建，紧挨着科什与加桑-巴什集市，里面驻扎着小部分俄罗斯卫戍部队——两个步兵连（一百五十至二百人）。他们隶属于1730年至1740年期间部署在乌克兰防线的驻军，主要由俄罗斯的独院农户（家道没落的小地主）构成。

防御城各地段共摆放有六门小散弹炮。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散弹炮只使用过一次，那是在1768年新年到来之际，为镇压塞契塞洛马（贫穷哥萨克）反科什军官暴动时动用过。那一次，科什阿塔曼彼得·卡尔内舍夫斯基及其手下九死一生，多亏俄罗斯卫戍部队干预才逃过一劫，免遭哥萨克士兵毒手。

新塞契的防御城建筑总面积有二到三公顷，其中有诸如卫戍司令（总司令）官邸，有陆军、炮兵和工程兵军官们的（公共）住宅，有士兵营房、警卫室（门卫室、“禁闭室”）和兵器库（储存火药

的库房)^①。与塞契本身建筑不同的是,防御城里的大多数建筑最初是木质的,经过几十年之后,这些建筑已变得破败不堪,以致1768年,卫戍部队中包括军官在内的大部分人不得不从各自住处搬迁出来,住进有扎波罗热风格的泥糊树条编织成的土窝棚。

塞契哥萨克与驻扎在新塞契防御城里的卫戍部队关系时常紧张,有一件1750年10月20日发生在塞契的事情相当具有代表性:新塞契防御城里的驻军中有四位龙骑兵(重骑兵)羞辱了一位明斯克库林的哥萨克兵,稍后该库林便跑出来五十名哥萨克替后者出气,混战中致几名俄罗斯士兵残疾,一人丧命^②。

不过有些时候冲突少一些戏剧性,多了一点幽默色彩。有位叫赫里斯托福尔·冯·曼施坦因的德籍军官,他在俄国供职。1735年至1739年的俄土战争期间他长时间滞留在俄国南方,他在笔记中讲述了一件事。众所周知,未婚的扎波罗热哥萨克“骑士”是不能容忍塞契中有女性存在的,即便是出于某种原因陪自己非扎波罗热出生的丈夫来出差而待在塞契也不行。然而,在1738年春季的一天,塞契来了一位叫伊万·格列博夫的中校,他以炮兵总署办公厅八等文官身份前来对驻扎在乌克兰防线和扎波罗热地区的俄国卫戍部队进行巡察。到达之后,他住进了新塞契防御城的一间寓所,随他来的还有他的妻子和几位女仆。得知此情,一群扎波罗热哥萨克士兵便将这位俄国军官的住处

① B.连琴科:《十八世纪扎波罗热塞契手稿提纲//乌克兰考古年鉴,新系列,第8/9辑,基辅-纽约:玛·科茨出版社,2004,第175-177页。

②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248,目录113,案卷846,第18页及其背面。





围了起来,高声嚷嚷着,要求立即将这几位女子给他们带出来,“让大伙儿也能好好享受享受”。为了息事宁人,保护几位女子的清白,格列博夫只好摆了一大桌“酬谢宴”,好酒招待,这才得以息事宁人。不过,这也正中哥萨克士兵的下怀^①。

新塞契建立的头几年,下游扎波罗热军人数就如同扎波罗热地区或者哥萨克首府——塞契的居民人口一样,无论是科什机关还是俄军指挥部都不清楚。同时代人的见闻显示,塞契常住人口平均在三千到五千(未婚)哥萨克士兵以及同样人数的已婚哥萨克兵、雇工(雇农)和商贩。并且这里的人口数量还会出现摆动,这是因为随着塞契人因季节性外出劫掠或返回过冬,或相反,以及因那些临时客居在首府的人返乡等因素而造成。并且三十八个库林中每个库林人口逐年都有变化。比如,1755年,伊尔克列耶夫斯克库林有哥萨克四百八十二名,而尼热涅斯杰布列耶夫斯基库林却只有一百八十人;又或者,1796年,伊尔克列耶夫斯克库林分队人数增至七百三十八人,而尼热涅斯杰布列耶夫斯基库林分队则已经降至一百二十八人^②。

为公平起见,我们也得指出,有关下游扎波罗热军人数的资料总体上来说也是有不少矛盾之处的:1755年10月,科什认定哥萨克士兵人数为两万七千人,而1759年6月则报出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数字——一万一千七百六十九人,其中骑兵近五千,步兵六千。并且还指明,这只包含具有完整军事装备,且能征战,

^① X. Г. 曼施坦因:1727年—1744年俄罗斯历史、民事和军事见闻录,第24页。

^② A. O. 斯卡利科夫斯基:新塞契史或扎波罗热末代科什史·前言与述评,Г. К. 什维契柯,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1994,第60-64页。

并因此而获得钱粮和酬劳的哥萨克士兵数量。

扎波罗热哥萨克军的人数无法确切统计，这主要受制于哥萨克一个古风俗，即士兵可从一个部队自由转入另一个部队。比如，一方面，新塞契期间，下游扎波罗热军兵员补充主要是通过将乌克兰东北部地区自由村哥萨克登记到库林名册的方式来增加兵源数量（即将那些愿意保留哥萨克生活方式的人添加进来，因为自1748年起，俄国政府就出台了针对性政策，将相当一部分“自由哥萨克村民”转变成农民身份，并且以那些保存完好的哥萨克团为基础建立常规军团）。另外一方面，还吸引第聂伯河左岸（盖特曼区）为数不多因各种原因在扎波罗热地区定居下来的哥萨克加入。此外，由于俄政府鼓励，一部分哥萨克定居在乌克兰，他们报名入册地方团。比如说，1737年至1738年间，仅米尔哥罗德哥萨克地方团就添加了五百五十名扎波罗热哥萨克。

就形式来说，新塞契时期下游扎波罗热军内部制度是在十六世纪自古传承的塞契村社传统基础上建立的，其最高管理机构是全军军事大会（拉达会议），一年举行三次，即每年新年（1月1日）、复活节（第二天或第三天）以及哥萨克军队节——圣母帡幪节（10月1日）。此类例会对西欧中世纪（十五世纪至十六世纪）骑士团来说是一种特色，骑士团内部制度部分地被首批哥萨克盖特曼——波兰-立陶宛王国小贵族军队缔造者们复制。他们分别是别尔纳尔德·普列特维奇、波格丹·卢任斯基以及德米特里·维什涅维茨基。

十八世纪扎波罗热的等级制度在下游扎波罗热军发给俄国





汗王等

沙皇、土耳其苏丹和克里米亚汗王的公文函件中有所体现。它体现的方式依次为(按官职大小):(1)科什阿塔曼;(2)哥萨克军官(五至六人,负责哥萨克军各种政务活动);(3)大爷(德高望重的年长者);(4)库林阿塔曼;(5)全体哥萨克军人。

高级军官,即哥萨克军军官拥有为期一年的特权。这些军官包括科什阿塔曼、军书记员、军法官、军事务官、军辎重官、军拉达会议议长、军资产财务官等。中层军官是库林阿塔曼及其助手(副职),由相应库林内部全体哥萨克会议选举。实际上,库林阿塔曼是中介角色,上达军级军官,下连普通士兵。一年授权期一过,其特权便被免除,但军官称号会保留一辈子。那些公正、睿智和威信高的军官会被重新选出来连任。

在扎波罗热哥萨克军内部生活管理方面起重要作用的是那些功勋卓越的哥萨克(前阿塔曼或军官)中被尊称为“大爷”(деды)的人。这些人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库林,凭借自己的威信影响着塞契和库林大会的决定。大爷在塞契享有无可争议的权威,无论是在培养年轻人方面,还是在扎波罗热军政治生活中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热衷于维护旧传统,对不成文的老规矩主张一成不变,即便是最高军事首领也必须顾及他们的态度^①。大爷在塞契里地位相当于军级军官和科什阿塔曼,并且在非公开的等级体系中他们的地位甚至高于现任的库林阿塔曼。科什必须要顾及这些人的看法,因为他们背后是众多的普通哥萨克士兵,科什的任何一项决定未经过大爷点头是无法付

^① 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县米哈伊洛夫卡村前扎波罗热哥萨克尼基塔·米哈伊洛维奇·科尔热口述记录,敖德萨:城市印刷厂,1842,第22页。

诸实施的。

按照哥萨克士兵的说法，他们加入新塞契的一个普遍原因是“失去双亲，无有兄弟姊妹，居无定所，孤独无援”^①。的确，但凡对新塞契时期公函文件中个人生平（自述文献）感兴趣的人都不难发现一个事实，即很大一部分比例的哥萨克士兵在其人生中的某一时刻投奔扎波罗热塞契是由于他们与家庭和社会环境的某种联系突然中断（有时候是由于逐渐丧失）。从时间方面看，这事通常发生在他们童年或少年时期：有的失去父亲后母亲改嫁，与继父关系紧张；有的失去双亲；有的是婚外孩子，“衣食”母亲过早离世等。如果列出一份生活清单的话，原因可以说是五花八门。

在这种情形下，来到塞契实际上就是一种获取新的家庭式关爱的行为，是“入会”行为。任何一个毫无干系的扎波罗热哥萨克，当他见到一个无家可归、对谁也无关痛痒的小男孩，都会引导和鼓动他投奔塞契（往深里说——出走扎波罗热）。当然，更多的时候是那些与这位塞契新兵的家庭或其同村人或同城人有某种社会关系的人。比如，从前的邻居、亲戚、教父或干亲家等。

来到塞契并被编入某个库林之后，任何一个新人均须在七年之内以“新兵蛋子”身份接受老哥萨克的培训，并且不能将其社会地位看成是类似塞契高级军官的贴身勤务兵或者传令兵的那种中间角色。年轻气盛（勇猛、英雄气概）是塞契哥萨克年轻

^①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16，目录1，案卷797，第6部分，第147页。





一辈人行为中必须具备的品质要素。在相邻的敌国腹地从事捕鱼或者打猎,偷赶马匹和牲口,抢劫其他物品等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必要的,没有这些行为别指望获得库林兄弟们的完全“认可”。这一切可以在那时的文献资料中得到印证,而不只是在后来民间文学中所读到的那些:有许多回忆录方面的资料,说的就是这些年轻的塞契新手参与盖达马克队伍出战,抢夺波兰和克里米亚汗国之事^①。

只有经过此类训练活动的洗礼,这些新兵方可被视为真正的塞契人,获得留一缕长发(鲱鱼型发型)的资格,剃成这样的发型是一种独特的仪式,意味着被“兄弟会”接纳。单身哥萨克“骑士”这一类人在塞契居民中具有优越感。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参加选举,有资格被推举为库林阿塔曼或军级军官,也只有他们往后才有可能成为塞契大爷。

在塞契自由村和扎波罗热哥萨克首府附近郊区的窝冬村里则住居着已婚哥萨克家庭。总体而言,这些人几乎占下游扎波罗热军管辖境内居民数的一半。根据各类统计,他们有四到六万人之众(男女都有)。

依照塞契传统,已婚哥萨克在社会地位方面要比单身的低得多。在这方面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士兵瓦西里·霍尔巴特的“案子”。1776年夏,他向波将金告状,请求满足自己诉求,把塞契最后一位军书记官伊万·戈洛巴被没收的财产中属于他自己的那一部分归还给他。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1761年他来到

^①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 248,目录 113,案卷 1591,第 127 页。

塞契，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他一直是戈洛巴的“伙伴”，他们共同拥有一处窝冬村，后来还添置了一座磨坊。日子一直过得安稳，直到1771年霍尔巴特结婚。

霍尔巴特结婚结束了他同戈洛巴的友谊与合作，因为当后者得知霍尔巴特结婚的消息之后极为恼火，当即与其“割袍断义”，并对后者说，“我与你已经无法再称兄道弟了，因为我是老爷，与一个庄稼汉是无法做朋友的”。结果，霍尔巴特不仅失去朋友，还失去了自己的那部分财产，因为戈洛巴认为霍尔巴特结婚不告知他，这是对他的羞辱，于是便独占了与霍尔巴特合伙的那份产业^①。

塞契要塞、塞契自由村以及窝冬村里的居民中还有一个类别——“军管农民”或被时人称之为“下游扎波罗热军臣民”。这些人可归为几种，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春季来扎波罗热打季节性短工的。他们有来自第聂伯河右岸地区的人，也有来自左岸地区和斯洛博达地区的人。这些人按照与“东家”的约定，在哥萨克开设的渔场或者在窝冬村干活，忙完后便返乡过冬。这种人基本上是一些年轻人或扎波罗热哥萨克的亲戚或教子，他们只是名义上临时依附哥萨克军，而常住扎波罗热地区的军管农民则应缴纳“军税”和其他赋税。此外，这种农民还要服各种徭役，徭役的数量与形式要由哥萨克军会议或库林阿塔曼与哥萨克军级军官开会决定。新塞契最后几年军税和徭役的额度由科什阿塔曼说了算。哥萨克军钱款的收缴由某个具体村镇的阿

^① 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74238号藏品/14531号档案，第112页及其背面。





塔曼负责,而他们这些人则接受帕兰卡长官督军领导。督军每年向“纳牲畜税”(指那些拥有骡马的)农民征收的钱款税额是八十戈比,而向“无牲畜农户”征收的税额是三十戈比,向那些居住在窝冬村或在自由区的村庄或镇上那些“纳牲畜税”农民家打工的佃户征收五十戈比。

居住在扎波罗热的军管农民不属于下游扎波罗热哥萨克军编制,但存在例外情况,只要他们办理一份形式文书,将农民身份转变为哥萨克身份就可以入编。一旦这种人编入到哥萨克行列,他们便被免除所有徭役,但需自备武器服兵役。非战争期间,这类平民百姓入编哥萨克的人数有限。而一旦打起仗来,哥萨克军的人员战损正是依靠这类农民来补充。但即便是打仗期间,农民转为哥萨克阶层这种事也并非大规模进行,每次的具体兵源补充情况要由科什阿塔曼本人亲自批准。

由于塞契住的绝大多数人是各库林分队的单身哥萨克骑马兵,因此他们吃住在一起,伙食费均摊。库林哥萨克每天都要凑钱来支付下一日饭钱,如果要是哪位兄弟因缺钱而交不起伙食费,那么就会有其他人或库林替他交。因为大家相信,今后如有需要,这位“接受垫付”的哥萨克也会以类似方式来帮助别人。库林集体吃的面粉和麦仁是由政府发放给每个库林的“粮薪”。

饮食事务由各库林里面精通哥萨克厨艺的厨师负责。他用大伙儿的伙食费去塞契市场和周围窝冬村采购食材。此外,他还需要几个新兵给自己打下手。比如,取水,把买好的食材从市场上运回来,清洗器皿等。每个库林分队做饭用的都是一口大铜锅,冬季用铁钩子把大铜锅悬吊在室内灶台上做饭,天暖时

节，就将大锅支在庫林营房旁边夏季用的户外小灶台上做饭。

每天早晚两餐，按哥萨克具体口味来做饭，或者庫林小队内部再分几个小组用餐。集体正餐一般是放在中午，每天一次，有汤菜。每天中午（不一定非赶在正午十二点，因为午餐时间是按太阳位置确定）哥萨克兵齐聚用餐。通常是在祈祷之后，大家成群围坐到一只只大木盆旁，木盆里装满鱼汤、羊汤、稀米粥（一种撒有腌制肥肉末的稀饭）等。阿塔曼同其助手们与大爷们则总是坐在摆放圣像的上庭用餐。根据同时代人描述，哥萨克用餐喜爱按鞑靼人的方式席地而坐。用餐过后，再来一次祈祷，此后便各自起身办自己的事情去，或继续围坐在一起，玩起掷骰子、跳棋或纸牌来。

吃稀饭用的是木勺子，士兵们平时都是将其装在特制的皮套里别在腰间的。叉子不太用，基本上都是用刀子、长木针，以及一些小金属扞子（铁扞）替代。日常用的器皿也是木质或金属的，陶瓷或玻璃品用得不多。

塞契“别的”（往往也是唯一的）饭菜是用各种麦类面粉做成的糊状食物，有面包渣汤、黑麦糊、鱼肉粥、碎玉米粥（燕麦粥）等。这些食物往往拌上黄油、蜂蜜或凝乳吃。庫林餐桌上常见的一道菜是鲜鱼肉，它们的做法各式各样，还有咸鱼子酱或者用鲜鱼熏制的咸鱼脊肉等。家畜类肉吃得少，基本节庆日才有。

酒精饮料在塞契士兵饮食和兄弟聚会时很受重视。同时代的俄罗斯军官们对扎波罗热新塞契中酒类饮料的风靡度及其内涵丰富的传统有过许多记述，比如前文提到的卡尔·冯·施托芬就曾有过这方面的描述。单单是土耳其运到扎波罗热塞契的酒





类清单就足以让人印象深刻：“萨摩斯马斯喀特酒、特内多斯群岛酒、赞特岛酒、希腊酒、阿索斯山酒、斯科普里酒，也有来自克里米亚半岛的葡萄酒——苏达克酒、卡钦酒、阿尔玛谷酒。”^①而更为流行的则是一种“热”酒，也就是那种低度麦类白酒。这种酒从盖特曼区、斯洛博达和波控乌克兰地区被大量运进扎波罗热。销售地点不仅只是塞契或者扎波罗热居民点，还有流动的“售货亭”（摊位），有的干脆就在大街上摆一个酒桶，进行散装销售。酒的销售对哥萨克军财政来说有一个好处，因为每出售一桶酒，就要缴纳一卢布税钱，而固定销售点上缴的税钱反而低一些，自营业日开始一年只需缴纳三卢布^②。

无论是塞契的大街小巷，还是其周边各地，人们所能见到的日常服饰尽管跟居民的经济状况和来源地有关，但对于哥萨克主体而言有标准样式：一件简单的灰色长袍子（皮质的长上衣），无袖，往往是贴身穿着，一块浸透鱼油的粗亚麻布缝制的“软骨”灯笼裤。这几乎是所有哥萨克兵的标配穿戴。

俄军军官瓦西里·阿巴扎在1775年被俄军占领后的塞契生活过一个夏天，如他所说，节庆日里的哥萨克你简直认不出来，那些殷实的库林军官——“老爹们”穿上用布列斯拉夫（现今波兰的沃洛茨拉夫市）呢子缝制的深蓝或天蓝的（最喜爱的颜色）长袍，或者同样款式的中国红长袍（亚麻布料，偶尔也有棉布料）。“庆典”灯笼裤也同样是用名贵的布料缝制，脚上穿的是一

①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13，目录1，案卷78，第27页、30页。

② 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166478号藏品/156号档案，第82页。

双大红靴子，灯笼裤上面系着一条镶银边的丝绸腰带，腰间挎一口哥萨克马刀。

哥萨克使用的武器整体上都很好：他们自身穿着可以“随便”，或者根本什么也不穿（尤其是在夏天），但是马刀、长枪、手枪和短矛（投枪）等却得到精心保养，有的镶上银饰物，有些军官甚至在自己的武器上镶上金子或珍贵宝石。

新塞契哥萨克头饰不甚讲究——无论冬夏，大多数人都是戴一顶羊皮帽，但也有忒“赶时髦的”家伙，他们头顶波兰细绒“四方帽”（一种有帽舌的四方顶头饰）臭显摆。这种帽子是盖达马克袭击波控乌克兰第聂伯河右岸地区得手后作为战利品抢来的。

下身着一条肥大灯笼裤，嘴角蓄两撇长胡须，头顶留一条鲱鱼型长发，加上一名真正扎波罗热哥萨克佩戴的其他饰物——凭借一套必备的标准打扮，扎波罗热哥萨克展示的就是一副风味十足的异国情调。

可以说，这种服饰特色（独特服饰代码）宛如一种标签，表明了自己扎波罗热哥萨克的村社属性。1775年新塞契（波克罗夫塞契）被剿灭之后，这种服饰还在其居民中流行了几乎半个世纪。当然，这基本上只能在那些曾经是塞契哥萨克的老一代人身上才可以看到。



第四章 帕兰卡：新塞契时期下游扎波罗热军 行政区(1734年—1775年扎波罗热边界)

一、1734年至1775年间的扎波罗热边界

1734年春,当扎波罗热哥萨克决定重返俄国时,他们先前所拥有的土地的合法性便成了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尽管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即依照俄土两国国际法协议,历史上的扎波罗热土地(按1711年实际情况)依然被控制在克里米亚汗国手中,但下游扎波罗热军领导层却力图证明自己对该土地的拥有权。于是,在这种情形下出现了相当戏剧性的一幕:他们用以主张这种权力的资料竟然是俄土边境勘界委员会于1705年做出的关于扎波罗热与奥恰科夫州之间的划界文件!须知,当年下游扎波罗热军一度是竭力反对这份文件,拒不承认其分界线的^①,而眼下,他们却要依仗这些从俄国外交院(部)复制出来的1705年原始资料的副本来宣称自己对那片土地的拥有权,并期待女皇安娜·伊凡诺芙娜恩准。

^①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24,目录124/1,1734,案卷6,第34-42页。

但俄国政府的态度却表现得相当犹豫不决，因为接收扎波罗热哥萨克重返俄国并同时将其1705年拥有的土地纳入俄国版图，这将对国际外交准则的粗暴践踏。一番权衡之后，俄国政府便利用下游扎波罗热军游移不定的状况，成功冻结了对这个问题的实际处理。而1735年夏再次爆发的俄土战争又再好不过地使俄国政府坚定了这种处理方式，这是因为1735年至1739年俄土战争期间，有关承认哥萨克对其历史固有土地权利的问题未被提及过。并且事实也表明，即便是战争结束之后，扎波罗热哥萨克也没能盼到对自己有利的裁决。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1739年秋，当交战双方——奥斯曼帝国与俄奥（奥地利）同盟签订《贝尔格莱德和约》与《尼什和约》时，俄国外交官进行了一番周旋，使得扎波罗热未被当作一个国际法对象来讨论。在这两份协议中，扎波罗热土地也没有被当作一个特殊的、不同于俄国其他地方的自治区来讨论，这不同于十八世纪初期（1700、1711以及1713年）俄国政府与土耳其政府所签订的类似条约中所做的规定。相反，它是被当作俄罗斯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来处理的。1740年夏，在大英古尔（现今的尼古拉耶夫州）举行了一次俄土专员大会，会上再次签署了“实施细则”，时称《俄土勘界议定书》。扎波罗热地区的东、西、南三面边界便是按照这份文件来划定的，并且是完全以俄罗斯帝国领土组成部分来讨论的。第聂伯河右岸地区的塞契领土边界呈直线，顺着南布格河沿波兰边境，经塔什雷克河、加尔布曾库河、死水河、咸水河、叶兰涅茨河、格罗姆克列亚河、大英古尔河、伊孙河、小英古尔河，一直到位于土耳其要塞加兹克尔门





(现今赫尔松州别利斯拉夫市)上方的卡米扬卡河注入第聂伯河口(麦洛瓦亚卡门卡)处。扎波罗热在第聂伯河左岸地区的界限则如是勘定:沿孔卡河注入第聂伯河处往上,直至其源头,而后呈直线,直到米乌斯河注入亚速海处。

1741年,双方对上述边界勘定仅作微调。1742年,俄土两大帝国之间地域边界便被永久固定下来。从亚速夫城到米乌斯河口(米乌斯利曼)之间,边境线沿亚速海海岸前行,而自米乌斯河起直行到卡拉德什河汇入别尔达河处,沿这条河再到孔卡河一带,然后再沿孔卡河直到第聂伯河。穿过第聂伯河,边界线延伸至其右岸支流——麦洛瓦亚卡门卡河,由此处穿过草原,抵达扎波罗热居民点布格河加尔德城下方的南布格河。这便是当时扎波罗热地区与土耳其(包括克里米亚汗国在内)官方正式认可的边界线,这种划分也与俄罗斯帝国国界线总体吻合。当边境线不是河流地段时,就在当地让人堆砌土丘作为标记,这种土丘被称为“人工冢”^①。

扎波罗热北部界线的确定则相当复杂。那里与波尔塔瓦和哈尔科夫等哥萨克团所辖地区以及所谓的“第聂伯河对岸地区”,即第聂伯河右岸的哥萨克农民殖民区(现今的基洛沃哥罗德州)不仅交界,而且往往交错重叠。早在盖特曼马泽帕时,扎波罗热哥萨克便同这些地区就沿奥列利河、萨马拉河、北顿涅茨河一带富饶肥沃的土地归属权问题发生过纷争。他们对米尔哥罗德团、波尔塔瓦团和普利卢茨克团等诸多哥萨克团也是满腹

^① 1742年俄土政府勘界条例//敖德萨历史与文物学会笔记,第二卷,敖德萨,1859,第835页。

牢骚，因为这些哥萨克团趁塞契投奔克里米亚汗国之际在“第聂伯河对岸地区”建立了为数众多的定居点，扎波罗热哥萨克认为这片土地是他们的。在他们看来，哥萨克军边界应该以幸纽哈河、维西河以及加斯明河等这些波兰俄罗斯之间的界河来划分。重返俄国之后，哥萨克军便着手在第聂伯河对岸北部直接与波兰接壤的边境地区建立定居点。此举不仅导致了与波兰政府关系紧张，也导致了与以米尔哥罗德哥萨克团团团长瓦西里·卡普尼斯特为总指挥的第聂伯河右岸哥萨克当局关系紧张。

还有一点也使得事情复杂起来。自1686年俄罗斯与波兰缔结“永久和约”之后，扎波罗热右岸地区便没再进行过两国边界的勘定工作。这样一来，下游扎波罗热军势力所及北部地区实际界限的确定就显得势在必行。出于这一目的，1744年末，按女皇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旨意，大尉工程师科柳巴金前往扎波罗热塞契要塞，负责勘定扎波罗热与波兰-立陶宛王国以及第聂伯河右岸各哥萨克定居点之间的边界线。由科柳巴金开始的这项工作于1745年在中校工程师达尼尔·德·博斯科特手中完成。他绘制的第一份下游扎波罗热军地域图，细节明晰得令人称奇。那时，他们还尝试进行了扎波罗热北部边界线的勘界工作，即所谓的“德·博斯科特线”^①。当时给人一种感觉，即扎波罗热西北部地区的土地问题快要解决了。然而，这些成果却因沙俄政府决定在第聂伯河右岸地区建立新塞尔维亚军事农垦居民点而被一笔勾销。为给新来的巴尔干定居者腾出地方，乌克兰当地居

^① 俄罗斯国家军事历史档案馆，全宗52，目录1，案卷1，第2部分，第43页。





民被迁出,安顿到更南部的扎波罗热地界上,而那个地方在1753年曾建立起诺沃斯洛博达哥萨克团。下游扎波罗热军当局试图通过递诉状,派代表进京请愿等方式捍卫自己土地的努力落空了——1756年至1760年,俄土地委员会作出了对他们不利的决定。

第聂伯河左岸的扎波罗热地区情况也相似。当年,在扎波罗热塞契投奔克里米亚汗国期间,与其相邻的顿河哥萨克便乘机向西部,沿卡利米乌斯河、米乌斯河下游方向扩张,建立起一个个村庄和集镇。而现在,当扎波罗热哥萨克回归俄罗斯帝国并再次在亚速海西北沿岸那片自古以来便属于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定居的时候,这两条河流以及亚速海一带自然资源,尤其是渔业资源和物产便成了下游扎波罗热军与顿河哥萨克军激烈争夺的对象。十八世纪四十年代初,这两支哥萨克军队之间爆发了历来最多的冲突事件。冲突起因一如既往的是顿河哥萨克从扎波罗热哥萨克手中抢夺分布在自米乌斯河河口到别尔江斯克盐湖一带的渔场。此事惊动沙俄政府,以至于1743年它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清查这些纷争根源并对下游扎波罗热军与顿河哥萨克军之间的地域界限进行勘定。经过委员会三年努力,枢密院于1746年颁布法令,明确了两支哥萨克军以卡利米乌斯河及其左岸支流格鲁兹卡河为边界。1753年,沙俄政府在北顿涅茨河、卢甘河和巴赫姆特河地区又组建起了一支巴尔干移民垦荒团——斯拉夫-塞尔维亚移民垦荒团,此事引起了扎波罗热哥萨克和顿河哥萨克的齐声指责,他们各自引经据典,主张对该地区土地的所有权。

于是，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初，塞契对自己与帝俄其他行政区相毗邻的实际掌控区临时进行了边界测定：西北方向，扎波罗热控制区边界从南布格河左岸支流米基斯克塔什雷克河河口直线延伸到自右岸方向注入第聂伯河的萨玛特卡尼亚河河口一线；东北方向，扎波罗热领土则抵达奥列利河（该河对岸就是波尔塔瓦哥萨克团属地）；东边以萨马拉河、伏尔齐亚河、别尔达河、卡利米乌斯河为界。

1764年，新俄罗斯省设立，它囊括了新塞尔维亚、诺沃斯洛博达哥萨克团、乌克兰防线、斯拉夫塞尔维亚、巴赫姆特州等地区，甚至还包括波尔塔瓦哥萨克团南部某些地方。这标志着俄帝国向扎波罗热地区扩张达到一个新阶段。1764年夏，俄国土地测绘员正式勘定扎波罗热和新俄罗斯省边界，并撤销两地土地方案，这意味着扎波罗热哥萨克属地的北部边界几乎比1745年的“德·博斯科特线”还向南移动了五十公里。为讨回被占土地，1765年至1767年期间，科什向京城圣彼得堡派遣了几个代表团，请求彻底解决领土问题^①。

由于自己诉求没能得到公正解决，扎波罗热塞契领导人便按自己的理解方式选择了问题解决途径。1768年至1774年爆发的俄土战争更加激化了领土纷争问题，这给他们创造了一个绝佳机会。因为自1769年起，俄国政府在扎波罗热布格河加尔德和英古尔两处帕兰卡（区）安置数万名从奥斯曼帝国迁来的新移民，其中有瓦拉几亚东正教徒（罗马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塞尔

^① 俄罗斯国家军事历史档案馆，全宗52，目录1，案卷1，第2部分，第477-490页。





农民迁居下游扎波罗热军地盘

维亚人、希腊人等。与此同时,在扎波罗热哥萨克军主力忙于战争之际,一批地主在北边,从新俄罗斯省盖特曼区纷纷涌入扎波罗热境内,掀起了一股抢夺扎波罗热哥萨克土地的热潮。参与争夺哥萨克土地的还有那些从盖特曼区跑来的自由哥萨克农民垦荒团。

在这种情形下,塞契没有任何机会从法律层面保护自己的领土,于是便使用武力迫使这些重新建立起来的居民点向科什当局臣服,或者将其从哥萨克军领土上驱离。塞契当局意识到必须尽快让自己的领土边界得到确认,强化下游扎波罗热军对其所有权。于是,1772年至1774年期间,他们不断采用请求、申诉和呈报等方式对俄国政府进行“密集轰炸”。而与此同时,新俄罗斯省政府也在不断向京城呈报,控告下游扎波罗热军行为,顿河哥萨克团也没有闲着,同样也与哥萨克军就土地问题发生纷争。

自然,叶卡捷琳娜二世政府在审理这些相互投诉的案件时偏袒了隶属帝国行省和效忠于朝廷的顿河哥萨克人。而下游扎波罗热军对自己土地的合法性诉求在最后一个塞契——新塞契存在的四十年期间也始终没能得到解决。不仅如此,土地纷争问题几乎是1775年新塞契招致清除的主要原因。

圣彼得堡当局一边千方百计阻挠，乃至曲解下游扎波罗热军与帝国其他行省之间边界勘定问题，一边却极为关注该部队在扎波罗热南部边界的制度执行情况。因为那里与奥斯曼帝国（克里米亚汗国）和波兰-立陶宛王国接壤，其边界自然也是俄国边界。沙俄政府在那里实行严格管理制度，这使得扎波罗热哥萨克各阶层广大民众的生活变得极为复杂。俄国政府实施的护照制度、隔离措施，建立前哨和边关哨卡网改变了边界性质。此前，这里更多是想象而非具体实际的边境线，现在，这里已经变成一个由军队控制掌管，越来越固定且跨越困难的地带。

二、下游扎波罗热军内部体制结构

与此前相比，新塞契时期的下游扎波罗热军行政管理体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当初，自克里米亚汗国重返俄罗斯之后，下游扎波罗热军领导层便着手整肃自己掌管的土地，安置居民点，推广带有综合职能性质的区域行政体制^①，这里指的是所谓的“帕兰卡（palanka）制度”。它兼容了哥萨克自古以来地域管理的传统方式和土耳其-克里米亚汗国的行政区域管理体系。“帕兰卡”一词由土耳其语进入扎波罗热当地词汇中，而土耳其语中的这个词汇又是从南斯拉夫语支（塞尔维亚语或克罗地亚语）引进的，意思是“围有木栅栏的居民点”，也就是一种小要塞——堡垒。显然，在入籍克里米亚汗国期间，汗王和苏丹官员将“帕兰

^① M. 斯拉布琴科：扎波罗热哥萨克自由区帕兰卡机构研究//B.K. 科济列夫：乌克兰南部行政体制历史材料（十八世纪下半叶至十九世纪上半叶），扎波罗热，1999，第426-430页。





卡”的这种意义用于指称那些驻扎着哥萨克卫戍部队和当地政府官员的扎波罗热军事据点。下游扎波罗热军在归顺土耳其-克里米亚汗国期间,布格河加尔德、老科达克和卡门卡(麦洛瓦亚)等要塞无疑就是帕兰卡。帕兰卡官员一面在克里米亚汗国(土耳其)面前代表着其治下居民的利益,另一方面,他们负责完成前者分派的军事徭役,收缴各种税费等任务。

扎波罗热哥萨克回归俄罗斯帝国之后,帕兰卡制度得以保留,并且于十八世纪四十年代期间在科什掌管的全境推行。自那时起,“帕兰卡”在更广泛意义上不仅指那些中心居民点,还指扎波罗热地区被划分出来的一个个纯粹的行政区域单位。

每个扎波罗热帕兰卡均设有一位督军,他由哥萨克拉达大会选举产生(后期,这一职位由科什来任命),其最亲近的助手是帕兰卡法官和帕兰卡书记官。帕兰卡领导机构对其全境实行监管。由于代表科什行使职权,因此,它不仅拥有广泛特权,还有明确的职责义务。帕兰卡管理层每年要进行一次选举并由科什认可,帕兰卡全体居民均隶属其司法管辖。督军的管理权力由一个小权杖——“箭羽锤”(铁质)作为标志,每个帕兰卡拥有自己的印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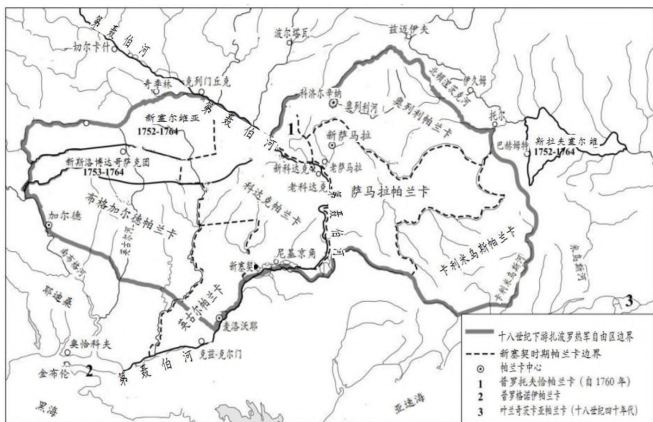
1734年至1775年期间,扎波罗热境内的帕兰卡数量随年份不同而有所不等,总体上在五到十一个之间^①:

布格河加尔德帕兰卡。一方面,它介于南布格河左岸和英古列茨河右岸之间;另一方面,它处于第聂伯河与奥斯曼帝国

^① B. 米尔切夫:新塞契时期下游扎波罗热军自由区及帕兰卡分布图//国立扎波罗热大学历史系科学著作,扎波罗热:扎波罗热大学出版社,2006,第XX辑,第34页。

（克里米亚汗国）分界线之间，其中心是布格河加尔德城。

英古尔帕兰卡。这个据点位于第聂伯河右岸，在第聂伯河与英古尔河以及上游的英古列茨河与巴扎夫鲁克河流之间。英古尔帕兰卡的中心是卡门卡镇（麦洛沃耶）。1730年至1734年，此处曾是卡门卡塞契所在地。



下游扎波罗热军自由区及帕兰卡分布图(1734—1775)

卡利米乌斯帕兰卡。位于沃尔奇亚河、卡利米乌斯河和亚速海之间的地区，中心城市是位于卡利米乌斯河注入亚速海入口处的朵马赫镇（现今马里乌波利市）。

科达克帕兰卡。它占据纳德波罗热部分右岸地区的土地，是扎波罗热境内人口最为稠密的地方之一，其中心是新科达克城。

奥列利帕兰卡。扎波罗热左岸北部，位于奥列利与萨马拉两条河流的上游地区。帕兰卡中心是哥萨克军据点科济尔辛纳。





普罗托夫恰帕兰卡。占据着第聂伯左岸、下游扎波罗热军属地,位于奥利柳河与普罗托夫恰河之间的地区,中心是雷奇科夫卡镇。

萨马拉帕兰卡。在扎波罗热军左岸地区位于萨马拉河与康斯卡河之间的地区。中心是萨马拉城(即为后来的新谢利察城)。萨马拉帕兰卡是所有扎波罗热帕兰卡中人口最为稠密的一个^①。

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初,由于扎波罗热地界上居民人数增加,部分先前被新俄罗斯省占据的扎波罗热北部土地得以归还,于是一些老帕兰卡便分解成一个个小帕兰卡,此外,又设立了一些新帕兰卡。其中,萨马拉、奥列利和普罗托夫恰等帕兰卡地界上分化出了巴尔温科斯京卡、雷齐科夫和科米萨罗夫卡等几个帕兰卡,只不过这些帕兰卡仅仅存在了两三年左右的时间而已(到1775年便消亡了)。

可以说,这是一些“常设性”帕兰卡,它们从19世纪40年代初直到1775年扎波罗热塞契被剿灭时一直存在着。这些帕兰卡拥有自己的中心居民点,发挥着日常管理功能。它们四周分布着农业区,人口稠密,均属于帕兰卡管辖。除去这些地方,在黑海和亚速海沿岸地区,有些形式上虽并没有被纳入扎波罗热军管辖,但不同时期曾受到过科什军事政治影响的地区,也建立起所谓的季节性“工业”帕兰卡,其中有:

普罗格诺伊帕兰卡。它包含金布伦沙嘴一带所谓的“晒盐

^① Д. И. 亚沃尔尼茨基:论扎波罗热哥萨克自由性问题——由三幅地图论其历史形貌概要,圣彼得堡,1890,第124页、227-229页。

场”或曰晒盐湖周边地区，即切尔诺沃盐湖、扎苏哈盐湖、雷苏欣盐湖等。这些湖泊拥有分支水系，附近有很多浅水支流与黑海雅戈尔雷茨基海峡类似，即这些河流流域和水系特点极有利于盐粒沉淀。几乎每年春末，这些海峡支流都会干涸，及至仲夏时节，湖中盐水已成结晶，可用于生活之需。表面上看，这些集镇位于克里米亚汗国境内，但汗王从未对其实行过充分监管。自十六世纪扎波罗热哥萨克出现在历史舞台之后，这些集镇便成了他们的经营活动场所，但这种经营活动带有季节性特征，而且也只涉及盐业开采。

叶兰奇茨卡亚帕兰卡。位于卡利米乌斯河东面，在叶兰奇克的苏霍伊、默克洛伊以及米乌斯等小河注入亚速海河口地区。十八世纪四十年代前半期，这地方也是扎波罗热哥萨克季节性渔猎场。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亚速海水域及其河口地区丰富的渔业资源一直吸引着扎波罗热渔民前往捕鱼谋生，即便是1734年他们脱离克里米亚汗国回归俄罗斯之后也还是一如既往地前往那里。相邻的顿河哥萨克极不欢迎扎波罗热人前来叶兰奇克和米乌斯等河流安营扎寨，从事渔业活动，他们一直觊觎这片区域，于是相互之间，冲突时有发生。沙俄政府成立专门委员会，处理下游扎波罗热军与顿河哥萨克军相互诉讼案并最后做出有利于后者的裁决。及至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初，这片地区便脱离了扎波罗热哥萨克科什管理，而叶兰奇茨卡亚帕兰卡也就终止了存在。



第五章 体制改革：新塞契时期沙俄帝国体系里的扎波罗热军(1734年—1755年)

1733年至1734年,俄国政府开始审议扎波罗热哥萨克回归问题,从整体上确定了几个帝国管理机构作为哥萨克军未来管理部门的基本框架。这样,重返俄国的下游扎波罗热军将交由陆军院、外交院、小俄罗斯院以及枢密院等机构共同管理。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初,由于盖特曼政权解体,于是,关于接受扎波罗热人回归的事务便落到幺冈-别伦加尔德·冯·韦斯巴赫将军(基辅总督兼乌克兰方面军统帅)和布尔哈德-赫里斯托福尔·冯·米尼赫元帅(俄陆军院部长)两人身上。如此一来,地方民事和军事管理机构——基辅总督府和基辅地区俄军司令部便充当起中间人角色,发挥上传下达作用。另一方面,凡与扎波罗热人联络事宜均被置于中央管理机构——外交院严密监管之下,陆军院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监督^①。

1734年,回归谈判事宜持续了整个夏季。随后,一百五十三名哥萨克军代表(包括科什阿塔曼伊万·马拉舍维奇、军书记官和军事务官、库林阿塔曼和几名普通哥萨克士兵等)于1734年9

^① B.米尔切夫:《扎波罗热哥萨克军回归沙俄问题探讨》//乌克兰哥萨克历史研究:概览(两卷本)//编辑:B.A.斯莫里(责任编辑)等,基辅:莫吉拉学院出版社,2006,第一卷,第604-607页。

月2日来到白采尔科维城向韦斯巴赫将军宣誓效忠帝国^①。1735年初,扎波罗热代表们在卢布纳城签署了哥萨克军入籍俄国准则,即《卢布纳协约》。俄方签字代表是黑森-洪堡王子路易·威廉。《卢布纳协约》共有七条,其中有两条明确了扎波罗热军行政管理的特殊性:一、内部管理方面,扎波罗热军有权“按现状保留各级官员”(第四条);二、外部管理方面,隶属基辅总督管辖(第六条)。兰德米利茨亚部队指挥官塔拉卡诺夫少将被派往波德波利纳亚河畔的新塞契执行全体转籍哥萨克效忠宣誓活动^②。

下游扎波罗热军隶属基辅总督管辖,这说明,由于基辅省地处边境(与波兰接壤),其总督权限与帝国其他各省省长权限有很大不同。比如,根据1737年的一份“工作条例”规定,基辅总督应该负责边境要塞和前哨的给养保障,担负对外侦察、抓捕间谍和缉拿敌我双方逃兵之责任,有权接待外国使节,主管剿匪等诸多事务^③。也就是说,在诸多问题方面,有权监控扎波罗热科什活动的恰恰是基辅总督。1735年,在米哈伊尔·列昂基耶夫(他替代已经去世的幺冈-别伦加尔德·冯·韦斯巴赫将军)就总督职务时,基辅总督对科什的最高领导权得以确认^④。

① Д. И. 亚沃尔尼茨基:扎波罗热哥萨克史(三卷本)//[编辑: П. С. 索罕(责任编辑)等;导言: В. А. 斯莫里,评论: Г. Я. 谢尔盖延科],基辅:科学思想出版社,1991. 第3卷,第444页。

② 1765年之前的小俄罗斯历史简述,增补扎波罗热哥萨克资料及附加此前资料//俄罗斯历史和文物学会读物,莫斯科,1848,第6本,第45页。

③ В. 谢尔宾纳:1654年至1755年基辅军事统帅、省长和总督名录//编年史编撰者涅斯托尔学会读物,基辅,1892,第6本,第121页、123页。

④ Е. А. 扎戈罗夫斯基:新塞契时期扎波罗热与俄国政府相互关系研究//敖德萨历史与文物学会笔记,1913,第XXXI卷,第5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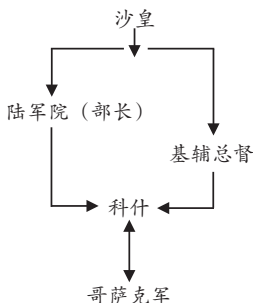


下游扎波罗热军转籍俄国的最初几年里,俄帝国缺乏对其进行垂直管理的明确机制。事实上,尽管扎波罗热人回归与盖特曼政府委员会(1734年1月,阿塔曼丹尼尔·阿波斯托尔去世之后开始实行的俄罗斯将军与乌克兰哥萨克军官合议机构)开始运作的时间相吻合,但是塞契却不隶属于它。同样,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后半期以及十八世纪四十年代,扎波罗热军也独立于盖特曼政权的另一个行政机构——军事总署,虽然后者试图将哥萨克军纳入自己的管辖权限,但科什却因通过向自己直接上司——基辅总督呼吁从而成功避免了这种情况发生^①。

基辅总督对下游扎波罗热军实施管辖权限问题尽管得到确认,但争议依旧不断,持续数年之久。事实上,只是到了十八世纪四十年代初,此事才得以明确,成为无可争议的事实。这种延宕乃是1735年至1739年俄土战争所造成。当时,下游扎波罗热军一方面服从基辅总督管辖,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常规军事组织,又要服从俄军陆军总指挥、布尔哈德-赫里斯托福尔·冯·米尼赫元帅领导,并从他那里获得军需给养。

^① И. 西尼亚克:扎波罗热科什与盖特曼区资料研究//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格鲁舍夫斯基古文献学与史料学研究所,基辅,2006,第12卷,第74-77页。

一、1734年至1741年沙俄帝国行政管理体制下的下游扎波罗热军



当时的情形相当不合情理：既然米尼赫元帅直到1741年底依旧是陆军院部长，那么按常理，下游扎波罗热军形式上理应服从俄罗斯帝国军事部长领导。然而，1737年12月2日，该军却并没有随其他哥萨克部队一道被列入陆军院下属编制，借口只是因为陆军院领导手中关于下游扎波罗热哥萨克军“没有任何书面资料信息”^①。

1742年，俄土战争结束之后，下游扎波罗热军便由原来陆军院管辖改为由外交院管辖（国家外交院由其前身——使节衙门变革而来，于1718年成立；这两个机构均负责处理对外关系）。这一改换主管部门的举动说明帝国政府的确试图认真研究扎波罗热哥萨克回归的条件问题。但外交院解释说在其档案中没有关于扎波罗热人回归条件的文件资料，并推测说这些文件在韦斯巴赫或者米尼赫那里有^②。

^①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248，目录126，案卷468，第368页。

^② Д. И. 亚沃尔尼茨基：扎波罗热哥萨克史文献（两卷本），弗拉基米尔：省政府印刷厂，1903，第2卷，第1714—1715页。





这里顺便提一下,即便是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也没能够弄清当时哥萨克军是在何种条件下决定回归的:1750年,在回答新当选盖特曼基里尔·拉祖莫夫斯基询问时,还是那个枢密院,答复说不清楚下游扎波罗热军当时是以何种条件重新入籍俄国的,转而将这个问题提抛给了外交院^①。这说明,有部分文件根本就没能从基辅总督办公厅和米尼赫元帅随军办事处那里转交到外交院来,而是被遗失在战争的倥偬岁月里了。

二、1742年至1750年沙俄帝国行政管理体制下的下游扎波罗热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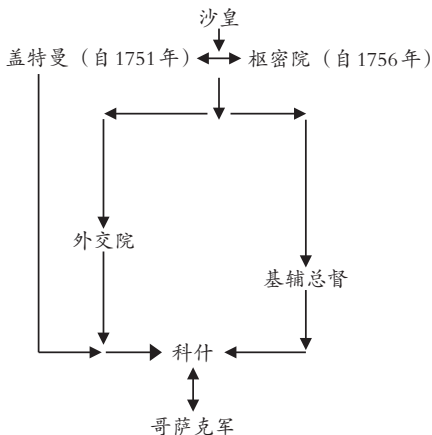
随着盖特曼制度在乌克兰左岸地区的再次恢复(1750年至1764年),下游扎波罗热军也部分地归属哥萨克盖特曼司法管辖。自此,凡所有涉及军队内部土地管理的事务,扎波罗热哥萨克均有义务向盖特曼拉祖莫夫斯基和哥萨克军办公总署汇报,而涉及军事和国际事务则应向基辅总督报告。1751年6月24日,女皇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颁发诏书,对哥萨克军管理权限

^① 枢密院档案,枢密院工作日志与措施,第VIII卷,圣彼得堡,1897,第175-176页。

的这种分配进行了确认^①。

需指出的是，较之于基辅总督对扎波罗热哥萨克军所拥有的各种广泛特权而言，盖特曼拉祖莫夫斯基的权限则相当有限，因为扎波罗热哥萨克军边防服役及他们与边境邻国交往关系的监管属于沙皇直接任命的总督的特权^②。

三、1751年至1764年沙俄帝国行政管理体制下的下游扎波罗热军



在俄罗斯帝国最高国家机构隶属层面上，下游扎波罗热军继续受外交院管辖，而后者则又直接听命于女皇。而下游哥萨克军与外交院和女皇之间充当中间角色的则是基辅总督（自1753年起主要通过基辅省办公厅）和哥萨克军办公总署（自1751

① [H.M. 穆尔扎克耶维奇]：1751年俄罗斯帝国各部门关于扎波罗热问题争端研究//基辅古风，1898，第60卷，第4-7页。

② E.A. 扎戈洛夫斯基：新塞契时期扎波罗热哥萨克军与俄罗斯当局的关系研究//敖德萨历史与文物学会笔记，1913，第XXXI卷，第60页。





年起该机构也成了盖特曼与哥萨克军之间交流的传递环节)^①。

由于沙俄政府地区政策是以支持盖特曼政权与科什之间的相互对立为基础的,因此,哥萨克保留了在特殊情况下可绕过盖特曼和哥萨克军军事办公总署直接与帝国政府沟通的权利^②。

自1756年起,俄国出台了一项政策,开始实行下游扎波罗热军向帝国枢密院汇报制。彼得一世于1711年设立的枢密院是俄罗斯帝国中央立法机构,而作为最高法律机构,所有行业部门(各部委)和国家行政区域单位(各省和哥萨克部队所统辖地区)均属于它管辖之下。枢密院的各种立法决议由沙皇亲笔签署确认,属最高级别文件,必须执行。基辅总督则监督下游扎波罗热军是否履行枢密院法令^③。

1764年,俄国废除盖特曼制,此后下游扎波罗热军划归小俄罗斯院管辖,该院部长是彼得·卢缅采夫。对此,科什表达了不满,向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提交呈请,请求将下游扎波罗热军从小俄罗斯院划归外交院管辖(1765年1月)。然而,扎波罗热代表在京城不仅什么也没有改变,而且还因卢缅采夫和卡尔·施托芬向女皇提出的建议而差点被抓捕^④。

新塞契期间,俄国政府不断进行尝试,企图从根本上来改变

① И. 西尼亚克:最后一个扎波罗热哥萨克科什同盖特曼政府函件往来研究,第76-79页。

② О. М. 阿帕诺维奇:十八世纪上半叶乌克兰武装力量,基辅:科学思想出版社,1969,第16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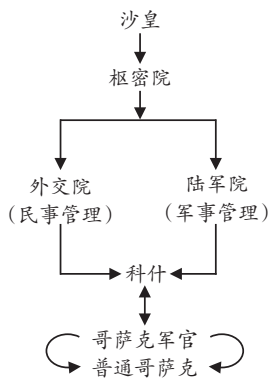
③ Д. И. 亚沃尔尼茨基:扎波罗热哥萨克史文献(两卷本),弗拉基米尔:省政府印刷厂,1903,第2卷,第1472-1473页。

④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13,目录1(补充),案卷78,第3页及其背面。

下游扎波罗热军管理性质,从不同层面收集扎波罗热社会制度、经济和军事实力等资料,以便这些资料在吞并这最后一个乌克兰大地上哥萨克自治区的任何时刻都能派上用场^①。

1768年12月20日,叶卡捷琳娜二世给小俄罗斯院颁布了一项法令,规定凡隶属该院管辖之下的哥萨克部队(指下游扎波罗热军和小俄罗斯省各哥萨克团),其民事事务管理和诉讼事宜均应依照“小俄罗斯法律和规章”(哥萨克地区传统立法)进行,而所有属于军事性质的事务则需根据帝国“军事章程”和“军事条款”处理。俄政府当时设想在扎波罗热哥萨克人中尽快宣传这些法律文件,并于1769年付诸实施^②。

四、1764年至1775年沙俄帝国行政管理体制下的下游扎波罗热军



① B. 米尔切夫、Ю. 科尼亚兹科夫:卡尔·施托芬少将的扎波罗热制度改革方案(1765年)//扎波罗热大学南乌克兰历史科学研究实验室笔记,扎波罗热:覃登出版公司,2003,第7辑,第35-38页。

②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13,目录1(增补),案卷76,第126页及背页。





1774年,沙俄政府同奥斯曼帝国签署和约,该和约对俄方有利。通过此举,它实际上已收服了克里米亚汗国,而下游扎波罗热军作为一个军事政治势力和行政区域单位却妨碍了叶卡捷琳娜二世政府在南线的扩张政策,这是它被俄国政府剿灭的主要原因。此外,扎波罗热地区被整肃也与俄罗斯帝国力图通过在国内推行行省制来对边疆地区实行规范化管理进程有关。行省制早在十八世纪初期就已经开始在俄帝国境内实施,在扎波罗热地区推行此项制度也只是沙俄政府废除旧的哥萨克地区行政区划的一环(这种做法同时也在顿河和雅伊克等哥萨克地区推行)^①。

1775年,扎波罗热自治区地位被取消,扎波罗热地区传统划分为帕兰卡居民点的做法也在同年年末被终止。从形式特征上看,新推行的扎波罗热区域和行政机构改革措施与之前并无多大差异。尽管之前的扎波罗热帕兰卡土地和居民点从此被调整为一个“县”,但此类新政措施更多只是流于形式。因为政府也只是形式上禁止使用“帕兰卡”一词,规定称其为“县”而已。例如,原来的“萨马拉帕兰卡”更名为“萨马拉县”,“普罗托尔昌斯基帕兰卡”更名为“普罗托尔昌斯基县”等(瞧!那些旧名称和以前的边界却保留下来)。也就是说,从地域划分方面来看,即便是扎波罗热塞契被剿灭,其原先的各帕兰卡地界也依旧在沿

^①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13,目录(增补)1,案卷76,第126页及其背面。

用着^①。

俄军占领扎波罗热地区之后，沙皇政府很快便任命了一批参加过1768年至1774年俄土战争的扎波罗热哥萨克军官为该地区各帕兰卡行政长官。这些军官均获得过奖章和奖励，对新政府忠心耿耿。他们的职责是防止有对立情绪的扎波罗热居民出现反政府举动，因为政府担心当地人举行武装暴动。此外，俄国政府还竭力阻止前扎波罗热哥萨克越境前往土耳其。可以说，这段时期是一个“行政过渡期”^②，直到1775年末，政府才得以在前扎波罗热自由区确立区域管理制度，开始往帕兰卡派遣俄罗斯官员。这一时期是前扎波罗热自由区开始区域行政改革的新阶段。于是，作为帕兰卡制替代方案，行省制开始在该地区推行起来（第聂伯河左岸地区划归亚速夫省，右岸地区划入新俄罗斯省）^③。

于是，新塞契存在的四十年期间，扎波罗热的“边界”概念和制度无论在哥萨克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塞契管理中都逐步发生了改变。帕兰卡制被视为科什政权得以在扎波罗热地区推广的管理基础。受当时内外政治现实影响，扎波罗热帕兰卡数量一

① И.Б. 萨甫琴柯：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俄罗斯政府行政管理政策中的哥萨克因素研究//科学笔记，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格鲁舍夫斯基古文献学与史科学研究所，青年学者及研究生学术论文集，第6期，2001，第236-237页。

② И. П. 施阳：扎波罗热哥萨克制度废除初期前扎波罗热自由区境内土地专员活动研究//扎波罗热大学历史系学术论文集，第VI辑，扎波罗热，1999，第4-5页。

③ H. 波隆斯卡娅-瓦西里延科：塞契覆灭后乌克兰南部形势//十八世纪扎波罗热及其遗产，第II卷，莫尼黑：第聂伯浪潮出版社，1967，第225-230页。





直波动不定。此外,在最后十年中,下游扎波罗热军成了俄罗斯帝国推行规范化政策的实施对象。在帝国政府体系中,扎波罗热哥萨克主要扮演的是帝国政治与军事扩张工具的角色,它也因此被纳入了严格的垂直管理体系中,被剥夺了保存哥萨克传统自治的权利。

第六章 盖达马克:十八世纪扎波罗热哥萨克人的一次社会运动

十八世纪乌克兰的政治和社会历史研究很薄弱,这使我们不能充分明确回答有关新塞契时期扎波罗热盖达马克运动的起源问题。当下,有关这一话题的研究依旧处于低水平层次。而与此同时,俄罗斯、波兰和乌克兰档案馆里那些被我们发现且被我们运用于学术论文中的有关扎波罗热哥萨克的历史文献所具备的那种“临界质量”,以及这些文献的信息有助于我们对1710年至1780年间以“盖达马克”闻名于世的部分扎波罗热哥萨克活动的某些方面进行单独阐释。

问题之一是关于盖达马克的社会本质和产生原因。因为有一个明摆着的事实,即在很多明文规定的场合下,实用主义的“猎获”(即抢夺财物)动机毫不掩饰地凌驾于国家、宗教以及阶级等诸多要素之上。对第一手资料的研究使我们最终得以形成这样的认识,即当时生活在十八世纪的同时代人将盖达马克运动中表现出的这种“匪性”看成只有扎波罗热哥萨克人的“猎获”活动才具有的特质。

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有不少乌克兰历史学家曾指出,扎波罗热哥萨克的盖达马克运动中带有明显的抢劫动机。但这些动



机要不就像斯卡利科夫斯基著作里所表现的那样,被绝对化^①,要不就像莫尔多夫采夫和安东诺维奇的著作那样,只作一般确认,而没有细节讨论^②。苏联时期的史学家著作里没有研究盖达马克抢劫现象,原因在于这种情况与当时提倡的乌克兰人民阶级斗争以及民族解放斗争观念不相容(此处仅提及专门研究盖达马克基本问题的苏联权威史学家主要论著)^③。只有乌克兰侨民历史文献(美国、加拿大)^④以及现代乌克兰^⑤历史文献中方可见到将盖达马克活动视为“社会匪患”问题,这显然是受到了英国新马克思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作的影响^⑥。与此同时,有一点非常突出,这就是我们这里提及的所有盖达马克研究者,他们均认为盖达马克运动是一种很晚——十八世纪初——才产生于乌克兰民族社会深层中的现象,并且其出现直接与波兰-乌克兰戏剧性对立事件有关,尤其是与乌克兰第聂伯河右岸

① A. 斯卡利科夫斯基:《十八世纪盖达马克袭扰西乌克兰问题研究(1733—1768)》,敖德萨,1845。

② Д.Л. 莫尔多夫采夫:《盖达马克运动》,历史专著,圣彼得堡,1870;B. 安东诺维奇:《序言》//俄罗斯西南档案馆,第三部,第三卷;《盖达马克公文(1700—1786)》,基辅:大学印刷厂,1876,第1-128页。

③ A. 德米特里耶夫:《盖达马克活动——十八世纪上半叶乌克兰阶级斗争史》,莫斯科,1939;B.O. 戈洛布茨基:《扎波罗热塞契的最后时光(1734—1775)》,基辅:乌克兰科学院出版社,1961;O.П. 罗拉:《十八世纪二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盖达马克卢赫》,基辅,1965。

④ 科卢特·E. 泽农:《新旧神话——最新史学文献中的盖达马克运动与右岸大起义(1768)》//《哈夫乌克兰研究》,1977,第1卷,第3期,第359-378页。

⑤ Г.К. 什维契柯:《盖达马克运动》//《乌克兰哥萨克人》//《小百科全书》,基辅-扎波罗热,2002,第88-89页;H. 雅科文科:《中世纪及现代早期乌克兰历史概论》,基辅:批评出版社,2005,第480-490页。

⑥ E.J. 霍布斯鲍姆:《原始叛军,土匪,黑手党,千禧一代,无政府主义者,西西里法西斯,城市的劳动力成本仪式》,曼彻斯特,1971。

哥萨克农民大众反对外族统治有关,而与扎波罗热哥萨克传统的“猎获”活动无关。

首次提及盖达马克运动的文献是在十八世纪初期,这不是偶然。这一时期,波兰、俄罗斯和土耳其三国政府分别在大规模进行边界勘定活动,对边境机构体制进行调整以及在黑海北部广大地区进行护照管控(1700年至1705年,1711年至1714年)。这种情形之下,来自三国哥萨克这些传统的“好汉”行为(也就是“猎获”)开始不可避免地被视为不仅是对邻国的敌对行为,而且也是对本国政府的叛逆行为。

要研究这一内容我们就绕不开这样的问题,即这两个术语是何时出现及它们最初含义:(1)“盖达马克”,专门用于指称塞契哥萨克人内部一群明确的社会群体;(2)“盖达马克运动”,在更为广泛意义上不仅表示一种社会现象,还指乌克兰历史上的一个时代。尽管十七世纪扎波罗热哥萨克在波兰-土耳其边境地区也曾有过类似广泛活动,但这两个术语只是到了十八世纪初期才开始使用。自十六世纪中期开始,为了形式上界定类似盖达马克运动的扎波罗热“猎获者”活动,波兰方面主要使用“łotrstwo”一词来称谓。该词由“łotr”派生而来,波兰语意思是“小偷;抢劫者;强盗”。我们在1563年土耳其苏丹苏莱曼与波兰国王西吉斯蒙德二世·奥古斯都的书信往来中读到的正是这个含义。当时,苏丹王就德米特里·维什涅维茨基公爵手下的哥萨克在奥恰科夫城郊抢劫土耳其和克里米亚买卖人一事向波兰人提出交涉^①。实际上,该词在整个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期间一直保

^① 波兰克拉科夫恰尔托雷斯基图书馆,第611号手稿,第297-301页。





持着这种意义,而外交公文里还刻意突出“哥萨克强盗行径”(łotrstwo kozackie)等类似含义(比如,1618年奥恰科夫总督迈哈迈德给波兰国王西吉斯蒙德三世的信函又或1653年土耳其苏丹穆拉特四世给波兰国王弗拉迪斯拉夫四世的书信等都是这样使用的)^①。我们在十七世纪上半叶波兰与克里米亚汗国的外交往来函件中(1637年至1641年期间,波兰国王弗拉迪斯拉夫四世给汗王巴哈德尔-吉列的王兄信件)见到使用“swawolne kupy”(无法无天的匪帮)这一词组用来称谓扎波罗热“猎获者”队伍,因为这支队伍罔顾波兰政府法令,经常“光顾”(抢劫)包括比萨拉比亚及其附近大草原(德涅斯特河与多瑙河下游之间一片区域)在内的地区^②。

此类术语直到十八世纪初都还在使用着:在波兰军队的军官口头报告和书面信函中十分频繁地对扎波罗热哥萨克军官和哥萨克“猎获者”使用各种蔑称,诸如“kupa”(流氓、混蛋)、“hultaji”(破坏者、罪犯)等^③。比如,1714年8月3日,波兰盖特曼阿丹姆-尼古拉·谢尼亚夫斯基在给奥恰科夫总督阿布达-帕夏书信中抱怨“swawolne kupy kozactwa”(哥萨克匪帮)从“奥恰科夫大草原”骚扰“波兰王国的乌克兰”(即第聂伯右岸地区)^④。

“盖达马克”这一术语全面使用于各生活领域,但又非指该

① 波兰克拉科夫恰尔托雷斯基图书馆,第611号手稿,第413-415页、445-451页。

② 波兰克拉科夫恰尔托雷斯基图书馆,第2058号手稿,第211-212页。

③ 华沙古代主要文书档案馆,拉齐维乌家族大档案全宗 第Ⅱ分部,第2543卷宗,第1页。

④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89,目录4,1714,案卷5,第1页背面。

现象本身,这是因为该词早在扎波罗热哥萨克入籍克里米亚汗国期间(1709/11年至1734年)就已出现。这点在波兰官员们的公务往来信札中有迹可循。波兰境内最早关于扎波罗热哥萨克“从事盖达马克活动”的消息出现在白采尔科维城的德·博伊恩上校写给皇家盖特曼谢尼亚夫斯基的信件中,这封信的落款日期是1714年6月3日。前者在信中汇报了乌马尼亚和斯杰布洛夫两人带领扎波罗热哥萨克队伍入侵及抢劫的情况。他指出,由于当地边防军玩忽职守而使得“...daly sobią napaść y 30 kony ukraść od Haydamakow...”(盖达马克得以来犯,盗走三十匹战马……)^①。一年之后的1715年4月9日和15日,有位叫别尔纳托维奇的军官从伊万科沃小镇同样给这位谢尼亚夫斯基分别两次去函汇报说“...poslal przytym trzech Haydamakow...”(言及他将抓获的三个扎波罗热“猎获者”押送至盖特曼之处的事)。这两封信函主要涉及扎波罗热团伙(即盖达马克队伍)在他们的阿塔曼格罗夫科、格列宾丘克和马斯拉克带领下如何侵犯乌克兰第聂伯右岸的波兰地区,如何抢劫克里米亚鞑靼人(其中格罗夫科团伙还抢劫了前往俄罗斯找舍列梅捷沃元帅的汗王使节)等^②。那个时期,扎波罗热哥萨克对波兰边境侵犯具有常规性特点,且往往是精心策划,采用偷袭战术,以至于1720年初,驻土耳其波兰公使向奥古斯特国王建议沿德涅斯特河往波兰边境派遣一些经验丰富的警官,以期能根除“kup exorbitantow”(犯罪团伙)。按他

① 波兰克拉科夫恰尔托雷斯基图书馆,第5769号手稿,第33页及其背面、37页。

② 波兰克拉科夫恰尔托雷斯基图书馆,第5762号手稿,第205-207页、209-210页。





的说法,这主要是别让“边境上一些阴燃的火星引发大火”(引自1720年1月13日雅西城波兰公使致奥古斯特国王密函)^①。

边境线上的冲突使得波兰、土耳其以及俄罗斯三国之间的外交联络频繁起来。显然,三方函件交流带来的结果是,突厥语中表示“抢劫/打劫”行为的动词“盖达马克”与同样源自突厥语,且早已进入乌克兰语、波兰语、俄语以及其他语言中的名词“哥萨克”一词意思逐渐相近起来,并且,“盖达马克”在这些语言的日常生活用语中整体上被用来界定边境劫掠行为。这种解释完全站得住脚,因为就扎波罗热哥萨克侵袭波兰领土,抢劫财物和抓捕奴隶(即雅西人)等事情,波兰与土耳其之间的外交往来函件材料中有明确记载。如1720年,土耳其驻布扎克城总司令给波兰皇家大盖特曼的信件中,除去其他事务还提到哥萨克“...*haidamak raifasi negione raji olduklari...*”(土耳其语,拉丁文转写,意为:对农民实施了抢劫)^②。

“盖达马克”这一术语及其派生词,比如“从事盖达马克活动”等,在它们刚开始出现期间——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并没有整体上用于称谓乌克兰右岸地区的反抗波兰统治的斗争行为,而仅仅是指扎波罗热哥萨克在波兰境内的抢劫性侵袭活动。此外,当地乌克兰人对这种行为也持否定态度。例如,前文提到的那位别尔纳托维奇军官于1715年4月15日在给谢尼亚夫斯基的信函中报告抓住几个扎波罗热哥萨克士兵。他写道:“这三个土匪中一人因遭严重殴打致死。这三人并非是我们的人抓获

① 波兰克拉科夫恰尔托雷斯基图书馆,第495号手稿,第279-280页。

② 波兰克拉科夫恰尔托雷斯基图书馆,第606-IV号手稿,第492页。

的,而是斯维拉城那边一个叫苏波托夫村的村民抓到的……如果几个村民就能将他们逮住的话,那这些哥萨克就不怎么厉害,要对付他们也不是难事。”^①

从十八世纪后半叶开始,“盖达马克”这一称谓才被波兰政府自由和最为广泛地使用。广义上看,“盖达马克”被他们用来指那些明里暗里与政府作对的人,但有一个必备前提,即要直接或间接与下游扎波罗热军有关联。这种广义上的解释还被用来指很多波兰东正教民众。事实上,“扎波罗热哥萨克”与“盖达马克”两个概念在波兰王国小贵族圈子里的认知中被视为同义词和同根词。后来,1787年至1788年期间发生的一件事更加凸显了这一点。当时,巴尔塔城的柳波米尔斯基家族的亚历山大和约瑟夫两位公爵的庄园管家、小贵族卡林达指控二十五户瓦拉几亚人(罗马尼亚人)从事盖达马克活动,于是便剥夺了这些人的财物,甚至把其中有些人卖给土耳其人当了奴隶。而指控这些人“从事盖达马克活动”的理由是基于如下事实:这些住户家的男丁曾于1775年之前在下游扎波罗热军中服过役,并且也在重建的黑海哥萨克军(自1787年起)中服过役。我们这里还是引用一份佐证文件比较好(这是一份1788年11月9日黑海哥萨克军阿塔曼扎哈尔·切别加给波将金公爵的汇报材料):“贵族卡林达先是将‘盖达马克’一词的含义加在这些人身上,然后便冠冕堂皇地对他们进行了搜刮。”^②也就是说,这清楚地表明该术语与

^① 波兰克拉科夫恰尔托雷斯基图书馆,第5762号手稿,第209-210页及210页背面。

^② 俄罗斯国家军事历史档案馆,全宗52,目录1,案卷304,第1部分,第41页。





其说有族群含义,不如说它具有社会含义。

很快,也就是在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初期,“盖达马克”一词不仅在波兰使用,俄罗斯方面也开始使用起来。因为来自克里米亚汗国境内扎波罗热哥萨克的抢劫性袭击开始在乌克兰南部和东部边区(即盖特曼区和斯洛博达区)引起恐慌。这些地区的民众恐慌情绪非常强烈,以致为了防止扎波罗热“匪帮”或曰“盖达马克”(那时的文献资料中这两个概念是当作同义词使用的)抢劫,俄国政府开始在边境修建新要塞,派俄籍乌克兰哥萨克进驻其中。在这种情况下,“盖达马克”针对驻扎在乌克兰境内俄罗斯军队的袭击并非空洞的军事行动,那些无辜的乌克兰居民点往往成了袭击受害者^①。

我们手头有不少这样的案例。其中,有最早发生在下游扎波罗热军投奔吉列汗国初年的事例,那是1711年至1713年发生的事,而且非常典型。我们来听听扎波罗热哥萨克费奥多尔·沃洛申科、雅科夫·雷瑟、阿列克谢·克拉斯诺维钦科和雅科夫·别兹鲁琴科在受审中都说些什么,这些人都是在1713年5月的一次抢劫活动中被抓获的。两年前,这伙分别来自俄罗斯边境一侧的奥廖尔、基申卡、基泰哥罗德等地的年轻人逃亡克里米亚汗国,投奔了位于阿廖什基地界上的塞契。他们在那里生活了两年左右,与其他扎波罗热哥萨克一道在第聂伯河和黑海打过鱼,参加过克里米亚汗国对北高加索的军事行动。但显然,这一切并没有带来让他们断然抛弃自己熟悉生活而为之追求的主要东

^①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9,第II分部,第4目录(第3部分),第94本,第179-181页。

西——财富！要知道，当他们像扎波罗热哥萨克抢劫者一样去劫掠时，他们去的不是异国波兰或克里米亚汗国，而是自己的“老家”，是在乌克兰打家劫舍！除渴望发财之外，很难找到一个能够说得通的理由来解释他们这种行为。自打加入盖达马克团伙后，这帮年轻人便当起了向导，领着这帮土匪在自家门口干起“打家劫舍”的勾当来，随后又开始了偷牲口，抢劫行人，抓俘贩卖。实在无法将他们这些行为看成是“民族解放斗争”，更何况，抵抗他们的还是乌克兰盖特曼领导的哥萨克^①。

扎波罗热哥萨克对乌克兰家乡实施的抢劫式侵袭，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归附克里米亚汗国的缘故。有关诺盖-鞑靼人专以抓俘转卖为奴为目的的抢劫行为对扎波罗热哥萨克抢劫特点的影响问题目前依旧研究不多。但是，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主要是来自俄国军官与盖特曼军官往来信函）显示，正是这一时期，盖特曼区和斯洛博达区抓捕“俘虏/奴隶”活动在部分扎波罗热哥萨克士兵当中盛行，他们将抓到的俘虏随后卖到克里米亚汗国。比如，有一条日期显示为1730年11月23日的消息，说的是扎波罗热哥萨克与鞑靼人团伙在塔拉诺夫卡城抓获一名波尔塔瓦哥萨克军团俘虏之事。没有人认为扎波罗热哥萨克广泛参与了此事，估计这种为人不齿的行径也只有那些社会败类才做得出来，而且做这些事也是要瞒着下游扎波罗热军军官的^②。

顺便提一下，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这就是塞契哥萨克大

①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手稿部，全宗905，目录2，案卷Q-347，第1页及其背面，2页。

② 俄罗斯国家军事历史档案馆，全宗20，目录1，案卷31，第1页、13页。





规模抢劫行为发生在他们入籍克里米亚吉列汗王在位期间。显然,土耳其克里米亚汗国统治境内奴隶贩卖活动猖獗,而且整个十八世纪一直在延续着。这种勾当犹如佳肴美味,使得扎波罗热哥萨克中一些堕落分子纷纷趋之若鹜。明显的例子是1775年之后,有部分哥萨克再次加入土耳其国籍,于是这种“土耳其籍”扎波罗热人抓俘之事依旧不时发生。例如,1780年上半年就发生三起“布特卡雷”年轻妇女被抓卖往奥恰科夫之事,并且这事发生地还不是别的什么地方,是在前扎波罗热军的军事据点——布格河加尔德城。显然,这些人贩子也在提防着随时可能被人揭发,所以他们总是试图身着土耳其服饰,并且在脸上涂上烟子,或者用黑巾罩面。即便这样,他们依旧操乌克兰口音,头上依旧是扎波罗热哥萨克特有的“一簇毛”发型。这可以理解,他们也只是在打劫熟人村庄的时候才不得已这样伪装打扮^①。

下游扎波罗热军重新入籍俄国(1734年)之后的头十年间,盖达马克队伍依旧继续越境袭击波兰腹地。1737年11月中旬发生的一件事就很能说明扎波罗热哥萨克侵扰波兰边境地区的规模和性质。当时,有一百多名在册哥萨克警察(在波兰官方服役的乌克兰哥萨克)在小贵族斯科尔热夫斯基带领下,沿俄波边境追击一群入境劫匪。他们追上这帮人后才弄明白,原来这群土匪已经与另外一支扎波罗热哥萨克劫匪队伍会合。这两拨人在数量上远超波兰警察,以至于后者无法与之对抗。这支警察队

^① 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90,目录90/1,案卷882,第1页及其背面、11页及其背面。

伍被勒令下马,抛弃马匹站到一旁,然后便遭到长枪短炮一通乱射,最后仅有几个人侥幸逃生,跑回去报告所发生之事。这群盖达马克匪帮人数达五百人之众,他们继续在列季切夫镇(现今文尼察州境内)附近游荡,抢劫周边居民^①。

这些扎波罗热哥萨克不仅只是简单地大规模组队入侵波兰那么简单,他们还在其境内建立季节性营地,并



第聂伯河畔盖达马克营地

且有时候营地防护还极为牢固。比如,1743年,有一支近三百人的扎波罗热哥萨克队伍驻扎在维德缅多夫卡村河滩的桦树林岛上,该岛位于佳斯明河上(第聂伯右岸的一条支流),他们就是从这个岛出发,四处进行抢劫的。这一带的波兰兵力不足,无法将他们从这个岛屿上清除。整个夏季,俄国与波兰的外交部门就此事不断进行沟通,但是没有取得什么实际效果,哥萨克依旧盘踞在那里。而随着冬季的到来,哥萨克士兵便主动放弃了那个岛屿,临走之前,将防御工事毁坏殆尽^②。

新塞契时期(1734年至1775年),由于哥萨克在战争中受俄军军官指挥,因此必须与俄军联合行动,这使得他们事实上无法

^① 波兰克拉科夫恰尔托雷斯基图书馆,第2886号手稿,第189页。

^②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248,目录126,案卷2596,第1-8页。





重操旧业,断绝了捞取“哥萨克面包”的机会(哥萨克人对自己抢夺来的牲畜、钱财、物品等的戏称)。当然,这种情况下他们却依旧有可能参加对土耳其军队大后方进行精心策划的破坏活动,这样也能获取丰厚的战利品,顺便个人也可捞取一点好处。比如,1739年6月22日至26日期间,由扎波罗热哥萨克与盖特曼哥萨克组成的一支千人队伍按照俄军指挥官的命令,在卡普尼斯特上校带领下对摩尔多瓦公国的索洛卡城进行了袭击,抢到数千马匹、一大群牲口、一大群羊,还搜刮到不少红酒、粮食、武器、毛皮以及大量的贵重物品。然而,同样是这支哥萨克队伍,当他们自作主张跑到相邻的波兰境内“抢劫犹太人”之后,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凡参与波兰抢劫的扎波罗热哥萨克均受到肉刑惩罚,领头者被处以了绞刑”(1739年8月11日,由冯·米尼赫元帅指挥部负责的《时事录》杂志就此进行了记载)^①。

对盖达马克而言,抢劫行动在和平时期不是最好选择,因为自从俄国再次与土耳其签订和约(1739年)之后,扎波罗热哥萨克前往土耳其边境“打猎”行为便被俄政府一律视为“勒索、偷盗和抢劫”,而一般意义上便被理解为“从事盖达马克活动”。这方面最能体现俄政府态度的是女皇叶卡捷琳娜·彼得罗芙娜。她分别于1746年4月14日和1747年2月3日以及4月8日给下游扎波罗热军颁发三道谕旨,要求扎波罗热人停止侵犯土耳其-克里米亚汗国以及波兰领土,要求科什更加积极加大打击盖达马克力度。在这种情形下,所谓“从事盖达马克活动”指的不仅是

^①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手稿部,全宗1000,目录2,案卷874,第2-3页、24页。

对波兰统治下的乌克兰地区(即第聂伯河右岸地区)发动侵袭行为,还指抢劫鞑靼人行为。这点可以从女皇给下游扎波罗热军的训令中看出来^①:前往土耳其要斯文,只凭护照,不携带枪支,这样谁都不敢装扮成扎波罗热哥萨克并以他们的名义从事盖达马克犯罪活动。

还需要指出的是,在扎波罗热本地进行抢劫也属于“从事盖达马克活动”范畴。例如,1771年初,一位25岁的扎波罗热人米哈伊尔·别列热诺伊(沃夫卡),就是因为“九次在扎波罗热窝冬村偷盗马匹、牲畜和其他家产而被判发往西伯利亚终身劳役”^②。

科什当局、俄罗斯和波兰两国交界省份的军事和民事部门、俄土边境冲突联合调查委员会等机构和部门都对盖达马克犯罪行为进行过司法调查,留下大量有关盖达马克个人的履历档案。这些资料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对大量实际材料进行总结,也有利于做出一定的分析性结论。

把从事盖达马克活动制度化视为一种现象,确切地说,把它当作由草原边境地区传统的“猎获”行为外溢成一个全新阶段的过程来研究,这种情况下必须意识到发生这种过程的根源不仅只在于扎波罗热哥萨克对打家劫舍活动过度的兴趣,对这种根源的追寻还应当从当时的现实生活中去寻求。那时,生活常常使得成百上千的男子把“走上人生大道”(俄语中的一个熟语,意指某人去做强盗)视为生活中唯一能成就一番事业的机会。

每一个加入盖达马克匪帮的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经历。不

① 俄罗斯国家军事历史档案馆,全宗52,目录1,案卷1,第2部分,第55页、62页、64-66页及66页背面。

②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248,目录115,案卷16,第5页。





过,成为盖达马克的深层心理动机无疑是同样的或非常相似的。这其中,我们首先要指出的是他们内在的心理失衡问题。这种失衡首先是由于他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突遭变故而引起,是由于对现实和想象中造成这种失衡的根源充满消极情绪累积而造成。其次,便是根植于那个时代中的哥萨克和农民对自身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普遍不满的心理。除去这种不满心理,再就是他们与最初使自己社会化的那个环境之间缺乏牢固的亲情或社会联系,而亲人的离世与缺少组建家庭的条件或愿望则是导致社会联系断裂的原因。

有必要用具体事例来向读者展示我们结论的正确性。这方面比较有意思的是一份土耳其扎波罗热哥萨克(即“布特卡雷”)尼基福尔·卡拉古利的受审记录。他于1784年5月10日被俄方抓获并被押往波将金那里受审。此人生活经历颇为典型:1734年出生于克列别尔德城波尔塔瓦团的一个哥萨克家庭,父母离世之后,这位年仅二十岁的年轻哥萨克便来到扎波罗热。在那他打过鱼,贩卖过食盐和鲜鱼(也就是当过“丘马克”)。1768年至1774年俄土战争期间,他在扎波罗热哥萨克水军服役,参加过第聂伯河、多瑙河和黑海等地的战斗。那时他就已经积攒了一笔钱财——显然来自缴获的战利品。塞契覆灭之后(1775年),他用这笔钱在英古尔河畔(现今乌克兰尼古拉耶夫州)买了一处住宅,家里养了一批牲口,雇有帮工。总之,他成了一位健壮富裕的地主。但好景不长,六年之后,这位卡拉古利突然变卖了全部家当,开始酗起酒来(生活主基调的巨变原因没有交代)。当他的钱财耗光之后,他就跑到土耳其那边,投奔了阿塔曼贾恭的

盖达马克团伙,这支队伍驻扎在季利古尔河口(现今尼古拉耶夫州和敖德萨州边境地带)。从那里这位卡拉古利伙同其他盖达马克经常跑到波兰和俄罗斯边境地区进行抢劫,直到1784年春被俄国边防哨兵抓获^①。

我们简要叙说了尼基福尔·卡拉古利的生活经历。鉴于他五十岁的年龄,我们认为这算是一个特例。正如在司法调查资料中所看到的,整个十八世纪盖达马克团伙中绝大多数人的平均年龄在二十至三十岁上下^②,按社会构成,主要是扎波罗热贫困之人。这些人除在捕鱼场帮忙或给窝冬村富裕哥萨克当帮工外,也不介意采取更为便捷的手段获取钱财^③。这些扎波罗热盖达马克分子中不乏平时喜爱寻求刺激之人。他们这种天性即便是透过冷冰冰的判词也以看出来——判词中除一些常见的抢劫外,还有使用假证件和假姓名来实施犯罪行为的。比如,哥萨克菲利普·卡涅夫茨(他自称约瑟夫·普利布卢达),此人与同伙在扎波罗热和新俄罗斯省境内进行偷盗和抢劫,逢人(包括受害者)一会儿自称扎波罗热哥萨克上校,一会儿谎称自己是哥萨克普里卢茨团百人长,有时还冒充“亚美尼亚骑兵连中尉”^④。他的犯罪五花八门,令人惊讶,以致在扎波罗热新塞契科什档案中关

① 俄罗斯国家军事历史档案馆,全宗52,目录1,案卷315,第1部分,第34-35页及35页背面。

②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16,目录1,案卷797,第3-a部分,第29-31页,86-106页;全宗248,目录115,案卷16,第2-4页、7页。

③ 俄罗斯国家军事历史档案馆,全宗52,目录1,案卷315,第2部分,第82页及其背面。

④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16,目录1,案卷797,第3-a部分,第104页。





于他的司法调查记录保留了整整两大卷,其中详细记载了他在1773年至1775年期间的“业绩”^①。

那些直接参与盖达马克活动的人是如何看待自身行为的呢?这个问题我们不仅可以从当时司法调查材料中获得答案,还可以通过对流传至今的有关盖达马克的民间文学作品研究来弄清楚。后者有代表性的是“狱中盖达马克刽子手之歌”。这首歌是著名的扎波罗热哥萨克和盖达马克运动史学家斯卡利科夫斯基写于十九世纪中期。其主题完全是那种“当红”类型:一位年轻的扎波罗热盖达马克去波兰境内“溜达”,被人逮住并投进大牢(显然,这指的是波兰大牢,因为他本人估计自己很快就会面临残酷的死刑,而俄国人一般都不这样对待盖达马克)。在牢里,他回顾自己短暂的人生经历,满怀惆怅——“当够了哥萨克,享够了鸟儿般的野外自由生活”。也即是说,此处的“当盖达马克”与“当哥萨克”这个两个词完全同义、近似。“当哥萨克”本质上完全不合法,是犯罪,这种观念即便是对盖达马克来说也不是秘密,因为接下来他做了一个总结,在我们看来,这是 he 对自己的行为进行的道德评价,或者说是对自己进行的宣判,“自己是祸根,活该这样死去”^②。

没有人怀疑这样一个事实,即对周边邻居,如波兰人、土耳其人以及鞑靼人所实施的大部分抢劫行为是由那些不受科什领导的扎波罗热人员所为。大量“外来打工”团伙(临时雇佣工人)

^① 基辅乌克兰国家中央历史档案馆,全宗229,目录1,第329页、331页。

^② 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历史研究所,全宗200,目录2,案卷188,第13页背页。

来到克里米亚汗国,进入盐场或其他手工作坊劳动,他们毫无顾忌,不时干一些盗掠勾当。这些人当中弥漫着一种浓烈的反社会气息,而这又助长了劫掠行为^①。盖达马克活动中所包含的纯粹抢劫意图在民间文学作品中有着明显表露。如,另外一首关于盖达马克的歌曲(同样出自斯卡利科夫斯基之手),内容是关于两千名“布尔拉克”在南布格河和第聂伯河扎波罗热捕鱼场干活场景。歌中唱出他们的心声——“我们已厌倦捕鱼,还是去折腾犹太人和波兰人吧”。其中,“布尔拉克”“塞洛马”“盖达马克”等词语无论是作者的使用,还是读者的理解,它们都是同义的^②。

在塞契,这类贫困哥萨克不仅令波兰人与鞑靼人“头疼”,而且也让下游扎波罗热军领导感到束手无策。尽管如此,在一定的情形之下,他们却往往被后者利用,去从事那些富裕哥萨克不愿做的各类“脏活”。在打击“塞洛马”盖达马克的同时,哥萨克军官往往出于一己贪念,自己又充当起盖达马克匪帮的组织者。例如,1750年10月末,哈尔科夫团哥萨克弗拉斯·季塔连科从塞契返回途中,在乌克兰防线的行政中心——别列夫要塞(现今的哈尔科夫州境内)讲述了一桩“言行”之事(此处的“言行”是一个术语,指的是知晓某人犯罪情况)。据他说,他在库林阿塔曼格里戈里·洛布利位于巴扎夫鲁克河畔的窝冬村里待过。在一次酒会上,他听人说前科什阿塔曼瓦西里·瑟奇伙同前波兰霍维茨克库林阿塔曼佩列德利允许扎波罗热哥萨克,尤其是其中的穷

①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23,目录123/1,1744,案卷2,第6页背面。

② 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历史研究所,全宗200,目录2,案卷188,第11页。





困者武装前往黑森林,从那里进入波兰人控制的乌克兰地区进行抢劫,而抢来的东西有一部分便落到这两位阿塔曼手中^①。

现在知道的还有好多起穷苦哥萨克在上层领导默许之下成群结队前往鞑靼草原,成百上千地抢劫马匹之事。但事后往往是:在越过土俄边境之际,或者干脆就在塞契营地,他们便将这些参与抢劫的盖达马克抓起来直接处死(一般都是绞杀),毫不拖延。如此一来,这些已成为多余的抢劫见证者和参与者便被清除,而那些抢来的马匹则被赶往俄国内地卖掉,或者干脆卖给军官所拥有的窝冬村。那些著名的扎波罗热哥萨克富裕军官,诸如彼得·卡尔内舍夫斯基、尼古拉·卡萨普、伊万·戈洛巴、伊万·丘古耶维茨以及瓦西里·比什米奇等人就是以这种方式攫取到自己庞大家产中的第一笔财富的^②。当然,尽管并非常见,俄帝国政府有些时候也会对那些参与组织盖达马克抢劫活动的哥萨克军官进行刑事案件调查。比如,1751年,一位叫阿列克谢·利亚赫的库林阿塔曼和事务官孔德拉特·别达就被判处死刑,后改判为终身流放^③。而在1756年初,布格河加尔德城上校塔兰的类似行动被制止,因为他被发现身上带有赃物:他派出的一队盖达马克抢劫团伙中有几人被抓,在他们身上发现有从新塞尔维

①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248,目录113,案卷793,第78页及其背面、79页。

②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13,目录1,案卷78,第13页、16页背面。

③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248,目录126,案卷2659,第26页。

亚中尉康斯坦丁诺夫那里抢来的财物^①。

扎波罗热地区最高当局，也就是其总部——科什——也会积极利用这些盖达马克来实施更为重大的行动。比如，用于索要被移民擅自建立居民点而占据的哥萨克军土地，这指的是1760年至1770年期间扎波罗热哥萨克“突袭”新俄罗斯省居民点之事。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塞契被摧毁之后的1775年至1776年期间，俄国新的地方当局开始调查一件十年前的案件。当时，一支由二百五十人组成的扎波罗热哥萨克队伍在格列赫、帕拉里奇、库里克和加拉杰等指挥官带领下袭击了位于乌克兰防线区域内阿列克谢耶夫要塞附近地区，抢劫了当地居民，还杀死两人。起初，科什策划这个行动只是准备驱逐那些在下游扎波罗热军地盘上居住的非扎波罗热哥萨克人，但事态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便脱离了负责此次行动的指挥官们的掌控，贫穷哥萨克的人数远超指挥官人数，导致前者不服从指挥，引发殴斗。那些被指控的军官们亲身经历了这场殴斗，“这场致人伤亡的殴斗主要由一帮流浪汉挑起，他们谁也不听，不服从命令，执意抢劫，最后谁也控制不住他们”。而这帮人的处罚却来得相当轻——有三人被发配到别尔哥罗德省东正教寺院“服劳役”（做祈祷）来赎罪，而加拉杰上校的辩词也有利于说明一点，即哥萨克军官完全无辜，因为他们指挥不动那些有劫掠意愿的“塞洛马”，不得不被这些人牵着鼻子走^②。

①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248，目录113，案卷1579，第691页。

② 第聂伯Д.亚沃尔尼茨基国家历史博物馆，第7457件收藏品//档案编号14740，第245-246页及246页背面。





与此同时,如果只是把扎波罗热盖达马克运动仅理解成一种因底层哥萨克纯粹的抢劫行为而产生的现象,那就搞错了对象。这是一群不仅仅只会在波兰统治下的乌克兰地区劫掠诺盖人村庄和贵族庄园,然后在醉生梦死中挥霍完赃物的流氓,作为塞契社群内部一个“帮派”,无疑,盖达马克不仅拥有直接的信众,而且也有自己的精神领袖,其中包括库林军官和哥萨克军官等一众指挥官,还有享有威望的“大爷”,即一群受人敬重的哥萨克长者。正是这个群体,在盖达马克运动发展到中期时,鼓励重返克里米亚汗国,提倡在汗王治下成立扎波罗热哥萨克非传统军事组织,或者说他们根本就是想建立一个与哥萨克塞契并行的“盖达马克式”塞契组织。那个时期的盖达马克活动形式——袭击和逃避追捕——实际上仅仅是该社会现象可见的明面部分,并且这个明面部分群体由底层盖达马克构成。而这项运动的真正引领者,即那些对俄国政府有对立情绪且拥有权势的那部分哥萨克则处在暗处。这些人才是暴动和起事的组织者,他们对抗效忠沙俄帝国的扎波罗热地方政府。底层哥萨克逐渐通过泛哥萨克军选举活动(即拉达议会选举)将这部分人选进塞契领导高层,这为“塞洛马”参加对土耳其和波兰抢劫而不被追究责任提供了保障。

科什对待盖达马克的姑息态度在新塞契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特定期间还有着另外一种解释。塞契贫穷士兵对军队管理部门执行的调和主义政策,包括对待按沙俄政府要求来迫害盖达马克这一做法感到不满,这种不满情绪随时都有可能演变成严重骚乱。1756年6月,塞契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当时,哥萨克军

官决定对那些带头胡作非为的盖达马克实施例行惩罚,这诱发了塞契军营里的又一次暴动,导致处罚未能实施,因为这种传统的境外抢劫行为在塞契各阶层中有众多参与者。1757年9月,罗斯科皮茨城附近军营里的波兰军事法庭就盖达马克活动在扎波罗热哥萨克中的波及范围开列了一份“名册”并将其发给了俄国枢密院。这份名册颇能说明问题,它共有七页,上面写满四百七十四位扎波罗热哥萨克的姓名以及具体来自哪个塞契库林等详细信息。这份名册所依据的材料是由那些在波控乌克兰地区内被抓获的扎波罗热盖达马克受审时所提供。被指控从事盖达马克活动的哥萨克每个库林平均有十到十二人,占塞契士兵总数的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六。调查同时还发现,这种现象在库林中波及的程度不同:有的库林有一至两名哥萨克参与(例如什库林库林和乌曼库林),而有的库林参与者则多达二十九至三十名哥萨克(如瓦休林库林和基里亚科夫库林)。据这份名册记载,1757年春,前往波兰进行抢劫的塞契库林哥萨克数量如下:

维德麦迪夫库林十四人,卡涅夫库林二十四人,波波维奇库林十三人,季莫舍夫库林八人,吉列耶夫库林十三人,列乌什科夫库林十九人,普拉斯图诺夫库林十五人,聂扎马伊夫库林六人,乌曼库林两人,佩列亚斯拉夫库林七人,库谢夫库林十四人,谢尔盖耶夫库林五人,克列涅夫库林八人,吉亚济科夫库林六人,普拉特捏罗夫库林二十人,克雷洛夫库林十五人,谢尔宾诺夫库林七人,梅沙斯托夫库林九人,顿斯基库林七人,捷列维扬科夫库林一人,季拉列夫库林五人,巴图林库林四人,科涅罗夫库林十五人,基斯利亚科夫库林三十三人,斯杰布列夫库林十一





人,卡尔尼波洛兹库林七人,什库林库林一人,瓦休林库林二十九人,维利奇科夫库林十四人,伊尔克列耶夫库林十八人,罗戈夫库林十人,伊万诺夫库林十三人,帕什科夫库林六人,明斯库林六人,波留霍维茨克库林十人,克尔松库林十三人。另外,单独开列出“大卢戈那帮坏小子”(即一群居住在第聂伯河河滩的年轻哥萨克见习生)九人,还有柯达克军事据点里的居民五人,罗曼库林一人,和卡门卡库林四人。此外,还有五十一名身份不明的哥萨克,无法确定来自哪个库林^①。

盖达马克天暖时节活动频繁,寒冬时节则偃旗息鼓,具有明显季节性特征。不过,在什么地方过冬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说却非常重要。曾出现过这种情况:1756年的2月,有支五十人的扎波罗热盖达马克队伍由于无法忍受糟糕的栖身环境,加之饥饿难耐,于走投无路之际,便投奔塞契,请求宽恕罪过^②。正如一些文献所记载,盖达马克都建有自己“地下巢穴”,但在这样的寒冷天气里,这些地方未必能够给他们提供庇护,因为那也就是简单找一个隐秘的地方挖一个地窖当作基地和庇护所,仅可作为夏季落脚点,冬季便停止使用直到来年夏季^③。

盖达马克团伙往往是根据情势需要而随机形成的,他们中的每位都得为自己过冬准备好落脚点:塞契库林、窝冬村、盖特

^①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248,目录113,案卷1579,第625-628页。

^②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248,目录113,案卷1579,第786-787页。

^③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248,目录113,案卷1579,第599页背面。

曼区(即乌克兰左岸地区)的村庄或城镇。这些地方均是众多“塞洛马”的庇护所,但扎波罗热窝冬村被认为是最安全的地方。这些窝冬村散落在大草原各处,较之于藏身在那些大的城镇中,他们藏身此处,被当局注意或被人揭发的可能性要小得多。他们从夏季就开始储备抢劫来的财物,其数量足以支撑到下一个春季到来,而作为房租交给窝冬村房东的份额足以保证他们有地方过冬。正因如此,窝冬村自然也就成了俄国政府和塞契机构密切关注的对象。于是,从1775年12月中旬开始,根据俄军位于新塞尔维亚居民点指挥官伊万·格列波夫少将的要求,科什组织了一支专门队伍,在几位“可靠的”哥萨克军官带领下,巡查了下游扎波罗热军地盘上所有窝冬村,以便查清并抓捕在那里过冬的无证件流浪汉。不过,此举收效甚微,原因是广大扎波罗热哥萨克民众对此举态度消极。为此,格列波夫曾经一度向枢密院进行过抱怨^①。随后政府又采取了一项附加措施,对包括房主及帮工在内的窝冬村人口进行登记造册,给窝冬村房主的每个住户发“卡”(身份证),然后规定这些人只能携卡方可离开。此外,无证件之人被严禁接纳为新住户,所有来到窝冬村的人均应被送往塞契接受甄别^②。凡给盖达马克提供住处,窝藏赃物并接受赃物馈赠的行为均被当局视为同犯,接受相应惩处。我们甚至知道有个扎波罗热盖达马克情妇因受牵连而被发配去修道

^①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248,目录113,案卷1579,第625-628页。

^②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248,目录113,案卷1579,第690页。





院终身悔过的案例^①。由于无法理解扎波罗热哥萨克人积极从事盖达马克抢劫活动的社会原因,每当“盖达马克活动季节”(也就是在天气转暖前夕)到来之初,俄边防军指挥部也只是沿袭习惯做法,在边境地区增加军队数量^②,用以纯粹的军事打压。

早在几年前,波兰方面也采用了类似措施来压制盖达马克活动。例如,1751年1月,根据波-俄边境联合委员会工作结果显示,波兰方面给包括布拉茨拉夫省在内的一些边境省(州)的民事机构和军事指挥部门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这些建议被归纳命名为《波兰边境预防塞契、加尔德及其他地区扎波罗热哥萨克侵犯条例(措施)》(以下简称《条例》)的工作细则。其中,首要措施是发布一项指令,禁止布拉茨拉夫、波多利亚和基辅等州居民前往塞契和布格河加尔德城收购盖达马克抢劫来的物品。禁止来自扎波罗热境内商贩的流动贸易,这是由于该贸易直接与盖达马克活动有关。指令规定,所有经商者,凡从扎波罗热贩运咸鱼者,只允许其在边境城镇进行出售,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进入波兰境内超过一英里的地方进行交易。因为在做生意的同时,这些商贩还能观察到那些小贵族或其他富裕家庭的殷实生活,给盖达马克充当眼线。这份指令还规定扣留所有不带证件在郊区游荡的流浪汉并移交给附近要塞指挥官处置。波控乌克兰地区村庄的村长还被要求时刻警惕,确保自己负责的居民点内任何角落均不会有流浪的东正教僧侣,因为这些人往往的确是盖达

①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16,目录1,案卷797,第89页背面、103页及其背面。

②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248,目录113,案卷846,第44页及其背面。

马克潜在的刺探情报之人。照《条例》编撰者看来,“三不管边界”存在的这一事实助长了盖达马克运动的嚣张气焰,这指的是波兰王国、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三国交界地区。盖达马克一旦越过边境进入俄国一侧,他们便立即有了充分的安全感,因为俄国边防军是不会允许波兰人越境追击的。同样,临近“三不管边界”的土耳其地区就像波军指挥官在报告中所描述的那样,时不时地被扎波罗热盖达马克团伙当作“穿堂院”使用。于是,波兰王国的最高官员请求汗王政府官员采取安全措施,阻止克里米亚盖达马克侵犯,保障波控乌克兰地区安全。波兰人也同样游说俄国政府,请求他们也能抓捕盖达马克并将这些人交给波兰方面。而根据《条例》,最有可能的措施是借盖达马克之手来消灭盖达马克。因此,所有波军军官都接到命令,要他们不急于处死那些被抓的哥萨克,而是在这些人中找自愿充当抓捕其他盖达马克的帮手(因为这些人比其他任何人都清楚盖达马克的习惯,并且他们还认识其他许多人)。这些人一经雇佣,便宣誓效忠,此后便被任命为波兰各要塞和边境哨所哥萨克小分队指挥官^①。

关于波控乌克兰地区哥萨克需要再单独说几句。1713年,这一地区再度易手,被俄罗斯归还给波兰。波兰政府企图消除潜在反波兰运动的社会基础,于是便打压起哥萨克来,强行将他们变为农民,将他们分配给封建主。这种情况使得大批哥萨克携家带口迁往俄国,有的被卷入盖达马克运动中。及至十八世

^① 华沙古代主要文书档案馆,拉齐维乌家族大档案全宗,第II分部,第46本,第345-349页。





纪五十年代,那些依然留在第聂伯河右岸地区的哥萨克纷纷加入大地主私人武装中,充当起民兵来。面对这种形势,波兰有钱人政府对该地区乌克兰哥萨克人处境有着清醒认识,这使得他们确信,哥萨克群体的衰落对盖达马克活动有直接影响。1751年初,皇家盖特曼(波兰王国军队总司令)严令奇吉林城官员不得将那里的城市哥萨克转籍为农民。盖特曼明确指出:“随着哥萨克群体被取消,即将消亡的不仅是奇吉林城,还有这个地区,因为奇吉林的衰落将直接打开哥萨克通往盗窃之路,亦即通往盖达马克活动之路。”但在一些波兰官员看来,保留波控乌克兰地区哥萨克权利的前提条件是这些人需要参与边境防御行动。于是,政府考虑专门下达一项命令,要求哥萨克承担这种兵役,并利用这些队伍来加强危险地段的防务工作。关于边境前哨防务事宜,波兰政府计划不仅要吸引居住在边境各城镇的哥萨克参与,还要吸引第聂伯河右岸地区腹地诸城,比如科松、白采尔科维、奇吉林、切尔卡什、斯麦拉、博古斯拉夫等城的哥萨克参与。波兰边防状况令人不满的一个原因是缺乏充足的财政资助:早在1736年,宪法就规定给那些将在基辅州边境地区服役的军官们发养老金,可惜,这笔钱即便在二十年后也没有兑现。因此,几乎无人愿意将自己的人生献给边防事业也就不足为奇了^①。

1750年末几乎是新塞契史上盖达马克活动大爆发期,为了对这种氛围有一个整体认识,我们有必要了解(左岸乌克兰)哥

^① 华沙古代主要文书档案馆,拉齐维乌家族大档案全宗,第II分部,第46本,第347页、349页。

萨克鲁本斯基团的两位俄国侦察兵——文书尼基塔·格里戈洛维奇和“哥萨克军战友”米哈伊尔·拉扎列维奇提供的情报。那年10月的最后几天,他们去了乌曼、拉德任、布拉茨拉夫、文尼察、亚诺夫、亚马、索科洛维奇以及其他诸多波控乌克兰城市,目睹了这些地方当局是如何采取严厉手段打击来自俄国境内的盖达马克队伍的。在一些大型居民点分别驻扎着三百至七百人规模不等的大封建主私人哥萨克民兵组织。而在边境区,追捕盖达马克之事则由利普卡尼人部队负责(利普卡尼人,或利普卡人,即波兰鞑靼人),因为这



波兰人绞杀扎波罗热哥萨克

些人被认为最擅长干此类事。总的来说,剿灭盖达马克手段残忍。比如,布拉茨拉夫省总督,由于盖达马克杀死了他的两位弟兄而十分震怒,于是便在索科洛维奇镇自家庄园靠近郊区的地方设置了“审判场”。在那片森林大空地上,他们沿道路竖起一排排绞架,埋好一根根木桩,然后用它们将数百名扎波罗热哥萨克悉数绞杀,有时甚至还将那些被怀疑同情盖达马克的当地居





民也予以绞杀^①。

波兰政府认为，盖达马克运动壮大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在边境实行严格的护照管控措施。于是，1752年初，皇家盖特曼布拉尼茨基向俄国驻华沙使馆发去一份照会，要求对方向所有俄罗斯帝国公民发布一份通告，告知他们过境必需持护照，否则，波兰边境指挥官保留对这类过境人员采取惩罚措施的权利。而对扎波罗热哥萨克所采取的措施尤其严格，他们一旦被拘留，即便是缺少参与盖达马克活动的证据，往往也会被处以死刑^②。

1752年4月6日，俄罗斯政府枢密院颁布例行决议，旨在约束盖达马克运动规模。根据这份决议，凡参与过对波控乌克兰地区人员袭击的人均被抓捕，首先要当着波兰专员的面被惩罚，随后要被流放到波罗的海在建的罗格尔维克要塞终生做苦力。“惩罚”内容有鞭答、烫烙、鼻刑等^③。

由于从塞契出发从事盖达马克抢劫活动的哥萨克往往是三五成群，因而这类小型队伍也就变成了俄罗斯边防军或盖特曼哥萨克队伍容易捕捉的目标。那些按程序规定笔录下来的被俘盖达马克的口供有助于揭示这些以抢劫为生的哥萨克团伙内部社会关系的大体情况，解析出他们的行为动因。现在我们就用具体的事例来说明这点。1750年10月14日，在诺沃米尔哥罗德

①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248，目录113，案卷846，第20—22页及第22页背面。

②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248，目录113，案卷1069，第1页、2—5页及第5页背面。

③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248，目录113，案卷1069，第1页及其背面、7—8页及第8页背面。

城附近十俄里(十五公里)处的“塞契路”(即由波兰边境通往塞契的道路)上,米隆诺夫上校的队伍抓获了四名盖达马克步兵,当时,这几个人正在前往“打劫”途中。这四位分别是:马特维·奥别尔塔斯、特罗菲姆·卢缅琴科、拉夫林基·克利缅科和巴维尔·古博琴科。他们均来自扎波罗热,虽同为哥萨克,但遭遇各不相同。他们背井离乡,来到塞契,成为库林一员,然后又锒铛入狱,这期间经历了怎样的人生之路?他们为何放弃习以为常的捕鱼或商贩生活聚到一起?对他们每个人的经历进行比较分析是可以弄清楚这些问题的。我们依据这几位在克留科夫城监牢中留下的口供来逐一分析他们各自的人生轨迹。

第一位提供口供的盖达马克是马特维·奥别尔塔斯,丹尼尔之子,时年三十二岁。1718年出生于哈尔科夫哥萨克团的一个叫杰尔加奇的村庄,直到1740年他父亲去世时他都一直住在该村(童年丧母)。其父亲去世之后他便去了塞契,在涅扎马耶夫库林落脚,给哥萨克瓦西里·波罗达夫卡当雇工。两年后(1742年)改做商贩生意,去克里米亚贩盐,一干就是六年,直到1748年。再后来,在亚速海沙嘴捕了两年鱼。1750年7月末,由于身处塞契营地,于是便参加了一个哥萨克七人团伙,准备去波控乌克兰地区进行抢劫活动。自此,他便告别了那种波澜不惊的平静生活。他们就这样干起这种营生……在乌曼地区一个叫切切尔尼克的小地方,他们每人偷了一匹马,结果被哥萨克警察发觉,遭到追捕。在抓捕中,团伙首领格里戈里·科列别尔江涅茨和另外两个哥萨克被打死,其余人越境逃入俄国。奥别尔塔斯便自己当起头儿,带着剩余的三位哥萨克弟兄去了布格河加尔





德城。他们在那儿把马匹卖了,开始“游荡起来”。对奥别尔塔斯来说,第一次经历这种事还算是顺利,他便决定再当一次向导。于是他说服了另外五位哥萨克跟他一起干。但当奥别尔塔斯带着这伙人走到诺沃米尔哥罗德时,他又遇到了另外一支扎波罗热盖达马克团伙,但这可不是他那支七拼八凑的杂牌队伍,这是一支装备精良的三十人哥萨克队伍。他们还主动建议这几位“步下战士”入伙,甚至还给他们每人发了一匹战马,就这样,奥别尔塔斯带着朋友跟着这帮人越过边境。在距离边境不远的—一个叫杰列平的村子里,这些盖达马克抢夺了两百头牲口,将它们赶入俄国境内的诺沃米尔哥罗德。但这回,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分赃便被一支由三百人组成的盖特曼哥萨克队伍堵住并被抓捕。奥别尔塔斯同五名“自家”哥萨克弟兄觉得他们“已替那帮人干完活了”,于是未经分配,他们便每人各带一匹马作为战利品溜走。随后又来到了布格河加尔德城。接下来他们又是老一套:卖马,去酒馆喝酒,钱一花光,就需要再外出抢劫。这次,奥别尔塔斯鼓动了前文提到的三个哥萨克同他一道外出,然后他们便是轻车熟路,直奔目的地。不过,当他们刚渡过维西河,天就下起了雪。因担心没有马匹,会很容易被捉住,于是奥别尔塔斯便带着同伙掉头返回了俄国境内。渡河时他们弄潮了衣物,于是便生起一堆火烤起来,但也因此被俄国龙骑兵发觉。接下来就是我们上文所知晓的结果:被抓获,坐牢,受审^①。

第二位受审的是特罗菲姆·卢缅琴科,其父为罗季奥诺夫。

^①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248,目录113,案卷846,第7页及其背面。

1720年出生,时年三十岁,居住在佩列亚斯拉夫哥萨克团防区里的加利奇镇。早年丧母,父亲在村里给人当雇工,他跟着帮忙。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卢缅琴科二十岁那年。1740年,他离开卢宾团防区的利特文诺夫村来到扎波罗热。在塞契军营里的两年期间(1740年至1742年),他落脚于什库林库林,受雇于哥萨克瓦西里·科利亚达。随后的八年里(即1742年至1750年),他给别的哥萨克捕鱼,作为回报,自己能得到一半的收获。1750年8月末,他在加尔德城遇上奥别尔塔斯,在后者的“怂恿”下去“搞点钱”,但“运气”不好,第一次抢劫就成了最后一次:还没有来得及抢什么财物,就被俄边防军抓获,成了阶下囚^①。

根据拉夫林基·克利缅科的交代材料,他的遭遇与卢缅琴科类似。他1730年出生于米尔哥罗德哥萨克团防区里的费得罗夫卡村,并在那里一直生活到1744年。父亲去世后便来到了塞契,在涅扎马耶夫库林落脚,给不同的哥萨克帮工打鱼,自己拿一半作为酬劳(1744年至1747年)。后来又在克列涅夫库林当了三年(1748年至1750年)雇佣军(为了领一份军饷才顶替了另外一位哥萨克)。1750年春,他去了英古尔河的伊沃夫甸子里的一家渔场打工并在那里落下脚来。同年8月,在奥别尔塔斯招募抢劫人手时入伙。谁料想,还没来得及去波控地区“作案”便被抓获^②。

同样,在从事盖达马克活动方面,巴维尔·古博琴科——安德烈之子,也是一位新手,被抓时三十岁。1720年出身于哥萨克

^①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248,目录113,案卷846,第7页背面、8页。

^②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248,目录113,案卷846,第8页背面、9页。





卢宾团防区里的罗姆纳赫城,在那里一直生活到1738年。他满十八岁那年,就跟随扎波罗热哥萨克伊万·特里古布去了塞契。跟着后者在罗高夫库林生活了一年之后便转到了谢尔盖耶夫库林,为了“结伴”(入伙),他与哥萨克住在一起。一连六年(1740年至1746年)他在布格河与第聂伯河交界处的利曼水域打鱼。再后来,他干起了商贩营生,这一干就是四年(1746年至1750年)。1750年春,来到英古尔河继续打鱼,同年8月,成为马特维·奥别尔塔斯抢劫团伙一员,以致给自己招来牢狱之灾^①。

由此可见,尽管以奥别尔塔斯为首的盖达马克团伙分子,出身不同,但四人的遭遇在很大程度上却类似:他们或出生哥萨克,或出生农民,且都来自盖特曼区和斯洛博达区的社会底层。他们青少年时期都是在家庭不完整,甚至完全缺失父母关爱的情况下完成社会化过程的。他们在扎波罗热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也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因而他们四人都把从事盖达马克活动看成是冲破自己闭塞生活环境的一种机会。

盖达马克著名首领马尔科·马迈的个人生平资料使得我们有机会一探盖达马克运动的幕后情况。这种活动并非由像马特维·奥别尔塔斯那样“业余”盖达马克团伙所主导,而是一场在哥萨克军官指使下,由大规模扎波罗热劫掠者所组成的真正军队参与的行动。“基辅省办公厅整理出一个绰号为马迈的窃贼和盗寇的审讯材料摘要(一桩刑事案件简介)。此人由地方部队监

^①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248,目录113,案卷846,第9页及其背面。

管,在扎波罗热塞契受审。”^①我们对此人生平尤为感兴趣,主要是因为在南布格河下游的俄国、波兰以及克里米亚汗国(实为奥斯曼土耳其控制)交界的“三不管”处,那里的民俗文化传统不仅把一些地名与他的名字关联起来,还一直努力不懈地使人把十八世纪中期以来以“马迈”之名闻名于世的哥萨克班杜拉琴手民间形象专门与他的面孔紧紧联想在一起^②。

这个具有传奇色彩的马迈(格里戈里耶夫之子),1710年出生于奇吉林城,之后住到哥萨克米尔哥罗德团下面的波托基分队小镇,并在那里长大。十九岁那年他结婚成家,但很快便撇下新婚妻子,独自一人从盖特曼区跑到扎波罗热。1730年,当时的塞契还处在克里米亚汗国管辖之下,他投奔了塔塔尔卡河窝冬村的扎波罗热哥萨克克列西。再后来,当扎波罗热哥萨克回籍俄国之后,马迈便转投了另外一位居住在塞契不远处的农庄庄主卡拉夏。此时,他已成为一名真正的哥萨克,被谢尔宾诺夫库林吸纳并获得了一个外号,叫“奥格里”(俄语意为“大公马”)。那时的马迈基本是靠打猎和捕鱼为生,自觉这两个行业比其他行业好,就这样一晃便是十年。在这之后,他渡河来到对岸地区(现今的克洛皮夫尼茨基州),投奔了齐布里夫小城的自家亲叔叔伊万·库拉。他甚至想好要好好过日子,于是便找回了抛弃十五年之久的妻子,两人搬迁到乌霍夫卡村,过起日子来,后来连

^①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248,目录113,案卷1245,第3-6页及第6页背面。

^② H. 列夫钦科:盖达马克栖身之所//基辅古风,1882,第5卷,第348页。





续两年还被村民推举为村长^①。

1748年的一天,他的平静生活被打破了。那天,他的亲兄弟格里戈里来探望他,随他一道而来的还有五位扎波罗热哥萨克。他在与其中两位来自梅沙斯托夫库林的哥萨克——伊万·斯迈尔奇和亚吉姆·古尔托沃伊进行了一番密谋之后便离家出走,跑到邻村拉采沃进行抢劫,那里属于波兰控制地区。这次打劫不是很顺:他们在那些穷农户家里只搜刮到几件旧衣物,如衬衣、头巾等。返回俄国这边,斯迈尔奇和古尔托沃伊两人便将这几件破旧衣物往马迈家一丢,转身又去波兰一侧抢劫去了。打那以后,马迈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们(据说,他们在那里被抓并被处决了)^②。

这次“冒险”激活了马迈那颗躁动不安的心,再度激发出他骨子里那种亡命之徒的本性。他又一次抛下妻子和家务,来到塞契,加入被他视为亲人的谢尔宾诺夫库林兄弟当中。他来到渔场干活,试图再次尝试“找回自我”,不过并没有待多长时间——因为他既已品尝过“哥萨克面包”滋味,就再也无法忘却了。1750年春,复活节圣周一过,这位马尔科·马迈在征得库林阿塔曼费德尔塔兰许可之后,与本库林其他六位兄弟带上武器,一道“打猎”去了。这回他自己当上了阿塔曼。当他把队伍带到黑森林(指克洛皮夫尼茨基和切尔卡什州交界处的那片大森林)时,又在齐布利夫城里熟人中收纳了几位朋友加入,他的人手增

^①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248,目录113,案卷1245,第3-6页及第6页背面。

^②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248,目录113,案卷1245,第3页及其背面。

加到十四人。带着这些人，他进入了波控地区。在安德鲁索夫卡镇，这群盖达马克分子洗劫了犹太人酒馆，劫掠了不少财物。在跨越边境返回俄方一侧的途中，他们被基利洛夫卡城的哥萨克队长格里戈里·卢奇和他一帮兄弟们撞见，卢奇原本想从马迈手中夺取财物，但以马迈为首的盖达马克这帮人也不是好惹的，一番较量之后，卢奇一行只好空手悻悻而去^①。

返回俄国境内之后，这帮人进入了丘图森林（位于克洛皮夫尼茨基州境内），他们在那里扎营停了下来并进行分赃，随后就开始挥霍起来，用分到的财物跟周边村子里的人换烈酒。还是在那个林子里，马迈一帮人发现离他们不远还有另外一伙扎波罗热哥萨克，这些人由一位来自巴图林库林的哥萨克领头，名叫亚科夫·科姆雷奇克。那帮人为数可观，有五十人之多，于是马迈一伙就与这些人合到一起。他们一道越境进入波兰一侧，来到韦德麦朵沃克村。这次给他们带路的是当地康德拉特修道院的一位见习僧侣。但他们遭到了当地村民的抵抗，双方展开了枪战，战斗中有一位居民被打死，而这帮人也被迫撤退。在撤退过程中，他们抢了村民的一些牲口，其中有十头犏牛（拉车的那种大公牛），还有三十只羊。返回丘图森林先前的那块营地之后，他们用抢来的牲口和物品跟当地人换酒，又开始了一连两礼拜花天酒地的生活^②。

在休整期间，又有几十人从塞契各库林前来投奔这支科姆

^①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 248，目录 113，案卷 1245，第 3 页及其背面，第 4 页背面。

^②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 248，目录 113，案卷 1245，第 4-5 页。





雷奇克团伙,队伍一下子就壮大了起来,达九十人之多。随着新人的加入,这帮团伙又越过边境,花了四天的时间来到小城莫什纳。他们袭击了这里东仪教(希腊天主教)修道院的会馆。尽管遭到武装抵抗,但还是抢劫了一些教徒。他们在退往第聂伯河途中很快又发现了一支马队,共有五十匹马,他们自然也没有放过,顺便抢了过来。随后他们分成两拨,一拨四十人,主要是伤员,他们乘坐早已准备好的拜达克式渔船(一种大木船),从水路向塞契返回,另外一拨五十人则骑马沿着河岸返回。顺着江边来到卡兰塔耶夫卡后,两拨人马再次会合。因为那里已经是俄国边防哨卡了,俄边防哨卡指挥官在得到这帮人赠送的良马之后,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放他们过了境^①。

进入俄国境内之后,他们又赶了数十公里的路,再次来到黑森林,接下来就是按惯例分赃。正在这个当口,又有一批一百五十名来自塞契哥萨克的盗掠者赶来,领头的是伊尔克列耶夫库林阿塔曼加夫里尔·雷瑟姆。两支队伍合并到一起,他们以亚斯科维茨和特鲁什科维茨为据点,连着数次闯入波控地区大肆劫掠,夺得大批财物。但对马迈本人来说,那年的盖达马克抢劫季却中断了,因为那年8月,他被戈尔杰·波洛兹手下的扎波罗热哥萨克士兵抓获。这支队伍是被塞契派来边境专门对付这些扎波罗热盖达马克抢劫分子的^②。不过,马迈最后还是得以顺利逃脱羁押,带着自己的队伍在扎波罗热、第聂伯河对岸以及波控乌克

^①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248,目录113,案卷1245,第5页背面,6页。

^②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248,目录113,案卷1245,第6页及其背面。

兰地区等又继续“游荡”了几年。随着时光推移,他逐渐成了当地民间文学散文作品和绘画中人们最喜爱的人物形象之一。

毋庸讳言,由于盖达马克经常性的侵扰,也使得乌克兰民众苦不堪言,但应当承认,他们抢劫的主要目标是那些信仰犹太教以及天主教(包括东仪天主教)的广大民众。这些参与盖达马克劫掠活动的扎波罗热哥萨克受审时常见的判词是“因在波兰犯下抢劫和屠戮犹太人与波兰人之罪行”(引自盖特曼区和扎波罗热1751年、1752年和1755年那些戴枷发配波罗的海罗杰维克要塞做苦力的囚犯资料《苦囚册》)^①。

事实上,盖达马克选择侵害对象是有他们自己“依据”的。这种依据便是波控乌克兰境内乌克兰居民与犹太居民之间复杂的种族矛盾冲突。显然,上述地区的反犹情绪有其现实基础。自波格丹·赫梅尔尼茨基发动解放战争以来,这种情绪就一直在暗地里滋长着,且每次都选择在恰当时刻爆发。

考虑到盖达马克运动爆发的这种意识形态基础,一份日期标记为1744年的文件就显得特别有意思。这份文件的名称为“法令”——那时凡哥萨克盖特曼所签署的命令就是这样称呼的。这是其中一个盖达马克头领所签发的,抑或出自基辅省北部地区某个自封盖特曼的光杆司令之手。尽管该文件本身并没有说明该文件属于“法令”性质(显然是被工作人员归入这类档案卷宗里去的),但它却具备了“法令”所有的形式特征:风格化署名——“致立陶宛公国最光明、最显赫的官员绅士们……”成

^①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248,目录126,案卷2659,第23-26页、54-55页、80-81页、138页。





文的日期与地点同样是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盖特曼文件风格——“1744年,于车队签发”。文件末尾有一个手绘徽章,里面标注“L:S”字母。这位“伪盖特曼”身份哪怕是从他自己宣称的出身和权限方面来看都值得关注——“瓦西科·沃希罗,波格丹·赫梅尔尼茨基之孙,阿塔曼及哥萨克军大盖特曼”。这份文件的目的是号召“消灭犹太教徒(即犹太人),保护基督徒”。其中谈到了波兰东正教徒遭受来自犹太人所谓的“无法忍受的磨难和暴力”,“法令”中还包括属于那个时期的“惯用手法”,即拿犹太人双手沾满无辜者(即儿童)鲜血说事——实际上是指责犹太人的献祭仪式活动。这份“法令”的作者还提到,这些“异教徒”也曾格里舍夫卡小镇企图谋害他本人,但基督不仅保佑他逃过犹太人毒手,还通过他传达自己以“惩罚这个不洁民族”为目的的神意。这个自称盖特曼的沃希罗认为灭犹运动应当开展,并将其解释为“圣战”。他告诫大家不要抢劫波兰贵族,同时还建议不要与波兰军队发生冲突。这位“盖特曼”的传奇大军由某位“安奇普克少校”统领,前往波利索夫县到布列斯特一带执行命令。“队伍”规定除了抢夺犹太人的食物外,不准携带任何军粮^①。

不过,不值得把宗教因素绝对化。盖达马克侵害的对象中往往也有像他们自己一样信仰东正教的教徒。但这些人却属于其他族群,比如,保加利亚人、摩尔多瓦人、塞尔维亚人、俄罗斯人等。有一种观点似乎值得认同,即总体上说,即便袭击者在实施犯罪时缺乏个人动机,但排外性依然是他们选择潜在攻击目

^① 华沙古代主要文书档案馆,拉齐维乌家族大档案全宗,第II分部,案卷2659,第1页。

标的决定性要素之一。

运用于科学研究中的文献信息潜力有助于从地域截面研究十八世纪扎波罗热哥萨克抢劫活动的方方面面,尤其是有助于分析个别边境地区在盖达马克抢劫活动制度化过程中的作用与地位。所谓的“第聂伯河对岸”这一区域(现今的克洛皮夫尼茨基州)在这一过程中占有特别地位。1733年之后,该地区又一次转手,从波兰并入俄罗斯。第聂伯河对岸地区和扎波罗热地区居民无论是其生活方式还是其直系亲缘关系,他们所呈现出的类型学方面的相似性不止一次为俄国政府官员所关注。最为突出以及最为典型的特征是“与扎波罗热人没有一丝一毫的区别”,“与扎波罗热人同样从事着渔猎生活”,或是“在他们渔猎活动中扎波罗热人给予协助和参与”等^①。

如果说1751年至1752年之前的第聂伯河对岸地区还仅仅只是盖达马克队伍活动的据点的话,那么自俄国在那里建立起新塞尔维亚省,移入巴尔干殖民者,强行将乌克兰居民驱赶至俄土边境这些更为靠南的地区之后,该地区便成了血腥冲突的大舞台。综合这些考虑,要谈此类冲突中存在什么“民族解放斗争”特征的话,那也只有在个别情况下方有可能,并且也是有相当的条件限制的。盖达马克攻击的主要目标是新塞尔维亚省的军官村,而绝非那些普通和贫穷的同胞。这一点也好理解,因为前者值得他们抢劫。

新塞尔维亚省设立的最初三年里,有二十多位军官遭到盖达马克抢劫。遵照塞尔维亚格伦茨边防军的民权管理传统,

^①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13,目录1,案卷76,第8页。





1755年11月20日,新塞军主力部队的四十九名指挥官聚在一起开会,讨论消灭盖达马克问题。会议最后出台了一份叫“决议”的文件,其中分析了盖达马克活动在新塞尔维亚省扩散的原因。他们认为,1751年至1753年间被强迫迁往更为南边的诺沃斯洛博茨哥萨克团防区村镇的前乌克兰居民,其冷酷无情是造成盖达马克泛滥的主要原因。这些人中大多数是扎波罗热哥萨克,是他们让盖达马克活动活跃了起来。他们熟悉当地情况,了解新塞军军官的富裕程度,所以抢劫从未失手。在这些新塞尔维亚人眼里,防御手段只有一个,那就是从主力部队中抽调三百人,组成一支常规队伍来从事常规性搜捕和打击这一地区的盖达马克分子。会议之后,他们将这份决议付诸实施^①。

可以肯定的是,在本研究所涉及的整个历史阶段,加入从事盖达马克活动(专指劫掠活动)中来的不仅有下游扎波罗热军,还有边境地区广大居民阶层,并且这些人不一定是哥萨克士兵或乌克兰人。正如当时俄军统帅部文件中的评论所说,无论是从种族构成成分还是从社会关系看,盖达马克运动都是一个极其驳杂的现象。依照这份文件,“盖达马克”可以是两个在黑森林养蜂场抢劫时被抓获的塞尔维亚骠骑兵,他们最后“因从事盖达马克活动”被判刑,也可以是在维拉高什镇(即现今的捷利耶夫卡)一位在新塞尔维亚军官家当雇工时将一帮扎波罗热劫匪引入雇主家的两个乌克兰年轻人^②。关于盖达马克活动的“国

①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248,目录113,案卷1579,第597-601页。

②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248,目录113,案卷1579,第687-687页及687页背面。

际性”证据在该地区也有不少。其中,我们还掌握塞尔维亚族的一些新塞尔维亚骠骑兵在波控乌克兰地区从事盖达马克活动的案例(此事发生于1753年)。无论是波兰方面还是俄国方面,这些人的行为均被称为“从事盖达马克活动”(不强调他们的种族身份或宗教派别)^①。

关于乌克兰南部非乌克兰族居民从事盖达马克活动这个话题,有一个例子值得引用。这例子足以透彻表明盖达马克活动主要呈现出的社会性而非种族性色彩。具体情况是这样的:自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后半期开始,处于边境地带的“第聂伯河对岸地区”盖达马克活动在性质方面进入一个新阶段,劫掠活动逐渐呈现出背后人为操纵且组织得当的特点。而这位能将众多盖达马克阿塔曼置于股掌之下,且能将他们的精力引导到他需要的方面的人就是新塞尔维亚军总指挥伊万·霍尔瓦特中将。这位级别最高的军官牵连到盖达马克活动一事并没有立即败露,对他的调查也是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登基之后才开始的。关于其犯罪活动的牵扯面《1763年至1764年伊万·霍尔瓦特中将渎职案》案卷里有交代。该材料包含了数十起已被证实的犯罪事实,这其中不仅有他收购被盗财物,因获得“份子”而对盖达马克抢劫行为故意不予追究等渎职行为,还有他本人亲自组织扎波罗热盖达马克队伍并派遣他们前往波兰境内从事“劫掠活动”的犯罪事实^②。

霍尔瓦特及新塞尔维亚军其他高级官员对盖达马克进行庇

^①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248,目录113,案卷1579,第47页及47页背面。

^②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10,目录3,第370页。





护的事实首次被揭露是在1757年秋。当时枢密院从伊万·格列波夫少将的汇报里得到一份复制材料,其中记录的是俄籍盖达马克瓦西里·维尼琴科被波兰人抓获后的受审口供。这些材料当即就成了枢密院秘密进行闭门会议的讨论议题。

原来,这位二十岁的维尼琴科是帕里耶夫沃湖村人,他于1757年春在新塞尔维亚首府诺沃米尔哥罗德城被人雇用,在新塞尔维亚军办公厅主任瓦西里·阿卡查托夫开的砖瓦厂打工。维尼琴科在那儿一连工作三个月,每天收入五戈比。有一天,雇主把他叫去,进行了一次开诚布公的谈心。雇主问他,如果面前摆着一条发财捷径,他是否会嫌弃这种“蛮力活”。另外两个年轻的工人也被问及了同样问题。得到肯定答复之后,这位雇主便给他们每人一匹马,一支火枪和一把马刀,同时吩咐他们前往距离诺沃米尔哥罗德城不远的伊万·霍尔瓦特的庄园——将军村。那里正在组建一支盖达马克队伍,领头的阿塔曼是一位叫什拉姆的扎波罗热人,他来自塞契雷奇科夫库林,队伍的骨干同样是来自那个库林的几位塞契哥萨克,余下人员则像维尼琴科一样都是新手。这伙人主要来自俄波边境一带的维斯卡、普列津塔什雷、利亨卡等乌克兰村庄,共二十一人。1757年7月至9月期间,在什拉姆带领下,这帮人数次闯入波控乌克兰地区抢劫,不分对象,无论是犹太店主、普通农民、东正教神父(队伍中有人还曾在这位神父身边做过事),还是东正教教堂、东仪教教堂或是天主教教堂等,都是他们抢劫目标。实施一次次抢劫之后,他们就带着财物返回俄国境内。这帮人在边境的比特罗奥斯特洛夫据点(小要塞)里有自己的“内应”——一位新塞尔维亚

军准尉的边防人员。由于抢来的财物有自己的一份，于是他不仅提供通行便利，还将自己的住处提供给他们用于休整。这些人按事先谈好的分赃条件，每次抢劫返回之后就立即给霍尔瓦特、阿卡查托夫以及其他参与密谋的军官送上份子^①。

随着时间推移，有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霍尔瓦特与盖达马克有关联。1758年3月末，在追击一支由波控乌克兰地区返回俄国境内的盖达马克队伍时，其中有一位盖达马克因受伤而被盖特曼哥萨克的一支先遣小分队抓获。使人大为震惊的是，他们在审讯中得知，被抓之人是诺沃斯洛博达哥萨克团的一位百人长，名叫尤里·塔巴涅茨，使他们更为震惊不已的是他们得知最终逃脱追捕的团伙主干成员的构成：该团百人长莫夫羌诺夫斯基、两名霍尔瓦托骠骑兵团的准尉布拉德利和伊万诺夫、几名士官生以及该团的一些普通士兵。抢劫前，这帮人均获得司令官伊万·霍尔瓦特默许，而他每次都要分得一份财物^②。

应该说，抢劫财物并非永远是最终目的，盖达马克队伍还是霍尔瓦特将军手中“解决”与波兰发生边境冲突的一张牌。比如，1758年，他组织了一支纯粹由扎波罗热哥萨克构成的队伍（八十人），准备用来袭击波兰几位总督在巴尔塔和克鲁季城的领地。这类袭击是为了复仇，因为这几位总督曾经将准备前往新塞尔维亚省定居的瓦拉几亚公国的数百户罗马尼亚居民强行

^①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248，目录113，案卷1591，第64-69页。

^②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248，目录113，案卷1591，第46-52页。





扣押,“安置到”上述两个省中去了^①。

顺便插一句,“盖达马克”这张牌也被沙俄政府外交政治玩起来。比如,俄国枢密院于1755年10月12日做出决定,建议新建的圣伊丽莎白要塞卫戍司令、少将伊万·格列波夫务必向比邻的土耳其指挥官证明,他们建设这个要塞仅仅是为了“将那些还没有充斥着盖达马克小偷们的空余地区圈起来”^②。

霍尔瓦特将军一边豢养“自己”的扎波罗热哥萨克抢劫队伍,一边却指挥新塞尔维亚省对不受其管制的盖达马克进行残酷镇压。1760年,他亲自带队,围剿两支盘踞在丘塔森林的盖达马克团伙^③。



抓捕参与科利伊夫起义的盖达马克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文献资料,有塞尔维亚移民直接参与了扎波罗热哥萨克盖达马克活动和1768年事件——

科利伊夫造反:这

年12月份前半月,俄军在斯梅拉城和扎波金城两个地方追击盖达

^①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248,目录113,案卷1591,第197页。

^②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248,目录113,案卷1574,第706页背面。

^③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124,目录6,案卷149,第1页及其背面。

马克时击溃其中一支队,但让追击官兵感到惊讶的是,在这支以扎波罗热哥萨克为主体的匪帮中居然有一位切尔内骑兵团上尉、塞尔维亚族的斯坦科维奇和该团十个左右的骑兵。这些人早在秋季就被团指挥官派往波兰执行一项任务,但是他们却想发一笔横财,于是擅自脱离行程,加入扎波罗热盖达马克抢劫队伍^①。

若是连新塞尔维亚军军官,而且还是那种最高级别的军官都不嫌弃从事盖达马克活动的话,那么普通士兵就更不会反对了。志愿参与这种抢劫活动的还有边境地区的普通民众——农民和市民。对于这些人来说,这是可以弄到牲口、居家什物和金钱的机会。邻居、家人和干亲家——这帮团伙成员之间往往纠缠着各种社会和亲缘关系。因此,盖达马克劫掠活动通常是组织严密、协调一致的行为,从中获利的绝非仅仅只是扎波罗热哥萨克,有很多人都指望靠这种营生过日子。显然,这一点恰好解释了整个十八世纪盖达马克活动在扎波罗热哥萨克各阶层有着最为广泛的流行性、适应性和在极端不利条件下能够生存下来的原因^②。

扎波罗热塞契被俄帝国政府摧毁之后(1775年),乌克兰南部盖达马克活动主要群体也还是那些“自由民”。1776年春,在探讨前扎波罗热哥萨克有可能造反之事时,俄军亚速夫省司令部便指出,对他们而言,危险系数最低的是那些以前参加过军,现在已有自己家产和家庭的“草原”哥萨克,而那些无家可归的贫民则最有可能发生暴动。这些人习惯在村里过冬,干活也只是

①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124,目录6,案卷149,第1页及其背面。

②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248,目录113,案卷1591,第57页及57页背面、58页。





为混一口饭吃,每到春季就聚集到附近森林里,然后成群结队前往波兰人或鞑靼人地界进行抢劫。最突出的是,这帮人不仅令俄军高层不安,也使那些已定居下来的哥萨克民众头痛。这些哥萨克表示,针对这些流氓无产者团伙,早在塞契时期科什就开始实施驱散政策,最好能延续这种做法。同样是在那个春季,哥萨克巴尔温科斯京科夫县那些有家小的哥萨克通过议员向省长表示说,他们担心用于对抗盖达马克的兵力不足,因为1775年夏季,政府将他们的武器收缴了,这使得他们无法对付来自盖达马克的进攻威胁^①。

塞契覆灭之后,相当一部分扎波罗热哥萨克来到了土耳其境内。这里原本就倾向于从事盖达马克活动,于是很多人又重新操起了旧业,并且抢劫对象改成了边境俄罗斯一侧的居民点,而根本不管这些居民是哪个民族或属于哪个宗教派别。自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后半期开始,对于阻止盖达马克侵犯活动,不仅俄国官方重视了起来,连土耳其官方也认真起来,决心根除横亘在两国关系中的这一紧张因素。俄方明显的例子是,1786年3月1日,少将雅科夫·列普宁向波将金公爵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中这位将军讲述了自己收到的来自土耳其奥恰科夫城省长给他信函的内容,信中列出双方共同对付盖达马克的行动方案^②。

塞契覆灭后的最初几年,“土耳其”扎波罗热盖达马克袭击活动依然时有发生,而且不仅延伸到俄国,还扩展到了波兰境

^① 第聂伯Л.亚沃尔尼茨基国家历史博物馆,第38197件收藏品/档案编号208,第6-7页及第7页背面。

^②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15,目录1,案卷185,第27页、29页及其背面。

内。比如,1778年年初,扎波罗热哥萨克劫匪“重创”了列季切夫小镇,杀死了镇中数百名犹太人和波兰人,抢夺了他们的财物。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记载此事的政府公函中,那些罪魁祸首不区分国籍和来源,一律像十八世纪初期那样被统称为“盖达马克”^①。

袭击俄国的土耳其盖达马克队伍,其人数一般在二十到三十之间,就其社会成分来看,是一些贫苦民众。他们除去在周边渔场干活外,并不介意采取较为快捷的违法手段来获取钱财。比如,1785年8月14日,彼得·杰列里亚中将在给波将金公爵的汇报中讲述了商人法别尔家半夜遭二十五名盖达马克洗劫一事。他们击伤了几名仆人,拷问了他的妻子和岳母,抢劫了五千卢布的财物。有人在这些抢劫分子中认出几位曾在渔场做过工、前不久才逃亡土耳其的前扎波罗热哥萨克^②。

打家劫舍这一传统活动在布特卡雷那里要比在黑海哥萨克那里维持得更久一些。多瑙河三角洲地区整个十九世纪前四分之一时期,其“前线”(即边境地区)特征的充分保留、土耳其政府中央管控的减弱以及与涅克拉索夫哥萨克人(即顿河旧礼仪派哥萨克后裔)无休止的战争,所有这一切要素叠加在一起给类似劫掠活动的生存提供了一个营养环境。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1808年3月4日,布格河哥萨克军办公厅向黑海哥萨克军阿塔曼布尔萨克汇报说,他们抓获了与其他一道越境俄国的土耳其扎波罗热布特卡雷彼得·钦慕巴尔,调查其在摩尔多瓦公国参与盖

①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89,目录89/8,案卷507,第1-7页。

② 俄罗斯国家军事历史档案馆,全宗52,目录1,案卷315,第2部分,第82页及82页背面。

其





达马克活动的事实,但最后被指控犯的是抢劫和偷窃罪^①。

按波将金公爵的提议重建的忠义扎波罗热哥萨克军(黑海哥萨克军)引起不少波兰官员担忧,因为他们从中感受到了蠢蠢欲动的盖达马克袭击波兰-立陶宛王国的危险性,而波兰国王斯坦尼斯拉夫-奥古斯特写给波将金信函(1789年11月)的语气则证实了这种担忧^②。

的确,黑海哥萨克军中自发组织起来的盖达马克武装团伙就像塞契时期那样,在他们军队的行政当局与邻国之间关系中造成了极度紧张态势,并且,作为活动受害者,还有那些具有相同信仰的东正教教徒。我们援引一封信函来说明这种情形,1790年6月20日,某位摩尔多瓦贵族给军法官安东·戈洛瓦德写信说,在斯杰茨卡纳镇附近他私家的林子里藏着一伙黑海哥萨克逃兵,他们有七人,经常抢劫,居民苦不堪言^③。

俄国方面,官员们采取最大努力来消除这种“无法无天”的风气,他们不仅采取了打压措施,还运用了思想意识手段,包括使用牧师说教来感化。1792年8月15日,黑海哥萨克受封得到库班地区土地。当天,他们在第聂伯河中心据点(科什)——斯洛博泽亚镇举行了一个全体哥萨克和所有居民大会,会上宣读了沙皇谕旨,举办了答谢皇恩的祈祷会。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城大主教阿姆夫罗西在隆隆的礼炮声中被迎进科什营地,亲自主

① 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国家档案馆,第249全宗,第1目录,第530卷宗,第32页。

② 华沙古代主要文书档案馆.波兰皇家档案全宗,案卷90,第152页。

③ 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国家档案馆,第全宗249,目录1,案卷72,第57页及其背面。

持盛大的祈祷仪式^①。这位东正教高官一心想运用扎波罗热哥萨克传统宗教来感化这些人,因此,在布道时除去一番宗教说辞,还试图引导这群黑海哥萨克,劝说他们放下将打家劫舍视为崇高骑士职业的念头^②。

盖达马克活动的衰落是一个渐进过程,它不仅维持了整个十八世纪后四分之一时期,还延续到十九世纪初期。也正因如此,沙俄帝国和土耳其势力范围之内出现了两个源于后塞契扎波罗热哥萨克团体——黑海哥萨克军和多瑙河对岸哥萨克军之后,两国政府不得不付出了更多精力来消除哥萨克群体中流行的打家劫舍这种传统恶习,使其走上参军服役、为国效力之路。

①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手稿部,全宗609,目录1,案卷218,第101页。

②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18,目录1,案卷314,第1-2页。



第七章 哥萨克宝藏:扎波罗热哥萨克生活中的藏宝与探宝活动

扎波罗热哥萨克人过去的藏宝与探宝活动历史研究有两方面意义:其一,该研究有助于弄清哥萨克在其传统居住地区对宝藏认识的演变情况;其二,将伴有为自己抢夺一切可能的物质财富,进而进行分配(分赃),花销(吃喝)和储藏(埋藏)等行为的哥萨克传统的抢夺、打劫和征战等活动的历史与宝藏联系在一起具有现实意义。

获取财宝以及藏匿财宝是塞契人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为塞契军事化特征或曰地处边境状态,加之塞契的扩展使其居民对包括钱财、贵金属物品等在内的物质财富滋生出一种独特心态。哥萨克对攫取或积累起来的大量财富的(非)使用历史构成了哥萨克世界图景的一个重要方面。该方面与在他们的生活环境中人们对宝藏的理解以及关于对宝藏拥有掌控权的阿塔曼的认识相关。

探讨扎波罗热哥萨克日常生活中的宝藏这个话题时我们应当明白,拥有宝藏源于边境地区的传统武装掠夺。自十八世纪开始,由于黑海北部边境地区局势稳定下来,哥萨克实用性“猎获”(即旨在掠取战利品)活动被俄国政府、奥斯曼帝国和波兰-

立陶宛王国共同视为犯罪行为,称其为“盖达马克活动”。并非所有盖达马克都是扎波罗热哥萨克,但很多扎波罗热塞契哥萨克也很看重这种活动。正因如此,扎波罗热哥萨克宝藏与盖达马克宝藏两者为同一类别,在大多数情况下实乃一个不可分割的研究对象。

按分类,绝大多数据传为扎波罗热哥萨克或盖达马克遗留下来的宝藏可分为:(1)硬币类;(2)可回收类(主人指望日后能重新回收藏匿的宝藏);(3)经济类,即为积累财富而藏匿^①。与这几类宝藏性质稍稍有些偏离的是埋藏武器和军用装备。这些物品尽管也具有货币价值,但毕竟在形式和积累财富的方式上同用以购买它们的金钱还是有差异的。

宝藏的出现首先是基于获得战利品这一事实本身,这些战利品或来源于合法所得(战争期间)或非法(和平时期)征伐邻国夺得,又或仅仅是在下游扎波罗热哥萨克军地盘上和盖特曼区境内进行打家劫舍抢得等。显然,这一现象曾在相关广大地区出现过,而并非仅局限于哥萨克人的领土内。例如,近年来,在当年的克里米亚汗国“腹地”——克里米亚半岛上,考古发掘确认了在十八世纪,哥萨克社群的主要合作方——当时的鞑靼人和诺盖人中广泛流行着与藏匿宝藏行为有关的社会文化习俗。这种情况下,往地里掩埋积蓄的冲动往往不只是出于单纯的积累财富的欲望,还出于担心俄土战争、民众造反和货币变革等战

^① B.M. 珀京:《硬币 宝藏 收藏:古钱学概论》,圣彼得堡,圣彼得堡艺术出版社,1993,第171-173页。





争与政治及社会动荡等因素考量^①。

就哥萨克或盖达马克而言,宝藏的基本部分往往首先是战争所得以及从事贸易和手工业积攒起来的钱财。在各种类型及形式的历史文献资料中,恰恰是记载与哥萨克战利品有关的信息最为丰富。盖达马克将全部财宝分为三份,其中前两份构成战利品的“主体”部分,两者相当,分别用于添置“科什家当”和分给“自由哥萨克”,而剩余的那一部分数量最少,分给阿塔曼本人^②。从萨夫卡·塔兰这个被抓获的扎波罗热盖达马克受审记录(1768年9月)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哥萨克通常在实施完抢劫返回营地之后,或者干脆于返途中方便停留的时候就立即进行战利品(赃物)分配^③。

每当抢劫队伍由相互缺少了解的人员组成时,分赃时头领便按人头来——“每人该给什么全凭自己意愿”。科利伊夫义军(1768年)首领中一位叫谢苗·纳日沃伊的乌曼库林阿塔曼首领就是这样处理的。显然,这种方式下无论如何分配,团伙首领所得份额要远比其他普通参与者多。当然,一个抢劫季度里,即便是团伙中的普通成员,其所得数量也可能相当可观——一百卢

① Д.В. 安德里耶夫斯基、М.М. 乔列夫:论麦什沃德诺耶村发现的克里米亚汗王钱袋子(克里米亚共和国黑海区),克里米亚古代与中世纪考古与历史资料,2015,第7辑,第325页、331-332页。

② О.М. 索莫夫:库巴拉之夜(选集)//编者前言与注释:С.В. 基利留克,基辅:第聂伯出版社,1991,第83页。

③ А. 斯卡利科夫斯基:十八世纪盖达马克攻打西乌克兰事件 1733—1768,敖德萨,1845,第207页。

布乃至更多^①。盖达马克活动(劫掠)获利数额特别巨大,这使得他们不得不考虑有关所得财物的“日后”积攒方式问题(至少,对那些实用至上者来说是如此考虑的),最简单的处理便是以藏匿方式保存起来。正如该问题最为早期的一位研究者所公允指出的那样,除钱币外,扎波罗热哥萨克尽管也抢夺战马、武器、布匹等形式的战利品,但他们一直千方百计地,哪怕是半价贱卖也不惜将其变换成便于藏匿的叮当响的金银钱币^②。

对于那个时代的哥萨克或盖达马克来说,财富的另一种来源(指的是贵金属形式的)是靠大量洗劫古墓所得。在当地居民的认知里,由于古墓与鞑靼人相关,因此它们完全也成了合法的获利来源。有关新塞契时期(1734年至1775年)扎波罗热哥萨克中流行的“奋力掘墓”的例子,有些至今依然让人记忆犹新。例如,1749年夏,一伙扎波罗热哥萨克去邻国抢劫未果,返回之后,他们“便在一条叫萨莫特干尼亚小河附近开挖了一座古墓。该古墓位于第聂伯河另一侧,在河滩上方的荒原中,当地人称之为罗曼科瓦古墓,其中埋葬着一些财宝”(位于现今的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州卡门斯科耶市境内)^③。接下来,1750年3月28日,新塞契防御城卫戍司令中校戈洛温书面致函科什阿塔曼瑟奇,告知对方说,在距离扎波罗热哥萨克和俄军两个要塞一百多米远

① A. 斯卡利科夫斯基:十八世纪盖达马克攻打西乌克兰事件 1733—1768,敖德萨,1845,第203—204页。

② И. 斯列兹涅夫斯基:扎波罗热古风,第I(II)部分,哈尔科夫:大学出版社,1833,第82页。

③ 乌克兰维尔纳茨基国家图书馆手稿研究所,全宗1,案卷62657,第358号。





的地方有几座古墓被人盗挖,尸骨抛撒荒野(位于现今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州尼科波尔区波克罗夫村附近)。戈洛温以死刑处罚来严禁自己手下做出类似举动,同时,他要求阿塔曼也像他那样来约束自己手下,“务请阁下将这些遗体尸骨掩埋处理,以免今夏给人带来任何伤害”^①。

可以推测,下游扎波罗热哥萨克军的科什机构本身极有可能组织类似挖掘。科什阿塔曼于1775年5月寄给基辅洞穴修道院大祭司佐西玛的信函可以间接证明这点。信中,这位阿塔曼请求为塞契圣母代祷教堂定制一批类似该修道院里“最精致最华美的”圣器器皿,他承诺会尽快找机会转交给修道院所需数量的黄金。引人注意的是为制作这批仪式用器皿,他们准备寄去的恰恰是沉甸甸的黄金,而并非像往常那样寄去一定数目的金银钱币来定制一套修道士法衣或法帽^②。

正如我们所见,在一些情况下,那些扎波罗热哥萨克不仅是财宝遗留者,还是财宝的积极探寻者。

哥萨克埋藏财宝往往伴随一套技术性程序,最简单和最流行的做法是找一块有标记的地方挖一个坑来埋藏。在前扎波罗热地区的民间传说中,这种标记最常见的便是某个具体的土冈^③,并且财宝往往既可以埋在土冈上,也可以埋在土冈旁。在

① 新塞契科什档案,第2卷,基辅: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格鲁舍夫斯基古文献学与史科学研究所出版社,2000,第586-587页。

② 新塞契科什档案,第1卷,基辅: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格鲁舍夫斯基古文献学与史科学研究所出版社,1998,第208-209页。

③ Я. 诺维茨基:来自第聂伯河两岸(扎波罗热随笔),旅途札记与研究,诺维茨基作品五卷本,第1卷,扎波罗热:覃登出版公司,2007,第56-57页。

后一种情形下,探宝人需(资料提到的是两种方式)在日出或日落时分前走上土冈顶上观察,看看身影落在哪一个方向,身影落向什么地方就应在什么地方开挖,以便挖到宝藏。由于寻宝人的身高与藏宝人的身高可能存在差距,为防止误差,所推荐开挖的距离是按身影长度再加减两至三步^①。

需指出的是,扎波罗热哥萨克或盖达马克哥萨克财宝埋葬点既可以是人工建造之地,也可以是天然之所。民俗札记关于宝藏传闻有着各种记载。如,有一些财宝被封藏在某些橡树洞中;霍尔季察岛上堵着石楔子的岩石裂缝,传说里面就塞满了珍宝;一些被河流淤泥掩埋着的古井,里面填埋着用提锅盛着的金银财宝;一些牛皮袋子,里面装满金币。甚至据说还有一些蒙着牛皮的哥萨克十人座平底舟,舟里堆满枪支、战刀,当然还有钱财^{②③}。札记所叙述的这些藏宝形式与方式是有可能存在的,因为它们同现实中当年下游扎波罗热哥萨克自由区的地形地貌特征以及札记所说时代的居民生活物品十分吻合。那些受访人对藏宝的细节描述往往充满着日常生活中的纯理性主义色彩。比如,埋入土冈的铜提锅里钱币通常以下列方式堆列着:锅底放的是金币,金币上面铺着一层铜币,再上面,即顶外层堆放着一层银币。这样摆放钱币为的是让铜币减少氧化以便保持其货币支

① Я. 诺维茨基:扎波罗热哥萨克与盖达马克哥萨克财宝,诺维茨基作品五卷本,第2卷,扎波罗热:覃登出版公司,2007,第323-324页、345页。

② Я. 诺维茨基:来自第聂伯河两岸(扎波罗热随笔),旅途札记与研究,诺维茨基作品五卷本,第1卷,扎波罗热:覃登出版公司,2007,第95页。

③ Я. 诺维茨基:扎波罗热哥萨克与盖达马克哥萨克财宝,诺维茨基作品五卷本,第2卷,扎波罗热:覃登出版公司,2007,第333页、341页、348页、352页、364页。





付价值^①。



扎波罗热哥萨克老巫师

财宝在埋藏过程中其主人往往会举行带有仪式性和魔法性的活动——从朗诵祈文、念咒语到举办各种仪式。值得一提的是,传说中所描述的具体到扎波罗热地区的这类活动,如,善于给财宝“念咒”——这是单身哥萨克“骑士”最为典型的行为,是那些非单身哥萨克“宅男”所不具备的^{②③}。这与十八世纪中期的书面史料内容相符。据这

些史料所记载,那时,盖达马克团伙首领常常诉诸魔性活动来保证他们抢到的财物的安全,避免被人追踪,并用以预知未来祸福等^④。哥萨克巫师形象与对年老(年长)战士的崇拜有关,而该崇拜又与他们古代祖先祭祀联系在一起^⑤。例如,十八世纪七十年

① Я. 诺维茨基:扎波罗热哥萨克与盖达马克哥萨克财宝,诺维茨基作品五卷本,第2卷,扎波罗热:覃登出版公司,2007,第345页。

② Я. 诺维茨基:来自第聂伯河两岸(扎波罗热随笔),旅途札记与研究,诺维茨基作品五卷本,第1卷,扎波罗热:覃登出版公司,2007,第11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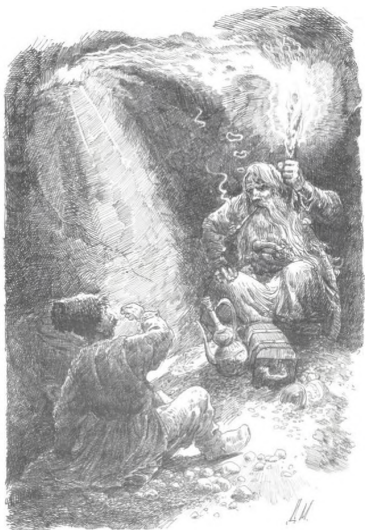
③ Я. 诺维茨基:扎波罗热哥萨克与盖达马克哥萨克财宝,诺维茨基作品五卷本,第2卷,扎波罗热:覃登出版公司,2007,第356页。

④ М. 戈尔班:马泽帕强盗(生活历史概览),东部与西部:历史文化集,第2辑,哈尔科夫:广场出版社,1999,第191页。

⑤ Л. 伊万尼科娃:论XVIII—XIX世纪中扎波罗热哥萨克形象神话化:由罪犯到典型,词语与时间,2011,第1(661)期,第71页。

代至八十年代广为人知的扎波罗热盖达马克谢苗·加尔库沙。据传他拥有一种魔法能力,能够围绕自己画出由“精怪”守护的魔法圈,他本人就在一直在这个圈子中睡觉,以防被抓^①。民间记忆中,由于哥萨克所埋藏的财宝均以“下咒”形式存在,因此可以推测^②,当时人们相信这些财宝身上有魔法在起作用。

谈到魔法,我们来对“数字魔法”做点简单介绍。民间认为,扎波罗热哥萨克财宝的埋藏与日后挖掘同诸多记号有关,这些记号同人们相信数字十二(一打)与诸般超验表现有关。财宝或埋藏于土冈之中或藏匿于石头之下或沉入河中,要由十二名阿塔曼头领(哥萨克或盖达马克)来执行,财宝要放置在十二个小桶(小锅)里,或十二门炮口塞满



盖达马克财宝及其守护精灵

黄金的火炮里。为使财宝容易到手,要宰杀十二只母鸡,因为财宝要用“十二颗头来下咒”。在藏宝地点要十二位哥萨克用树条抽打一个从盖特曼区偷抢来的十二岁小男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

① O.M.索莫夫:库巴拉之夜(选集)//编者前言与注释:C.B.基利留克,基辅:第聂伯出版社,1991,第41页。

② H.马尔凯维奇:加尔库沙,乌克兰强盗,俄语词语//文学政治杂志,1859,第9期,第140页。





能使他日后找到这些财宝^①。人们迷信财宝能化身为不同活物、物品或现象,诸如小山羊、熊、红色(白色、黑色等)战马、一群灰狼、斑白色的猪、大白燕、吹笛子的羊倌、年迈的村妇和扎波罗热哥萨克老头(并且后者还会围绕自身挥洒火星)、一支点着的蜡烛或干脆一片炎热、一阵反光或一线光芒^{②③}。这些地下财宝的射气往往以不同的次数出现在寻宝者或路人面前——从一年两次(通常是在新年和复活节那天)到十二年或四十年甚至一百年一次^{④⑤}。

此处就藏宝地施展魔法活动的补充介绍很有趣味性,它不仅是对民族奇闻逸事的描绘,同时也能让人切身感受到所有寻宝者所体验到的那种氛围,既充满对与邪灵接触的恐惧和惴惴不安,又充满期待很快发财的忐忑心情。

由于类似神秘感,我们不应否认那位谢苗·加尔库沙财宝的存在。他生活中的一个插曲可证明这点。这事发生在1780年波兰边境一侧的卡涅夫城。当时,加尔库沙抢劫了一位犹太商人

① Я. 诺维茨基:扎波罗热哥萨克与盖达马克哥萨克财宝,诺维茨基作品五卷本,第2卷,扎波罗热:覃登出版公司,2007,第335页、337页、348页、357页、362页。

② Я. 诺维茨基:来自第聂伯河两岸(扎波罗热随笔),旅途札记与研究,诺维茨基作品五卷本,第1卷,扎波罗热:覃登出版公司,2007,第57-58页、87页。

③ Я. 诺维茨基:扎波罗热哥萨克与盖达马克哥萨克财宝,诺维茨基作品五卷本,第2卷,扎波罗热:覃登出版公司,2007,第326-331页、334页。

④ Я. 诺维茨基:来自第聂伯河两岸(扎波罗热随笔),旅途札记与研究,诺维茨基作品五卷本,第1卷,扎波罗热:覃登出版公司,2007,第56-58页。

⑤ Я. 诺维茨基:扎波罗热哥萨克与盖达马克哥萨克财宝,诺维茨基作品五卷本,第2卷,扎波罗热:覃登出版公司,2007,第362页。

和一位富裕地主，共计近一万金币，这还不算他拿走的那些装饰品以及器皿里的贵重金属，这些金银财宝都被运到林子里分掉。不久加尔库沙在罗姆纳城被抓获，但上次所得的大部分赃物并不在他身上，考虑到他所得财宝数目巨大，且也无法在短短数日之内花完，因此，这些财宝极有可能被他藏匿起来^①。得益于他同伙的口供，可以相当精确地确认出这些财宝埋藏的实际方位。按惯例，它们被埋入地下，附近有用于定位的物体，“……不远处有两棵大橡树……其中一棵有一个野蜂窝”，在房子的“屋角处圣像下方”或者在某个居民点里某人房子的不同角落处。而关于他财宝的数目和价值却说法不一，区别甚大——有人说全部是金币或银币，而其他人则说还有铜币。个别情况下还给出具体数目——两千卢布，而其他情况下，所理财宝的总量是“四俄斗”。用来装这些财宝的“载体”也是五花八门，原因是，在抢劫过程中会用随手遇到的任何物品来装抢到的金银财宝：生铁锅、麻布袋以及牛皮袋^②。

同样，有关扎波罗热哥萨克在离开故乡往库班地区（1792年）前遗留下财宝的传说也完全有充分的现实根据。从预留一定数量资金“留后手”这方面来说，这种做法是合理的：若是到新地方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怎么办？当他们在塔曼半岛安顿下来后，这些哥萨克为取回自己当年的积蓄曾返回过故土。比如，一位叫亚列马·日列兹尼亚克的黑海哥萨克，他迁居几年后在苏加

① K.科绍维克：谢苗·加尔库沙（1772—1784）基辅古风，1883，第3期，第535—536页。

② K.科绍维克：谢苗·加尔库沙（1772—1784）基辅古风，1883，第3期，第3页，第541页。





克列亚河(现今乌克兰基洛沃哥罗德州英古尔河右岸支流)边自己的旧窝冬房地窖里挖到过一份宝藏^①。一些奥利维奥波利城(现今尼古拉耶夫州沃兹涅申斯克市)的土生居民也回忆称,有些库班地区哥萨克来此找到自家老宅,说是要取回当年自己祖上留下来的财宝^②。

有些程序自财宝藏匿时起就开始“启动”。首先,若是财宝后来没有现世,就是说,短期内不为其主人所知,这就是发生了考古学化——也即跌出当时经济与文化时代大背景范畴;其次,每当藏宝地点和宝藏价值等所有确切信息随着埋藏人的消失而不为人所知时,那么,一些无据可考的信息,诸如传闻、流言等其他碎片化信息便转化为民间口头创作等。与此同时,最初事实——埋藏财宝——往往保留下来的只是一个充斥着后世传播者错误推测的大致梗概。例如,1880年代,诺维茨基记录下当地一位老居民的口述,说的是十八世纪一次俄土战争期间,扎波罗热盖达马克抢劫沙皇用于支付军队的官饷之事。哥萨克决定将抢到的财物作为宝藏来埋藏,于是在动手埋藏之际便在土坑边将在场的一个“胆小鬼和叛徒”杀死,这样注定他死后就要看守这份财宝^③! 翻阅那个时代私人资料(其中有一位叫巴尔什的海军军官的日记,这人于1738年至1739年在霍尔季察岛造船厂待过),我们发现其中提到过一件真实事件,这可以作为那份口述

① B.亚斯特列波夫:《扎波罗热僻壤,基辅古风》,1885,第12期,第726页。

② B.И.戈什凯维奇:《赫尔松州宝藏与古迹(第一册)》,赫尔松:南方出版社,1903,第26页。

③ Я.诺维茨基:《扎波罗热哥萨克与盖达马克哥萨克财宝》,诺维茨基作品五卷本,第2卷,扎波罗热:覃登出版公司,2007,第339-340页。

的依据：1739年7月中旬，有部分下游扎波罗热军士兵在陆军元帅拉西指挥下驻防霍尔季察岛。这批士兵应发军饷总计三千卢布，结果，运到后不久，由于分配过程中时任科什阿塔曼（雅科夫·杜卡洛）想从中多得一点，结果导致被杀身亡^①。显然，那段历史由于历经无数年转述，其具体内容中已很少留有当初的基本史实了。

那些“沉睡地下”财宝的假设性存在，无论它们是不是凭空杜撰出来的抑或确有其事，都会激发当地居民对发财机遇的兴趣。与此同时，他们每个人都竭力想弄到关于宝藏藏匿地点的确切信息。自1792年哥萨克主体部分迁移库班后，历经九十至一百一十年时光，出现关于乌克兰南方有扎波罗热哥萨克遗留宝藏的传说，但该传说的历史构建成分问题目前研究不多。这里提醒注意几个有现实基础的情节。我们觉得，南方各省居民中一些憨厚老实之人对十九世纪投机生意人兜售的“藏宝秘籍”和“藏宝图”笃信不疑，这说明当时广泛流行着一种看法，即哥萨克塞契有专门记事簿，里面列举了所埋藏的“科什家当”名目。据说，1775年塞契被“清剿”之际，这些记事簿被“顿河将军普拉托夫”收去（张冠李戴！），自那时起它们便被存放到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城“用十二把锁层层锁住”。知情者只有那些有权知道的

① [Я.巴尔什]：雅科夫·巴尔什自1707年海军服役以来简明日记及工作履历表，第II部，（1726—1740）//B.Г.赫曼：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国家公共图书馆集，第3辑，列宁格勒，1955，第32—33页。





“贵族”^{①②}。显然,这里谈论的是民间记忆中关于查抄下游扎波罗热军科什机构档案一事所留下的一个痕迹。科什档案直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依旧放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市省长办公厅,没人拿它们当回事^③。

拥有祖先埋藏财宝的私家档案资料,这通常都是俄帝国乌克兰各省、州中那些祖先系哥萨克的贵族家庭(当然也并非只是贵族才有)。十八世纪与十九世纪之交,按“寻宝秘籍”探宝的情节进入当地小说文学作品中。作为例子,我们可以看一下索莫夫的中篇小说《宝藏的童话》(1830年)。其中主人公之一是原盖特曼区哥萨克团一位少尉的孙子涅什别塔少校。他读完爷爷箱子里珍藏的“小俄罗斯和乌克兰各地藏宝传说”之后便痴迷于寻宝活动^④。

显然,此类宝藏手稿在前哥萨克边区——扎波罗热、盖特曼区、斯洛博达等地以手抄本形式流行着。其中,有一本据说是塞契的某位识字先生编撰,几经转手(所谓的“列辛斯基手抄本”)之后于1857年以小册子形式出版^⑤。这个版本价格不菲,出版不久便销售一空。它的出版导致在当时的基辅、波多利亚两省掀

① Я. 诺维茨基:来自第聂伯河两岸(扎波罗热随笔),旅途札记与研究,诺维茨基作品五卷本,第1卷,扎波罗热:覃登出版公司,2007,第67页。

② Я. 诺维茨基:扎波罗热哥萨克与盖达马克哥萨克财宝. 诺维茨基作品五卷本,第2卷,扎波罗热:覃登出版公司,2007,第335页、340页。

③ А. 斯卡利科夫斯基:十八世纪盖达马克攻打西乌克兰事件(1799—1768),敖德萨,1845,第9页、17页。

④ О.М. 索莫夫:库巴拉之夜(选集)/编者前言与注释:С.В. 基利留克,基辅:第聂伯出版社,1991,第147页。

⑤ [H. 谢缅托夫斯基]:扎波罗热手稿之盖达马克与当地居民藏宝地及藏宝详情,基辅:А. 哈门尔什密达出版社,1857。

起一股新的探宝热潮。据说,这两省各有三百一十五处藏宝地。引人关注的是以该版为基础的新的手抄副本同样在寻宝爱好者中有大量销售^①。

整个十九世纪,扎波罗热哥萨克遗留财宝的探寻活动不仅在前下游扎波罗热哥萨克自由区流行,在黑海北部地区也流行着。因为自1775年之后,那里曾有哥萨克及其后人居住,敖德萨地区就是其中的一个落脚点。具体是指敖德萨地区的乌萨托沃和涅卢拜斯科耶两个村庄。那里本身条件极好——居民构成(塞契人后代)、装饰刻着“马耳他十字”的哥萨克古墓群、延绵着的地下墓窟等,所有这些无不利于宝藏传说的保留。那里令探宝者激情四射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这两地离着敖德萨城——这个以冒险和投机传统享誉世界的国际大都市很近。当年,那两个村挖掘活动长年不断,其中大多数都未经有关部门许可。寻宝催化剂是那些据传是十八世纪的“古代”藏宝图。总的来说,这些藏宝图是一群人或几帮人在敖德萨制作的。有时候,与藏宝图配套的还有同样是被制作出来的“遗嘱”,其中,有一份标注为1769年以扎波罗热哥萨克三兄弟名义立下的遗嘱,里面提到,兄弟三人将一笔共同财宝放在铁锅里沉入一口古井中。第二份遗嘱是僧侣的口吻,据说是由多瑙河右岸地区四位扎波罗热哥萨克所立。他们四位将财宝藏匿于哈吉别河河滩中。在这类资料和示意图中,作为藏宝定位的物体往往有墓地十字架、岩石、地窖、一棵孤树等。而墓碑的碑铭语言和古文字也是被风

^① [B. 安东诺维奇]:基辅及其近郊宝藏:基辅古风,1883,第6期,第387-388页。





格化了的——乌克兰语、俄语和教会斯拉夫语大杂混,使用的是古文字母,还故意弄出文理不通的样子^{①②}。

一旦类似“藏宝笔记”和“藏宝图”不够用,那么人们便会用上各种传闻与假象。岩壁上或山冈上林立着的石碑身上雕刻的任何图案——从十字架到类似人类的古代壁画——都会被当地农民认定为扎波罗热哥萨克埋藏宝藏的标志^③。十九世纪下半叶,纳德波罗热地区居民纷纷将注意力投向“扎波罗热旧要塞”^④,将它们作为可能找到盖达马克宝藏地点的参照点。但通过进一步分析藏宝清单和地点,人们不难确认,这实际上是要塞的防御城和棱堡,是当年冯·米尼赫元帅的部队在1735年至1739年俄土战争期间修建的,在接下来发生于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的两次战役(1768年至1774年和1787年至1791年)中所使用^⑤。显然,九十至一百五十年的时光将后世信息提供者与历史事件远远地隔离开,使得这些军事工事的原本用途被人遗忘,正如他们认定该地区其他文物古迹也具有“宝气”那样,这些人将原先扎波罗热地区的“宝气”移植到这些遗址上。

① В.И. 戈什凯维奇:《赫尔松州宝藏与古迹(第一册)》,赫尔松:南方出版社,1903,第62-64页。

② І.В. 沙波什尼科夫、В.Г. 佩特连科:《乌克兰草原寻宝图(敖德萨近郊扎波罗热哥萨克密室)》,国家地图绘制:状况、问题及发展前景,学术作品集,2003,第1辑,第320-323页。

③ В.И. 戈什凯维奇:《赫尔松州宝藏与古迹(第一册)》,赫尔松:南方出版社,1903,第7页、18页、23页、43页。

④ Я. 诺维茨基:《来自第聂伯河两岸(扎波罗热随笔)》,旅途札记与研究,诺维茨基作品五卷本,第1卷,扎波罗热:覃登出版公司,2007,第150页。

⑤ Г. 什毕塔利奥夫:《乌克兰地方军,基辅: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格鲁舍夫斯基古文献学与史科学研究所出版社,2013,第89页、98页。

那些忙于探宝之人,他们幸运吗?诚然,扎波罗热哥萨克遗留宝藏也不只是想象的结果,霍尔季察岛周围老住户对相关往事的叙述可以证明这一点。比如,十九世纪中叶那里曾发过一次大洪水,洪水冲掉了萨加达奇景区(现今的第聂伯河水电站附近)里一个小岛地表上面的一层淤沙,一位叫弗拉申科的渔民在裸露出的岩石上面发现一口小生铁锅,里面装有一堆金币^①。说到这里我们必须强调一个重点,确实有一些人很幸运地捡到宝藏,但根据对已出土的宝藏统计,它们全部都是在很偶然的情况下被发现,而并非是刻意寻找的结果。这其中,所发现钱币的材料部分属于十八世纪,且主要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所产。宝藏的数目从三十至四十个铜质五戈比硬币到十五至一百个银卢布不等。当然也能见到金币,但这种情况不多见^②。大多数情形下,“扎波罗热哥萨克宝藏”的发现要归功于暴雨和洪水等对埋葬在地下财宝上的表层沙土的冲刷^③。

除钱币外,人们经常发现的是手枪、步枪、军刀和匕首。按民间对扎波罗热哥萨克宝藏的说法,武器被认为是护卫所埋财宝的永恒不变的标志,“……山冈上埋着十二把手枪,这些手枪下方是十二只装着金币的木桶”。我们发现,有时确实存在着武器伴随宝藏的例子。曾经发生在托马科夫卡村的(现今第聂伯

① Я. 诺维茨基:来自第聂伯河两岸(扎波罗热随笔),旅途札记与研究. 诺维茨基作品五卷本,第1卷,扎波罗热:覃登出版公司,2007,第176页。

② В.И. 戈什凯维奇:赫尔松州宝藏与古迹(第一册),赫尔松:南方出版社,1903,第12页、14页、35页、70-72页。

③ И. 斯列兹涅夫斯基:扎波罗热古风,第I(II)部分,哈尔科夫:大学出版社,1833,第86页。





彼得罗夫斯克州一个区中心)捡宝事例就是突出例子:农民利亚波沙普卡在宅旁自留地耕作时发现一处宝藏,其中有匕首、马镫、马蹄铁和六十五个铜币。几年后的1915年10月,这些物品被亚沃尔尼茨基购买并赠给了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市珀利博物馆^①。尽管这些钱币的日期不清楚,但我们推测,其埋藏时间很可能是在1775年塞契被灭事件之后。这些东西最有可能是某位扎波罗热哥萨克作为储备所藏匿,说不定哪一天他想去外地,比如“去土耳其”时能用上。应当将那些不带钱币而单独出土的物品,诸如火枪、战刀、匕首和马具也列入此类扎波罗热哥萨克“藏宝”之列。按惯例,这些出土物品的典型特点是埋藏浅,容易获取^②。

总体来说,幸运之神很少对挖宝者展开笑脸,更为常见的是这些人的寻宝热情变成毫无结果的时间与资金的浪费。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十九世纪末在克里沃罗格市郊区发生的一起与寻找扎波罗热宝藏有关的事情。该市附近有一处土冈,被当地人称为沙皇冢。某个叫普罗丘克的当地居民声称他从自己父亲口中得知,在当年塞契被灭之前不久,要塞中的哥萨克在附近挖了一个十俄丈(二十一点三三六米)深的大坑,坑里砌了一个地窖,分成两个密室,然后用三百普特重(四点八吨)的银币填满大部分空间,留下小部分空间由科什阿塔曼本人(卡尔内舍夫斯基)亲自将十普特重(一百六十公斤)的金币放入其中。普罗丘克说这事是他父亲从自己哥萨克爷爷那里听到的,而他自己据

① И. 沙珀瓦尔:探宝,基辅:第聂伯出版社,1965,第45页、69页。

② В.И. 戈什凯维奇:赫尔松州宝藏与古迹(第一册),赫尔松:南方出版社,1903,第8页。

说还知道进入密室的精确坐标,于是他找到这个土冈所在地段的拥有者并说服他参与挖掘,探挖工作持续了1884年整个暖季,可什么也没有找到。十多年之后,这块地段的主人换了,普罗丘克本人也不知去向,但当地居民大脑中依然在充斥着“强烈的寻宝欲望”,于是挖宝活动于1898年“在神婆皮拉盖娅·沃伊托娃指点下”再次重启,然而,神婆也未能帮上藏宝迷们的忙^①。

我们时代的技术进步,一方面极大减轻了对扎波罗热哥萨克遗留宝藏探寻工作的难度,但另一方面也助长那些业余爱好者对宝藏的抢夺之风。近几十年来出现了一种情况,有不少手拿金属探测仪的财宝掠夺者大规模涌入“大荒原”地区。这将有关出土宝藏的信息推向了所谓灰色的、带有犯罪性质的“隐讳”地带。在这种情形下,凭借网络上每宗在线拍卖品的性质,我们所能确定的仅是一件事——又有一个前扎波罗热地区宝藏被发现。举一个例子,我们手头掌握两份(据信息提供者所说)财宝图片。这是借助金属探测仪在第聂伯市郊区找到的,以1660年至1668年波兰铸造的格罗西(波兰古辅币名称——译者)居多,其中有面值为六点三格罗西和一点五格罗西的古铜币(共计二百五十六枚),还有几枚铸造于1680年代的西班牙荷兰塔列尔和半个塔列尔古币(五枚)。后者大概是项圈部件抑或单独佩戴的“杜卡奇”(传统乌克兰女性服装上的配件或装饰物,通常为带金属蝴蝶结和鹅卵石的大型奖章状硬币形式——译者),因为这些

^① B.И. 戈什凯维奇:《赫尔松州宝藏与古迹(第一册)》,赫尔松:南方出版社,1903,第9-11页。





钱币均带有便于佩戴的穿孔^①。由于这两份财宝中的硬币材料因非专业性挖掘,导致它们从文化背景链中被“扯断”,且混在了一起,故而很难就其考古化过程方面能说出什么明确看法。

钱币铸造国或许是宝藏来源年代研究的标签,尽管这点并非完全可靠。例如,2000年,在切尔尼科夫州普里卢茨基区的波诺拉村有几位当地村民找到(和抢到)一份财宝。这是一堆一百多公斤、铸造于十八世纪四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铜币,全部是俄国铸造^②。相应而言,在前扎波罗热地区、盖特曼区或是斯洛博达地区能找到波兰或荷兰等国硬币,这或许:第一,与具有合法合同贸易的商人相关;第二,与因“猎获活动”而积攒财富之人——那些盖达马克有关。需指出的是,在第二种情形下,此类宝藏想来应该是藏匿于边境地区,而非内陆腹地。

还必须指出的是,迄今为止,我们还不能百分之百地将那些已出土宝藏或已经过科学描写的宝藏的来源与扎波罗热哥萨克或与盖达马克联系到一起。

① 乌克兰哥萨克时期考古//Д.Я.捷列金(责任编辑),И.С.维诺古尔、О.М.提托娃,И.К.什维什尼科夫等:教辅资料,基辅:内容与教学法研究所,1997,第172页。

② H.B.梅捷尔金:乌克兰财宝和未出土的宝藏,莫斯科:ОЛМА媒体集团,2006,第95-96页。

第八章 哥萨克改制：沙俄政府对下游扎波罗热 哥萨克军及其他哥萨克部队的体制改造

就时间方面来看，叶卡捷琳娜二世早期执政与俄罗斯帝国内所有哥萨克群体的生活巨变阶段有关联：由于推行有目的的统一政策，哥萨克军队在诸多情况下丧失了不为察觉的前国家性特征。如，哥萨克盖特曼区（小俄罗斯）自治权被取消，斯洛博达哥萨克团实行同一化制度。改革的目的是让哥萨克土地上的居民在参军服役过程中变成一个封闭群体，彻底融入统一的国家法律空间。此外，他们改革的思想基础源于一种认识，即国家理想的社会结构由“阶层”构建，就是说，国家由各种社会群体构成，其中每个群体在等级结构中拥有同它们被赋予的权利、义务和特权相一致的严格规定的地位。

此章我们将主要关注俄罗斯帝国哥萨克中那些成为顿河哥萨克军、雅伊克哥萨克军和下游扎波罗热军这部分人的生活变化。尽管中央政府对其中每一个群体实行的统一政策都各具特色，但对待哥萨克的基本态度是相同的，这就使我们得以综合分析问题。不过，综合分析的同时我们自然也会就各哥萨克群体的情况单独分析。

在很大程度上，对哥萨克制度进行改革，促使其成为一个自



足阶层,这不仅是女皇及身边众臣行动的结果,也是前任沙皇们连串改革所注定了的事。这其中,彼得一世不同于其他几位沙皇,他以改革措施的彻底性而闻名。在十八世纪头十年里,他对1707年至1709年扎波罗热哥萨克和顿河哥萨克反政府暴乱及起义进行了严厉镇压。这种情况下,扎波罗热哥萨克转投了克里米亚汗国-奥斯曼帝国,在双重庇护之下讨生活,而顿河哥萨克军、雅伊克哥萨克军以及格列宾哥萨克军则被划入俄帝国陆军院(1721年)统辖,开始进入常规性参与国家军政活动的体制中。正是那个时期——十八世纪前四分之一期间,俄帝国政府“梳理”众多范畴的边境居民计划成熟。

从1730年到1740年期间,俄帝国政府机构采取了严厉的系统性措施,意在减少臣民从大俄罗斯各省内陆腹地和乌克兰各哥萨克团辖区(盖特曼区和斯洛博达区)流向各哥萨克军所辖地区。

需要说明一点,较之于俄帝国境内其他哥萨克军队,下游扎波罗热军被纳入政府改革进程是相当晚的事。对于类似其他哥萨克部队的改革,下游扎波罗热军获得了一定的“免疫力”,这与1737年12月它未同其他哥萨克军一道被列入陆军院重新编制的体系,而是被划归外交院有关^①。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俄政府所采取的“拧螺丝”式的改革手法在顿河地区力度最大。顿河哥萨克军军官和普通哥萨克按照自己的实用主义动机,广泛采用应对手法,试图避免汇入其军队的居民流中断。如,经常隐瞒逃亡顿河地区人员的实际年限,向

^① 俄罗斯国家军事历史档案馆,全宗20,目录1/47,案卷31,第368页。

新建哥萨克州迁移人口等。政府同顿河地区窝藏逃亡人员行为斗争的高峰期是1743年10月。当时,阿塔曼达尼尔·叶夫列莫夫被紧急传唤回莫斯科进行调查。政府对他的指控相当严重:在切尔卡斯克擅自修建巨石要塞,建造用于制造火药的磨坊。陆军院专门成立了委员会来调查此事,于是,在原有罪行基础上又添加一条:接收五百户从斯洛博达乌克兰地区逃亡家庭定居。按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1743年9月28日谕旨,叶夫列莫夫与其他高级军官被判死刑。当然,他们旋即又被沙皇宽恕——审判和判决被设计好用于示范性教育,旨在对那些潜在可能的暴动进行警示,阻止暗地里在顿河地区窝藏所有“非法”逃亡人员的行为发生^①。

显然,“此教训深刻”——该事件之后的1743年年末,部队甚至实行了“军官值日”制:军官们被要求带领一支哥萨克小分队,专门对逃亡人员进行调查、逮捕和遣送出顿河地区^②。根据稍晚一些资料(1761年)显示,该分队实施具有警察工作性质的行为,共计三百四十八名哥萨克参与(是顿河哥萨克军——一千七百一十六名哥萨克战斗人员和军官总数的百分之二十)^③。就这样,自彼得一世到叶卡捷琳娜二世,所有俄罗斯沙皇政策的共同导向便是让各哥萨克边区的生活和制度全方位服从国家利益。

由于对扎波罗热哥萨克内部的社会制度不满意,俄国政府

^①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20,目录1,案卷54,第1部分,第41页、43-44页。

^② А.П. 普隆施坦恩:《十八世纪顿河大地》,顿河罗斯托夫:俄罗斯国立大学出版社,1961,第270页。

^③ 俄罗斯国家军事历史档案馆:全宗13,目录1,案卷100,第243页。





尝试按现存哥萨克制度“模范”来引导它。于是在十八世纪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期间,枢密院几次参照顿河哥萨克军制度研究了下游扎波罗热军的重组方案^①。按方案提出的顺序,第一种是基辅总督列昂季耶夫(1740年)向枢密院提交的。他认为首要措施是控制有科什阿塔曼推举权的哥萨克人数,但被枢密院否决,他们主要是担心这会引发扎波罗热哥萨克的不满情绪。1750年,列昂季耶夫又提出另外一套改革议案。他认为合理做法是:第一,将哥萨克军官改为终身制;第二,对哥萨克身份准入进行限制;第三,安插政府观察员,监督扎波罗热哥萨克军官。这个提议基于一个明显的事实:这样一来,俄国在乌克兰地区的民事机构与军事机构的利益与扎波罗热哥萨克军官——前科什塔特曼马磊、军书记官切尔尼亚夫斯基等人的愿望基本就吻合了。军书记官切尔尼亚夫斯基还提交了一份“表忠心报告”供总督审阅。报告共分八点,其中不仅列举了扎波罗热哥萨克基层兵士的诸般“为非作歹”行为,还提出了实际建议——今后如何避免这些问题出现^②。1753年7月19日,枢密院做出决定,禁止下游扎波罗热军举行选举,哥萨克军大拉达会议被限制,然而哥萨克依旧我行我素^③。1750年至1760年期间,围绕未经政府许可的一

① [A.A. 安德里耶夫斯基]: 涉扎波罗热哥萨克案(1715—1774)// 敖德萨历史与文物学会笔记,第十四卷,敖德萨: 苏利策印刷所,1886,第455—456页、462—463页。

② [A.A. 安德里耶夫斯基]: 涉扎波罗热哥萨克案(1715—1774)// 敖德萨历史与文物学会笔记,第十四卷,敖德萨: 苏利策印刷所,1886,第182—186页。

③ B.A. 戈洛布茨基: 扎波罗热哥萨克,基辅: 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7,第382—384页。

年一度哥萨克高层军官选举一事的形势非常严峻,以致1764年4月19日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颁布法令,彻底禁止不同盖特曼基里尔·拉祖莫夫斯基协商,未经女皇进一步确认的科什领统、军书记官以及军法官的选举活动^①。

在双方冲突中,还有一点也不可忽视,就是他们各自对欧洲类型的直线性边界态度不同。早在十七世纪与十八世纪之交,俄罗斯就参与这种边界的建设,扎波罗热哥萨克认为固定边界(边界标志、关卡、护照、前哨等)的想法有悖于他们的法律传统,与传统的草原边界的整体界定方式相冲突。这种情况使得下游扎波罗热军争取“自己的”土地愿望变得迫切起来,激化了他们与政府的矛盾。类似情形在十八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期间显得尤为直观。哥萨克试图坚持不让出前不久还属于科什司法管辖土地的同时,愈发积极参与到边境冲突中。实质上,下游扎波罗热军领土争端,无论是与新塞尔维亚人争夺(1751年),又或是与斯拉夫塞尔维亚人争夺——这些争端是扎波罗热哥萨克同俄帝国的原则性冲突,是一种对俄帝国来说不可能不作出公开回应的挑战^②。事实上,扎波罗热人试图维护自己领土的任何努力都注定要落空。早在1751年9月(新塞尔维亚自治区设立之前),俄枢密院就已致函拉祖莫夫斯基称,因1708年的“背叛”,“扎波罗热人已丧失对这片土地的拥有权”^③。最终,随着新塞尔

① Д.И. 亚沃尔尼茨基:扎波罗热哥萨克历史资料集,圣彼得堡:И.Н. 斯科罗霍多夫印刷厂,1888,第199-201页。

② 乌克兰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与管理部门中央档案馆,全宗3806,目录1,案卷3,第99-102页。

③ 乌克兰B.维尔纳茨基国家手稿研究所,全宗10,案卷18258,第18页、22页。





维亚人于1751年至1752年间的定居,以及乌克兰居民因这些巴尔干移民而遭驱离,“第聂伯河右岸地区”便成了扎波罗热盖达马克积极活动的天地。在新塞尔维亚军办公署的公文处理中有几十起有关抢劫、掠夺和杀戮事件记录在案(顺便一提,这些伤害都是相互的)^①。盖达马克袭击的主要目标是新塞尔维亚军官庄园:新塞尔维亚自治区成立头三年里便有二十多位屯军军官家庭被抢劫^②。

与此同时,新塞契时期,俄帝国政府针对下游扎波罗热军地盘一直推行着双重政策:一方面,在与克里米亚鞑靼人的边境冲突中支持扎波罗热人,与此相反,在与俄帝国治下的那些行政区域单位发生矛盾时就压制或惩罚哥萨克试图捍卫自己领土权利的行为。比如,1764年夏,俄国大地测绘员绘制的新俄罗斯省(前新塞尔维亚自治区)和扎波罗热地区的勘界和测量图确定了下游扎波罗热军领土的北部边界线。它比1745年的所谓“德·博斯科特线”(这位测绘员军官所假想的边界线)要偏南五十公里。扎波罗热人试图夺回被占领土,于是便向圣彼得堡分批派遣了几个代表团。总体上情景是这样的:在不提供有利于扎波罗热人的边界争端解决方案的情况下,俄政府却支持强化帝国在南部边境地区的军事、农民和外国殖民化工作。

谈到俄帝国内哥萨克数量,需要指出的是,统计数字是不

① 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州国家档案馆,全宗P-1684,目录2,案卷122,第44页背面、56页、65页背面、66页背面、83页及其背面、94页背面、111页、120页、168页背面、170页背面。

②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248,目录113,案卷1579,第597-601页。

充分和非常规性的。比如,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登基前一年,也即1761年春季,根据陆军院的资料,帝国里哥萨克部队的基本人员数量如下:顿河军——一万七千二百零九人,雅伊克军——三千一百九十六人,伏尔加军——一千零一十二人,格列宾军——四百六十九人,捷列克军——五百三十二人。而那些附属各要塞和各边境防线的哥萨克团和队伍的人数更少,仅有一百至三百人^①。而要统计外交院掌管之下的下游扎波罗热军的确切人数几乎不可能,因为按照1762年彼得三世登基时的宣誓名册,有三千七百零四人。而与此同时,其他资料则显示,有三至三点五倍之多的哥萨克加入扎波罗热哥萨克军^②。

整顿帝国境内各哥萨克州内部等级制度的步骤至少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登基最初的几个月就已处在设计阶段了。这些步骤设计出自女皇身边最亲近的大臣之手。例如,一份日期为1762年9月盖特曼拉祖莫夫斯基的呈请建议,将小俄罗斯哥萨克军官军衔与全帝国通行的“官秩表”规定一致起来。但在全面审议之后,这项建议被否决,这首先是由于盖特曼区军官身份获取的性质问题(哥萨克军官经常是继承,而非因实际功勋而获得);其次,担心潜在开支巨大^③。倘若这个建议被接受的话,那么奖以军衔的可能性对那些退伍的下游扎波罗热军军官来说也将会成

① 俄罗斯国家军事历史档案馆,全宗13,目录1,案卷141,第2部分,第138-140页、225-227页、243页、265-278页、296-312页、380-384页。

② 1762年下游扎波罗热军宣誓/编者及前言:伊万·西尼亚克,切尔尼戈夫:出版人B.M.洛左沃伊,2015,第15页。

③ T.A.克鲁格洛娃:1762年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未能推行的改革//史料学研究//莫斯科大学学报,系列8,历史卷,2017,第6期,第9页、11页、18页、27-28页。





为现实,因为这些军官中的大多数人在接到退伍通知之后便在哥萨克团辖区内定居下来,并在那里获得军官军衔。

同时,也有人提出改革帝国境内哥萨克部队。萨尔特科夫元帅向女皇献策,就俄国军队重组之事提出自己“建议”。其中,在他“建议”的第五点,即“关于顿河哥萨克军、楚古耶夫哥萨克军和其他哥萨克部队以及它们的供给问题”中,谈到了保障这些军队所需物资的合理化问题^①。

俄陆军院应枢密院要求起草的一份“摘要”便函让我们产生一种认识,即俄政府对帝国边区哥萨克群体真实状况的了解是多么零碎。这份便函的日期为1765年,这不禁使人产生联想,即该“摘要”的起草与1766年政府准备召开立法委员会会议有关,其目的是以更好方式使枢密院元老们了解问题。“摘要”罗列了以往文件,以此为基础,用最为简化的方式陈述了各哥萨克军队和团体的独立历史,描述它们的大致状况(人数、土地和特权等情况)。根据这份“摘要”内容,帝国境内所有隶属陆军院管辖的哥萨克应当归属于:(1)各哥萨克军——顿河军、雅伊克军、伏尔加军、奥伦堡军、格列宾军和捷列克军;(2)某要塞下属各哥萨克团和分队——亚速夫要塞、阿斯特拉罕要塞、霍佩尔要塞、楚古耶夫要塞;(3)地方部队——萨克马拉镇、伊列茨克镇;(4)防御线——西伯利亚防御线。所有哥萨克的钱粮薪俸只有在外派公干(驻扎)或参加战斗期间才配发,其余情况下要依靠产自受封土地或水域的收成来满足自身需求——耕种田地、酿酒、饲养牲畜、渔猎、开采盐矿等(每种情况均标明授予从事该活动特权的期限)。同以往一样,当“摘要”在涉及确认哥

^①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20,目录1,案卷228,第1页背面。

萨克军自有领土时,问题出现了:处境最为有利的是那些前不久刚成立的哥萨克团体,他们自十八世纪上半叶彼得一世、安娜·伊凡诺芙娜和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等几位沙皇执政期间整肃边境时起就一直定居在家乡;那些“历史”哥萨克部队(首先是顿河军和雅伊克军)手中没有任何正式文件来证明拥有土地权,只能借口当年曾被罗曼诺夫王朝首位君王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御赐过封诰书,但在后来的一场大火中封诰书被焚毁。这样一来,这些部队所占据的土地就很容易成为争议的焦点,成为国家和一些私人业主蓄意谋取的对象^①。

“摘要”中缺少有关下游扎波罗热军的资料信息,这说明该部队并未归属陆军院领导。我们还需要指出的是,这份“摘要”所搜罗的信息“在整体上”被认为是不完整的,因为三年之后,即1768年,枢密院首席元老维亚泽姆斯基因举行立法委员会会议需要再次向陆军院索要了所有哥萨克部队的信息资料^②。

俄帝国政府的行动并未局限于研究哥萨克现状。1765年3月10日,叶卡捷琳娜二世在确认前任沙皇所颁发的最高法令后又颁布一道法令,禁止帝国内非常规军(即各哥萨克军)在自己所辖领土内接纳和挽留逃亡人员^③。与此同时,由于针对顿河哥萨克实施了“拧螺丝”政策,结果造成不少人纷纷逃亡高加索

^①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248,目录113,案卷501,第8-14页及14页背面。

^② 总参谋部总档案馆莫斯科分部哥萨克事务档案目录//编者:И.И. 德米特连科大尉,出版单位:总参谋部军事学术委员会,圣彼得堡:独立宪兵团总部出版社,1899,第194页。

^③ 俄罗斯帝国法律大全,第十七卷,第86页。





地区。一份日期为1766年8月的资料显示,在顿河地区的上卡尔加利镇有一些哥萨克,他们携家带口逃亡到库班地区一个叫“黑森林”的地方^①。



扎波罗热哥萨克巡察南部边境

面对俄政府财政长期拨款不足,哥萨克显得相当敏感和不安。三支规模最大的哥萨军队——顿河军、扎波罗热军和雅伊克军,政府每年按八千至一万卢布标准下拨给他们,用于保障食物以及火药和枪弹的供应。尽管资金数目有限,但1766年至1768年间,这笔刚需资金却被拖延了一年

年到一年半才发放。而政府财政保障方面最为脆弱的一个群体是那些常年在边境前哨服役或者在各防线地区驻扎的哥萨克部队^②。

俄政府还启动了哥萨克迁移进程,将他们从历史所在地区调往国家实际控制的边境地区。如在十八世纪第二个四分之一时间里,察里津防线无论是“沿线”地区,还是“靠近”该防线的地区均已失去作为边境地区的地位。于是,十八世纪的六十年代初,关于自1730年起就驻扎那里的伏尔加哥萨克部队(有六个镇,约一千名战斗人员)整体迁往高加索地区的问题被提到议事

^①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15,目录1,案卷149,第17-18页。

^② 俄罗斯帝国法律大全集,第十八卷,第705-706页。

日程上来。迁移准备工作于1763年至1770年展开,但最后却以调动部分人员于1770年至1771年前往库马河镇守通往基兹利亚尔要塞要道而草草收尾^①。就这样,伏尔加哥萨克迁移工作一直拖延着,直到1777年才最终完成^②。

俄帝国政府为避免自由租借土地这一哥萨克传统做法在西伯利亚省等新安顿地区流行起来,便对哥萨克的土地使用进行监管。最为典型的例子是额尔齐斯河防线地区。十八世纪上半叶,该防线服役的大部分部队是从顿河和雅伊克地区派驻的哥萨克,出于这一事实,俄政府为保障粮食供给,给他们划拨了土地,但这些土地并非由哥萨克驻防军自己耕种,而是让国家农民经营,以此来代替哥萨克部分或全额人头税。1767年3月27日,枢密院做出决定,给驻守防线的哥萨克按每个男子六俄亩(合六点六公顷)标准划拨土地。此举有助于减少西伯利亚省财政负担,并彻底将哥萨克固定在其防区地盘上。土地划拨工作由省测量办公室监管。适中的土地划拨量也起到阻隔哥萨克因受诱惑而接纳逃亡人员定居来替自己耕种多余土地的作用^③。

同时,俄政府还努力增加西伯利亚哥萨克居民数量,它不仅有计划地从顿河、雅伊克地区往西伯利亚迁移哥萨克,甚至还在那些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哥萨克身上打主意。这一点可以从1770年1月19日西伯利亚哥萨克部队总指挥官、少将施普林格

① 俄罗斯国家军事历史档案馆,全宗23,目录1/121,案卷936,第18页、22-26页、38页。

② A.B.库雷舍夫:《伏尔加哥萨克军(1730—1804)——建立,发展及改造成常备哥萨克团》,伏尔加格勒:出版者出版社,2011,第181-190页。

③ 俄罗斯帝国法律大全,第十九卷,第744-745页。





尔向陆军院所作报告中看出：他不仅毫无法律障碍地将一百三十八名因参与1768年乌克兰科利伊夫盖达马克大起义而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哥萨克划入西伯利亚防线要塞驻防部队，而且还从物质方面帮助这些人解决获取马匹、置办武器等装备和解决土地耕作、生产等问题^①。

1767年至1769年，立法委员会充分展示出自己的工作意图——试图实现官方所理解的帝国社会的可能结构，包括确定哥萨克在其中的阶层定位。1766年12月14日，叶卡捷琳娜二世颁诏，决定成立立法委员会来制定帝国新法典方案。这是政府与地区和地方国家团体进行直接对话，包括与哥萨克对话的一次尝试。立法委员会在工作过程中制定出一份方案。该方案将进一步规定帝国全体臣民的权利，使按社会地位划分的权利合法化。这份方案数易其稿，不断完善，出现了几种勘校文本。根据最后一版文本内容规定，所有俄国臣民应分为高、中、低三等级“类别”。社会上层群体，即第一等级，又曰“最高类别”，由“高贵”人群构成，中等“类别”（第二等）又分三小类：第一小类是学者、艺术家和神职人员（“从事学术和职员行当”）；第二小类是商人、工厂主、航海员和船主（“经商者”）；第三小类是手艺人、市民和解放了的农奴（“从事市民阶层各种正经工作之人”），最后，第三类“低等类别”由庄稼人（独院农户和其他枪炮器械维护人员及其后代、外国移民、自由农民、经济农民、皇家农民和工厂农

^① 俄罗斯国家军事历史档案馆，全宗13，目录1，案卷131，第46页及其背面、47页。

民、国家农民；车夫；农奴）和游牧民（以及非俄族贡民）组成^①。

哥萨克的位置在哪儿？显然，这个问题不仅委员会中来自帝国哥萨克阶层的代表们不清楚，连帝国高层的“指挥们”也不明白。最终，委员会制定出“哥萨克部队权利法律草案”^②，于是，尝试解决哥萨克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这一工作才算是得以完成。

根据一份日期为1767年7月24日下游扎波罗热军向立法委员会递交的“请愿书”的文本内容可以断定，在立法委员会着手工作之前，下游扎波罗热军领导乃至全体哥萨克对自己的“社会政策”基础的认识，即自身在俄罗斯帝国社会总体结构中进一步发展的认识总体来看至少是模糊不清的^③。请愿书共计十条内容，其中仅有一条（第八条）在涉及哥萨克军新成员的补充和退伍哥萨克归扎波罗热司法管辖这两方面的法律基础时才提及下游扎波罗热军愿望问题^④。即便这样，他们也把该愿望的实现与他们同新俄罗斯省领土争端这一现实问题捆绑在一起。

下游扎波罗热军在表达自身愿望（其实是对政府提要求）之际还远不能理解立法委员们究竟应当讨论哪些“哥萨克问题”，因而他们的愿望基本上涉及的是解决土地争端，解决同帝国内

①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342，目录1，案卷220，第1部分，第62页及其背面、267页背面、370页。

②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342，目录1，案卷220，第1部分，第413-427页、428-442页。

③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342，目录1，案卷105，第477-490页。

④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342，目录1，案卷105，第485页背面。





陆省份以及同外国进行货币流通等相关问题,而立法委员会需要讨论的则是国家未来社会制度的基础方案。就是说,扎波罗热人与俄政府当局对未来的理解存在着根本的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在何处?主要表现为扎波罗热哥萨克的自我定位与外界对其认识截然相反。这种迥异的观点最好不过地体现在对哥萨克本质的传统思想认识方面。

在扎波罗热哥萨克的想象中,社会中的单个群体应分属于“宗教、骑士和农民”三个不同阶层^①。扎波罗热人自己认为哥萨克应当被视为“骑士”阶层,也就是高贵阶层,而扎波罗热人对哥萨克这一高贵本质的认识由来已久:比如,十七世纪上半叶,波兰-立陶宛王国高层官员在与哥萨克盖特曼以及阿塔曼往来信函中就承认“贵族与哥萨克应获得同样的尊重”,因为大家都是在用刀剑和鲜血保卫着国家^②。



扎波罗热哥萨克与土耳其海战

下游扎波罗热哥萨克军官本身对其军队的历史使命、在社会中的作用与地位定位是这样的:他们不是其他什么人,而是整个基督教

世界免遭“异教徒”侵害的保卫者。这类想法颇为典型,我们在多位扎波罗热哥萨克官员的表述中均能见到。例如,1772年9月

^① 俄罗斯国家海军档案馆,全宗233,目录1,卷宗14,第46页。

^② И. 卡马宁:关于波格丹·赫梅尔尼茨基起义之前的哥萨克问题,基辅:高尔察克·诺维茨基出版社,1894,第55页。

29日，哥萨克军法官尼古拉·卡萨普给第聂伯防线指挥官切尔特科夫少将去函，同其就俄军抢夺扎波罗热土地问题进行争论，强调不允许这种情况出现，原因在于“众所周知的哥萨克军的丰功伟绩——他们痛击异教徒，用自己血肉之躯阻挡着敌人对国家的侵略”^①。

而俄罗斯贵族方面，首先是贵族高层，他们是以怀疑的态度看待扎波罗热代表争取使全体下游扎波罗热军哥萨克贵族化这一图谋。在他们看来，这些扎波罗热人是一群普通的哥萨克和农民，他们擅自脱离社会，从事着捕鱼、饲养牲畜等活动，干着不择手段抢劫邻居（从事盖达马克活动）的勾当。1765年，小俄罗斯院部长彼得·卢缅采夫在一份呈交女皇的奏折中对军书记官戈洛巴评价很差，认为此人“非骑士之楷模，实乃鸡鸣狗盗之徒，钻营发家之捷径……”^②。而同时期的少将冯·施托芬在1765年3月向女皇提交御审的下游扎波罗热军改革方案中谴责哥萨克，认为这些人主要从事的活动不是在军事上图谋保家卫国，而是饲养和贩卖牲口，“其畜牧从业者几近一万四千之众，然所能派出作战骑士仅为四千之数”^③。总之，扎波罗热人力图集体“贵族化”的心愿无论如何都注定无法实现。

立法委员会关于下游扎波罗热军“方案”中的提议尽管没有付诸实施，但直到该部队结束其历史存在之前，它对哥萨克军改革的事态发展进程无疑产生了巨大影响，因为它不仅向哥萨克

① 俄罗斯国家军事历史档案馆，全宗52，目录1，案卷95，第3部分，第222页背面至223页。

②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13，目录1，案卷76，第5页背面。

③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13，目录1，案卷78，第5页。





军领导展示了该军要被迫改变传统生活方式的未来悲哀趋势，还导致后者采取极端措施来巩固自身在该地区的地位。其中让哥萨克最受刺激的一件事是委员会的立法者们最终明白他们要将哥萨克划归“哪一类”了。果然不出所料，哥萨克被划归为最低等的第三类。而在哥萨克看来，这是最为侮辱“骑士”尊严的事。委员会中来自下游扎波罗热军的代表穆西·斯卡帕就这一个结果向负责贵族类法律汇编工作的分委员会提出一份报告，要求将哥萨克军从“第三”等级移入“第一”等级。报告中突出了扎波罗热人的特殊历史地位、他们的古老特性以及哥萨克军“一直都属于贵族之列，而非什么农民出身”^①。

虽然“方案”的实施被拖延了几年，但哥萨克群体各阶层普遍对拟议中的改革内容和部队未来地位不满，这种不满逐渐酿成一种滋养环境，催生出连续的暴动（起义），并使之走向成熟，最终于1770年初席卷了俄帝国境内各哥萨克边区。有一个事实可以视为是体现这种不满的独特试金石：新法典委员会中有两名来自奥伦堡哥萨克部队的代表——百夫长帕杜洛夫和哈里通·萨姆索诺夫，而其中的这位帕杜洛夫后来加入了普加乔夫起义队伍，并以后者的书记官身份参加战斗^②。

俄政府不善于听取哥萨克声音，而后者不善于理解情势变化，这种情况用雅伊克哥萨克的例子来说明最好不过。俄政府

① A. 弗洛罗夫斯基：1767年立法委员会中的扎波罗热军代表，敖德萨：“斯拉夫”E. 赫利索格罗斯出版社，1912，第27页。

② П.И. 阿夫杰耶夫：奥伦堡哥萨克军历史记录，军事经济委员会顾问П.И. 阿夫杰耶夫上校于1873年编，奥伦堡：H.A. 佩尔隆诺夫出版社，1904，第173—174页。

改革雅伊克军方案的出台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早在1748年，奥伦堡省省长涅普留耶夫就向陆军院提交了一份审议方案，建议按顿河军模式对雅伊克军制度进行调整^①。他认为主要任务是终止雅伊克人的全体哥萨克大会制。1763年，尽管政府对阿塔曼选举进行了规范，使政府得以在军队领导层中安插亲信，但对雅伊克哥萨克全体大会制的禁止导致了军权被军阀篡夺，而部队也因此分裂成两派^②。

早在1760年初，雅伊克军日后发生冲突的萌芽就已出现，它牵扯到当时部队指挥官霸占雅伊克河及其支流处的最好捕鱼场、对普通哥萨克征税以及强制军人执行计划外派驻等事件。最后，政府部门不得不出面干预。1770年12月31日，遵照女皇旨意，禁卫军大尉杜尔诺夫被派往雅伊克，主管舞弊案调查组工作。杜尔诺夫制定了渔场使用规则，指望以此来平息广大贫穷哥萨克的愤怒^③。

需要指出的是，仅仅平息哥萨克平民对指挥官们违法乱纪行为的愤怒还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令雅伊克人不堪忍受的主要是哥萨克传统生活方式的“转换”之苦，因此暴动此起彼伏。部队指挥官波罗金所作的“1772年至1773年雅伊克军叛乱记”显示，全体哥萨克，无论是“年长的”还是“年轻的”，他们都对履行政府出台的《哥萨克兵役法》感到不堪重负。拥有物产丰富的河段和土地使那些即便不太富足的哥萨克家庭也每年能得到

① 俄罗斯国家军事历史档案馆，全宗13，目录1，案卷141，第2部分，第2页。

② 俄罗斯国家军事历史档案馆，全宗13，目录1，案卷141，第2部分，第44页。

③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6，目录1，案卷505，第2页及其背面、3页。





两百卢布的盈利收入。要知道有大量逃亡者,他们季节性地在渔场打工(每年夏天,差不多有两千名逃亡人员来此打短工,而真正能服役的哥萨克也只有八千人),这充分保证了廉价的劳动力人手。如此一来就不难理解,将部队派往高加索或西伯利亚防线执勤就是一种繁重负担。因此,广大哥萨克士兵不乐意。此外,雅伊克人与政府就宗教问题的对话也陷入僵局,原因是他们中大多数人属于旧礼仪派教徒^①。

上述这些矛盾的累积为1772年1月13日在雅伊克军政府中心——雅伊克城的武装起义作了铺垫。而起义的直接原因是冯·特劳宾别戈少将前来调查雅伊克军放行卡尔梅克人逃亡准噶尔一事。由于接下来的起义事件已有详细描述^②,在此我们就不再展开。仅需指出,这次起义的领导人之一——“行军和战斗中的第一首领”——是彼特罗帕夫洛夫教堂的米哈伊尔·瓦西里耶夫神父^③。

雅伊克哥萨克起义被镇压之后,陆军院制定了雅伊克军改革方案。此方案是按奥伦堡省前任及时任省长的建议为根据制定的,即参照了1748年涅普留耶夫提出的方案,也参照了省长列因斯朵夫的建议。该方案于1773年3月7日呈报女皇御览。该方案各条款建议如下:第一,取消雅伊克军区和办公厅,代之以

^①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6,目录1,案卷505,第3页、36页及其背面。

^② И.Г. 罗兹涅尔:风暴前的雅伊克,1772年雅伊克起义——E. 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战争的前奏,莫斯科:思想出版社,1966,第110-185页。

^③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6,目录1,案卷505,第9-12页及12页背面。

雅伊克军警备厅,由一名非哥萨克军职业军官领导,负责处理军队内部事务;第二,雅伊克全军划分为八个团,外加两个分别由伊列克镇和萨克马拉(即居住在萨克马拉河的)哥萨克组成的团(共计十个团,每团五百人)。这十个团按数字序列命名,并通过现有哥萨克及其已满十七岁子男性子嗣来配齐人数;第三,责成所有哥萨克团轮流派往前哨进行战斗执勤,而那些留在家里的哥萨克须进行操练;第四,粮饷薪水就地发放,禁止派代表前往京都拿要;第五,添置军服(领章与袖口带团队识别标识的日常哥萨克军装)、购置武器(火枪一杆,标枪一支,手枪两把),马匹(每人不少于一匹)由本人负责饲养;第六,允许雅伊克军从事捕鱼和打猎活动以便维持日常生活和外派执勤等开销,但取缔酿酒制造权(作为对暴动的惩罚),在雅伊克军防区境内实行酒类专卖制;第七,责成雅伊克军就军队自身情况每月进行汇报,而奥伦堡省省长则负有对该军进行监督并呈报关于军队今后改革成效之职责^①。

这份报告内容总体上被女皇认可,于是开始付诸实施,这反过来又引起了1772年至1773年积极参与起义的那部分哥萨克更大的不满。雅伊克哥萨克内部问题得不到解决,这是促使那些一贫如洗的雅伊克人成为普加乔夫起义队伍第一阶段核心(两百至三百人)的基本原因(并且根据性质和规模,普加乔夫大起义不能仅解释为哥萨克暴动,它还具有“农民战争”的典型特点)。官方对这一事实也不是没有察觉。这一点可阅读一下刊

^① 俄罗斯国家军事历史档案馆,全宗13,目录1,案卷141,第2部分,第2-7页。





登于1774年12月19日叶卡捷琳娜二世所颁“诏书”中的“暴乱起源及歼灭暴徒、叛乱分子和欺世盗名者叶麦利卡·普加乔夫记”，还可参阅1775年1月10日发布关于处死他的判决书(诏令)^{①②}。1775年1月15日，女皇给陆军院签署法令，将雅伊克军更名为乌拉尔军。此举算是完成了“绞杀”所有参与普加乔夫起义的哥萨克以及“老雅伊克哥萨克”仪式^③。

如前文所述，尽管政府制定了详细的哥萨克军权利法方案，但在实际生活中却并未付诸实施，而只是朝着实施该方案的方向迈出几步。例如，1768年12月20日，叶卡捷琳娜二世给小俄罗斯院签署法令规定，凡该院所属哥萨克军队（这里指的就是下游扎波罗热军，因为除它之外该院就没有管辖其他哥萨克军队）以及被取消的小俄罗斯省（盖特曼区）各哥萨克团民事事务均应按“小俄罗斯权利与章程”来执行和判决，而其他属于军事事务部分则应受“军事章程”和“军事条例”制约。该法令当时曾计划自1769年开始实施，但战时条件使得该法令的实施被推迟了很多年，直到与奥斯曼土耳其战争结束^{④⑤}。

俄土之间再次开战是因俄土边境土耳其一侧一个叫戈尔特瓦的地方发生的一起事件。1768年6月末，一支扎波罗热哥萨克小分队放火焚烧了该地。这起事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使得俄帝

① 俄罗斯帝国法律大全，第十九卷，第1065-1066页。

② 俄罗斯帝国法律大全，第二十卷，第2-3页、8-10页。

③ 俄罗斯国家军事历史档案馆，全宗13，目录1，案卷141，第2部分，第32页及其背面、35页。

④ 俄罗斯国家军事历史档案馆，全宗52，目录1，案卷311，第126页及其背面。

⑤ 俄罗斯帝国法律大全，第十八卷，第786页。

国境内三支最大哥萨克武装——下游扎波罗热军、顿河哥萨克军和雅伊克哥萨克军之间原本紧张的关系加剧。

这些扎波罗热的“无法无天分子”，确切地说，这些不受下游扎波罗热军政府约束的盖达马克是诱发1768年俄国与奥斯曼帝国例行战争（参见1768年11月18日的宣战书）的原因之一，因而为沙俄政府所特别关注。尽管如此，沙俄政府对哥萨克高级指挥官并没有进行惩罚，因为它需要这些塞契官兵来为其服役^①。1768年10月末11月初，已被任命为第二集团军总指挥的基辅总督彼得·卢缅采夫多次下令，要求科什阿塔曼彼得·卡尔内舍夫斯基带领下游扎波罗热军做好充分准备，时刻准备击退土耳其-鞑靼联军来犯，然而扎波罗热军对战争却没有准备好：如果说军官们已经准备好执行上级命令的话，那么这些“塞洛马”（贫穷哥萨克）却于1768年12月26至27日在塞契发动了暴动^②。因为在这些哥萨克中，一股投奔土耳其或鞑靼人的念头再次抬头。而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投奔“异教徒一方”（即投奔土耳其一方）这一想法抑或先于十八世纪大部分哥萨克反俄运动产生，抑或与这些反俄运动相伴相随。举例说明，还是这位叶麦利卡·普加乔夫，他于1772年11月诱使雅伊克军前往拉巴河的“土耳其”地区。同样，在数月之前，也就是一月份，他就采用过“投奔土耳其”的类似愿景来诱惑捷列克军^③。

基层穷苦哥萨克拒绝战争动员，他们发动骚乱，并最终发展

① 俄罗斯帝国法律大全，第十八卷，第762页。

②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13，目录1，卷宗76，第127页及其背面。

③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6，目录1，案卷413，第1-3页。





成对忠于政府的哥萨克的大洗劫。此类事件不仅发生在塞契,在下游扎波罗热军控制下的其他大型据点也发生着,这导致部队战斗力遭到破坏。结果下游扎波罗热军既无能力保卫自己的领土,也无能力在1768年12月至1769年1月间抵抗克里米亚汗国军队对伊丽莎白堡和巴赫姆特两省的进攻^①。正是下游扎波罗热军在战争初期的这种糟糕表现被沙俄政府用作了日后剿灭塞契的理由——“这些扎波罗热人未能给我军提供有关克里米亚汗王军队逼近边界的情报,他们未能在前方对行进中的汗国军队进行任何阻截”^②。

与此同时,其他非正规部队在反击鞑靼人进攻的“阵地坚守”中也出现不少问题。比如,1769年8月末,坚守别尔达河、康佳河和卡拉特什河分水岭一线(这是1739年《贝尔格莱德和约》条款于1740年至1741年划定的俄土边境线)的卡尔梅克部队不战而逃,首先退至卡利米乌斯河,继而又撤过顿河,将道路让给了克里米亚汗国军队,而后者立即抓住这一战机,将部队推进到第聂伯河左岸扎波罗热腹地,兵锋直抵萨马拉河。由于此时扎波罗热哥萨克主力部队主要集中在奥恰科夫城附近,于是最高统帅部便命令顿河哥萨克军紧急调派七千名哥萨克士兵前往替代逃跑的卡尔梅克人,然而,并没有等到增援部队。这主要是由于军事阿塔曼叶夫列莫夫不仅不愿意从顿河调派部队支援,甚至还将在第二集团军参战的三千顿河哥萨克官兵调回过冬。他此举是把哥萨克军土地的安危置于整个帝国利益之上。这一做

^① B.A. 戈洛布茨基:扎波罗热哥萨克,基辅: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7,第409-413页。

^② 俄罗斯帝国法律大全,第二十卷,第193页。

法,连同他让溃逃的卡尔梅克人毫无障碍地通过顿河以及对帝国所犯的其他过错,比如,接收逃亡人员,套取钱款等,导致他于1772年10月被捕^①。他的被捕引发切尔卡什哥萨克反抗从京城派来“调查”并代替叶夫列莫夫位置的切列波夫少将。这次抗议活动史称“切列波夫暴动”^②。

针对叶夫列莫夫的调查从1772年持续到1774年,最初是在罗斯托夫圣德米特里要塞进行,1773年转到首都。1772年12月,部分哥萨克在军官带领下采用武力示威,他们不少人来到圣德米特里要塞,企图给调查委员会施以心理压力。这一行动尽管没有使得叶夫列莫夫获释,却也没有使行动参与者受罚。1773年1月23日,由于战争原因,这些参与闹事的哥萨克被女皇下诏赦免其罪。随着1774年6月与土耳其签订和约,那些针对顿河军的所有调查被终止,而被流放到波罗的海(现今奥沙尼亚派尔努市)要塞的阿塔曼佩尔诺夫,于1778年4月3日根据波将金公爵指示,被允许在自己的家乡塔甘罗格城附近安家落脚^③。但由于他被羁縻在圣彼得堡,在那里去世,并于1784年3月安葬在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因而未能在有生之年回家乡

① B.B. 格里博夫斯基:1769年最后的“鞑靼人入侵”//俄罗斯南部民间文化中的战争与军人传统(托卡列夫阅读,第五部分)//全俄学术与实践会议资料(顿河罗斯托夫市2016年5月6日至7日)//责任编辑:历史学副博士 А.Л. 博伊科、历史学博士 Д.В. 谢因,顿河罗斯托夫:阿里塔依尔出版社,2016,第77-81页。

② А.А. 卡拉谢夫:阿塔曼斯捷潘·达尼洛维奇·叶夫列莫夫(1753—1772)//顿河州公报,1902年9月22日第2-3页;9月24日第2-3页。

③ 顿河军历史文件,诺沃切尔卡什克:顿河州出版社,1902,第3-4页、88页。





安顿^①。

雅伊克哥萨克的“罪孽”也很深重。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该军沿雅伊克河驻扎,建立起一个个村镇。其主要任务已不再是守卫与哈萨克斯坦汗国接壤的国境线,而改为禁止俄国居民——卡尔梅克人——迁移(实际是逃离帝国)。这个任务顿河军1771年未能完成,其领导人不仅没阻止汗王渥巴锡带领卡尔梅克人渡过雅伊克河,而且,据现有资料显示,他还因此获得过后者物质补偿。同时,还有近两百名雅伊克哥萨克加入这支迁徙大军,随他们一道去了准噶尔。随后发生在科利伊夫的起义以及1772年至1774年的普加乔夫大起义使得顿河军的防卫体系彻底失去平衡。在中央政府眼里,顿河哥萨克军完全不堪大用^②。

顿河军与下游扎波罗热军无休止的土地争端以及后者与新俄罗斯省居民持久的土地冲突使得枢密院要求这两支军队必须提交能够证明它们对现有土地有拥有权的证据,结果土地冲突按有利于顿河军的方式解决^③。

通过沙俄政府对土地问题的处理态度,下游扎波罗热军嗅

① A.A. 卡拉谢夫:阿塔曼斯捷潘·达尼洛维奇·叶夫列莫夫(1753—1772)//顿河州公报1902年9月22日第2-3页;9月24日第3页。

② B.B. 格里博夫斯基:十八世纪三十年代至八十年代雅伊克河哈萨克斯坦汗国与俄罗斯帝国边境线(阿斯特拉罕州国家档案馆资料)//国际学术-实践会议资料《由哈萨克汗国到独立的哈萨克斯坦之路》(阿斯塔纳,2015年5月22日-23日),阿斯塔纳:国家历史研究院出版社,2015,第60页。

③ 总参谋部总档案馆莫斯科分部哥萨克事务目录//编者:И.И. 德米特连科大尉,总参谋部军事科学委员会,圣彼得堡:独立宪兵团总部出版社,1899,第208页。

到了一股威胁气息,部分军官认为不能坐以待毙,而是要采取措施,与俄政府关系正常化。1774年,该军代表——戈洛瓦德、别雷、莫申斯基等人向政府提出军队改革方案,并提交给波将金审查。该方案建议利用各种借口将“不可靠”分子清除出哥萨克军,实行类似顿河军的管理制度。方案还建议建立部队例行名册,将其作为“最终”名单,不再接受其他阶层人员加入。俄政府当局则认为,下游扎波罗热军兵员扩充的合法之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征召哥萨克成年男性子嗣进入军队服役”^①,而事关所谓的“军管农民”(即居住在扎波罗热军所辖境内且集体隶属该军管辖的农民),情况变得复杂起来。这些人无形中成了扎波罗热科什与俄政府之间的“绊脚石”之一。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初,下游扎波罗热军试图通过吸引俄帝国人口中各类“税民”来扩大自己军管人口数量。他们此举遭到当时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政府的严令禁止。为此,1756年8月5日,枢密院专门给下游扎波罗热军下达一道禁令^②。尽管如此,下游扎波罗热军“非法”扩大其军管农民的做法继续进行,特别是在自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的科什阿塔曼彼得·卡尔内舍夫斯基掌权的那些年里,增加军管农民的做法越发规模化。在他的带领下,科什改变做法,暂时停止从不久前开发出来的宜居土地上驱离那些不愿服从管

^①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248,目录126,案卷468,第388页。

^②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248,目录113,案卷1579,第792页。





教的“外来人”^①，并且，下游扎波罗热军高层已不再满足于被动等待新的迁移者前来，他们开始给“新俄罗斯”省那些居住在政府赏赐给军官们的村庄里的居民开出优惠条件，吸引他们迁移到自己军队所辖土地上的自由村庄里来生活。可以不夸张地说，科什“新政”极大改变了自由人口和那些对地主有着人身依附关系的人口的流向性，并且这一过程不仅在新俄罗斯省境内蔓延，还波及斯洛博达乌克兰省^②。

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扎波罗热地区的“偷渡者”人数第一多的是军管农民和下游扎波罗热军哥萨克士兵，这些人最早是在例行的俄土战争爆发前从自由区逃到较为安全的新俄罗斯省境内，然后再从那里跑回扎波罗热地区（即自由区）；人数第二多的是诺夫斯洛博达团的前哥萨克士兵，这些人对1764年将他们变成长枪兵一事心怀不满；最后一类是那些从波控乌克兰地区大封建主领地逃亡过来且在新俄罗斯省军官“自由村”住过一段时间的人员。对这些人而言，继续在自由村待下去的结果就是变身为农奴^③。由于这些志愿迁移者已被政府列入“征税对象”（征税名册），或已被编入当地哥萨克团服役。这些人的离开，且是携家带口逃离便遭到俄地方政府和军事部门的阻挠^④。

① 基辅乌克兰国家中央历史档案馆，全宗229，目录1，案卷143，第3-4页。

② 俄罗斯国家军事历史档案馆，全宗52，目录1，卷宗95，第3部分，第242页。

③ 俄罗斯国家军事历史档案馆，全宗52，目录1，案卷1，第19-23页及23页背面。

④ 俄罗斯国家军事历史档案馆，全宗52，目录1，案卷95，第3部分，第127-128页，128页背面。

截至1775年初，“被引诱过来的”或被扎波罗热哥萨克强行带到自由区的总人数中，来自新俄罗斯省伊丽莎白格勒州的有两千八百八十一名男子，叶卡捷琳娜州的有两千四百九十三名男子^①。

扎波罗热哥萨克的种种“劣迹”使得俄帝国政府在解决雅伊克问题之后就迫不及待地拿它“开刀”。1775年6月初，沙俄政府针对扎波罗热塞契要塞展开第二次军事行动，将其彻底摧毁（详情请参见第九章“布特卡雷”相关内容）。

总体来说，沙俄帝国这次是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扎波罗热哥萨克自由区。然而，史学界惯称的“1775年扎波罗热塞契覆灭事件”却不能仅被看成是1775年6月5日那天俄军“一次性”占领哥萨克首脑中心的军事行动。这次行动持续了数月之久，并根据全帝国标准，采取了一套统一规范扎波罗热制度的综合措施。

1775年，塞契覆灭之后，俄国政府照会土耳其政府，专门通报了有关针对塞契——刚刚过去的那场战争罪魁祸首的严惩措施^②。

自1776年初开始，波德波利纳亚河畔扎波罗热塞契在俄罗斯官方文件中便正式以“波克罗夫斯克镇”名称出现，但五年之后，这一地位便被取消，改称“波克罗夫村”。

俄政府相当一部分精力花在了对前扎波罗热自由区的行政

^① 俄罗斯国家军事历史档案馆，全宗52，目录1，案卷95，第2部分，第35页及其背面。

^② 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90，目录90/1，1775—1780，案卷614，第12页。





区划制度改革方面,而措施的计划性和系统性是其关注点^①。捷克利与其下属制定了将扎波罗热地区分别划归新俄罗斯省和亚速夫省的方案,该方案于1775年下半年付诸实施。从此,前哥萨克军的帕兰卡被调整为一个个相应的县^②。到1775年末,为减轻征税工作负担,他们制定出一份扎波罗热境内窝冬村和其他自由居民村庄的人口清单^③。另外,当地政府也花费不少精力来改变前哥萨克队伍中已婚者与单身男子的比例关系,鼓励男子结婚成家。这种做法也可以理解,因为扎波罗热哥萨克中对政府最忠诚的一群人是那些已婚者,即所谓的“有家室者”。政府当时的想法与实际做法是一致的。最能说明这种情况的是1775年6月捷克利颁发给军官利亚波军人荣誉证书里的一段文字,“……由于他是已成家立业的扎波罗热人中一位最受尊敬之人”^④。当局想尽办法,采取各种措施来鼓励哥萨克成家立业,给他们提供额度为三至五卢布的经济援助(当时的十五至十八卢布就可以买到一匹马!——译者注)来发展经济。县里(以前的帕兰卡居民点)的俄军指挥官每月要向亚速夫省和新俄罗斯省省长汇报那些前扎波罗热哥萨克结婚男子的数量,而报表信息

① A. 博伊科:十八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期的南乌克兰//文献分析,基辅: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格鲁舍夫斯基古文献学与史料学研究所出版社,2000,第59页。

② 俄罗斯国家军事历史档案馆,全宗52,目录1,案卷79,第101页及其背面、102页。

③ 俄罗斯国家军事历史档案馆,全宗52,目录1,案卷79,第101页、167页。

④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16,目录1,案卷797,第6部分,第148页。

则要向亲自主管该工作的波将金呈报^①。俄政府的这些措施从根本上影响了早先塞契流行的单身传统,给俄帝国带来足够的实际效果。

1775年与1776年之交是一个特殊时间点。从此以后,可以说俄国官员从总体上清除了扎波罗热自由区先前的传统制度。于是,1775年便成了叶卡捷琳娜二世政府整顿哥萨克阶层过程中的一个独特节点。其间,最早实行改革的顿河军成了俄帝国内所有哥萨克军队统一规划的榜样。1775年3月,所有参与对土耳其和波兰贵族同盟作战的顿河军军官均获得了军衔,并相应地获得贵族身份。正是这一举措促成了顿河哥萨克中贵族亚群体的形成,而同时,作为其中成员,该亚群体又保留了哥萨克阶层的归属特性^②。1775年2月4日,女皇批准了陆军院副部长波将金关于在顿河地区成立民事政府的报告,其中建议将涉及国库税收连同其他一切与贸易、工业、农耕和财产纠纷相关的案件交由该政府处理。实际上,这是将俄帝国行省制中的大部分要素引入顿河地区的管理工作中来^{③④}。此时的雅伊克军,由于屈从于政府的铁血手腕,正在积极按照顿河军的模式进行改造。那种自由选举军官的做法无论是在顿河军哥萨克,还是在雅伊克军(即乌拉尔军)哥萨克中均被彻底废除,而下游扎波罗热哥

①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16,目录1,案卷797,第6部分,第184页。

② Л.М. 萨维洛夫:顿河哥萨克贵族,第1辑,莫斯科:И.Н. 库什涅列夫公司印刷厂1902,第10页、27页、64页、104页、118页。

③ 俄罗斯帝国法律大全,第二十卷,第53-55页。

④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16,目录1,卷宗703,第1-2页。





萨克军则是终止了存在,部队的指挥官遭到迫害,其土地也被亚速夫和新俄罗斯两省瓜分。

那时候,也就是1775年,波将金还按他本人想法对乌克兰南部哥萨克部队采取了整顿措施。其中,1775年6月25日,女皇批准其关于解散亚速夫和塔甘罗格两个哥萨克团的报告。这两个团各有五百一十四人,当时是为了在两个要塞间进行交叉巡查而建立的,这两个团的名称来自这两个要塞名称。由于这两个团的成员均来自顿河军外派人员,因而政府觉得将该区段交由顿河军来防卫使原本就已经够多的非正部队再添新成员,这是多余之举,没有必要^①。

^① 俄罗斯帝国法律大全,第二十卷,第170-171页。

第九章 布特卡雷:塞契覆灭后的土耳其扎波罗热哥萨克(1775年—1791年)

1775年夏,俄国政府展开了第二次军事行动,彻底摧毁了扎波罗热塞契要塞。与1709年不同的是,这次沙俄军队没有采取正面猛攻,从而避免了双方大量人员伤亡,但后果却与前次相仿,即同样导致相当数量的扎波罗热塞契哥萨克出走土耳其。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叶卡捷琳娜二世及其亲信作出剿灭扎波罗热塞契哥萨克的决定的?

其实,促使沙俄政府采取这一措施的主要原因是下游扎波罗热军与俄国乌克兰防线、新塞尔维亚和斯拉夫塞塞尔维亚以及诺沃斯洛博达哥萨克团等地各军事农耕据点之间产生的长期土地纠纷(1764年后这些地区合并成统一的新俄罗斯省),除此之外,他们还同顿河哥萨克争夺地盘,且这些纷争早在十八世纪四十年代就已经开始。双方都曾发生过相互偷赶牲口、抢劫财物和驱赶居民之事。这些冲突在1768年至1774年的俄土战争期间达到顶峰,加之这期间扎波罗热塞契又定下一条政策,决意从那些不速之客手中夺取他们认为属于自己的土地。尽管下游扎波罗热军忠心耿耿地服务俄国,并且在战场上屡立战功,但他们这些所作所为还是引起沙俄中央政府的极度反感。于是,俄土



战争结束后不久,圣彼得堡便着手研究如何彻底解决“扎波罗热问题”了。

关于消灭塞契或至少要抓捕其高层领导人这一议题,因为俄枢密院部分成员在几次御前会议上均陈述了“此事务必当机立断”的必要性,于是,此事便于1774年5月再次被提上议程。但出乎预料的是,因为某种我们目前尚不知晓的原因,叶卡捷琳娜二世当时拒绝了这种提议。她强调说,下游扎波罗热军在刚刚过去的俄土战争(1768年至1774年)中一直忠心耿耿,为国效力^①。此后接下来的一年里,枢密院会议关于消灭或改造扎波罗热军的“扎波罗热问题”方案便没有再讨论,尽管其间来自新俄罗斯省、斯洛博达乌克兰省以及顿河军等各军事部门对扎波罗热军的指控不断(如,1770年夏至1773年扎波罗热军与第聂伯河防线要塞之间的冲突;1771年至1774年同顿河军就卡利米乌斯河地区的土地以及亚速海几处沙嘴的争夺;1769年至1774年同伊久姆州居民点争夺奥列利与萨马拉河地区的土地,同伊丽莎白格勒州居民点争夺萨姆特干河与多莫特干河地区的土地等)^②。

形势最终的改变出现在1775年初,当时俄国开始对哥萨克军队管理进行改革。1月14日,波将金向女皇提交了一份报告,其中陈述了其本人对顿河军改革的看法。他认为顿河军应成为其他哥萨克军改革的榜样,提议完善对顿河军办公厅和阿塔曼的监管方式,参照俄帝国境内的行省制度,将顿河地区的民事管

^① 俄罗斯国家历史档案馆,全宗1146,目录1,卷宗3,第188页及其背面、190页及其背面。

^② 俄罗斯国家历史档案馆,全宗1146,目录1,卷宗3,第199页、203页背面、265页、269页。

理事务一劳永逸地与军事管理分离出来。该报告得到女皇首肯,并在随后的两个月之内付诸实施^①。

按理说,下游扎波罗热军也应参照此模式进行改革,然而,1775年4月,基辅陆军元帅彼得·卢缅采夫-扎杜纳伊斯基传来密报称,科什阿塔曼彼得·卡尔内舍夫斯基想要带领手下全班人马投奔土耳其。这种情形下的密报其实是一种诽谤,因为阴谋叛变论缺乏先在条件:以彼得·卡尔内舍夫斯基为首的军官们因战功已被重赏,而且科什依然还在期盼着解决土地纷争问题。尽管指控荒诞不经,但1775年4月27日的枢密院会议采取了一项果断措施:以审议扎波罗热哥萨克关于俄国政府侵占新俄罗斯省境内的土地意见书为名,邀请科什领导人火速进京。如果他前来,就说明他无变节之嫌,如果不来,就说明他有问题。与此同时,乌克兰左岸地区(小俄罗斯省)总督彼得·卢缅采夫还是被紧急秘密召回京城商议解决塞契之事。1775年5月7日,枢密院就解决塞契问题召开会议,女皇亲临。会议关于下游扎波罗热军的命运宣判具体表述是“……会议视科什为哥萨克悍匪之巢穴,务必予以剿灭,以约束暴民,弘扬法度……”^②。会议决定先用军队占领扎波罗热全境,抓捕塞契所有军官,之后彻底解散下游扎波罗热军^③。

扎波罗热塞契清除计划的制定者中除去卢缅采夫(此次行动的策划者)外,还有俄帝国总理帕宁和波将金公爵。这一点确

① 俄罗斯帝国法律大全,第二十卷,第14251号法令,第53-55页。

② 俄罗斯国家历史档案馆,全宗1146,目录1,案卷3,第188页及其背面、190页及其背面、290页、294页背面。

③ 俄罗斯国家历史档案馆,全宗1146,目录1,案卷3,第290页。





凿无疑,因为在那份对下游扎波罗热军来说是致命的御前会议记录上有这些人的签名。波将金,这位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宠臣在此次会议上建议说,俄土战争已结束,从凯旋的军队中动用十个团的常规部队参战,外加一定数量的非正规部队(指顿河哥萨



1775年5月7日关于剿灭塞契之御前会议

克、塞尔维亚轻骑兵部队),则这次行动实施起来就比较方便。令人非常惊讶的是,这份计划并非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本人亲自批准。她对上述几位高官的信任度是如

此之高,以致仅凭这几人便定下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①。

于是,彼得·卡尔内舍夫斯基还没有来得及进京(圣彼得堡),扎波罗热塞契的命运就这样被历史定格了,接下来只是计划的实施而已。为达此目的,需选出几位办事得力的执行者,这应该是那些战斗经验丰富的高级军官。照1775年5月末从首都圣彼得堡发出的命令内容看,这项任务落到俄罗斯南方军队(第一和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官阿列克山大·普罗佐罗夫斯基中将和彼得·捷克利中将身上(一位在俄罗斯军队服役的塞尔维亚人)。

在清剿下游扎波罗热军的行动中,俄国政府调动了多达四万之众的军队,其主力部队由十个团的常规部队组成,这些部队

^① 俄罗斯国家历史档案馆,全宗1146,目录1,案卷3,第294背面。

在前次俄土战争中就集结于黑海北岸。此外,还调入非常规部队参战(有顿河哥萨克、卡尔梅克人等)。当然,如此众多的军队不只是用来对付塞契哥萨克,他们主要任务是占领扎波罗热地区,且首要目标是那些帕兰卡中心和库林驻扎点。另外,此次行动中归彼得·捷克利指挥的还有附近新塞契防御城的俄罗斯卫戍部队。各路大军将通往塞契的全部道路封锁,并占领了塞契桥头堡——加桑-巴什以及附近的各处窝冬村^①。1775年6月4日凌晨,彼得·捷克利指挥的一支由塞尔维亚骠骑兵连和奥尔洛夫斯基步兵团组成的队伍逼近塞契营地。4日上午,彼得·捷克利指挥的俄军逼近扎波罗热塞契大本营。



1775年6月4日塞契覆灭

俄军的部署让塞契哥萨克对其作战意图十分明了,他们在短短数分钟之内便聚集到要塞内广场上举行全体大会(拉达会议)。会上发生激烈争吵,有相当数量的哥萨克主张武力抵抗,但也有不少人看不出归顺政府有什么不妥之处。此外,还有一

^① П. Г. 亚历山德罗夫:论清剿扎波罗热塞契军事行动进程//扎波罗热国立大学历史系学术论文,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1997,第二辑,第47页。





个主张和平让出塞契的原因,即多数下游扎波罗热军军官和塞契神父还保留着对俄国政府忠诚的意愿。于是,一小时之后会议结束,要塞大门打开,科什阿塔曼、军法官、军书记官、“大爷”以及库林阿塔曼依次走出营门,他们手捧面包,拿着盐坛子径直来到彼得·捷克利跟前,后面跟着全体塞契哥萨克士兵^①。

1775年6月5日,扎波罗热哥萨克额外举行了一场效忠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宣誓仪式,扎波罗热其他居民点也同样举行了这种仪式。总体而言,这次俄军以兵不血刃的方式完全吞并了下游扎波罗热军地盘。

在占领扎波罗热自由区最初几个礼拜期间,彼得·捷克利中将(又称捷克尔利)全力关注被捕者的处理问题:科什阿塔曼彼得·卡尔内舍夫斯基、军书记官伊万·戈洛巴和军法官巴维尔·戈洛瓦德等一行人被押送至莫斯科。经过一段时间的持续调查,高层军官被判终身流放,发往各地修道院——索洛维茨基修道院、托波尔修道院、吐鲁汗修道院等^②。全部财产被查抄充公,其中有塞契军军费十五万卢布,哥萨克军标志,各类火器。这些前哥萨克的火器收缴工作非常彻底,塞契档案资料也被查封没收^③。此外,1775年夏,捷克利针对扎波罗热军官和哥萨克还提

① B. 米尔切夫:彼得·捷克利——扎波罗热塞契“邪恶天才”素描//“塞利亚母亲”历史协会文集,第71—72辑,诺维萨德,2005,第206页。

② 彼得·卡尔内舍夫斯基和他的一天,文件与资料//编者:B. 格里博夫斯基、B. 米尔切夫、И. 西尼亚克,基辅:(出版社信息缺),2008,第322页、331页、337—338页。

③ 俄罗斯国家军事历史档案馆:全宗52,目录1,案卷79,第59页。

起了不少公诉，指控他们对新俄罗斯省居民实施了劫掠犯罪^①。

随后，俄国政府花费了相当大的精力来改造扎波罗热区域行政机构。7月，捷克利制定了一个方案，将第聂伯河位于新俄罗斯省和亚速夫省之间的扎波罗热段左岸与右岸地区进行了划分，并于1775年下半年付诸实施。从此，扎波罗热各地帕兰卡镇改为县^②。冬季来临之前，为了减轻税收工作，便于管控哥萨克，他们还在扎波罗热所有的窝冬村和居民区进行了人口登记^③。

这些措施让业已归顺的塞契哥萨克无法忍受，促使其中一部分人逃往土耳其境内。第一批“去当土耳其人”潮出现于1775年6月。这些哥萨克在彼得·捷克利处获得“路条”，前往“奥恰科夫方向”的黑海河口从事传统的捕鱼活动，但秋季并不回转。1776年春季，此类情况再次发生。到1776年年底，已有相当数量的扎波罗热哥萨克聚集在奥恰科夫草原，这造成俄罗斯和奥斯曼帝国两国关系出现严重问题。有关这群人的具体数目尚有争论，因为当时俄罗斯方面认为有近八千人^④（这显然是夸大事实，使局势紧张化）。土耳其方面有资料称，截至1778年5月，哥萨克人只有一千五百人^⑤。无疑，土方消息来源更加准确些。

① 俄罗斯国家军事历史档案馆：全宗52，目录1，案卷79，第167—168页。

② 俄罗斯国家军事历史档案馆，全宗52，目录1，案卷79，第101页及其背面、102页。

③ 俄罗斯国家军事历史档案馆，全宗52，目录1，案卷79，第167页。

④ П. 伊万诺夫：论覆灭后的塞契扎波罗热哥萨克历史//敖德萨历史与古代史协会笔记，第25卷，敖德萨，1904，第23—28页。

⑤ A. 巴塞：奥斯曼帝国布特卡雷定居点与活动情况考察（1775—1826）//土耳其—乌克兰关系国际研讨会之“哥萨克时代（1500—1800）”，伊斯坦布尔，2015，第539页。





俄国政府对扎波罗热哥萨克投奔土耳其一事深感不安,陆军院副部长波将金公爵亲自过问此事。他要求亚速夫和新俄罗斯两省的军政首脑在外逃者中开展宣传,敦促这些人返回俄国。于是,那些出身塞契哥萨克的俄国侦探人员遍访奥恰科夫草原各处扎波罗热人聚集地,会见同乡,劝说他们,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而在此过程中得到的情报被立刻上报给波将金本人。1776年11月,前扎波罗热哥萨克格利戈里·克里维茨基和谢苗·基斯里茨基受普罗佐罗夫斯基中将指派,来到奥恰科夫地区,造访了别列赞和季利古尔两个河口,收集有关扎波罗热哥萨克的情报。他们这样描述到:早在1776年春季,这些扎波罗热人就已经选举哥萨克伊格纳特·纳图拉为团长领导大家。这些叛逃的扎波罗



扎波罗热渔场

热人大多数是“穷人”,没有武器、缺少马匹,不是一支像样的队伍。他们在黑海沿岸、布格河-第聂伯河、别列赞河、季利古尔河以及德涅斯特河等河口渔

场落脚,居住在土窖和半土窖里,条件十分简陋。他们将捕到和加工出来的鱼卖给带着车队前来河口专门从事收购的摩尔多瓦公国犹太商人。有些哥萨克受雇成为“帮工”,帮奥恰科夫、阿克

尔曼以及本德雷等地的土耳其人织渔网^①。

在扎波罗热哥萨克投奔土耳其后的这段后塞契历史中，有关1777年至1783年间所发生的事，即便是在公认的权威研究者的表述中也只有片段性描述^②。在缺乏基础文献，特别是缺乏自述性文献的情况下，我们所发现的一位土耳其扎波罗热人穆希（莫伊谢）·什特里格利的受审记录显得十分有益和及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其中所传递的有关信息称得上独一无二，它所呈现出的事实使我们得以用新眼光来审视扎波罗热哥萨克如何演变成奥斯曼帝国边境的一个群体的过程。并且，这位哥萨克人生经历非凡，在不突破本书研究主题框架的前提下，我们认为其起伏跌宕的人生值得向读者介绍一二。

穆希·什特里格利（不清楚这是他的名称还是他在塞契的绰号），1751年出生于苏梅哥萨克团驻地斯杰尔茨科夫卡镇的一个军官家庭。他从小就学会识文断字，17岁那年出走塞契，加入了梅沙斯托夫斯基库林分队。1768年至1774年的俄土战争初期，什特里格利被编入扎波罗热舰队，在第聂伯河、黑海以及多瑙河等水域参加战斗。1773年被土耳其抓获，当了两年俘虏。俄土战争结束后，因双方交换战俘，他得以被遣返（1775年），但此时塞契已不复存在，于是他便冒名顶替别人，投奔了斯卡尔仁斯基的“新募团”（布格河哥萨克团的前身）服役。报到后的第二天，在领到皮靴和安顿费后他便开溜，跑到了土耳其的奥恰科夫城。

①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16，目录1，案卷797，第8部分，第121页及其背面。

② A. Д. 巴钦斯基：《多瑙河右岸塞契（1775—1828）》，历史文献概论，敖德萨，1994，第12—13页、28页。





在土耳其被俘的两年中他学会了当地语言。因此,对他而言,土耳其文字掌握起来不是问题。于是,自1776年起,什特里格利便靠替人当翻译谋生。此外,由于对第聂伯河下游非常熟悉,他便受雇土耳其商船,往返于奥恰科夫和尼科波尔(即尼基京诺)两地之间。1778年至1781年间,他多次搬迁住处,往奥恰科夫城、德涅斯特河以及多瑙河对岸等地的不同扎波罗热人群中“挤”,每次都受雇给人当文书官。他这种爱折腾的独特性格也让他吃尽了苦头。1781年年末,他在奥恰科夫城同扎波罗热首领开玩笑时与对方发生激烈争吵,然后便一赌气离开了那里,跑到盖达马克哥萨克中去了。1782年春天,他在奥利维奥波尔斯基县的几个镇实施了抢劫,在试图渡过南布格河时被俄国边防警卫队抓获,当即被押往了克列缅丘格。新俄罗斯省办公厅对他进行了详细审问。由于穆希·什特里格利已是土耳其籍,因此,1782年他被押往伊斯坦布尔,移交给了土耳其司法部门。此后的情况便不得而知了^①。

1778年4月,奥恰科夫帕夏哈吉·迈哈迈德(1780年调任霍京城帕夏)任命亚基姆·戈尔巴上校为哥萨克军阿塔曼,任命马克西姆·贾恭,为军事务官,统帅自己管辖地界里的全部哥萨克军,而军书记官则是我们已经熟悉的这位穆希·什特里格利。同时,征得这位帕夏许可,在德涅斯特河边的卡加里山地界上建起了一座传统扎波罗热哥萨克军教堂,以感恩圣母帡幪。此外,帕夏还应哥萨克请求,出面与有关方面协调,帮助后者获得建教堂

^①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90,目录90/1,1781—1783,案卷882,第12页、14页背面、17页。

的官方许可,允许在君士坦丁堡牧首庇护下做礼拜^①。

显然,这个中心并没有完全把留在包括比萨拉比亚地区在内的多瑙河左岸地区各哥萨克群体联合起来。1778年4月,有消息说在索罗卡城(现今摩尔多瓦共和国的一个县中心)有近百名扎波罗热人,他们在那里专门负责德涅斯特河索罗卡渡口的与该河对岸属于波兰-立陶宛王国波多利亚地区的布拉格镇渡口的摆渡事务^②。这里属于摩尔多瓦国王管辖,而不是本德雷、奥恰科夫或霍京等城的任何一个土耳其帕夏的地盘。因此,来到这里,扎波罗热人也就承认了国王的督辖权,自认为是为国王服务。

这支哥萨克分支的领导人之一就是前布格河加尔德帕兰卡督军伊万·苏欣纳。1777年,由于与新俄罗斯省的新帕甫洛夫斯克县政府发生矛盾,他便带领一大群哥萨克先是迁移到季利古尔河口,与摩尔多瓦当局谈妥后便迁移到摩尔多瓦公国境内。在索罗卡城,这支哥萨克人一待就是十年。有一个事实可证明这点。1787年9月,俄土再次爆发战争之后,摩尔多瓦国王给驻扎在索罗卡城及其附近的扎波罗热哥萨克发布了一项命令,要求这些人携带武器到雅西城报到^③。

下面来谈一下这一时期其他扎波罗热哥萨克群体的生存状

① A.巴塞:奥斯曼帝国内希里曼布特卡雷哥萨克的迁移与活动考察//土耳其-乌克兰关系国际研讨会之“哥萨克时代(1500—1800)”,伊斯坦布尔,2015,第540页。

②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1274,目录1,案卷126,第197页背面。

③ И. Б.沙波什尼科夫:伊万·苏欣纳——黑海哥萨克无名阿塔曼//扎波罗热大学,XVIII—XIX世纪南乌克兰历史科学研究实验室笔记,第5辑,扎波罗热,2000,第259—267页。





况。根据俄罗斯侦察员安德烈·马利亚尔(此人是塞契哥萨克出生)记述,1779年夏,大约有六百名哥萨克聚集在布扎克(南比拉比亚)和耶迪桑(位于现今的奥恰科夫州)地区,他们想进入伊兹梅尔、基利亚、阿克尔曼(现今的别尔哥罗德-德涅斯特洛夫斯克)和奥恰科夫等城市,并且其中绝大部分人聚集在奥恰科夫草原。是年春,为履行《艾纳勒-卡瓦克公约》(1779年3月10日签署),苏丹政府命令所有哥萨克迁移到多瑙河右岸,但扎波罗热人却不愿离开^①,而此时已经渡过多瑙河的另一部分哥萨克来到了保加利亚东部黑海沿岸地区。土耳其任命科连卡(科连科)上校为这部分哥萨克的阿塔曼首领。此人在1773年的锡利斯特拉城(保加利亚)战斗中曾率五百扎波罗热多瑙河哥萨克舰队参战,因作战勇敢,在塞契哥萨克中颇负盛名^②。1779年7月,前文提到的马利亚尔走访了阿克-刻奥伊(现今保加利亚瓦尔宁斯克州比亚拉市),探明科连卡手下哥萨克总数为六百人左右^③。

1779年秋,苏丹又下一道命令,要求所有驻扎在季利古尔的扎波罗热哥萨克迁移到多瑙河右岸。哥萨克这才迫不得已将科什营地连同教堂一道迁移至该地区,但依然还是有很多人留在

①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15,目录1,案卷185,第43页背面。

② 基辅乌克兰中央国家历史档案馆,全宗229,目录1,案卷285-285a,第2部分,第245-250页。他因自己的英勇事迹而获得一枚金质胸章。这枚奖章在战斗结束后被他抵押给塞契的一个酒馆换钱喝酒了(A. 马利亚尔的证书)。幸运的是,这枚奖章历经百年岁月之后被Д. И. 亚沃尔尼茨基私人收藏,而后被叶卡捷林诺斯拉夫市的A. 勃列博物馆基金会(即现今的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市Д. И. 亚沃尔尼茨基国家历史博物馆)收藏。

③ 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15,目录1,案卷185,第45页。

原地。那些屈从苏丹命令的扎波罗热人则在季尔索夫（现今的罗马尼亚东南部的赫尔索夫市）度过了1779年末至1780年初的冬季。请注意，我们这里讨论的是扎波罗热哥萨克首次来到罗马尼亚的塞伊门地区（现今罗马尼亚康斯坦察州的尤尔塔斯镇附近）一事，据史料研究界普遍认定的说法，塞伊门这个地方恰恰是多瑙河右岸哥萨克塞契要塞所在地。其实，在1779年那里还没有塞契，真正的塞契要塞建立是稍晚一些时候的事，但扎波罗热哥萨克临时聚集到此处这一事实却是相当清楚的。还有一点也引人注目，即我们这里提及的地方和居民点的名称不是罗马尼亚的民间叫法，而是土耳其官方称谓。这种称谓来源很有可能与扎波罗热-塞伊门哥萨克在此停留有关。有必要解释一下，“塞伊门人”（阿拉伯-土耳其语 *seymen*，意思是“饲养猎犬的人”）最初在奥斯曼帝国时期是用来称呼那些负责照料苏丹猎犬的禁卫军士兵，自十六世纪起，塞伊门人就成了帕夏指挥的雇佣步兵的统称。事实上，在布特卡雷军（1787年）成建制之前，所有在土耳其服役的扎波罗热哥萨克其实就是塞伊门人，而在奥斯曼帝国服役的哥萨克军名称源于土耳其对塞契的称呼——布特卡雷，意思是“多神教要塞”。

土耳其政府将扎波罗热哥萨克迁移到巴尔干半岛时就一直在关注一件事，即不让这些人过度集中在某一处，而是将他们分成一支支队伍，分散到从多瑙河到马尔马拉海和爱琴海之间的广大区域。关于这事，从1779年夏他们把扎波罗热哥萨克队伍安置到达达尼尔海峡岸边的加里波利半岛的举措中就可以看





出^①。扎波罗热哥萨克无论是对自己被安置在塞伊门还是被安置到更远的“白海城”都不那么情愿,其中很多人不喜欢那些地方的环境,他们宁愿再回到奥恰科夫草原去。他们中有少数人在土耳其的巴尔塔城(戈尔特瓦)落脚,到当地的地方长官乌祖-阿赫(奥斯曼帝国的县级地方官——译者)那里当差。这些哥萨克为避免被遣送到多瑙河右岸,逢人便说他们并非土耳其籍扎波罗热人,而是前塞契哥萨克,居住在乌克兰第聂伯河右岸地区(属于波兰-立陶宛王国管辖地区),他们是从那里逃来的。当然,当地土耳其行政部门也懒得调查这些细节,谁找他们,就给谁安排差事,提供庇护。同时,大部分耶迪桑地区的哥萨克除了在土耳其人那里当差外,也不排斥在俄国管辖的地盘上干一些打家劫舍之事。通常,这些扎波罗热盖达马克分子在头目率领下汇聚成队伍,再组成一支支库林支队,在边境的一些偏远地方安顿下来。这帮由土耳其籍扎波罗热哥萨克组成的盖达马克队伍中最为出名的头目分别要数马卡尔·别列别伊诺斯(1775年前是列乌什科夫斯基库林阿塔曼)、普希、列图奇^②和贾恭^③这几人。

扎波罗热哥萨克在奥恰科夫草原(德涅斯特河与南布格河之间的耶迪桑地区)的存在使得新俄罗斯省政府深感不安。1780年7月,该省省长亚泽科夫给俄罗斯驻伊斯坦布尔公使斯塔

① A. Д. 巴钦斯基:多瑙河右岸塞契(1775—1828),历史文献概要,敖德萨,1994,第13页。

②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90,目录90/1,1781—1783,案卷882,第12页、14页背面。

③ 俄罗斯国家军事历史档案馆,全宗52,目录1,案卷315,第1部分,第35页。

希耶夫去函，希望他能根据《艾纳勒-卡瓦克公约》规定，想办法把土耳其籍扎波罗热哥萨克从多瑙河地区弄走。他提醒说，1778年至1780年发生了数十起盖达马克分子侵袭布格河加尔德城周边地区事件，边境地区屠杀、抢劫、抓囚徒等事件随处可见。通过土方官员——奥恰科夫帕夏和戈尔特瓦城地方官推诿的态度，他感到约束这些扎波罗热人非维齐尔本人亲自出面干预不可^①。

负责扎波罗热哥萨克迁往多瑙河右岸地区的任务落到了伊萨克庆地区的“当家人”费祖拉-艾芬迪身上。这位土耳其官员在自己工作笔记里记载了有关哥萨克分布的数量和地理位置等大量信息。比如，截至1780年7月1日的实际情况是，在现今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境内多瑙河流域和黑海沿海地区就有五百四十三名扎波罗热哥萨克^②。

哥萨克分布地点	指挥官	哥萨克人数
阿德里安堡(埃迪尔内)	-	43
马钦	瓦西里(上校)	52
哈索瓦	宾塞布尔(尼奇波尔)(上校)	80
拉霍弯(位于康斯坦察附近)	伊万·扎古贝任库(上校)	42
锡利斯特拉	科农·拉兹科(上校)	50

①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90，目录 90/1，1781，案卷 839，第 3 页。

② 参见：A. 巴塞：奥斯曼帝国布特卡雷定居点与活动情况考察（1775—1826）// 土耳其-乌克兰关系国际研讨会之“哥萨克时代（1500—1800）”，伊斯坦布尔，2015，第 542—544 页。该文作者所使用的数字“543”与下表中实际总数（637）不相符，但我们不作更改，特此说明。





续 表

哥萨克分布地点	指挥官	哥萨克人数
应从锡利斯特拉迁往尼科波尔之人	哈利科·布贾克(上校)	12
应从锡利斯特拉迁往季莫瓦之人	伊万·诺威(上校)	32
锡利斯特拉人数总计	-	94
卢谢(鲁舒克)	伊万·米吉斯(上校)	
图特拉坎(归入卢谢)	帕甫洛(上校)	65
斯维什托夫	-	29
巴巴达格	-	54
奥里亚霍沃附近不服从指挥且未能如期迁移之人	-	49
卢谢附近不服从命令且不迁移之人	-	25
斯维什托夫附近之人	-	10
多瑙河右岸地区哥萨克总人数		637

并且,鲁米利省的主要城市——阿德里安堡在1780年至1787年间成了扎波罗热哥萨克军军官常驻之地。对于落脚在这里的“头领”(盖特曼),土耳其政府还特意调拨一名翻译常伴左右,以便减少他与土耳其当地和最高行政机构官员之间的沟通麻烦^①。

1780年末(已经多少次了!),柏塔政府给全体扎波罗热人——自己的臣民发来命令,要求他们立即搬迁到多瑙河对岸

^① A.巴塞:奥斯曼帝国内希里曼布特卡雷哥萨克的迁移与活动考察//土耳其-乌克兰关系国际研讨会之“哥萨克时代(1500—1800)”,伊斯坦布尔,2015,第545-546页。

去。被指派带领军队执行这一命令的是我们前文介绍的科连卡上校。他动作迅速,手段严厉,将这些扎波罗热人从已经待惯的地方赶走,大多数人被迫顺从。1780年末至1781年初,所有被驱赶出来的哥萨克集中安置在帕扎尔吉克城(现今保加利亚南部一个州中心所在地)^①。显然,这种过冬的地方只不过是哥萨克迁移途中的一个临时停留地,划给他们的安置地是爱琴海和马尔马拉海沿岸的东色雷斯地区。

自然,被安置到如此远离家乡的地方定居,这不可能不引起扎波罗热人内心恐慌。于是在斯捷番·皮萨列茨上校组织下,不少人开始表达不满。1781年春,这位上校去了趟伊斯坦布尔,在那里他似乎受到苏丹王的召见,并得到特许令,准许他们返回奥恰科夫草原。不过,这极有可能是公开作假,因为此类特许令与土耳其政府此前或此后颁布的命令无论如何也没有关联。但是“皮萨列茨党”人却需要一个哪怕只是形式上的借口,以便能够驻留在黑海北部沿岸地区。于是就有人给他们伪造公文(极有可能就是那位穆希·什特里格利)。实际上,哥萨克人内部已经发生了分裂,因为部分扎波罗热人在皮萨列茨带领下,自行离开了帕扎尔吉克城,回以前的老地方季利古尔去了。他们在那里重建了科什和教堂,并把苏丹的特许令当作圣物供起来^②。

那时,除季利古尔河口的科什要塞之外,第聂伯河下游还有两处扎波罗热“科什”——分别位于马亚奇卡河畔以及该河的河

^①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90,目录90/1,1781—1783,案卷882,第12页背面。

^②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90,目录90/1,1781—1783,案卷882,第13页。





口。事实上,这些居民点只是几个渔场而已,里面也仅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库林支队。他们手中的捕鱼网也没几只:季利古尔有四只(其中一只属于教堂),马亚奇卡两只,第聂伯河河口五只。三个村全部哥萨克加在一起也仅三百人多一点而已^①。

那些年里,扎波罗热哥萨克身影重新出现在巴尔塔城。1781年12月,俄罗斯驻伊斯坦布尔公使雅科夫·布尔加科夫向土耳其当局指控说,他的信使彼特洛夫准尉在路过该城时遭该城禁卫军中的扎波罗热哥萨克殴打。该公使就此事再次要求苏丹及政府将土耳其籍扎波罗热哥萨克撤到多瑙河右岸去^②。事实是,按苏丹命令,1781年末,并非全部扎波罗热哥萨克被调离至多瑙河右岸地区,他们继续滞留在奥恰科夫,依旧成为俄国与奥斯曼帝国边防军司令部和两国外交部门间关系紧张的原因。并且这些人不仅是自由任性的盖达马克士兵,也是哥萨克,为地方当局服务。这让俄罗斯难以接受,于是他们通过公使不断照会土方,要求调离这些哥萨克,但收效甚微。1782年,这些扎波罗热哥萨克依旧驻留在季利古尔,并没有打算去其他什么地方。他们科什归奥恰科夫新帕夏哈吉-阿里·恰达扎雷管辖,并且后者还任命伊戈纳特·巴桑斯基为这些人首领。加夫里尔·布里兹纽克是这支哥萨克部队的军事务官^③,他作为整个科什军代表,

^①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90,目录90/1,1781—1783,案卷882,第13背面。

^②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89,目录89/8,1781,案卷589,第56—60页。

^③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90,目录90/1,1781—1783,案卷882,第14页背面。

在奥恰洛夫帕夏身边供职,得益于他的说情,这些哥萨克人获得了在驻地建教堂的许可。这就更加证明这部分扎波罗热人准备长期停留在耶迪桑境内了^①。

1782年2月22日,奥恰科夫、本德雷以及霍京等诸城几位帕夏相继接到苏丹命令,要求他们必须将扎波罗热哥萨克调往多瑙河右岸地区,但哥萨克和土耳其地方政府均未遵照执行^②。接下来几年,苏丹颁布的命令同样也没有被执行,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1786年才有所改变。原因是,个别哥萨克部队顽固分子坚持留在黑海北部沿岸地区,不愿撤离,道理很简单:南下迁往亚德里亚海岸和爱琴海是一条未知之路,这种情况下即便是那些留在巴尔干半岛的扎波罗热人也会尽量给自己寻找别的生活出路。比如,有人会给有权势的地方头面人物当差。其中,根据来自西利斯特拉城的一位俄罗斯密探报告,1783年5月,扎波罗热哥萨克代表拜访了当地帕夏,他们之间的谈判细节这位密探不清楚,但是有一件事他清楚,即城中的扎波罗热哥萨克不久便迁走了。我们推测,扎波罗热人与帕夏交谈的内容应该是有关他们给后者服役之事^③。

1784年初,驻扎在奥恰科夫草原和布扎克地区的扎波罗热哥萨克军中涌动着一股返乡思潮,起因主要跟土耳其政府采取

^①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90,目录90/1,1781—1783,案卷882,第11页及其背面。

^②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90,目录90/1,1781—1783,案卷882,第14页、26页、27页背面。

^③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89,目录89/8,1783年,案卷1197,第8页。





强硬措施,要求哥萨克迁往多瑙河右岸地区有关。现存相关资料显示,哥萨克代表向俄军统帅部和外交机构提交过相应的呼吁书。不过我们觉得,这其中俄方的宣传更是起到了重要作用。俄罗斯这边线人和情报人员原先都是塞契哥萨克军人,他们冒充商人,经常往来扎波罗热科什要塞,把一些以最高爵位和职衔官员名义签发的公告、文书和信函带给这些军官,并且这些函件再也没有类似1776年的那种威胁口吻,相反,充满了令人惊喜的和解意味,语调振奋,突出宗教信仰:“尊敬的东正教同胞们!你们应该为自己目前所处环境而感到耻辱。请想象一下,主耶稣用自己无辜鲜血为你们赎罪,难道就是为了让你们向污蔑耶稣圣名、迫害耶稣信仰的那些异教徒效忠吗?”(引自波将金1784年信函)^①

最终,部分土耳其扎波罗热哥萨克开始认真思考关于回归俄罗斯帝国并进入俄军服役的可能性。于是,在季利古尔科什和雅西城的俄国领事机构之间便开始了信函往来。例如,有封哥萨克军官伊戈纳特·巴桑斯基写给领事官И. 谢维林的信函,日期为1784年2月6日,这封信由哥萨克军中的教堂神父达尔马特在同年2月底送往雅西城。信函以德涅斯特和季利古尔全体扎波罗热哥萨克名义请求沙皇宽恕罪行,准许他们重返家园。根据这位神父的记述,这些地区的哥萨克约有三百到四百人^②。但这些人是否全都想回归,这个问题是有些争议的,至少,几乎同一时期的其他资料(1784年3月)显示,这些潜在的回归者人数要

^①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手稿部,全宗588,目录3,案卷82,第1页。

^②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69,目录69/1,案卷26,第40-41页。

少很多,在二百人左右^①。

俄国领事官员谢维林给他们回信(2月22日),建议这些扎波罗热人来雅西城领取通行证件和路费^②。2月底,新俄罗斯省长伊万·西涅利尼科夫准将(不久他就晋升为叶卡捷琳娜斯拉夫总督辖区长官)同样收到奥恰科夫草原扎波罗热哥萨克写来的类似信函。这两位国务活动家及时将此情况密报给波将金公爵,后者再次重申了宽大政策,彻底赦免那些愿意从奥斯曼帝国回归的哥萨克罪行,并保证他们人身安全^③。

如此一来,自1784年春季开始,不仅摩尔多瓦公国(现今的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东部地区)境内的扎波罗热哥萨克,还有布扎克和耶迪桑两处扎波罗热哥萨克,他们纷纷聚集到雅西城。这些人,还有旧礼仪派哥萨克(涅克拉索夫哥萨克和杜纳克哥萨克)、利珀万人以及俄军常规军中的逃兵等,他们组成了迁徙大军。仅从1784年春到1786年夏,就组成并遣送了十二批人(领馆编号是从第6号到第17号),总人数有一千三百五十二名成年男性迁移者(女人和儿童特意不作统计)。在俄罗斯帝国南部用于安置从雅西城迁移过来的扎波罗热哥萨克的定居点中,领馆档案提及不久前才建立的赫尔松城,还有扎波罗热哥萨克入籍

^① 俄罗斯国家军事历史档案馆,全宗52,目录1,案卷304,第1部分,第4页。

^②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69,目录69/1,案卷26,第56页及其背面。

^③ 俄罗斯国家军事历史档案馆,全宗52,目录1,案卷304,第1部分,第8-9页。





克里米亚汗国后建立塞契要塞的阿廖什基^①。

土政府把扎波罗热哥萨克分成“多瑙河右岸哥萨克”“季利古尔哥萨克”“摩尔多瓦哥萨克”和“奥恰科夫哥萨克”的做法一直保留到1787年俄土战争再次爆发前夕。战争的爆发才促使土耳其政府尝试将这几处分散的哥萨克部队全部集中起来。于是,1787年9月1日,遵照上级命令,驻扎在阿德里安堡的扎波罗热哥萨克随“盖特曼”一道北上,9月27日到达巴巴达格,听从那里的帕夏阿里指挥^②。

根据俄罗斯情报员、上尉格拉西姆·切尔诺夫(前扎波罗热哥萨克)1787年末至1788年初的报告,扎波罗热哥萨克军在土耳其控制区的总体部署情况是:从巴尔干撤出的“多瑙河右岸哥萨克”与在多瑙河河口往上一點的卡季尔列兹科什哥萨克战友汇合,但战争初期便离开营地出征了(1778年至1779年,其驻地被从库班俄罗斯军队中逃过来的涅克拉索夫哥萨克军占据),差不多有五百名哥萨克来到雅西城,投奔了摩尔多瓦国王,另外三百人由(“并非扎波罗热哥萨克出身”)上校留利卡指挥,驻扎在奥恰科夫草原,接受当地帕夏指挥,其余部分则按惯例驻扎在奥恰科夫草原,大体上位于季利古尔河口^③。

整体上来说,在阿塔曼亚金姆·加尔多夫领导下,哥萨克科

①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69,目录69/1,案卷38,第13页;案卷45,第2-3页;案卷61,第22页。

② A.巴塞:奥斯曼帝国内希里曼布特卡雷哥萨克的迁移与活动考察//土耳其-乌克兰关系国际研讨会之“哥萨克时代(1500—1800)”,伊斯坦布尔,2015,第546页。

③ 俄罗斯国家军事历史档案馆,全宗52,目录1,卷宗304,第2部分,第11页。

什在“图兹列岛或者季利古尔河上游地区”一直坚持到1788年中期。由于外部压力（来自土耳其政府以及俄国宣传攻势），一部分哥萨克返回故乡，加入黑海哥萨克军，另外一部分则去了多瑙河右岸，汇入当地的土耳其扎波罗热哥萨克中^①。

布特卡雷，即那些1787年至1791年俄土战争爆发前取得土耳其国籍的扎波罗热哥萨克，实际上在战争一开始就投入了战斗。这些扎波罗热人在土耳其部队的作用类似黑海哥萨克在俄国军队中的作用，即执行巡逻和侦察任务，从事破坏和“抓舌头”活动。他们主要的活动场所是黑海区域。有报道称，1787年8月，一支布特卡雷小舰队闯入布格河-第聂伯河河口，他们试图派遣海军陆战人员接近俄军金布伦要塞，但被俄军击退^②。此类情形的战斗在后续几年里发生过不少次。值得一提的是，1789年9月初，布特卡雷袭击了俄国驻别列赞岛守备军之事^③，抑或1789年夏，他们参加哈吉别城（即现今乌克兰敖德萨市——译者）海战，那时他们的舰只已达三十多艘^④。

战争期间，尽管前扎波罗热哥萨克在不同阵营参战，且不止一次彼此短兵相接，但那种惺惺相惜，对共同命运的理解还是在

① 俄罗斯国家军事历史档案馆，全宗52，目录1，卷宗304，第2部分，第5页及其背面。

② 参见《1787年至1791年交战双方首都战报资料集》，其中就有关于针对俄罗斯帝国敌人的军事行动。莫斯科，1791，第1部分，第12页。

③ 参见《1787年至1791年交战双方首都战报资料集》，第45-46页。

④ 俄罗斯国家军事历史档案馆，全宗52，目录1，案卷526，第1部分，第17页。





各方身上都能体现出来^①。当时的各种文献经常提及那些彼此敌对的前扎波罗热哥萨克“联欢”之事，他们之间经常友好相聚，甚至一起喝花酒。这里有几个突出的例子：1790年10月2日，在奥恰科夫附近的芦苇荡，一位卡尔尼勃络茨基库林的黑海哥萨克军士兵卡尔普·舍甫琴科偶遇一个土耳其“布特卡雷”。他们相互不仅没有开枪射击，反而热情拥抱起来，并且对方还赠送给这位黑海哥萨克士兵一枚金币，并嘱咐后者说一定要跟“兄弟们”上酒馆把它喝掉^②。那时经常有这样的情形发生：黑海哥萨克有人逃往到土耳其哥萨克那边去或者有土耳其哥萨克投奔到黑海哥萨克军这边来。有些时候，此类相互投奔事件完全出于自愿，而有些时候则是因被俘而被强行扣留，就像1791年5月5日至7日在图尔恰城近郊发生的事情一样^③。这类人员，其自身便是珍贵的信息源，向人展示当时扎波罗热哥萨克各派别里正在发生着的事情。比如，由土耳其扎波罗热哥萨克列昂吉亚·斯科卡的见闻我们得知，早在1790年夏天，有一批数量相当的布特卡雷依旧滞留在德涅斯特河口，且其中一个定居点甚至取名叫巴尔温科沃斯金卡，以此纪念“老”扎波罗热（现今哈尔科夫州巴尔温科沃市）哥萨克部队的一个同名镇子。这群哥萨克部队的阿塔曼是格里戈里·阿卜杜拉，军书记官是伊万·伊万科，军法官

① П. П. 柯罗连科：黑海哥萨克军（1775—1792），叶卡捷琳诺达尔，1892，第36—37页。

② 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国家档案馆，全宗249，目录1，案卷22，第12页。

③ 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国家档案馆，全宗249，目录1，案卷22，第37页及其背面。公布于：库班哥萨克军史料文集/ И. И. 德米特连科收集和整理，三卷本，圣彼得堡，1896，第2卷，第286—287页。

是雅科夫·冈恰尔，擎旗手是格里戈里·塔兰^①。

也有不少土耳其扎波罗热哥萨克出于个人愿望，投奔了俄国，因为他们参加布特卡雷军纯属偶然。比如，尼基福尔·拜达便是一个例子，他来自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地区，战争前夕，从盐粮贩子的车队中逃亡到摩尔多瓦公国。土俄战争初期，他作为辎重兵被强行编入扎波罗热哥萨克部队，派往前线参与对俄战争^②。

可以说，塞契覆灭后的头十年里，无论是俄国政府，还是土耳其政府，它们谁也不屑给扎波罗热哥萨克开出满意的参军服役条件，以便他们能按相应的社会群体身份获得在帝国中重建军队组织和争取定居地盘的机会。1787年至1791年俄土战争的又一次爆发才导致这两支“后塞契”军队——俄国黑海哥萨克军和土耳其布特卡雷哥萨克军制度化，使得一切“各就其位”。

^① 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国家档案馆，全宗249，目录1，案卷22，第7页及其背面。

^② 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国家档案馆，全宗249，目录1，案卷22，第25页。



第十章 马耳提兹：效力于哈布斯堡王朝的 扎波罗热哥萨克(1785年—1790年)

部分前塞契士兵进入奥地利军队服役^①，这事与前文提及的1784年至1785年俄国驻摩尔多瓦公国首府雅西城的领事机构活动有直接关系。在雅西城，那些一批批被组织起准备遣返俄国的大部分前俄国公民，他们自由自在，没有社会羁绊，因此流动性很大。他们频频向俄国领事官员展现出自己的这一品行：曾经无数次，每当雅西城轮廓在遣返队伍背后消失之际就立即有人逃脱，甚至那些“拖家带口者”也有百分之五的人逃离遣返队伍^②，而那些在雅西城靠俄国领馆接济过着逍遥日子的“流氓无产者”（即没有家小的人），他们当中，手拿遣返费在抵达俄国边境之后便溜之大吉者更是大有人在。溜开之后他们就渡过多瑙河，进入土耳其腹地，或者想其他办法谋出路。他们会想出什么好办法呢？

距离雅西城不远的地方便是当时欧洲最有影响力之一的国家——奥地利哈布斯堡帝国。自十七世纪末开始，为反抗土耳

① 本章两幅插图选自《奥地利边防军1740—1798》一书（作者：霍林思·大卫、帕夫洛维奇·达尔科（插图），系列编辑：马汀·温德罗，牛津：鱼鹰出版有限公司，2005，第19页、34页）。

②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69，目录69/1，案卷61，第22页。

其，欧洲一些基督教国家成立了“神圣同盟”。自那时起，奥地利皇帝便不止一次地充当俄国沙皇在欧洲反抗奥斯曼统治的同盟者。当然，他们这样做完全在情理之中，因为他们有共同目标，即瓜分土耳其在巴尔干和黑海北岸领土。但在为共同目标付出努力的同时，奥地利与俄罗斯两国统治者又各自不无妒忌地紧盯对方所取得的每一点成就，相互支持，却又试图不给对方强化地位的机会。又或一方不给予盟友实际性军事支援，如1716年至1718年奥土战争，俄罗斯便是作壁上观，同样，1768年至1774年俄土战争，奥地利也只是远远地隔岸观火，两国关系就这样时冷时热。

两国同盟关系还因俄国要保护奥地利境内东正教信徒而一点点地变得复杂起来。由于天主教打压，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数千名塞尔维亚东正教信徒“格伦茨步兵”（即边防军）在他们指挥官的带领下投奔了俄国，在位于现今乌克兰南部地区开辟了两个军事农垦移民区——新塞尔维亚移民区和斯拉夫塞尔维亚移民区。这致使两国关系愈发冷淡，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奥地利女皇玛丽娅·特蕾西亚（1717年至1780年）退位，其子约瑟夫二世即位（1780年至1790年）之后才有所改变。然而，即便是在他执政期间，维也纳外交官员也在利用一切可能，试图对十八世纪五六十年代期间发生的本国纳税人逃离事件进行报复。1785年初，这种复仇的机会终于在雅西城出现：那些驻扎在雅西城及其周边地区的扎波罗热哥萨克成了奥地利军人和外交官策反的对象。

在我们看来，不能说俄、奥两国政府把“引诱”行为过度戏剧





化。早在1770年初,俄罗斯帝国大臣尼基塔·帕宁在给俄第一方面军司令彼得·卢缅采夫的信件中就已充分表达出两个帝国在涉及各自接受对方逃兵入籍参军方面的态度了。他写道,“关于处置奥地利逃兵问题,一方面,如果我方将他们交出去,而对方却在明目张胆地招降我方逃兵,那将使我们蒙受耻辱;另一方面,目前的政治形势却要求我们避免与对方有任何方面的关系冷淡”^①。瞧,再也没有比这更明确直白的了!

摩尔多瓦公国境内聚集着很多从俄罗斯和奥地利逃过来的士兵。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两国军官们和外交官们都同样不遗余力玩着招降对方人员的把戏。“人口主义”和“重农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主张国力直接取决于国民数量,这种观点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各国占据官方学说地位,并以最佳方式支撑着这类“抢人竞赛”。

俄罗斯外交官常把逃兵遣送回国,而驻瓦拉几亚(布加勒斯特)与摩尔多瓦(雅西)两个公国里的奥地利外交机构也在进行着类似活动。俄国与奥地利两国外交官员们相互极其严密地监视着对方一举一动,及时向圣彼得堡或维也纳方面汇报既是盟友也是竞争者的细微动作。得益于驻雅西城的俄罗斯领事密报,我们有机会看到奥地利外交人员在扎波罗热哥萨克投奔哈布斯堡王朝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这其中,我们所知道的是,1783年8月末,宫廷秘书莱科维奇分别在布加勒斯特和雅西这两座城中公布了约瑟夫二世给逃亡到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两个公国所有奥地利士兵的诏书,声称,如果他们现在返回,就会饶恕他们罪行,回国通行证可以在两

^①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手稿部,全宗563,目录1,案卷1,第8页及其背面。

个公国都城的奥地利外交机构那里办理。有不少逃兵决定利用这一难得机会开始前往雅西聚集^①。

如此一来，在时间和空间方面，两拨人潮交汇到一起。雅西城经常会同时出现奥地利和俄罗斯两方面的待遣返人员，他们达数百人之多，各自聚集在一起等待返回家乡时刻的到来。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在待遣的“俄罗斯人”中还有不少扎波罗热哥萨克。我们也可以想见，在那些待遣的“奥地利人员”中同样也有很多来自“边境军事区”（奥地利帝国与土耳其边境军事地带）的“格伦茨”团士兵。就来源看，这些人基本上是东正教塞尔维亚人^②。可以断定，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格伦茨人和哥萨克之间是有联系的，当然也不可能没有联系，因为这两伙人相当明确地显示出某种类型学上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自十六世纪末期以来就无一例外地吸引着旁观者眼光，更不用说他们相互吸引对方注意了。还需指出的是，在“会面”之前，这两拨人就“神交”很久了。这里说的是普通格伦茨士兵，即新塞尔维亚和斯拉夫塞阿尔维亚军屯士兵。尽管这两个军屯点指挥官与扎波罗热政府之间关系紧张，但士兵们却经常有人往扎波罗热哥萨克军这边跑，以致塞契军人数不断增加（十八世纪五十年代的扎波罗热塞契科什档案文件中有关这些事件的记录比比皆是）。

于是，雅西城的奥地利领馆便开始做那些扎波罗热哥萨克的工作。这些哥萨克有的来到摩尔多瓦公国都城已经几周甚至

^①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89，目录 89/8，1783，案卷 1198，第 9—11 页。

^② 霍林思·大卫、帕夫洛维奇·达尔科（插图）：奥地利边防军（1740—1798），系列编辑：马汀·温德罗，牛津：鱼鹰出版有限公司，2005，第 5 页。





几个月,他们在等待着动身回国,有的则刚刚赶到此处打探遣返条件的真实性。奥地利帝国外交政治机构及其隶属的各驻外外交代表处掌握了扎波罗热塞契被剿灭的全部情况,因为1775年9月,俄罗斯外交部将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文告副本发往了维也纳,以便让哈布斯堡王朝知悉此事^①。

奥地利人迅速展开对扎波罗热哥萨克军官的宣传攻势(当然,这其中也少不了金钱诱惑),让他们自告奋勇站出来,充当为奥皇效力的鼓动者,成为哥萨克人驻扎奥土边境的倡议者。俄国领馆人员很快便获悉了奥地利机构的这种举动。这引发了雅西城中奥地利和俄罗斯两国使领馆之间的冲突,且此事一度成了两国外交部门专门调查的对象。由于摩尔多瓦公国是奥斯曼帝国的附庸国,于是该公国驻伊斯塔布尔使馆也介入了冲突调查。雅西城的俄国领事官谢维林对奥地利外交官拉伊克维奇的不法行为进行了指控,而后者则坚决要求俄国副领事谢伦斯基进行道歉,因为后者对其行为的某些方面进行了尖锐批评^②。总的来说,由于俄奥双方均认识到这事还不至于要闹到两国皇帝那里去,于是便在领馆和使馆这个层面着手解决。事实上,这些前俄国士兵在摩尔多瓦公国逗留五年或者更久时光了,这期间俄方已默许奥方与这些士兵进行接触,但条件是奥方不得引诱

^①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33,目录33/2,1775,案卷62,第37-40页。

^②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89,目录89/8,1784,案卷1198,第8-10页。

那些有回国意愿且已准备好返回的俄国人^①。

考察 1785 年俄奥外交领事机构如何钩心斗角“抢人”之机，我们不禁产生一些疑问：这段时间，驻扎在雅西城且已经接受奥地利帝国建议的扎波罗热哥萨克主体人员在干些什么？他们从前塞契军改编成后来的格伦茨步兵时经历了怎样的历程？他们为何做出这一选择？实际上，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扎波罗热哥萨克已经体会过俄罗斯女皇的“柔情”滋味，也品尝过土耳其苏丹的“温情”——塞契覆灭后的头十年里，无论是俄国政府还是土耳其政府都未能开出满意条件来让扎波罗热哥萨克获得一块立足之地，以便他们在帝国大社会中来重建自己往日的“小社会”，即哥萨克军组织，使他们能心甘情愿参军服役。只是后来又一次的俄土战争爆发才使得一切“各就各位”，使得两支“后扎波罗热”哥萨克军，即俄罗斯黑海哥萨克军与土耳其布特卡雷哥萨克军方得以有机会组建。而在 1785 年，尽管一部分扎波罗热哥萨克当时心怀期望，但无论是在俄国还是在土耳其，他们都未能够找到自己能接受的生存方式。于是，他们这才决定去奥地利帝国的边境军事区碰运气。

就这样，这群扎波罗热哥萨克决定迁居哈布斯堡帝国内，到边境参军服役，在奥皇统治下开始新生活。奥地利皇帝，他尽管不是斯拉夫帝王，但好歹也是一位基督教君王。1769 年 1 月 10 日，奥地利宫廷颁发过一份诏书，这对少数扎波罗热哥萨克前往边境军事区服役起到过一定的鼓动作用。诏书呼吁当时居住

^①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89，目录 89/8，1785，案卷 1208，第 1-36 页。





在波兰、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但还没有在当地入籍的所有前俄罗斯帝国公民迁移到多瑙河地区的巴奇卡和巴纳特去定居。这推动了部分扎波罗热哥萨克去边境军事区服役。这份法律文件的出台多少与奥地利政府报复俄国心理有关,因为俄国政府十七年多来一直鼓动东正教塞尔维亚人迁居乌克兰南部。1775年之后,这份依然具有法律效力的诏书对那些背井离乡的扎波罗热哥萨克来说更是具有特别现实意义,因为这份宣言的基本条款对他们有着直接的利益关系。比如,1785年,当有关前塞契哥萨克入籍哈布斯堡王朝问题出现后,无论是奥地利政府官员,还是军方均援引了这份文件来做挡箭牌^①。

既然扎波罗热哥萨克迁移事务是以将他们安置到边境军事区为前提来计划的,那么此事就理应由奥地利帝国军事部门和相应部队的指挥官来处理,于是,此项事务便落到奥地利驻雅西城领馆武官别杰乌斯大尉身上。1785年4月1日,扎波罗热哥萨克代表便向他正式提出接受他们的服役请求。这些“代表”究竟是些什么人,这个问题现在依然没有定论。比较遗憾的是,那时奥地利政府竟没有一份涉及此事的往来公函提及这些人的具体姓名——这些代表在公文里一律被冠以“扎波罗热上校们”的称谓^②。倒是俄国驻雅西代表处的公文能稍稍说明一点问题。当然,依据它,我们也只是最大限度地做一些逻辑上推测。前文提到,扎波罗热哥萨克军官中有人早在1784年就与俄罗斯外交官取得联系一事,这其中就有一位克雷洛夫库林阿塔曼,他的名字

^① 克罗地亚国家档案馆,全宗430,目录1,1769,案卷27,第1-7页。

^② 克罗地亚国家档案馆,全宗430,目录66,1785,案卷147,第2-3页。

叫安德烈·塔郎^①。1785年2月至3月间，雅西城聚集了一支主要由单身汉（可能就是扎波罗热哥萨克）组成的遣返队伍（共一百二十四人，其中一百一十一人为单身），这些人准备在4月份被遣送回俄国^②，安德烈·塔郎便出现在这支队伍中。驻扎在季利古尔的自由哥萨克军队的四位指挥官中，其中某位完全有可能是这些“上校们”中的一人。

尽管别杰乌斯拥有武官身份，但是他并没有被赋予必要的权限来处理这一事务。因此，几日后他便向军队高级军官通报了扎波罗热哥萨克的这一“提议”。这些军官中距离他最近的是布科维纳地区军事长官卡尔·冯·埃尔钦别戈少将。当时，这位将军的官邸在切尔诺维茨（现今乌克兰西部一个州的中心），1785年4月6日，这位雅西城的武官别杰乌斯第一个就是向他详细汇报了这一情况。根据他的通报材料我们有理由认为，扎波罗热哥萨克军官们夸大了想去边境军事区定居的哥萨克人数。显然，这些人故意虚报以便争取到更好的服役待遇。比如，他们信誓旦旦地说，已经集结了八千名前塞契哥萨克士兵，这些人在摩尔多瓦公国境内生活已达十年之久云云^③。但我们知道，即便是奥斯曼帝国境内全部扎波罗热哥萨克加起来，也未必能达到这个数目，更何况，这其中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人被土耳其政府调往了多瑙河右岸地区，远离了俄罗斯边境。当然，要确保一支数

^①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69，目录69/1，1784，案卷26，第56页。

^②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69，目录69/1，1785，案卷40，第47-48页。

^③ 克罗地亚国家档案馆，全宗430，目录66，1785，案卷147，第2页。





量如此庞大的哥萨克迁移,仅靠“上校们”是做不到的,但他们确实上报了这个数目,并且保证说所有这些哥萨克将自己配备马匹和添置武器。正因如此,代表们请求给他们在土耳其边境、多瑙河中游等地划拨定居土地,让他们在自己人中选举指挥官,不要强迫他们结婚成家^①。

1785年4月9日,布科维纳地区总督收到来自雅西城的消息,考虑到事关重大,他便命令别杰乌斯暂时压下给扎波罗热代表的具体答复。因为未经计划就安排扎波罗热哥萨克迁移,这会导致与摩尔多瓦公国外交甚至军事冲突(进而会与土耳其帝国发生冲突,因为前者乃是后者附庸国)。作为(地域上)最近的奥地利统帅部代表,埃尔钦别戈赋予别杰乌斯一定权限,让其继续与扎波罗热人谈判。此外,他还一再要求雅西武官将谈判拖延几周,同时又命他在领馆里寻找几位为人机灵的斯拉夫士官生,给他们发“代表”费,让他们陪一陪扎波罗热代表,以便这些心腹们在酒馆喝酒谈天的友好交流氛围中不仅能了解这些代表,还能弄清楚这些哥萨克人数、装备等类似问题的真实情况^②。

授予别杰乌斯一系列必要权限和规定其行事规则之后,埃尔钦别戈认为有必要立即向奥地利帝国军部报告此事。因此,就在同一天(即4月9日),他在提交维也纳国家军事委员会的报告中不仅谈了“雅西城事务”,还就此事的稳妥解决方案谈了个人的看法。他建议委员会将哥萨克安顿在查伊卡什营与日尔曼巴纳特格伦茨团之间的边境军事区。这样一来,哥萨克就可以

^① 克罗地亚国家档案馆,全宗430,目录66,1785,案卷147,第3页。

^② 克罗地亚国家档案馆,全宗430,目录66,1785,案卷147,第4页。

驻扎在蒂萨河下游至该河注入多瑙河的河口一带地区，他们就能乘船巡逻奥土边界。与此同时，这位总督还获得一条消息，说是扎波罗热哥萨克在上次俄土战争（1768年至1774年）中有不俗表现，那时，不少哥萨克在俄国多瑙河海军服役，成功参加过几次对土战斗。总体上来看，埃尔钦别戈觉得接受哥萨克服役是一个明智选择。因此，可以满足他们对武器、军装、资金和实物薪酬等的需求^①。

在接下来的三周里，别杰乌斯大尉与他雅西城里的手下忙于“关照”这些扎波罗热军官，而埃尔钦别戈少将本人则在等待皇城维也纳回复。与此同时的维也纳，约瑟夫二世本人根据帝国军事委员会报告亲自研究起此事来。1785年4月27日，奥皇命令军事委员会将这批扎波罗热哥萨克编入奥军，将他们部署在蒂萨河两岸。自圣旨颁布之日起，应保障供给哥萨克军粮饷，并且作为哥萨克加入奥军服役的一个重要条件，允许其保留单身权。当地“扎波罗热哥萨克工作委员会”分别由埃尔钦别戈少将（分管切尔诺维茨部分）和别杰乌斯大尉（分管雅西城部分）负责。5月初，埃尔钦别戈接到奥皇命令，随即便给雅西的别杰乌斯发去一份复制件，后者则将其翻译成教会斯拉夫文字，复制几份交给扎波罗热军代表，让他们在瓦拉几亚、摩尔多瓦，以及比萨拉比亚等各哥萨克聚集地散发。此举收效甚巨，仅短短几天时间，扎波罗热哥萨克便开始朝布科维纳聚集^②。

需要指出的是，扎波罗热哥萨克在布科维纳的出现大概在

① 克罗地亚国家档案馆，全宗430，目录66，1785，案卷147，第6页。

② 克罗地亚国家档案馆，全宗430，目录66，1785，案卷147，第7-8页。





塞契覆灭后的第一个十年,而更有可能的是,哥萨克在那个地区早已融入另外一个由俄罗斯人旧教派教徒“利波万”组成的逃亡群体中。一方面,奥地利帝国驻布科维纳司令部在1785年至1786年的官方文件中有过这方面的记载,据这些文件,官方曾计划将扎波罗热人和这些利波万一道安置到巴奇卡和巴纳特地区^①;另一方面,俄方文献也可以证明。俄方文献更加令人感兴趣的地方在于,这些文件与波将金公爵组建忠义扎波罗热军(黑海哥萨克军)活动有关,其中有一份文件就直接明言,期待扎波罗热“利波万据点的哥萨克人”回归^②。

1785年5月末(下旬),第一批集结在摩尔多瓦公国和布科维纳地区的扎波罗热哥萨克穿过摩尔多瓦公国与奥地利帝国边界^③。也几乎是那个时候(即5月25日),埃尔钦别戈少将收到执行指令,这份指令对接受和安置扎波罗热哥萨克事务作了极为重要的细节规定。总体上来说,这份指令归结为以下几点:(1)哥萨克军军官不会被自动授予官衔,相反,在每个被安置的队伍中要委派一名奥地利军官^④;(2)倘若迁移扎波罗热哥萨克举动引起摩尔多瓦公国明显不满,则应停止活动,然后以暴乱分子之名将这些人赶出奥地利;(3)斯洛沃尼亚“总防卫军”指挥官——

① 卡尔·弗莱赫尔·冯·乔尼希:奥地利君主制的民族志(含四张地图),第Ⅲ卷,匈牙利地区及前邻国交界地区民族部落与殖民地历史概论,维也纳:皇家宫廷和国家印刷,1857,第149页。

② 俄罗斯国家军事历史档案馆,全宗52,目录1,卷宗304,第2部分,第11页背面。

③ 克罗地亚国家档案馆,全宗430,目录66,1785,案卷147,第1、18页。

④ 克罗地亚国家档案馆,全宗430,目录66,1785,案卷147,第12-13页。

少将热涅因应立即准备好接收哥萨克，在他所辖部队的防守区找一块大空地，以便建立哥萨克临时营地；(4)向该地区派遣符腾堡步兵团维持纪律，监督哥萨克分配到各部队工作；(5)明确扎波罗热人享受的优惠条件：免除赋税，提供住处，供给军饷和军服^①。扎波罗热哥萨克前往安置点的路线是：凡去巴奇卡者需跨越国界线，沿索尔诺茨克和比哈里亚这两个“如帕尼亚(州)”(即现今罗马尼亚的斯拉江州和比霍尔州)前行；前往巴纳特者需要穿越摩尔多瓦公国的阿拉茨克和克拉绍夫州(即现今的阿拉德州和卡拉什-谢维林州)^②。

我们对奥地利政府这种实用主义的灵活性态度给以关注的同时，又不得不说，扎波罗热哥萨克迁居从一开始就被纯粹看成一种可加以如下利用的要素：(1)巩固边境防御；(2)对沙俄盟友过度玩弄“塞尔维亚”牌进行报复；(3)削减奥斯曼帝国境内扎波罗热哥萨克人数，防止日后在与土耳其开战中这些人会对付奥地利人，等等。这份清单还可以继续下去，但这其中每一条都表明一个简单且无可辩驳的事实，即任何一个帝国，它首先关心的是其自身利益，帝国能在多大程度上感受到本国民众的某种需求将最终决定它所制定的国民政策的特色。奥地利帝国也正是基于这几点对待扎波罗热哥萨克的。由于在建立和统一国家专制制度方面哈布斯堡帝国比俄国走得更远，这就意味着在奥地利帝国中没有地方，也没有可能容下扎波罗热哥萨克人的传

^① 克罗地亚国家档案馆，全宗430，目录66，1785，案卷147，第14-15页。

^② 克罗地亚国家档案馆，全宗430，目录66，1785，案卷147，第16-17页。





统组织形式和生活方式。哥萨克来到奥地利帝国的头一两年时间里便很快便意识到这一点,而那时迁居安置工作还在继续中。

1785年整个夏季,扎波罗热哥萨克不停地从四面八方朝着雅西和切尔诺维茨两个地方聚集。而当扎波罗热哥萨克被征召进入奥地利帝国军队服役这一消息传播开来之后,前来投奔布科维纳的就不再只是流落在摩尔多瓦公国的前塞契哥萨克了,那些生活在波兰,特别是波多利亚(现今乌克兰文尼察州境内)的哥萨克也开始涌向那里。后一群人中不仅仅有真正的扎波罗热哥萨克,十有八九还有一些为寻求更好生活的人混迹其中。还是



格伦茨步兵

那位埃尔钦别戈少将,他在6月份向帝国军事委员会汇报时便说,在“哥萨克”中,有不少普通混混,他们不仅没有马匹和武器,甚至连一套像样的服装也没有。鉴于队伍中有这样一批人存在,扎波罗热代表们也改变了他们以前要求保留传统服饰的想法,开始请求帝国给大家配发奥地利军队统一服装^①。

奥地利政府官员和军队对扎波罗热哥萨克的甄别和筛选工作几乎延续了四个月(8月至11月),而且非常苛刻。截至1785年末,在准备好安置扎波罗热哥萨克的军营里只住进几十号哥萨克,仅凭这点便足以看出奥方的谨慎态度。实际上,从一开始

^① 克罗地亚国家档案馆,全宗430,目录66,1785,案卷213,第1页、5页。

就有一定数量的士兵被拒绝进入奥军服役。起初，所有哥萨克被安置在巴奇卡的三个小城——森塔、松博尔和苏博蒂察^①。关于临时安置在森塔的扎波罗热哥萨克问题，现有的资料是这样的：他们中的第一拨二十五人于1785年12月16日到达，而其他大部分人依然还在赶来途中——刚到达特兰西瓦尼亚，有的甚至还滞留在布科维纳。后一种情况可从这样一个事实得知：1786年2月末，布科维纳地区军事长官埃尔钦别戈少将不停地收到维也纳国家军事委员会关于扎波罗热哥萨克物质保障条例和标准说明细则^②。细则内容是：（1）哥萨克士兵的物质保障比照外国非军事移民标准执行，也就是在这些人迁移到巴奇卡和巴纳特过程中按每人每天三克里泽发放费用；（2）如果哥萨克中有人想结婚成家，那就立即将其安顿到日耳曼巴纳特格伦茨团，给他们提供空置房，这种房子数量充足^③。

如此，自1785年末到1786年初的整个冬季，没有出现新批次扎波罗热哥萨克迁移者来巴奇卡。随后一批人员要等到三个月之后的1786年3月20日才能到达。彼时，安顿在森塔的哥萨克人才增加了三十七位同伴。接下来，大约相隔一个月，又有两批扎波罗热人抵达：4月25日来了五十三人，5月26日来了八十七人。总体上，这四批共计二百零二名哥萨克来到森塔^④。根据

① 巴契-博德罗格州，瑟姆·波洛夫斯卡博士主编，布达佩斯：匈牙利科学院，第248页。

② 克罗地亚国家档案馆，全宗430，目录66，1786，案卷8，第1页、3页。

③ 克罗地亚国家档案馆，全宗430，目录66，1786，案卷8，第2页。

④ 杜达斯·季尤拉：森塔哥萨克殖民地//森塔城消息报，森塔，1907，5月15日；I. 斯特里普斯基：关于扎波罗热哥萨克在匈牙利定居点最新消息//舍甫琴科科学学会笔记，利沃夫，1907，第76卷，第157页。





不同作者的资料以及各种历史档案记载来看,1785年至1786年两年间,加入奥地利军队的哥萨克总数达一千人之多。

关于扎波罗热哥萨克在边境军事区安置的条件,乌克兰国内史学界有部分学者持一种观点,认为这些哥萨克被授予了广泛的自治权。他们声称,这些哥萨克组建起一个独立团以区分其他格伦茨步兵团,他们有权使用自己的武器,穿戴自己的服装,配备自己的弹药,有权自由选举自己的指挥官。此外,还宣称在森塔建有所谓的“巴纳特塞契”,说是在其存在期间由科什阿塔曼指挥^①。对此我们认为,十八世纪末期奥地利边境军事区绝对不可能存在所谓的“巴纳特塞契”。1735年至1748年,奥地利边境军事区实行一系列改革,彻底结束了格伦茨自治区的存留部分,并且根据奥军统帅部标准,统一了边境地区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正是这些变化导致塞尔维亚格伦茨士兵移居到俄国境内,并随之于1751年至1753年建立了新塞尔维亚和斯拉夫塞尔维亚居民点^②。

同时,从奥军统帅部和文职政府的公文可以看出,前文提到巴奇卡地区的一些城镇,它们在1785年至1786年间也只是临时安置扎波罗热哥萨克队伍的几处集合点。1786年夏,约瑟夫二世巡视了巴奇卡地区,其间走访过松博尔(7月8日)和苏博蒂察以及森塔(7月9日)三城的扎波罗热哥萨克安置点。根据十九世纪稍晚期一些史学家的见证,奥皇此番出巡引起了奥地利社会

① 如果它确实存在,则更为确切的称呼应为“巴奇卡”,因为地理位置方面,森塔城并非位于巴纳特,而是在巴奇卡。

② E. 罗森伯格·冈瑟:克罗地亚的奥地利军事边界(1522—1747),乌尔班纳: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60,第112—123页。

对帝国境内这个具有异国情调的新臣民群体的关注^①。当时的维也纳报刊对奥皇此次出巡进行了广泛报道。这也是1788年的《维也纳日历》杂志刊登以“扎波罗热哥萨克”为标题进行报道的直接原因^②。

从1788年7月中旬开始,所有扎波罗热哥萨克被陆续调往更南边临近土耳其的边境地区。在他们的安置点中提及诺维萨德、蒂泰尔、科维利以及番切沃这四个城镇^③。直到此时,这些哥萨克的服装供应才最终得以保障。显然,对于奥地利军方来说,扎波罗热人是一个新生要素,缺少了解,因此也就令人不放心。或许,这恰好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边境军事区内军方竭力阻止哥萨克集中到某一个部队。至少,我们掌握的一些资料显示,在恰伊卡什水兵团和日耳曼巴纳特团军人中都有哥萨克的身影^④。



格伦茨恰伊卡什水兵

① 伊什特万·伊洛斯:《苏博季察,王国自由之城,历史》/苏博季察:约瑟夫·伯特曼书籍出版社,1886,第307页。

② 这篇文章的作者非旁人,乃俄国驻维也纳使馆参赞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波列季卡。此人系著名哥萨克军官家族出身,酷爱乌克兰和扎波罗热古风研究//B.舒拉特:《庚得列维卡关于扎波罗热消息来源考》/舍甫琴科科学学会笔记,利沃夫,1919,第128卷,第26页、40页。

③ 克罗地亚国家档案馆,全宗430,目录66,1786,卷宗224,第1页。

④ 拉扎尔·切拉普:《现代沃耶沃京地区的扎波罗热哥萨克》/《社会科学文集》,第24辑,诺维萨德,1959,第122-130页;克罗地亚国家档案馆,全宗430,目录66,1786,卷宗224,第1页。





与此同时,还出现过将哥萨克从陆军团调往水兵营或者相反的事情。这主要是出于合理利用部分有水战经验的哥萨克来防卫多瑙河与土耳其之间边界的缘故,而那些从前是步兵和骑兵的哥萨克则被安排到步兵团服役。比如,那个时代日耳曼巴纳特团公函中最典型的用语类似“伊万·恰伊卡,技术员,遵照第……号指令,于1786年随其他四位哥萨克调离恰伊卡什水兵营”^①。

恰伊卡什水兵营,或按其正式名称“蒂泰尔格伦茨营”,存在于1763年至1873年间,是边境军事区里一支最具特色的队伍。这些大名在外的军人——恰伊卡什人,按宗教-族群归属来说,大多数为东正教塞尔维亚人。他们主要任务是乘轻型内河巡逻艇——恰伊卡(塞尔维亚语 шайка)在多瑙河及其支流水域巡逻,阻止土耳其人越界过河的企图^②。十八世纪八十年代这个时期恰好是扎波罗热哥萨克加入该营的时间,其小分队分别被安置到十二个据点:上科维利、下科维利、噶尔基诺瓦茨、卡奇、蒂泰尔、洛克、墨寿林诺、维洛沃、丘卢戈、高斯博津采、约泽福多尔夫(扎巴利)和森蒂万(恰伊卡什)^③。大多数被分配到恰伊卡什水兵营的哥萨克被派驻提特利和上科维利两个据点。他们倾向于集体住宿,于是向统帅部求情允许他们按照自己的习俗,分“库林”居住。统帅部同意其请求,在1786年至1787年期间共花费一百六十九个福林在科维利为这些参加恰伊卡什水兵的扎波罗

① 潘切沃历史档案馆,全宗758,案卷304,第32页。

② 沃耶沃京档案馆全宗指南/编辑:尧万·瓦拉宾斯坦等,第1辑,诺维萨德:沃耶沃京出版社,1999,第9-10页。

③ 沃耶沃京档案馆,全宗8,目录1.案卷20,第1-2页。

热哥萨克购置了四栋房舍，并且还额外修建了一栋。这几栋房舍作为营房，每栋里面能容下的人不超过二十至三十名。由此也可以推断出，这个据点里扎波罗热哥萨克士兵的数量大概在一百至一百五十人左右^①。

按前塞契哥萨克的数量来说，日耳曼巴纳特格伦茨第十二团（1765年至1872年）是除恰伊卡什水兵营之外第二大团。调拨给该团的扎波罗热哥萨克绝大部分被派驻在番切沃城。首先，这一点为哥萨克自己口头传颂传统所证明。依据这些传颂可知，这座城镇是他们在奥地利帝国服役期间的主要基地^②，其次，还有历史文献方面的佐证。日耳曼巴纳特格伦茨团的首要任务是骑马巡逻他们负责的防区，巡视的区间在一处被塞尔维亚语称为“恰尔达克”的警戒碉堡群区间。这些碉堡防御性很好，其中某些部位还架设了一种形似加特林机枪的轻型火炮，危急情况下它们还是极佳的庇护所^③。

1787年，奥皇约瑟夫二世访问俄罗斯，两国间战略同盟关系得以恢复。双方约定，在新一轮俄土战争中奥地利有义务支持俄罗斯，在巴尔干半岛西部加入战斗。后来奥地利履行了这一缔约。扎波罗热哥萨克格伦茨军加入多瑙河舰队（恰伊卡什水兵）和巴纳特团主力（步兵）之中，积极参与了1788年至1791年的奥土战争。由于这些扎波罗热哥萨克并没有专门同其余的士

① 克罗地亚国家档案馆，全宗430，目录66，1791，案卷123，第1页。

② Ф.康德拉托维奇，多瑙河右岸塞契（依据当地人回忆与口述）//基辅古风，第V卷（一月），1883，第48页、50页。

③ Д.布列季契：军事边界线——旧地图及图表中的绘图，斯列姆斯卡米特洛维察：文化遗产保护局出版社，1996，第19页。





兵区别开来,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凡是其他恰伊卡什水兵和格伦茨步兵所经历的考验和参加过的战斗这些哥萨克士兵也同样经历过。我们准备对全部的细节曲折进行描写,只想指出,扎波罗热哥萨克在那场战争里遭受重大人员损失,因此他们逐渐累积起对服役的不满情绪。

与此相关,一份日期为1791年7月23日恰伊卡什水兵营给斯拉沃尼亚总指挥部的密报显得特别有意思。其中提到,在这场与土耳其的战争中,大多数在恰伊卡什水兵营服役的扎波罗热哥萨克士兵不是战死便是逃亡。截至1791年夏,该营总共仅剩下九名早就央求退伍的扎波罗热哥萨克老兵。也正因如此,营指挥部向上级请求允许他们把那些逃亡哥萨克留下的动产与不动产进行出售,以此来补偿当初为这些人购置家当所花去的费用^①。如此一来,1791年,日耳曼巴纳特格伦茨团的扎波罗热哥萨克最终消失了^②。由此出现的问题是,是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情况下使得大多数扎波罗热哥萨克离开了奥地利军队?

关于这些士兵的逃跑原因,我们可以说,这是因哥萨克不满情绪造成的。其实,从这些哥萨克来到奥地利帝国的第一天起,他们就被当作劳工使用,从事即便是帝国必要但在哥萨克人看来却是屈辱的土方作业^③。天主教当局对东正教居民歧视,试图统一东正教仪式等的一些行为没有引起哥萨克们的好感。比如,同样是在1786年,巴奇卡州政府颁布了一项法令,规定所有东正教节日中,信徒们只允许在其中的二十七个工作日中搞庆祝

① 克罗地亚国家档案馆,全宗430,目录66,1791,案卷123,第2页。

② 克罗地亚国家档案馆,全宗914,案卷1618,第1-590页。

③ 沃耶沃京档案馆,全宗2,目录138,案卷160,第1页。

活动,并且只准按儒略历(新历)举行^①。此外,绝大多数在上述两支队伍里服役的扎波罗热哥萨克,他们的职务要不只是低级军官,要不就是士官生。至少,在1785年至1790年期间的团级或营级军官名册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位扎波罗热哥萨克被奥地利统帅部授予高级军官称号的,而在1785年春谈判时他们可是承诺了这点的^②。

这些事实叠加在一起最终导致了扎波罗热哥萨克心怀不满,以致他们不断从奥地利帝国离开(其实是“开小差”)。触发这一过程的是战时事件。显然,身处异地,这些扎波罗热哥萨克绝对感到自己是外人,他们从已心生厌倦的帝国离开实在是不需要太多的理由。

逃亡哪里?这不是问题。哪里自在,哪里有自己人,就往哪里去。也就是说,他们要逃往多瑙河下游,去投奔土耳其扎波罗热布特卡雷。自1768年至1774年俄土战争爆发起,那片土地对于扎波罗热哥萨克来说再也熟悉不过了。那时,塞契千人水兵的队伍在伊万·曼德拉上校带领下在黑海和多瑙河下游一带活动。在那里的两年时间,哥萨克把那些地方的水文和地理情况都研究透了。伊兹梅尔、伊萨克齐、巴巴达格、图里奇等诸城周边地区以及布扎克和朵布鲁季两州的周围情况,这些人都极为熟悉^③。那场战争中,他们在多瑙河驻扎的最北据点是土耳其锡利斯特拉要塞(现今保加利亚的一个州中心),1771年至1773年

① 沃耶沃京档案馆,全宗2,目录144,案卷23,第1-2页。

② 潘切沃历史档案馆,全宗758,目录118,案卷(缺),页码1-132;沃耶沃京档案馆,全宗8,目录1,案卷22,第1-3页;沃耶沃京档案馆,案卷25,第1-2页。

③ 俄罗斯国家海军档案馆,全宗212,目录4,案卷139,第22-23页。





他们在这个要塞的近郊参加过战斗,与该要塞隔河相对的(河的左对岸)是那些年扎波罗热人的多瑙河部队营地。而他们作为奥地利多瑙河水兵部队,在1790年战事中驻扎的最南端是土耳其维京要塞附近(现今保加利亚西北的一个城镇)。南北两地距离也不算大,约莫四百公里。若是借助船帆和船桨之力顺流而下的话,也就是三四天的路程。而这片区域以外的其他地方他们不仅自前一次战争时就已经了解,还因扎波罗热塞契覆灭十年来他们在土耳其境内的漂泊而进一步熟悉。

最大的可能是,那些从奥地利军队逃跑的绝大部分扎波罗热哥萨克是恰伊卡什水兵,因为他们不仅了解当地情况,还可能给自己提供渡水工具(可能是简单小划子船,因为他们盗取配有火炮的多瑙河恰伊卡船舰可能性比较小)。战争结束对扎波罗热恰伊卡什水兵来说也仅仅只意味着他们可以返回驻地,再过起那种经指挥官编排好,按小时轮班的不紧不慢的日子。而与此相对的是,距离他们不远的多瑙河三角洲地段则是另外一种生活情景——经土耳其政府许可,塞契哥萨克军事组织得以恢复,土政府还专门划拨了一块土地用来建造居住点。这一切竟是如此强烈地让人回想起那个并未被完全忘却、且使人内心充满温馨感的第聂伯河下游塞契老营。而对那些不想为“基督徒的敌人”(即土耳其人)效力的人来说,还有另外一条路可走——投奔伊兹梅尔俄军,那里有新建起来的黑海水军(忠义扎波罗热军)。大家都在选择自己要走的路,但没有一人愿意继续留在奥地利军队。这段“为衣着投军”的插曲已经结束,留给他们的只是在多瑙河对岸扎波罗热哥萨克中间生活的片段回忆,

还有在那个时代文献中留下的为数不多的见证。

1775年之后，扎波罗热哥萨克历史中与这段“奥地利插曲”相关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情节是所谓的“马耳他痕迹”。“马耳提兹”（马耳他人）是那些奥地利扎波罗热哥萨克对自己的称呼，其实就是那些信仰基督教的“哥萨克骑士”，且首先是航海武士，“对抗异教徒战士”的一个概括形象，形成于十六至十八世纪期间扎波罗热哥萨克的集体想象。一个最明显不过的事实是，这一形象的形成正好处于塞契哥萨克在黑海战斗活跃期——十六至十七世纪。尽管我们缺乏有关扎波罗热哥萨克与马耳他骑士协同行动的证据（鉴于他们的海战战场在地理空间方面有着一一定的距离，他们未必有过合作），但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他们之间偶发性的联系应该还是有的。总体上来说，他们都涉及这样一些事情，比如，他们两方面的部队分别在地中海和黑海解救过土耳其划船奴隶中的基督教被俘人员。显而易见，扎波罗热哥萨克和马耳他骑士相似的经历促使了他们彼此产生敬意。

“马耳提兹”这个术语也正是在1785年至1790年之后才获得新的含义。这与绝大多数扎波罗热哥萨克在格伦茨部队服役时被编入恰伊卡什水兵营有关。哥萨克恰伊卡什水兵在水面上，在天主教皇帝约瑟夫二世战旗下与土耳其作战，正是这点让他们戴上了“马耳他”光环。不仅他们自己这么看，就连那些在俄罗斯和土耳其军队的塞契兄弟也有这种看法。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马耳提兹”姓氏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头几年的文献中大量出现，而且恰恰记载在有关哥萨克的资料里，并且这些姓氏也恰好与当年那些在奥地利边境军事区服役





几年的那部分扎波罗热人有关。1791年11月,黑海哥萨克军中有一位没有俄军军衔的军官,名叫瓦西里·马耳提兹^①。值得注意的是,1787年至1791年俄土战争结束时,此类哥萨克军官绝大部分都是从土耳其投诚过来的前多瑙河士兵。最有可能的是,部分前格伦茨士兵实际上很快就被卷入归国潮中。这里要指出的是,要想辨认这些人的身份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唯一能做成此事的现实可能性是对黑海哥萨克人员名单进行人名学材料分析,筛选出带有“马耳提兹”姓氏的人。其实,土耳其扎波罗热哥萨克中可能有更多的前格伦茨士兵投奔了俄国,只不过要确知都有谁,在哪里,这是无法做到的。有一种猜测听上去倒是感觉真实可信,即从前的那些“马耳提兹”不愿意过多宣扬自己在奥军服役一事,同样的,他们也不愿意让外人知道自己从那里开了小差,毕竟当时进行着战争,而从盟友队伍中开溜一事未必会被俄军军官视为什么值得肯定的行为。或许这类哥萨克也的确觉得自己在俄罗斯境内不自信,宁愿一有机会就返回多瑙河对岸去,至少有一些文献表明了这一点。在1795年和1796年发生过驻扎在敖德萨城的黑海哥萨克的一些低级军官出逃之事,这其中就有我们已经提到过的那位瓦西里·马耳提兹及其同伴尼基福尔·马耳提兹。在这种情况下,有一种说法听起来可信,说的是俄军不给那些马耳提兹和多瑙河部队出身的哥萨克军官授予军衔的做法刺激了这些人,迫使他们再次逃回土耳其^②。

① 库班哥萨克军历史史料集(文件选自库班哥萨克军档案)// И.И. 德米特连科收集与出版,第3卷,圣彼得堡:独立宪兵大队总部出版社,1896,第398页。

② И.В. 沙波什尼科夫、Г.В. 萨波什尼科娃:哈吉别与敖德萨的扎波罗热哥萨克与黑海哥萨克,敖德萨:ОКФА出版社,1998,第167-168页。

据现有资料考证，驻扎在多瑙河右岸塞契的前“马耳提兹”及其后人投奔黑海哥萨克军的又一次高潮出现在1806年至1812年俄土战争期间。众所周知，1806年12月，俄土战争一爆发，特洛菲姆·盖达布拉（迈达布拉）带领多瑙河右岸扎波罗热哥萨克部队便投靠了俄军^①。按他们自己提议，那些投诚过来的士兵组建了多瑙河河口布扎克哥萨克军，这一建议得到摩尔多瓦军队司令官米赫利松将军的支持。到1807年8月，这支部队共招募了一千三百八十七名军官和普通哥萨克^②，将军本人卫队中绝大多数是所谓的“布莱拉土耳其哥萨克”。这支部队中有八十七名哥萨克特别引人关注，他们出身“奥地利籍”，突出的就是他们中有位马特维·马耳提曾科。他姓氏的特点让人一眼就能准确无误断定他是某个“马耳提兹”的后人。同时，这位哥萨克的年龄才30岁（也就是1777年出身）——这立即引起其他几个额外问题，且使人有理由认为有一定数量（尽管不多）的扎波罗热哥萨克在1785年至1786年在奥地利军队服役时可能是有家室的（或者他们有可能在新的落脚点安顿下之后将自己妻儿老小从摩尔多瓦公国接了过去）^③。

不管如何，这位前多瑙河右岸士兵出现的事实本身能较为宽泛地说明一种可能性，即格伦茨扎波罗热哥萨克剩余士兵向

① O.A.巴钦斯卡娅：1828—1868年多瑙河哥萨克军（建军一百七十年纪念），敖德萨：“奥斯特罗文印”社，1998，第9页。

② 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国家档案馆，全宗250，目录2，案卷151（第1卷），第69页背面。

③ 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国家档案馆，全宗250，目录2，案卷151（第1卷），第36页。





多瑙河右岸“溢出”，而后，在“马耳提兹”主体离开奥地利帝国之后的二十多年中又逐渐向黑海哥萨克军迁移。至少，1811年流落到塞契的安纳尼伊·柯洛莫伊茨——这位多瑙河右岸土生土长者的详细情况连同1785年至1790年扎波罗热哥萨克在奥地利边境军事区的诸多驻扎细节让人有理由猜测，直到1828年，多瑙河右岸哥萨克军中还有不少扎波罗热哥萨克存在^①。而当这些多瑙河哥萨克在科什阿塔曼约希普·格拉特基带领下离开土耳其（1828年），去了他们在北高加索的下一个定居点之后，这些“马耳提兹”（或确切一点说，他们的后人）的足迹无疑是消失在了乌克兰南部和库班地区的民众中了^②。

① Ф.康德拉托维奇，多瑙河右岸塞契（依据当地人回忆与口述）//基辅古风，第V卷（一月），1883，第36页、46页、48页。

② 与此同时，我们想提请读者注意，“马耳提兹”姓氏在我们这个时代依然在使用（尽管并不多），这一点只要往任何一个浏览器搜索框输入俄文或乌克兰文书写形式的“Малтыз（Малтиз）”就不难得知。最明显的事实是，现今大多数带有这一姓氏的人通常居住在乌克兰南部和库班地区，这些地区在十九世纪上半期集中居住着从多瑙河右岸返回俄罗斯帝国的剩余哥萨克。

第十一章 黑海哥萨克：沙俄帝国前扎波罗热哥萨克新军事组织(1783年—1801年)

塞契覆灭之后的头十至十二年间,部分扎波罗热哥萨克逃亡到奥斯曼帝国并在那里安顿下。他们缺乏统一领导,同时也没有结构明确的军事组织,这不仅使得哥萨克们陷入迷茫,也使得他们中许多人对今后能否继续待在土耳其苏丹统治下生活产生怀疑。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俄国政府对他们的关注。如果扎波罗热人能脱离土耳其统治回归俄国,这对俄政府来说,不只是便于对他们进行管控,如果考虑到与土耳其可能发生战争的话,这也有利于在乌克兰南部地区扩大非正规军人数,特别是1783年5月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汗国之后,两国间发生战事的可能性越发增大了。

1783年7月1日,俄帝国政府向前扎波罗热哥萨克宣称有意尽快重建他们的哥萨克军,并任命前扎波罗热哥萨克军官扎哈尔·切佩加和西多尔·别雷为指挥官。这两位军官那时已经获得俄罗斯贵族身份并被授予了军衔。按照政府指示,作为第一步,两位指挥官要招募五百名哥萨克骑兵和同等数量的海军陆战士兵。政府这一举措立即得到前塞契哥萨克的积极响应,他们纷纷聚集到别雷和切佩加麾下听命。截至1783年10月末,已经聚



集起八百名哥萨克。但许多人不仅缺少武器和马匹,甚至连套像样的服装也没有,而俄政府却并没有急于解决这些扎波罗热人的粮饷问题,更不必说划拨土地来安置他们。此外,乌克兰南部地区各省地方政府以及地主也进行阻挠,他们不惜代价,试图将哥萨克强留在原地,而这些前哥萨克那时有的已经进行了身份登记,成为市民、国家农民和地主庄园农民。此外,还有一件让扎波罗热哥萨克颇为不安的事是,实际上他们必须以招募制来服兵役(类似常规军士兵)。由于种种不利因素的妨碍,使得最初积极响应的人有三分之一几乎无法进入新建部队服役。而一年之后的1784年11月,别雷的队伍中只剩三十名骑兵和二百五十三名步兵^①。

转眼到了1785年,但有关组建军队事宜依旧没有着落。于是在1785年6月,伊万·索洛古布少将便把哥萨克人服役条件——希望能得到政府坚决保障——这一愿望向波将金公爵作了汇报。尽管索洛古布独自宣称(别雷和切佩加两位指挥官没有参与)到1786年春他要建立一支五百人的队伍,但哥萨克却不买账,他们并不急于投身到俄国军队中来。

1787年夏,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南巡。在波将金安排下,一批前扎波罗热哥萨克的军官在新俄罗斯省省会克列缅丘格城觐见了女皇。其间,这些人向女皇提出请求,希望她能恩准恢复前扎波罗热哥萨克军队。当然,他们并非想要重新恢复塞契体制——他们计划中的新部队将按顿河哥萨克体制来建立。

^① 俄罗斯国家军事历史档案馆,全宗52,目录1,案卷304,第1部分,第1页、3页、10页、11页。

最终,还是1787年新一轮的俄土战争爆发才加速了俄政府组建哥萨克军进程。由于沙俄政府在意增强自身军事潜力,因此同意征召全体前扎波罗热哥萨克兵入伍服役。于是,1787年8月20日和10月12日,波将金公爵两次发布命令,宣布不仅征召塞契哥萨克,还征召乌南地区所有自由居民入伍当兵^①。一时间,这些新组建的哥萨克军队名称五花八门,什么“忠义哥萨克军”“忠义扎波罗热科什军”“忠义扎波罗热军”等不



黑海忠义扎波罗热哥萨克(1787年至1791年)

一而足。这支军队之所以被冠以“忠义”之名,想必意在与“叛逆的”(即土耳其)扎波罗热哥萨克军划清界限。从文献上来看,直到1788年末,这支哥萨克队伍才确定了两种主要称呼:“黑海哥萨克”和“黑海哥萨克军”^②。

前扎波罗热哥萨克进入俄罗斯军队服役,这使俄政府得以顺利解决如下几个问题:第一,在新军事组织框架下集中相当一部分前塞契军成员,这有利于(帝国)减轻对这些(对帝国而言)忠诚度不高的人员的监督与降低管控成本;第二,大幅增加非正

^① 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国家档案馆,全宗249,目录1,案卷28/29,第1页。

^② 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国家档案馆,全宗249,目录1,案卷3,第1页。





规军数量,这在平原战争条件来说是一支真正不可替代的力量;第三,提高俄政府在乌南地区居民中的知名度。须知,该地区大多数居民同1775年被剿灭的下游扎波罗热军有直接联系。

1787年至1791年俄土战争初期,新建哥萨克军由骑兵和步兵两支队伍组成。这两支队伍在1787年末至1788年初获得军队地位,当时被称为“忠义扎波罗热军”。步兵基本上是在划舰部队服役和当炮手。1789年夏,军队开始实施以五百人为一团的建制制度。

这支哥萨克军人数不断增加。截至1787年末,“扎波罗热自由军”有六百名哥萨克^①,及至1788年2月,人数便增加到七百三十二人,同年3月底,人数猛增至一千三百四十三人,而到5月份,则又变成一千八百一十二人^②。到1788年6月,这支部队拥有低级军衔的哥萨克有两千零七十七人(普通哥萨克士兵一千九百七十三人,以及一百零四名炮手)和六十二名哥萨克军官(一名军阿塔曼,一名军事务官,五名上校,五名上尉,五名少尉,六名团军官,三十八名库林阿塔曼和一名炮兵阿塔曼),并且大部分哥萨克士兵在划舰部队和炮兵部队服役,而骑兵部队只有区区二百人多一点的哥萨克士兵^③。

新建哥萨克军的第一批指挥官是哥萨克军(科什)阿塔曼西

① И.И. 德米特连科:库班哥萨克军史资料集,第3卷,圣彼得堡,1896,第6页。

② 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国家档案馆,全宗249,目录1,案卷16,第2页、11页、13页。

③ 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国家档案馆,全宗249,目录1,案卷16,第4页。

多尔·别雷上校(指挥步兵),大尉扎哈尔·切佩加(骑兵指挥官),还有指挥划艇部队的军法官安东·戈洛瓦德^①。

由于沙皇谕旨明确允许这支部队不仅可招收前扎波罗热哥萨克入伍,还可以招收其他“闲散人”加入哥萨克。这样一来,新哥萨克军人数迅速增加。1790年1月,该部队哥萨克骑兵人数为一千二百零五人,而到同年10月,便增加到两千七百七十人^②。而步兵人数更多,1790年5月就已达五千二百二十九人^③。俄土战争结束后,该部队人数再次增加,1791年末达到一万两千六百二十人,其中七千五百名哥萨克在实实在在地当兵服役^④。

黑海哥萨克军参加过1787年至1791年俄土战争中的几场主要战役。比如,奥恰科夫、哈吉别(即现今敖德萨)、伊兹梅尔、基利亚(以上四座城市在现今乌克兰境内)、墨钦、巴巴达格、图尔恰、伊萨克恰(以上四座城市在现今罗马尼亚境内)等黑海西北岸土耳其各要塞的攻城战与其近郊战。

此次俄土战争期间,黑海哥萨克军指挥官一直同俄政府谈判,要求其提供用于居住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土地。波将金公爵随即于1788年初将此事上奏叶卡捷琳娜二世,称哥萨克请求将塔曼半岛或刻赤半岛上的土地划归他们。这些黑海哥萨克

① 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国家档案馆,全宗249,目录1,卷宗11,第3页。

② 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国家档案馆,全宗249,目录1,案卷69,第216页。

③ 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国家档案馆,全宗249,目录1,卷宗67,第36页。

④ 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国家档案馆,全宗249,目录1,卷宗112,第1页。





对土地追求的胃口随着他们战功的累积而逐渐增大：服役表现好就可以期待得到更好赏赐。于是，1789年8月，哥萨克要求用于定居的地区已不再只限于塔曼半岛了，他们还想将整个塔夫里亚内陆地区（这几乎是除克里米亚半岛之外前克里米亚汗国在乌克兰南部的全部地区）据为己有^①。不过话又说回来，当时的俄国政府和地主的殖民活动正在塔夫里亚地区迅猛发展，哥萨克的愿望无疑是竹篮打水。不过，波将金公爵此时已经正式成了这支哥萨克军的东家（庇护者）。作为俄帝国内所有哥萨克部队的盖特曼，1790年4月19日，他一道手令，将前不久刚从土耳其人手中夺过来的位于南布格河与德涅斯特河之间被称为“奥恰科夫草原”（耶迪桑州）的那片地区划拨给了黑海哥萨克军，用于定居。1790年至1792年间，该地区安置了一千七百五十九户黑海哥萨克士兵家庭（其中五千零六十八名男性，四千四百一十四名女性）。截至1792年2月，奥恰科夫州共建起了二十五个哥萨克居民点，这其中还不包括农庄（窝冬村）和渔村^②。

1791年，波将金公爵去世，奥恰科夫草原的哥萨克殖民拓荒行动一下子便陷入艰难境地。公爵在世时，作为女皇宠臣，他有着手眼通天的本领，哥萨克殖民活动一律以他的批示作为法律依据，且无人对其有异议，但公爵一去世，这些批示便失去了法律效力。于是黑海哥萨克军领导层以新当选的科什阿塔曼切佩加为首，从1791年末便开始不断恳请女皇赏赐给他们一块永久

① И.И. 德米特连科：库班哥萨克军史史料集（3卷本），圣彼得堡，1896，第3卷，第132页。

② П.П. 柯罗连科：黑海哥萨克军（1775—1792），叶卡捷琳诺达尔，1892，第45页。

立足之地，若不能将他们当下所住居之地划给他们，哪怕在库班地区给一片土地也好。在这种情形之下，俄政府允许黑海哥萨克军派代表团进京表达诉求。于是，1792年3月2日，以安东·戈洛瓦德为首的哥萨克代表踏上了前往圣彼得堡的申诉之路^①。

与此同时，五十名哥萨克在奠基·古利克上校率领下前往库班，去勘探准备用于建立黑海哥萨克定居的地块。他们不仅勘探了地块，作了详细描述，还对定居点奠基之处标注^②。1792年6月30日，俄政府经过一个月研究，终于出台了一项有利于哥萨克的决定：女皇签署法令，将法纳戈里亚岛（塔曼半岛）连同库班河与亚速海之间的土地一道赏赐给黑海哥萨克军^③。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的库班
黑海哥萨克

但居住在奥恰科夫草原一带的黑海哥萨克军中有相当一部分士兵及其家属决定留下来，他们共有男女三千一百四十一人。

① 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国家档案馆，全宗249，目录1，案卷161，第1页。

② 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国家档案馆，全宗249，目录1，案卷161，第1页、2页、69页、74页、84页。

③ 库班哥萨克军存留沙皇谕旨及其他书面文书复印件研究//库班哥萨克资料集，叶卡捷琳诺达尔，1901，第8卷，第186页。





这些人与前塞契哥萨克基本没有直接关系:仅有三百二十五名黑海哥萨克士兵经历过军事服役,余者分别是九十二名乌克兰农民,一百八十八名波兰人,十三名亚美尼亚人,二千二百五十三名摩尔多瓦人(绝大多数是东罗曼居民,他们自奥斯曼帝国时期便在此定居)^①。

从1792年至1793年,黑海哥萨克军(“忠义扎波罗热军”)迁居库班前后持续了两个夏季。迁移新址后的头八年里,由于有大量移民加入,军队人数增至近两倍。哥萨克阿塔曼季莫费·科特利亚列夫斯基在呈给沙皇保罗一世(1797年12月)的报告中称,如果有需要,萨克军可以派出一万两千五百一十名士兵,其中骑兵二千八百二十九名,步兵九千六百八十一名^②。“切尔诺莫里亚”(当时开始这样称呼起库班来)在1800年进行过一次人口统计,当时有两万三千四百七十四名男性,九千一百三十五名女性,其中适合服兵役者有一万五千五百三十七名^③。

移师库班之后,黑海哥萨克军的行政区划如下:哥萨克军受封之地分为五个区——叶卡捷琳诺达尔区、法纳戈里斯基区、贝苏格斯基区、耶伊斯基区以及格里戈里耶夫斯基区,每个区均有各自区政府领导。切尔诺莫里亚的行政机构人员由黑海哥萨克军设立在叶卡捷琳诺达尔城(现今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市)的军

^① 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国家档案馆,全宗249,目录1,案卷193,第208页。

^② 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国家档案馆,全宗249,目录1,案卷361,第38页。

^③ 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国家档案馆,全宗249,目录1,案卷442,第52页。

政府官、军事务官、区政府官（兼具地方警察职能）、库林阿塔曼、村镇阿塔曼、村监督员、特别监督员、警察局长、村百人长和十人长构成。

黑海哥萨克作战部传统配备形式为：首先，军阿塔曼要确定服役所需士兵人数，然后按库林哥萨克人数宣布从各库林（镇）进行征兵；其次，库林阿塔曼负责对被征召哥萨克进行登记造册，然后密切关注他们服役期限、武器保养、军服置办等事宜；最后，征召来的哥萨克士兵被分成支队和团，这些战斗单位的指挥官由哥萨克军阿塔曼任命。

就参军服役而言，所有黑海哥萨克士兵被分成三个年龄组：（1）战斗组哥萨克（“成年组”或“适龄组”）；（2）少年组；（3）老年组。将某个士兵划归为老年组并没有确定的年龄限制，而是根据体力，更多时候则是凭“眼力”来判断。

十九世纪初，黑海哥萨克军机构经历了一场彻底改革。1801年2月16日，保罗一世颁布谕旨，宣布取缔黑海哥萨克军政府，代之以军事办公厅^①。

谕旨第六条规定，黑海哥萨克军今后应按俄罗斯帝国内哥萨克军共同之规定行事。同时，确立了切尔诺莫里亚地区的上级主管部门——文职人员属于枢密院管理，军事人员则属于陆军院管辖^②。保罗一世的改革仅仅只是这支军队体制改革的开端。1802年2月25日，根据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签署的法令，黑

^① 库班哥萨克军存留沙皇谕旨和其他书面文书复印件//库班哥萨克军资料集，叶卡捷琳诺达尔，1901，第8卷，第287页。

^② Г.Н. 舍甫琴科：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上半叶黑海哥萨克军研究，克拉斯诺达尔，1993，第8页。





海哥萨克军按顿河哥萨克军模式建立起军政府^①。

这样,在1801年至1802年期间,黑海哥萨克军源于扎波罗热塞契传统社会制度的旧式自治模式残余被彻底清除,也正是自那时起才谈得上说,前扎波罗热哥萨克及其后代开启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与之前乌南部地区生活方式鲜有关联的新时代。

^① 俄罗斯帝国法律大全,第十七卷,圣彼得堡,1830,第20156期。

结 语

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初,扎波罗热哥萨克发展史上留下记忆的首先是彼得一世针对扎波罗热地区实行的统一整编政策。该政策于1708年至1709年实施,引发了追随盖特曼伊万·马泽帕和瑞典国王卡尔十二世的第聂伯河下游扎波罗热军的反俄运动。这场运动最终以扎波罗热哥萨克及其盟友的失败告终,于是哥萨克军不得已投靠了克里米亚汗国。

自1709/11年至1734年,差不多耗费二十五年时间,扎波罗热哥萨克一直尝试入职克里米亚汗国国家机构,但终究未能如愿。在汗国军政体制中地位的不确定性引起他们不满,并最终导致他们重返俄国。

第聂伯河下游扎波罗热军脱离克里米亚汗国重返俄帝国后(1734年),其所拥有的土地很快便被并入了俄帝国版图。最后一个扎波罗热塞契要塞——位于波德波利纳亚河河畔所谓“新”塞契(1734年至1775年)——不仅成了哥萨克军行政机构(科什)所在地,同时也具备了大型手工业生产和商贸中心特质。由于拥有系统防御工事,这使得它成了该边区防卫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节点,阻挡着土耳其鞑靼人可能的进犯。而日常驻扎在塞契要塞那些多达三十八支的哥萨克库林大军则又大大消除了类似威胁。扎波罗热哥萨克地盘由科什掌管,而科什则将这些土地



划分为一个个行政区域单位——“帕兰卡”，让帕兰卡督军领导和治理。由于人口增加，加之扎波罗热哥萨克将其与顿河哥萨克以及与土耳其（克里米亚汗国）有争议的地区强行纳入自己掌控之中，于是整个“新”塞契时期扎波罗热帕兰卡数量有所增加。

俄土边境局势趋于稳定，这一方面促进了扎波罗热地区国家制度的快速建立与发展，另一方面也瓦解了扎波罗热本地传统社会秩序，加深了哥萨克群体分化，使得他们朝着“猎获”式盖达马克活动和“入职与农耕生产”这两个分支方向发展。广大扎波罗热哥萨克底层群体（贫困哥萨克）尝试建立亲克里米亚汗国和土耳其政府的军事中心，即那些事实上独立的盖达马克“塞契”，以此来表达对哥萨克军事领导层实行调和政策的不满。

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十八世纪的盖达马克运动应从两个角度来考察。一方面，它是当时乌克兰族群对本民族部分地区——第聂伯河右岸被外国势力（首先是波兰）所统治的一种社会性回应。同时，对于率先发起并广泛参与这种活动的扎波罗热哥萨克来说，他们的理想和目标就是驱逐外敌，恢复哥萨克制度。另一方面，据其奉行的策略和具体实施的行动来看，盖达马克活动本质非它，乃是哥萨克传统“猎获”活动的一种表现。只不过在当时边境对立的情形下，这种活动因其所针对的对象是其他民族和其他宗教信徒等所谓的敌对邻居，如鞑靼人和土耳其人、波兰人和犹太人等，从而给这些哥萨克以借口，使他们得以为自己高强度的暴力行为进行开脱。

相当一部分扎波罗热哥萨克不愿按照沙俄政府在国内其他哥萨克群体中推行的标准来统一自己的生活方式，其结果必然



导致两者之间发生冲突。俄帝国政府对第聂伯河下游扎波罗热军的吞并是一场精心策划和周密部署的行动。1775年6月,他们武装侵入扎波罗热地区,其目标就是吞并哥萨克军地盘,从政治、军事和财政等诸多方面将该地区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

沙俄政府对前扎波罗热地区的打压行为引发了哥萨克人大规模出逃。有相当一部分扎波罗热哥萨克——不少于五千人逃到了土耳其境内(包括克里米亚汗国和摩尔多瓦公国),但1778年至1787年期间,土耳其帝国对他们实施强制性迁移,并且临时性禁止他们重建有着明确结构的军事组织,这让很多哥萨克对今后能否在苏丹统治之下继续生存产生了疑虑。

如此一来,塞契灭亡之后的头十年期间,无论是俄国政府还是土耳其政府,实际上它们均无法提出令扎波罗热哥萨克满意的条件,以便使他们能够安心服役,于是他们中一部分人(大约一千人)决定前往奥地利军队碰运气。1785年至1786年间,他们当中不停有人跨过所谓的“边境军事区”投奔奥军。在奥军中他们大多数人的任务是乘坐一种叫“海鸥”的轻便独木舟沿奥土界河地段进行巡逻。这些人还作为多瑙河舰队(水军)和巴纳特军团(步兵)成员,积极参与到奥土战争之中。然而,由于不愿遵守严格的军纪,他们不久又离开了奥地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加入了多瑙河右岸的扎波罗热-布特卡雷哥萨克队伍,还有部分人投奔了俄国,参加了黑海哥萨克军。

对黑海哥萨克军——这个前扎波罗热哥萨克的新组织进行制度化改造是俄罗斯帝国在复杂环境下作出的一项决定,因为组建哥萨克部队一事在沙俄政府看来是一项情非得已的举措,



是迫于解决一系列内外政治问题需要而迈出的一步,其中一个主要推动因素就是围绕黑海北岸地区霸权的长期争夺的需要。这种霸权地位早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时期(1762年至1796年)就已经成功实现,而哥萨克军则被沙俄政府纯粹视为实行其对外扩张和对所夺地区进行殖民统治的工具。

由于俄国分别于1774年、1783年和1791年数次从土耳其手中夺得大片土地,南乌克兰作为边境地区的特征便快速消退,其居民的传统哥萨克生活方式实际已经难以为继。因此,1792年,这些前扎波罗热哥萨克军人及其家眷被迫迁往库班地区便是一个自然且必然的出路。

自此,历史上的扎波罗热大地,一场自1491年首次被提及,轰轰烈烈历经三百年风雨曲折的哥萨克群体彻底走向衰落。

十九世纪上半叶,俄帝国政府允许从土耳其回归的扎波罗热人后代在黑海北部沿岸的多瑙河地区和亚速海地区建立两个小规模哥萨克部队。但这两支队伍,无论是实力还是对该地区政治和军事局势的影响力都远不如当年的第聂伯河下游扎波罗热哥萨克军。时至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这两支队伍最终被合并到库班地区黑海哥萨克人主体部分中去了。

后 记

2017年6月,安徽师范大学伏尔加-第聂伯两江流域研究中心(简称“两江中心”)正式成立。中心成立之初就把作为历史文化现象的哥萨克确立为本中心基础研究内容之一。

2018年10月,译者受学校委派,前往乌克兰扎波罗热国立大学孔子课堂工作。由于工作性质,译者经常同扎波罗热市不同群体的民众打交道,从中不仅感受到当地居民对中国的友好态度,同时也感受到当地浓厚的尚武气息。由于译者当时对扎波罗热地区的中国传统武术文化传播较为关注,于是便去探究这种尚武历史的由来。这才发现,这一切源于当地独特的哥萨克文化习俗。扎波罗热市郊的霍尔季察岛上,如今被当地政府列为文化遗产保护对象的塞契大本营旧址犹如当年哥萨克人留下的一支“香火”,散发着幽幽的历史气息,默默熏陶着扎波罗热地区民众,激发着哥萨克后人的血脉,使得这种尚武精神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在译者前往扎波罗热国立大学后工作不久,安徽师范大学两江中心充分利用两校合作机会,聘请了扎波罗热国立大学历史系教授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米尔切夫先生作为外籍特聘专家进入本中心工作。

由于工作关系,译者有充分条件与米教授接触,向他请教哥萨克历史方面的知识。这一接触才发现,原来他竟是一位对哥萨克



历史文化,尤其是对扎波罗热哥萨克历史文化研究造诣很深的专家。同时,这一时期在扎波罗热市工作的老朋友程徽晟先生基于对当地民俗的了解,建议译者关注一下扎波罗热哥萨克文化。这样一来,译者便经常利用空余时间向米教授请教哥萨克问题。于是,米教授的著作被翻译过来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本书翻译过程中得到很多专家与同行的帮助,译者不敢忘却。借此机会,请允许提及其中几位。首先是本书原著者米尔切夫教授。没有他详细解读,译者是不敢着手翻译的。即便如此,本书依然有不少翻译瑕疵,敬请读者批评指正;其次是乌克兰扎波罗热著名画家、史学专家米罗斯拉夫·多布良斯基和收藏家瓦列里·科济列夫两位先生。译者与他们素昧平生,但他们特意为本书中文版友情奉献了大量画作,本书呈现出来的只是其中部分作品。凭借这些精美画作,相信读者一定程度上能直观感受到历史上扎波罗热哥萨克的生活与战斗气息;再次,译者要感谢复旦大学赵世峰教授和安徽师范大学两江中心首席专家杨素梅教授。他们二位是本译著书稿的第一批审核者兼读者,为译者后续进一步校订提供了宝贵建议;最后,要感谢的是微信群“苏联东欧史研究会”的群友。群内各位专家在译者翻译过程中提供了诸多免费信息,其中周国长先生、张盛发先生、吕雪峰先生和国玉奇先生等,他们对译者提出的翻译方面的问题都进行过指点。

本书得以顺利出版,得益于安徽师范大学伏尔加-第聂伯两江流域研究中心领导、外国语学院领导、校出版社领导以及出版社吴琼老师等工作人员的大力支持与帮助,译者在此谨表深深谢意。

2023年3月28日 于芜湖



米尔切夫·弗拉基米尔 历史学博士，哲学硕士。乌克兰扎波罗热国立大学教授，安徽师范大学伏尔加—第聂伯两江流域研究中心特聘外籍专家。研究方向为哥萨克人历史（扎波罗热、库班、顿河等地哥萨克）及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巴尔干半岛各民族历史、语言和文化。发表论文两百多篇，出版专著十部。



吴世红 俄语博士，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历任外国语学院俄语系主任，副院长。2009年至2011年借调至中国驻哈萨克斯坦使馆工作；2018年至2021年为乌克兰扎波罗热国立大学独立孔子课堂首任中方院长。学术方向为俄语语言学、国别区域研究。

责任编辑：吴 琼

责任校对：晋雅雯

装帧设计：王增辉

姚 远

责任印制：桑国磊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微信公众号

上海建设/历史文化

ISBN 978-7-5676-6160-8



9 787567 661608 >

定价：15.00元